

A LITTLE PHILOSOPHICAL LEXICON OF ANARCHISM FROM PROUDHON TO DELEUZE



DANIEL COLSON

TRANSLATED BY JESSE COHN

Is the thought of Gilles Deleuze secretly linked to Pierre-Joseph Proudhon's declaration: "I am an anarchist"? Has anarchism,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been secretly Deleuzian? In the guise of a playfully unorthodox lexicon, sociologist Daniel Colson presents an exploration of hidden affinities between the great philosophical heresies and "a thought too scandalous to take its place in the official edifice of philosophy,"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we underst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 creative and yet precise way, Daniel Colson brings together two lines of thought – philosophy from Spinoza to Leibniz – and anarchism from Proudhon to the present day. At their intersection he discovers an affirmative and expressive anarchism that rejects all forms of resentment and negativity. This is anarchism as joy and empowerment rather than sadness and accusation." – Todd May, author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oststructuralist Anarchism*

"Colson's *Lexicon* is an inspiring resource for conceptualizing anarchism: it offers new, exciting paths for exploring anarchism with French thought and French thought with anarchism." – Iwona Janicka, author of *Theorizing Contemporary Anarchism*

"Offers a line of thinking that connects disparate thinkers ranging from Proudhon to Simondon to Nietzsche to Deleuze... What emerges is a radical challenge to the insistence on dialectic resolution, to occult left teleologies, and to the certainty that past anarchists have nothing to say to contemporary anarchists" – James Martel, author of *The Misinterpellated Subject*

Daniel Colson is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é de St.-Étienne in Lyon. He is the author of *Trois Essais de Philosophie Anarchiste: Islam, Histoire, Monadologie* (2004) as well as several studies of French labor history.

Jesse Coh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He is the author of *Anarch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Hermeneutics, Aesthetics, Politics* (2006) and *Underground Passages: Anarchist Resistance Culture, 1848–2011* (2014).

MINOR COMPOSITIONS

WWW.MINORCOMPOSITIONS.INFO

ISBN 978-1-57027-341-4



9 781570 273414

开放存取声明- 请阅读

这本书是开放存取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本电子书，它是一部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作品的开放存取版本，传统的印刷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所有次要作品的出版物全部免费放在网上。这是因为，自由和自主地分享知识和经验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图书发行的结构调整和日益集中使得难以(和昂贵地)有效分发激进文本的时候。免费发布这些文本并不意味着生产这些文本所需的精力和劳动力不复存在。人们可以认为，购买实物副本不是购买商品，而是支持或声援知识生产和参与研究(特别是直接从出版商那里购买)的一种形式。

这份出版物的开放获取特性意味着你可以:

免费阅读和储存本文件

免费分发给个人使用

把作品的各个部分打印出来供个人使用

在没有金融交易发生的情况下阅读或执行部分工作

然而，它违背了小调作品的宗旨，开放获取的方法是:

从作品中获得经济利益

出售作品或寻求与作品分配有关的金钱使用作品从事任何种类的商业活动通过使用或分配在商业机构内或通过商业机构分配的作品间接获利的第三方(在商业机构内的学术用途除外)

教育机构

作为一个项目，小型作品的意图是，使用集体制作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任何盈余，旨在回到进一步发展和制作进一步的出版物和写作: 来自公地的资源将用于继续培育这些公地。Omnia sunt communia !

支持小型作品/购买书籍

你正在阅读的 PDF 是一本实体书的电子版本，可以通过书店(包括网上商店)，通过正常的图书供应渠道，或直接的小型作品购买。请支持这个开放获取出版物，要求你的大学或当地图书馆购买这本书的实体印刷副本，或者你自己购买一本。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出版商: minorcomposition@gmail.com。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Daniel Colson

翻译: Jesse Cohn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Daniel Colson

翻译: Jesse Cohn

国际标准书号 978-1-57027-341-4

封面设计: Haduhi Szukis

玛格丽特·科尔乔伊的室内设计

由 Minor composition 2019 发行

科尔切斯特/纽约/华生港

小调作品是一系列的干预和挑衅，它们来自于自治政治、先锋美学和日常生活的革命。

Minor composition 是 Autonomedia 的一个版本

www.minorcompositions.info | minorcomposition@gmail.com

com

由 Autonomedia 发行

威廉斯堡车站 568 号邮政信箱

纽约布鲁克林 11211

[Www.autonomedia.org](http://www.autonomedia.org)

Info@autonomedia.org

目录

前言: 翻译手册

Jesse Cohn

前言.....

.....

先验/后验- 行动(实践)- 活跃的少数民族- 亲和(亲和群体)- 亲和(选择性亲和)- 肯定- 疏远

- 联盟- 利他主义- 类比(同源)- 无政府主义的权利

-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化学- 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 痛苦- 反独裁/反权力- 反某物- 反物种主义

- Apeiron- appetite- Application- Arrangement (collective Arrangement)

- 协会/分离- 自主

B.....

..... **41**.....

平衡- 基础(横向)- 成为- 存在- 超越自己的极限(超越自己的能力)- 身体(人体)- 炸弹- 老板- 大脑

C.....

..... **49**.....

资本-- 捕获-- 关心自我原因-- 混乱-- 卓别林-- 掌控自然--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 环境-- 阶级(社会、性别、代际等)-- 阶级斗争-- 分类-- 集体(社会)-- 集体存在-- 集体理性(公共理性)-- 共同概念-- 常识/良知-- 共同事物-- 交流-- 交流-- 组成-- 统一-- 构成-- 概念-- 一致意识--

约束-- 契约-- 矛盾-- 对立-- 约定-- 核心-- 文化-- 犬儒主义

D... ..
... .. 65... ..

Dao ism- Death- Definition- Dependency- Desire- Determination- Determinism-
Devil (diabolic, demons)- Dialectic- Differences- Dignity- Direct- Direct action-
Direct democracy- Direction of the conscience- Disassociation

- 纪律(自律)- 支配- 二元论- 记忆的责任

E... ..
... .. 75... ..

经济- 效益- 自我- 精神- 解放(肯定)

- 遭遇- 目的/手段- 能源- 实体- 平等
- 力量的均衡- 永恒的回归- 永恒- 伦理- 评价
- 倏逝(暂时)- 事件- 经验- 专家(科学家)- 表达- 外部/内部(外部/内部, 外
部/内在)

9... 9... 91

联邦主义- 反馈[回顾]- 焦点(聚焦)- 折叠- 力量(集体力量, 集体存在)-
分裂- 自由意志- 自由- 朋友的朋友

G... ..
... ..
... ..

宗谱- 总罢工(和起义者)大会- 慷慨- 姿态- 给予时间- 上帝- 良知- 好/坏
[bon/mauvais]- 好/坏[bien/mal]- 政府- 伟大的夜晚- 团体(团体)- 内
疚

H... .. 109... ..

圣经- 牧羊- 他律- 等级- 背后世界- 历史- 同源- 水平- 人文

我... .. 115... ..

理想- 理想(乌托邦)- 认同- 理想狂- 特质- 想象- 内在- 即刻- 强制委任- 不可察觉- 暗
示(利他主义)- 内隐- 无能/无力[冲动]- 无限- 不确定/不确定- 愤怒- 难以分辨- 个人
- 个体化- 本能- 不服从- 叛乱- 整体和平主义- 内部- 内部- 内部世界- 间隔- 亲密(亲
密, 亲密的圈子)- 亲密的存在[存在于时间内]- 直觉- 非理性 -

J... ..
... .. 129... ..

喜悦/悲伤- 审判- 正义- 辩护

我... ..
131... ..

劳动- 实验室- 缺乏- 领导- 自由主义- 生命(消逝)- 有限的无限- 局限- 局部主义- 闭锁的号角

M... ..
... .. **139**... ..

主战场/第二战场- 手册/知识分子- 大众- 主人/奴隶- 物质- 调解- 事物中间- 环境(自由意志主义环境)
- 军事- 流动性- 单一- 一元论(多元论)- 超越自我- 运动(变成)- 多重- 多样性

N... .. **155**... ..

自然法则-- 自然主义-- 自然-- 必然(自由)-- 否定-- 新儒家-- 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力量节点-- 游牧-- 非暴力

哦... ..
163... ..

目的- 对象- 一个(统一)- 压迫- 秩序(系统)- 组织- 其他(另一个)- 外部/内部

P... ..
... .. **169**... ..

特别是- 行为的通道- 过去的父权制- 人- 人(个人主义)
观点- 透视主义(透视)- 扭曲- 怜悯- 地点/网站
- 内在平面(一致平面, 构成平面)- 现实平面(构成平面, 世界)- 塑性力- 平台, 平台主义
- Plenitude- Pluralism (libertarian Pluralism)- Plurality- 政治委员
政治活力主义 -- 积极的无政府状态 -- 占有(财产) -- 可能性 -- 潜在力量[权力] -- 权力(集体力量) -- 外部力量 -- 实际意义 -- 实践 -- 前个人 -- 私人/公众 -- 亲女权主义 -- 浪费 -- 项目 -- 行为宣传 -- 财产 -- 亲某物 -- 精神病人 -- 公开忏悔 -- 处死

R... ..
... .. **203**... ..

存在的理由- 反应- 拒绝- 力的关系- 理性相对主义
- 陈述- 重复- 代表(代议制民主)- 反感- 排斥- 存在的保留- 尊重- 责任- 怨恨- 结果- 可撤销- 起义- 革命- 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 右翼/左翼- 右翼/法律(合

同、公约)- 破裂

S... .. 213... ..

悲伤/快乐- 科学- 科学- 科学法律(原因)- 科学家- 分离- 保密/透明- 选择- 自我批评- 自律

- 自我完善- 自我管理(自治)- 自给自足- 敏感- 敏感- 分离主义[非混合]- 系列辩证法- 系列(序列)- 人民公仆(国家或任何其他所谓的“更高”事业或权威)- 性- 意义- 奇点- 情境- 奴役/自由- 社会- 社会联系- 社会爆炸- 社会革命- 团结- 孤独- 物种活动- 自发性- 自发性- 自发性- 国家- 统计学(数学)

- 停止- 主题(革命主题)- 主体性- 颠覆- 痛苦- 超级丰富- 符号(标志)- 辛迪加(革命性)

- 综合, 综合(平台, 平台)

T... .. 239... ..

气质(特质)- 紧张- 恐怖主义- 理论/实践- 事物

- 时间- 与自己分离- 竭尽所能- 竭尽所能- 冒着生命危险- 被鞭打致死! - 工具/武器- 整体主义/极权主义- 传统- 超越- 转换

- 跨个人- 透明度- 信任

U... .. 257... ..
无意识- 统一- 普遍- 普遍的因果关系- 唯一的存在- 功利主义- 乌托邦

五... .. 261... ..

先锋- 复仇- 暴力- 男子气概- 至关重要- 自愿- 自愿服役

W... .. 265... ..

战争(好战)- 武器- 权力意志- 工人(工人主义)- 工人分裂主义- 世界(多元世界)

致谢

丹尼尔·科尔森感谢 j.p.e.，简历和 y.c. 纪念玛丽·露易丝·马塞拉。

杰西·科恩感谢丹尼尔·科尔森(获得许可，但更多的是感谢他的教育)、罗纳德·克雷格(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导师)、里昂研讨会的其他与会者(约翰·克拉克、弗朗西斯·杜普伊斯·德里和我们温和的东道主阿兰·塞韦内特),nathan Jun (帮助我学习科尔森法语)，Corinne Dupont (鼓励我听更多的声音，成为一个更好的继任者)，Mark Mellor 和 Arabella Bond (这个企业最好的不知情的赞助人)，还有很重要的，steven Shukaitis (因为他无限的耐心)，Margaret Killjoy (因为她可爱的设计工作)，和 Karen Alderfer (主要负责你手中这本书的可读性)。即使是伤害最终也有帮助。

前言： 翻译手册

媒体和法庭对“ Tarnac”事件的定义，以及国家将最激进的势力定为犯罪，并将其变成“恐怖组织”的努力。表明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从根本上脱离他们自身逻辑的运动。——丹尼尔·科尔森

理解无政府主义本身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理解它的方式看起来奇怪或不合理，它就是我们的我们必须首先质疑... 我们必须理解无政府主义的语言无政府主义，就像任何其他运动一样，最终意味着用我们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它。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翻译手册。
— Davide Turcato²

1.

在 2017 年最黑暗的一个月里，一群学生和一群“戴着面具的黑衣抗议者”阻止了米罗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预定的演讲活动。米罗雅诺波鲁斯是一个极右翼人士，以煽动竞选活动而闻名

科尔森，“革命主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25(2010 年秋季)：25-26。

Turcato, Making Sense of anarchy: Errico Malatesta's Experiments with Revolution, 1889-图尔卡托，理解无政府主义: Errico Malatesta 的革命实验，1889-

1900 年(贝辛斯托克，英国: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2012)，10。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对妇女的骚扰。为了保护社区不受他们认为是法西斯招募活动的影响，他们打破窗户，放火，直到扬诺波洛斯逃跑的消息传来。1. 这次黑色集团行动不仅招致媒体的批评——媒体可靠地将其描述为对“言论自由”的非理性、暴力攻击——还招致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批评。她指出，“暴力和非暴力这两个术语已经被其出现的框架所扭曲”(实际上，她长期参与的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已被贴上暴力的标签 2)，但她警告说，不要把暴力视为工具，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起初似乎只是一种工具，但在实现其目标时就会被抛弃，
结果却是一种实践，一种在实现目标时就设定目标的手段；
暴力手段则设定暴力为目标。换句话说，通过使用暴力作为
一种手段，一个人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加暴力的地方，一
个人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暴力。

此外，尽管她承认我们面临着“民主政治的危机”——一种日益普遍和有根据的信念，即选举不能充分反映或转化人民的意愿——但巴特勒认为，黑人集团的行动“只会加剧人们对实行民主的可能性的绝望和怀疑，而实行民主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在政治领域行使判断力、自由和权力，可以激活真正的多数派，将特朗普及其幕僚赶下台。”最后，她强调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些被砸碎的窗户属于小马路德金。学生会。为什么黑人集团，“一群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强壮的男人..。

麦迪逊公园和 Kyung Lah, “伯克利抗议 Yiannopoulos 造成 10 万美元的损失,”cnn 网站 (2017 年 2 月 2 日)。一年后,《反法:反法西斯手册》(Antifa: The Anti-Fascist Handbook, 2017)一书的作者马克·布雷(Mark Bray)得出结论:“黑色集团”行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它不仅拒绝了扬诺普洛斯在伯克利的演讲平台,而且还使得邀请他在其它场馆演出的提议变得难以接受,因为后来担心财产损失和负面宣传。参见 Bray, “Antifa vs. 米罗雅诺波鲁斯:谁赢了?”Salon 网站(2018 年 1 月 31 日)。

见,例如,卡里·纳尔逊的建议,“BDS 和哈马斯在概念上和政治上是相关联的”(“朱迪斯·巴特勒的问题:抵制以色列运动的政治哲学”,洛杉矶书评,2014 年 3 月 16 日),或者,更直接地说,艾伦·德肖维茨的 BDS: 试图扼杀以色列(普拉格大学,2014 年 7 月 14 日)。

事先就想到, 对许多人来说, 目睹校园建筑遭到袭击是多么痛苦, 而这场袭击象征着并尊重为争取民权而进行的斗争。”¹

几个月后, 在奥克兰不远处的一个会议上, Joshua Clover 尖锐地反驳了 Butler。对克洛弗来说, 问题不仅在于打破窗户的行为被描述为“暴力”, 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能(也不能)代表“人民”, 甚至对白人至上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被描述为某种程度上与它所抵抗的东西相同。问题还在于, 像巴特勒这样的话语倾向于将所有行动都归结为代表, 而这种归结已经是压迫性的了。巴特勒的话语将黑色集团变成了白色的象征, 建筑变成了黑色的象征。在这种姿态下, 玻璃、钢铁和资本的物质现实被变得面目全非, 拒绝法西斯主义在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物质实践变得难以理解。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激进政治的一种广泛而明显的形式, 但自从 99 年西雅图黑人集团在媒介化的公众注视下首次亮相以来, 围绕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几乎没有改变。一些学者试图以各种方式表明, 这种表述带有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性误解——这种误解再现了受无政府主义挑战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偏见。在这种自由主义模式中, 政治生活在一个城邦中展开, 在这个城邦中只有一件事情必须发生: 公民对话, 公民之间的言论自由交流, 就共同利益相互推理。武力只能(非法地)作为对这种不断循环的迹象的威胁或(合法地)作为允许这种循环的秩序的恢复而进入这个空间。这种模式无法解释建立公共领域时经常采取的暴力行动, 也无法解释行使“合法”暴力的权力最初是如何形成合法性的。³ 它也无法预测法西斯主义如何能够在自由城邦中获得立足点, 将其行使武力表现为合法交换标志(“言论自由”), 将其反对者表现为非法武力(“暴力”)的代理人。通过这种方式, 自由主义者被说服

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大局: 抗议、暴力和非暴力》,

Publicbooks.org,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例如, 参见 Don Herzog, “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庸的自由主义”, 《政治理论》35.3(2007): 314-15。

见 UTA 编辑委员会, “面具背后: 暴力和代表性政治”

大卫·格雷伯, 《可能性: 关于等级制度, 反叛,

and Desire (Oakland, CA: AK Press, 2007), 365-66; a.k. Thompson, *Black Bloc, White Riot*:

《反全球化与异议谱系》(爱丁堡: AK 出版社, 2010), 11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允许法西斯主义者进入美国城邦的剧院作为他们的权利，驱逐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完全陌生的侵略者。

在这种背景下，丹尼尔·科尔森的词典尤其受欢迎。科尔森从德勒兹对“意义”和“力量”二元论的反对中汲取灵感，将其与蒲鲁东的“思想源于行动”的原始实用主义观点联系起来，阐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要素，这种理解彻底反对自由主义模式，即无情地将思想从行动中分离出来，将标志从力量中分离出来，将“好的”守法抗议者从“坏的”恐怖分子元素中分离出来正是从这种激进的一元论和内在主义的视角，无政府主义行动才能被理解和有意义的评估。这里，然后，是一个“翻译手册”，如已被要求。

2.

就在伯克利冲突发生的前几天，Iwona Janicka 发表了《当代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团结、模仿和激进的社会变革》，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具有煽动性和说服力的理由，来解读 Judith Butler (以及其他人的) 作品，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理论结构来理解当代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特勒对“黑色集团”行动的批判引发了一个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拒绝那种功利主义的盘算，在这种盘算中，位于未来的理想的、最终的目标证明了当前的任何行动，无论多么肮脏。这种拒绝的积极结果是预示性的实践，即试图在产生预期未来的斗争中制定预期未来：“对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正如科尔森所说，“目的必然包含在手段中。”巴特勒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并不陌生。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赞扬巴特勒对酷儿理论的贡献，她也证实了自己的兴趣

参见科尔森的“手动/智能”条目

汤普森，黑色集团，白色暴动，35。

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团结、模仿和激进社会

Change (London: Bloomsbury, 2017), 161.

请参阅「目的/方法」一栏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接受预设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完全“未经证实”的概念(迈克尔·弗里登，《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概念方法》[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5)。要了解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概念的质疑，请参阅 Uri Gordon 在《政治研究》(2017年6月22日)中的“介于道德实践和缺乏承诺之间的预兆式政治”：1-17。然而，戈登的“预成”系谱似乎使它成为一个可疑的概念，只有在(在一些概念化)，它似乎预先假定的“随着时间的掌握”，科尔森的概念化明确拒绝。

例如，参见 Lucy Nicholas 的《无政府主义，教育学，酷儿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走向积极的道德理论，知识和自我》，《无政府主义教育学：集体：

她参加了 2011 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举行的一次高调会议“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会上她就亲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讲话。然而，正如我们从伯克利那样的对抗中所看到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破坏财产是暴力行为，他们也不把预设原则解释为禁止暴力抵抗压迫。在这个翻译过程中，误解从何而来？

巴特勒对无政府主义最具体的介入(作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主题)也采取了一个关于翻译和可译性的问题的形式：“以色列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应该得到感激的接受，”她建议说，“理解巴勒斯坦压迫问题的词汇在巴勒斯坦和在以色列可能完全不同。”²换句话说，即使巴勒斯坦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怀疑国家主义项目，“如果巴勒斯坦的民族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能够或应该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斗争”的问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明显的“僵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各种不同的斗争如何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对于巴特勒来说，这个问题只能通过黑格尔无休止的“文化翻译”来回答，对于这个过程，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太没有耐心了。然而，她没有停下来问这个交叉斗争的问题——事实上是 1960 年代后激进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否已经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阅读这一传统的边缘，科尔森从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第八次研究中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参考得到了相当大的灵感

教育的行动、理论与批判性思考。Robert h. Haworth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242-259 and Lena Eckert, “Intersexualization and Queer-Anarchist Futures”, *Queer Futures: Reconsidering normality,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al*, ed. 伊拉赫·哈谢米·耶卡尼, 比特丽斯·米凯利斯, 伊芙琳·基利安(Aldershot: Ashgate, 2013), 51-66。

参见巴特勒, 《关于组装的行为理论的笔记》(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

大学出版社, 2015), 160-63, 杰米·赫克特和朱迪思·巴特勒, “关于无政府主义: 访谈朱迪思·巴特勒, “无政府主义与性: 伦理, 关系与权力, 编辑。

Jamie Heckert and Richard Clemin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03-130.

巴特勒, “巴勒斯坦, 国家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僵局”, 《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 雅各布·布鲁门菲尔德主编(伦敦: 冥王星出版社, 2013), 208。

Ibid. 215-17.

巴特勒, 《重塑宇宙: 霸权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局限》,

《霸权, 普遍性: 当代左翼对话》, 朱迪思·巴特勒, 欧内斯托

Laclau, and Slavoj i ek (London: Verso, 2000), 20.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本书至今尚未出现在完整的英译本中。在对 17 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批判中，蒲鲁东认为，虽然困扰他们的问题(例如“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分割”或“是否存在真正的灵魂”)仅仅是推测性的，但他们关于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问题可以在实际的政治术语中重新思考。¹ 因此，即使我们不把任何文学现实归因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无限小、不可分割的存在原子，每个原子都不能从外部修改，但它们以协调的方式一起运动——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思考个体与集体、自治与合作问题的模型，或者用更现代的说法，思考机构与结构问题。科尔森观察到，这种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简略提及，在德勒兹(特别是在《The Fold》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重新阐述的那样，它被细化为一种“新单子论”科尔森综合了蒲鲁东、德勒兹和塔尔德的观点，阐述了“一个基于生物自发性的世界的概念，一个万物来自内部的世界”，尽管如此，正如塔尔德所说，这是一个“一切都是一个社会……一切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事实”的世界³

起初，这似乎只是对更为熟悉的概念的一种奇怪的修饰，即我们认为是统一的、完整的类别或实体(如“人类”、“女人”或“自我”)实际上是异质的复合体(用德勒兹的术语来说，是“集合体”)。然而，科尔森感兴趣的似乎是单子学更神秘的方面：如果一个单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没有方式接收或发出的迹象，它如何沟通和协调其他单子的运动？换句话说，莱布尼茨奇怪的本体论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于

《革命与教堂中的正义》，第 3 卷(巴黎：河流，1930-5)，第 408 页，我自己的译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尔森和德勒兹欣然承认，莱布尼茨和塔尔德都是极权主义者：正如德勒兹在他关于莱布尼茨的演讲中所说：“他是秩序的哲学家，甚至更是秩序和警务的哲学家……他只从秩序的角度来思考。”然而，德勒兹指出，正是这种对秩序的愤怒或“呐喊”，推动莱布尼茨进入“我们在哲学中所见过的最疯狂的概念创造”(德勒兹，“Cours Vincennes”[1980 年 4 月 15 日]，trans. 查尔斯·j·斯蒂维尔(Charles j. Stivale)，Webdeleuze: Les cours de Gilles Deleuze, 2018 年 2 月 10 日。)一旦单子论从保证和谐的上帝的“神圣抵押”中解放出来，科尔森认为，“它就从(神圣)秩序的保守理由转变为这种秩序的颠覆性概念，转变为解放的必要性：必须以一种极端内在的方式，建立莱布尼茨认为已经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科尔森，三篇哲学无政府主义论文：伊斯兰，历史，单子论[Paris: Léo Scheer, 2004]，91-92, trans. 我自己)。

参见“焦点”条目

知识的领域。”¹正如科尔森在其他地方写到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新一元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关于虚构作品如何可能与一个看似十分明显的现实相联系,现在的事件如何可能与一个看似无法挽回的失去的过去相联系。它提出了一种认识的方式,包括“在他人中‘发现’自己,在已经存在的自己中发现他人……存在于自己与他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于所有他人之中。”²

科尔森在《哲学与档案学三篇论文:伊斯兰教,历史,单子论》(2004)中对他的新单子论的总结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莱布尼兹推断,虽然每一个单子都是无窗的,“这种所有创造的事物与每一个、每一个与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或适应,意味着每一个简单的物质都有表达所有其他物质的关系,因此,它是宇宙永恒的活镜子。”³类似地,在新单子论理论中,每个存在都与所有其他存在有着内在的联系:

每个存在本身都拥有所存在事物的总体性,即各种可能性的总体性,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属于它的“视角”来看。换句话说,每一个存在同时都是完全独特的,在其观点的独特性上与其他所有存在不同,同时,与它们相似,与它们“完全”相似,人们可能会说,因为与它们相似,它本身包含了可能的观点的全部,即使只是从某个观点来看。换句话说,在新一元论的方法中,现实必须完全被思考[引用 Jacques Rivelaygue]“在主体的模型上”,从一个“主观的基础”,一个无限多的力量和主观的和单一的观点开始,每一个都可以正确地声称能够进入存在的事物的总体。⁴

在这个模型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不需要翻译或翻译”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行动,而不需要先锋知识分子的调解或中央委员会的指导。⁵与其寻求超越“普遍性”的总体统一中的差异,或者将所有的斗争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范畴(阶级、性别、种族、生态等),参与社会斗争的力量可以彼此联系起来,用费利克斯·瓜塔里的话来说,就是沿着“跨一元轴心,其中之一”

Colson, *Trois essay*, 87, trans. my own 科尔森, 三篇文章, 87, 我自己的翻译。

科尔森, 三篇论文, 42-43, 我自己的。

莱布尼茨, 《单子学》, 罗伯特·拉塔译(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898年), 56页。

科尔森, 三篇论文 87, 我自己翻译。

参见“保密”条目

横向性。”¹ 这样，无数不同的力量可能还是会找到一种奇怪的共性——一种“陌生人的统一”，正如德勒兹所说，“这种统一只能表征多重性。”²

尽管这种新一元论看起来很抽象和具有推测性，但它暗示了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就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活动分子在 *bili'in* 的一个军事建筑工地遭遇一样具体：看似不同甚至不和谐的运动、团体和身份是如何以足以挑战统治力量的强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形成这些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重新陷入另一种功利主义手段——目的盘算——科尔森称之为“政治的机械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总是要定义其他人……并将他们归类为权力棋盘上的朋友或敌人，以便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战略征服或捍卫他们”？³ 事实上，我们如何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而不仅仅是“朋友的朋友”或“敌人的敌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价值可以归因于身份，归因于经常被嘲笑的“身份政治”？

在一个类似于巴特勒的举动中，科尔森提出了骄傲的霍尼亚式的“类比”概念，作为一种简化的战略分析的替代，在这种分析中，每种形式的权力最终都必须追溯到一个单一的来源（例如，妇女的压迫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旦“现有秩序或制度的矛盾”得到解决，就会自动消失，或者充其量是作为一个辅助问题，在定义性革命之后解决，“推迟到时间的尽头”）：如果教会、国家和资本产生类似的权力效果，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也不是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结构。但是，巴特勒强调了“类比”核心的非身份性——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禁止“假定一个群体的痛苦与另一个群体的痛苦相似”——科尔森认为，不仅压迫形式之间的“类比”是有用的，而且我们发现，在被压迫者之间存在一个可能的“亲和力”世界，这正是“自由意志主义力量彼此联系”的逻辑⁴

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斗争逻辑的情况下，无数不同的斗争可能会发现一种奇怪的共性，即德勒兹的“陌生人的统一”类比和亲和力

费利克斯·瓜塔里，“*Ritornellos* 和存在主义影响”，翻译。朱莉安娜·希萨里(Juliana Schiesari)和乔治·范·登·阿贝尔(George Van Den Abbeel)，《瓜塔里的读者》(The Guattari Reader)。盖瑞·吉诺斯科(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167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翻译。Brian Massumi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158(我自己的修改)。

参见“我们朋友的朋友”条目

巴特勒，《分道扬镳：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128页。参见 Colson 的条目“类比(同源性)”和“亲和力(亲和群体，选择性亲和力)”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例如, 在 2011 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里, 埃及学生在解放广场跨越“跨一元轴心”, 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迎接抗议的工会工人, 他们表达了欢乐的认可, 以及解放广场的占领是如何在 Zuccotti 公园成为“镜像”的。也许我们可以说, 这是对古典人文主义颠覆性的普遍主义口号的回归, “没有什么是人类对我是陌生的”, 但没有人文主义的正常化负担: 没有什么是对我来说陌生的。

在这些假设下, 科尔森的新一元论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另一种方式, 以避免致命的二分法, 在这种二分法中, 激进的理论如 -ten 被困: 不仅是统一/差异、普遍/奇异、结构/能动性和理论/实践, 而且还有一元论/多元论、自我/他者、主体/客体、观念/物质、自然/机械、人/非人。这些也是 Iwona Janicka 书中的首要目标。

3.

2001 年, 索尔·纽曼(Saul Newman)出版了《从巴枯宁到拉康: 反威权主义与权力的混乱》(From Bakunin to Lacan: Anti-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Dislocation of Power)一书。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通常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 以英语为母语的理論家通过“法国理论”的纠正透镜重读“古典无政府主义”尽管这些尝试往往是建设性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尝试阅读《从巴枯宁到拉康》的尝试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 在很大程度上, 后无政府主义的英语作品并没有深入了解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经验。英语国家的后空想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某些主要解释过滤, 依赖于一些被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政府主义同行的关键思想家, 他们往往满足于忽视其他过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包括女性、非欧洲人以及二战后几代人的声音), 以及理论家写什么和激进分子做什么之间的区别。

第一个错误导致了第二个错误。以英语为母语的后天主义者几乎都把无政府主义传统解读为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 即卢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非建筑派学者在过去几代人中对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有时还有斯特纳)的沉淀解读。他们几乎不相信, 除了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任何其他东西都会允许一个理性的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期待出现其他东西。事实上, 那些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一起行动的方式的人都很清楚他们

假设人类行为是文化和环境以及自然的复杂产物。否则，为什么还要费心制定联邦制的做法，以保护地方自治不受上级的侵犯，或者以立即罢免为代价，通过强制委任的方式直接举行民主代表集会？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真的相信“自然”是秩序的充分来源，为什么他们如此关注组织的细节？为什么天生善良的信徒如此强调教育和道德？但是，如果一个人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仅限于看一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或斯蒂尔纳的《自我与自我》，那么这些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

由于被认为是“古典”无政府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承诺，英语国家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忽视了传统中的实际理论资源，而选择将后现代主义理论重新解释为已经暗示了无政府主义政治。这使得他们能够将后现代主义从其改革主义的解释中抽离出来，将其重新写入1968年5月的语境中。然而，他们经常无法完全区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和相对主义的解释。如果福柯坚持认为权力和知识是一起传播的，那么一些后斯坦格主义者似乎认为，打破对知识的主张等同于分散权力的影响。因此，后斯坦纳主义的实践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抽象的游戏，一场学术运动：“为解放而斗争，”安德鲁·M·科赫宣称，“具有政治上的抵制性，抵制一种服务于控制和操纵利益的语义和隐喻还原论的进程。”¹后现代无政府主义从事“对现代政治经济符号学堡垒的象征性攻击”，旨在“推翻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法律”，Lewis Call 写道。²这种“抵抗”的主题，这种“攻击”（“革命”一词已经消失），是根据思想和认识（认识论）而不是根据存在和行为（本体论和伦理学）来定义的。其结果有时很难与自由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称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区分开来：“在上个世纪，有些哲学家认为，除了思想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些人写作的时候好像除了文本什么都没有。”³

然而，科尔森所做的不仅仅是将19世纪的传统翻译成20世纪的话语。相反，在他的哲学小词典中，无政府主义阐明了后结构主义，将后结构主义置于完全不同的立足点上。纽曼的《从巴枯宁到拉康》和科尔森的《从骄傲到

¹“后结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社会科学哲学》23.3(1993)：348。

Lewis Call, *Postmodern anarch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2), 5.

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随笔，1972-1980》(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2)，139页。

德勒兹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被解读为富有洞察力但不成熟, 背负着人道主义, 尚未装备精神分析和解构的激进工具)到福柯、德勒兹、瓜塔里、德里达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 科尔森的书没有这样的叙述。它利用“字典和手册”的通用架构(通过一种轻微的“模仿”), 给我们提供的不是一系列自命完整和权威的定义(见“定义”的导言和定义), 而是一个根状茎——一个相互关联的节点组成的无中心网络, 在这些节点之间, 意义可以在多个方向传递。这种根茎结构允许在无政府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颠覆性和启发性思想的实例, 包括重要的非西方声音)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和多边的关系, 因此, 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德勒兹作为普劳顿的继承者来解读的问题,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德勒兹的镜头来重新解读普劳顿。

这样, Colson 开始为 Proudhon (和 Bakunin, Courderoy, Déjacque, Michel, Makhno, Pouget...)做马克思主义学者如 Antonio Negri 早就为马克思做的事情。内格里在他的书《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的标题中给了我们, 科尔森创造了一个“超越普鲁东的普鲁东”, 一个创造性的翻唱, 通过使他们自相矛盾, 或者用科尔森的德勒兹的术语来说, 通过展示他们的潜力“超越他们的极限”, 成为“超越他们自己”, 来表明他们对创始文本颠覆性精神的忠诚¹《内格里报》以后现代的方式重读了马克思的著作, 即“在边缘”和“反对谷物”, 从而帮助重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阅读马克思的“边缘”意味着阅读一部不完整的、过渡性的著作《基本原则》, 这部著作以前在马克思主义语料库中是边缘性的, 并且表明它本身就值得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部准备工作, 或者是一部不完整的经典著作。解读“逆其道而行”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 而不是对“马克思”意味着什么和做了什么的某些公认的观念, 例如, 马克思是一个“客观主义和决定论”思想家, 对他来说, 对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最终排除了工人的主体性、自发性或历史方向的选择。相反, 内格里为把马克思解读为一个工人“主体性”和自我活动的思想家找到了依据, 因此, 马克思回溯性地成为内格里“自主性”的先知——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概念装备中几乎没有位置。同样, 当普劳登未能通过自己激进思想的检验, 陷入厌女症和偏执时, 科尔森允许他最好的概念(例如“集体力量”、“集体理性”和“结果”)充当

1 参见“限制”和“有限的无限”条目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一种内在的批判，使得蒲鲁东“超越自己的极限”同时，Colson 允许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估后结构主义的含义，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来重新描述它。这个翻译可能

最深刻地发生在骄傲的“集体存在”、“集体力量”和“集体理性”三元组中。如果像 Murray Bookchin 所抱怨的那样，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解释倾向于产生一种私人化的世界体验，一种没有主题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题中，解放似乎是想象一个人是自由的自由，² 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典重新恢复了其适当的社会维度：解放当然需要梦想，但它是一个集体项目。我不知道科尔森是如何有意识地着手这么做的，但他的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德勒兹和瓜塔里从他们思想中的“加速主义”元素中解救出来，根据这些元素，先进资本主义已经在做自我毁灭的工作——几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类似目的论元素的戏谑性夸大。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对自我形象私有化或消费主义的自由潜力的庆祝。也没有任何文本主义的空间：“我试图‘说’的一切。”正如科尔森在其他地方评论的那样，

正是在于，一方面，从不将行动与思想、力量与意义分开，另一方面，从不将一方置于对另一方的损害之上…… 德勒兹的这一立场是好战的自由意志主义话语本身的核心，是直接行动概念的核心，当然也是行动宣传概念的核心，这是一个新兴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概念，一个既实用又理论的概念，它本身证明了它所肯定的东西：行动与思想、力量与意义不可分割的特性

在这里，德勒兹对巴鲁克·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创造性挪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斯宾诺莎提出的“平行主义”本体论——对现实的描述，“思想”和“延伸”（或者更著名的“上帝或自然”）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蒲鲁东和德勒兹都回避了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西方思想的还原论问题，即思想或物质是否更真实的问题。

例如，参见“Monad”和“Labor”的条目

Murray Bookchin, 社会无政府主义或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加州奥克兰：AK 出版社，1995）。

科尔森，《丹尼尔·科尔森对爱德华多·科伦坡的回应》，第 8 卷(2002)：第 144 页(我自己翻译)。

这反过来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非先锋式理解扫清了道路

通过德勒兹和德勒兹对蒲鲁东的重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说后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与它的历史发展是一致的,同时也与我们接受的一些关于它的最持久的观念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也不仅仅是一种“否定否定”,它可以用一系列反对意见来定义,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是由它想要克服的压迫性力量决定的;它是深刻肯定的,“肯定了多样性、无限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它们构建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统治或依赖形式的世界的的能力,而不是完全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的自由结合。”²

4.

当然,任何“简短”词汇中的定义都不能自称是决定性的。例如,有人可能会问许多遗漏的重要性。科尔森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选择和评价已经被证明是有争议的:原始主义等三种完整的思潮甚至不值一提,而且尽管这本书证明了对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遗产的极大尊重,但是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会对“阶级”、“运动”和“组织”的讨论提出异议此外,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这里都有代表,然而雅克·拉康——纽曼后空想主义叙事的终点和当代激进哲学家的关键参照物——却明显缺席。

事实上,科尔森不仅是“拉康左派”的最严厉的批评者,而且也是整个激进思想谱系的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些思想谱系归功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某种解读。其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最近对理查德·j·f·戴(Richard j. f. Day)所称的“承认的政治”和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所称的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作品核心的“构成性缺失的政治理论”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参见“理论/实践”条目

参见“反对某事”、“解放(肯定)”和“无政府主义”

参见“选择”和“评价”的条目,以及爱德华多·科伦坡的评论,“无政府主义与哲学:对丹尼尔·科尔森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汇的提议”,摘录 8(2002): 127- 41。

还有米歇尔德塞都,乔治阿甘本,以及一些德勒兹本体论的奇怪来源,这些来源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不仅有有神论者如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还有基本上不关心政治的吉尔伯特西蒙顿和恶毒的反无政府主义者加布里埃尔塔德,一个地方法官和犯罪学家(见科伦坡,“l'anarchisme et la philosophie”)。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第一章黑格尔的欲望概念的特点是通过在交战的主体之间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著名的“主奴辩证法”)来寻求“承认”，因为拉康的主体性理论就是这样被引入的，这意味着一个主义所渴望的那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横向的秩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回事,”格雷伯评论道,“说寻求相互承认必然是棘手的,充满陷阱,不断有陷入控制甚至消灭他者的企图的危险。从一开始就认为相互承认是不可能的,这是另一回事。”² Colson 更加直言不讳:“(我)在欲望作为缺乏的理论中,与他人的相遇变得不可能。”³

尽管 Janicka 注意到 Butler 的思想也被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强烈地标记出来, Butler 尖锐地批评拉康理论(“一种‘奴隶道德’”,因为她在《性别问题》中这样标记它),因为它倾向于将“缺乏”实体化为一个新的准神话基础。虽然科尔森可能会质疑任何特权的“翻译者”是否有必要在单子之间进行调解,但他并不否认符号在允许形成“能够在符号和语言领域‘翻译’这些集体存在所包含的‘行动方式’的更广泛的集体存在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巴特勒和科尔森都对那些被允许“凝结”、“沉淀并具体化”成僵化结构、“赋予人类创造的东西绝对性”的符号所构成的“陷阱”心存警惕⁷ 巴特勒和科尔森在质疑和破坏“身份本身的监管实践”作为物化的主要形式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巴特勒的身份是“女人”和“同性恋”,科尔森的身份是“工人阶级”,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

David Graeber, 《消费》,《当代人类学》52.4(2011年8月):494;

格兰西已死:最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伦敦:

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缺乏组织性的政治理论:批判》,《理论与事件 8.1》,2005年版。

格雷伯,“消费”,494。

见科尔森,“缺乏”的条目

杨尼卡,《理论化当代无政府主义》,26-7;巴特勒,《性别问题》,72;巴特勒,《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限制》(纽约:路德里奇,1993),201-2。

科尔森,“符号(符号)”条目

巴特勒,性别问题,二十一,二十三。

Colson,“符号(符号)”条目

巴特勒,性别问题,32;科尔森,“阶级(社会,性,代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这些相似之处确实引人注目:“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势力都声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以及它在存在的根源——一个无所不能的第一原则——上进行斗争的意义

这种固定性的表现, 也许表明他们彼此接近 Tarde。塔尔德宣称“一切都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结果是, “社会是模仿的”: 雅尼卡写道, 塔尔德的单子“有一种作为社会的倾向,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联想, 意味着同化, 也就是模仿。通过巴特勒所说的“颠覆性重新意义化”和科尔森所说的“自由意志主义的重复”, 他们发现的不是人文主义的悲剧必然性, 而是“解释和重新解释事件和事实的意义的无限能力。”²

鉴于《无政府主义哲学小词典》和一位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交集, 更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 这里提到女权主义的内容并不多见, 而且有时还有明显的误导。弗朗西斯·杜普伊斯-德里注意到, 虽然塞巴斯蒂安·福尔的《无政府主义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anarchiste, 1934 年出版)包含了一个关于“女权主义”的条目, 但无政府主义的小哲学词典却没有这样一个条目。相反, “支持女权主义”的空白标题导致了“支持某种东西”的条目, 科尔森在其中阐述了由白人直男内疚驱动的行动主义的常见危险。这种虚幻的女权主义发现

为自己的斗争辩护(上帝、国家、资本、父权制等等)——仅仅是参与到自己假装与之斗争的力量中,”科尔森写道。巴特勒写道: “为了政治化的目的动员身份类别始终受到身份成为一个人所反对的权力工具的前景的威胁。”。两者都强调身份是效果而不是因果起源——用 Colson 的术语来说, 即“下游”(“下游”, 其他事物的产品或结果, 后验)而不是“上游”(“上游”, 基础性或先验): “性、性别和欲望的基本类别是权力特定形成的效果……被指定为起源, 并导致那些身份类别, 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效果, 具有多重和分散的起源点”(Gender Trouble, xxix)。或者, 正如科尔森所说, “对于自由主义思想来说, 贯穿和构建我们社会的巨大分裂(工人/资产阶级、男人/女人、年轻/老人、白人/黑人、城市/农村、高/低、进/出、左/右、支配者/被支配者等等)并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众多力量和支配关系的起源。相反, 他们是这些关系的整体效应”(“阶级”的入口)。

Janicka, 理论化当代无政府主义, 96。

巴特勒, 性别问题, xxxi; 科尔森, “重复”和“永恒的回归”条目

杜佩斯-德里(dupuis-deri), 《面对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法国与魁北克的比较》(l'anarchy face to féminism: compare france-quebec)

好战主义者 ed. Olivier Fillieule and Patricia Roux (Paris: pres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cs, 2009), 198-99n10.事实上, 福尔的女权主义百科全书第二卷中有两条关于“女权主义”的条目, 一条是让·马雷斯坦写的, 另一条是玛德琳·佩莱蒂尔写的。百科全书和科尔森的词典都有缺陷, 因为它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种族主义、能力主义和其他重要的压迫模式。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交代情况”条目中也有类似的回应。据推测，这种仪式是由不知名的“北美涌现的潮流”实施的。在这种仪式中，“每一股反叛势力”都必须“立即服从一个比自己更受控制的势力，向另一个势力‘交代情况’，‘在其监督下’行动和思考。”¹如果这充其量看起来像是保守派谴责的“政治正确”的讽刺漫画，那么它可能反映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缓慢而艰难地接受了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言论，根据杜普瓦-德里的说法，这些言论仍然深受法国“共和主义言论”的“普世萨利主义”的影响²也许这也反映了科尔森原始材料中的性别偏见：如果一个人试图写一篇关于“性”的文章，只引用斯宾诺莎(她的政治论文宣称“女性在本质上不与男性平等”)和普劳顿(她推测“让女性隐居”可能是明智的，因为她可能只是“交际花或家庭主妇”)，那么可以期待什么呢？即使他否认任何“解剖学或论述性”的基础，当科尔森坚持“男子气概，在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的术语，是无关的性别和性别的类别，”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肯定”和“力量”，这是很难接受的表面价值，我们也不能避免听到一个荣耀的回声，他写道，“天才是……精神的男子气概，它的力量抽象，概括，发明，受孕，儿童，太监，妇女同样被剥夺。”⁴

公平地说，北美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抱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讨论随时可能演变成“压迫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修辞竞赛，在这种竞赛中，相对缺乏特权可以转变成一种“亚文化资本”⁵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达到科尔森所描述的专制的“陈述”，正如劳拉·波特伍德-斯塔瑟指出的那样，“追究人们对压迫行为的责任”的纳粹主义社会实践“很容易被误认为(或者实际上堕落为)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和武断的边界管理。”⁶ All 6 所有

Colson”账户呈现”条目

杜佩斯-德里，《面对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193,196。

巴鲁赫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文和政治论文，翻译。埃尔韦斯(r.h.m. Elwes, 纽约:多佛, 1951) , 387; 蒲鲁东 qtd. 《女人的哲学》(Jenny d'héricourt, a Woman's Philosophy of Woman; Or, Woman franchised: An Answer to Michelet, Proudhon, Girardin, Legouvé, Comte, and Other Modern Innovators), 84。

傲慢, De la Justice, 4.197。

阿比火山,“边境警察”,奇怪的无政府主义:解决和脱衣权力和欲望,编辑。大胆, j 罗格,德里克香农,和阿比火山(奥克兰,加州:AK 出版社,2012年),34; 劳拉波特伍德-斯塔瑟,生活方式政治和激进行动主义(纽约:布鲁姆斯伯里,2013年),60。

Portwood-Stacer,《生活方式政治与激进行动主义》,90。

然而, 这本书与无政府主义环境中的各种压迫行为共存, 从微侵略和操纵到种族主义和强奸。事实上, 科尔森正确地观察到, “传统的分歧... .. 以及屈从于外在权威的做法”——包括所有邪恶的性别、种族、性取向、能力等等——“继续在似乎是最和平和自由的行动范围内运作。”那么, 我们就更需要“不断地讨论和修改最微小的关系”, 不断地评估和实验“最脆弱的现实和关系, 数以千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吃饭和穿衣, 爱和学习, 生育和衰老。”²

如果将科尔森的文本解读为恰恰呼吁无政府主义集体目前所从事的那种内部审计, 是否有悖常理? 科尔森认为, 某种“易怒”、“敏感”、甚至“超敏感”、“对关系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的警惕关注”、“对细节的痴迷”以及“一种夸张的民主”实际上适用于任何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作为一种持续的评估实践, 旨在确保“自治和尊重它所联系的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我管理,”他写道, “总是被置于紧张、冲突和不稳定平衡的标志之下, 而这种平衡必须不断寻求。”科尔森指出, 这种内部平等关系的“平衡”的一个关键保证是, 个人和团体有权利和能力脱离社团和联合会, 形成平行或自治的集体。他写道: “妇女运动要求分离社团的要求,”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项目的基本要求... .. [和]需要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完全自治的集体力量, 负责通过试验各种结合和分离的方法, 具体证明其有效的解放性质。”⁴

最终, 《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小词典》预示了女权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本身的哲学小词典的重新阅读和挪用。也许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精明读者会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 “打开[它], 直到[它]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和意义为止”, 这样它就可以“超越自身的限制”, 正如科尔森的文章似乎预言的那样:

Colson “Hierarchy” 的条目

科尔森, “常见概念” 条目

参见“敏感性”、“阶级(社会、性别、代际等)”和“自我管理” 条目

科尔森, “分离主义” 条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厌恶女性的普劳登能够使我们在一个半世纪后思考和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价值，以及她们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潮流的肯定和意义。”¹

这里，这本书的承诺是：它是开放的意义，翻译。
你现在就是翻译。

5.

“找到彼此，”隐形委员会在《即将到来的起义》(2009)中敦促道，“找到你的朋友和同谋”在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就职的行动呼吁中找到了回音² 如果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紧急状态’不是例外，而是规则”，³ 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当前的世界危机感到恐惧，因为这场危机反映了上个世纪全球法西斯主义崛起的黑暗岁月，而且也反映了这场危机前所未有的方式，因为地球上生命的基本进程正在迅速瓦解，尽管技术进步为统治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找到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小词典所描述的，交往和集会的艺术，实验和评估关系的艺术，也是如此。

愿它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工具。愿它改变你——也愿你改变它。

科尔森，输入“多重”

无形的委员会，即将到来的起义(纽约: Semiotext (e)，2009年)，97; “西雅图呼吁自治行动 # j20,”它正在下降(2016年12月24日)。

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照明》(Illuminations)，译。哈里·佐恩，编辑。汉娜·阿伦特(纽约: Schocken 出版社，2007)，257。科尔森对本杰明的文章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参见丹尼尔·科尔森的《历史的天使》，《自由世界 1377》(2004年11月18-25日)。

前言

无政府主义，由于其丰富多彩的、有时是残酷的历史，其要求的极端性，以及其主要人物的边缘性或民俗特征——但也由于其大多数理论文本的性质——从未在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得到真正的承认。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其社会和理论含义的激进性、连贯性和直接性才有希望变得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的提法已经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种记忆模糊的好奇心，一种微不足道的、或多或少令人同情的提法，年轻人有时必须对此表示敬意。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也许是第一种可读性，一种直接的、隐含的经验和感知的加倍。正如其主要理论家经常声称的那样，它主要归功于外部因素：在短时间内，从上海到巴黎，从华盛顿到柏林或东京，这些事件席卷并撼动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但同时也是一种似乎与历史无政府主义无关的当代思想的外部因素，这种思想更多地指向尼采，而不是普鲁登，更多地指向斯宾诺莎(Spinoza)，而不是巴枯宁或斯特纳，同时在一种地下但不可否认的人性中，帮助恢复一个政治和哲学项目的意义，这个项目甚至在能够表达它所包含的内容之前就被遗忘了。这至少是这个词典想要建立的：展示尼采主义的福柯或德勒兹，重新解读斯宾诺莎或莱布尼兹，这些思想家允许的，以及目前重新发现的加布里埃尔塔德，吉尔伯特西蒙顿，或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不仅给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例如，普鲁东或巴枯宁的文本)赋予新的含义，而且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内部赋予新的含义。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这种相遇有助于使 21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丰富的经验及其所有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典的目的是有限的。它不包含任何历史，也不提供任何关于个人、潮流或组织的信息。它没有提及近一个世纪以来(从 1848 年的欧洲起义到 1936 年夏秋的西班牙革命)构成无政府主义活生生的现实的事件。它并不排除阅读那些最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真实意义的叙述和证词的必要性:例如,詹姆斯·纪尧姆(James Guillaume)的《l'internationale》,或沃林(Voline)的《The Unknown Revolution》,阿贝尔·巴斯(Abel Paz)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提》(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或亚历山大·斯科达(Alexandre Skirda)的《Nestor Makhno. 2》,即使在它为自己设定的限度内,这本词典仍然是临时性的,容易受到大量补充和更正的影响。简而言之,它只有一个目的,可以归纳为四点:1)证明一场坚决呼吁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可能(而且自相矛盾)的理论一致性;2)证明这场运动在经历了漫长的失败之后,如何在 20 世纪下半叶恢复其理论起源;3)从这个运动的角度来看,把哲学家和理论家联系在一起的秘密密切关系,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斯蒂尔纳、普罗东、巴枯宁、Tarde、尼采、伯格森、福柯、西蒙顿和德勒兹等;4)揭示类似于自由意志主义实践和经验的对世界和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这些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有时他们严重缺乏这种认识。

给读者的一些实用建议:任何真正的词汇,无论多么有限,都是一个有许多可能入口的迷宫。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这些入口都不能占据特权地位,扮演基础角色,或者作为第一原则。因此,不必依赖于字母表的任意顺序,也不必出于漠不关心或习惯而开始

相反,所有人都被邀请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词条,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到与某某某词或某某想法有一种特殊的直觉上的亲和力,或者是因为某些想法已经构成了他们的方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结晶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非常恰当地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天”(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夏天:布维纳文托拉杜鲁蒂的生与死。麦克·米切尔[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

《未知的革命》,1917-1921年,译。《文件与纪念品》(1864-1878);《西班牙革命中的阿贝尔·巴斯》(Abel Paz, Durruti, trans. 查克·莫尔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AK出版社,2006年);亚历山大·斯科达,内斯托尔·马克诺-无政府主义的《哥萨克:乌克兰争取自由苏维埃的斗争》,1917-1921年,译。保罗·夏基(加州奥克兰:AK出版社,2004)。

思考、感受和感知。最后的索引允许这种选择。你可能想从这里开始，然后再回到这里。然而，通过你与这些建议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也会有亲和力和对应关系，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逐步阅读，这种方法除了要遵守字母顺序或逻辑推理的要求外，不需要更多地遵守接近原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两者都与这个词典背后的项目的性质以及它的构建方法密切相关：

每个定义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独阅读，这意味着任何词的评注都可以重申某些引用和补充，以阐明和解释它，而不必担心冗余。

一般来说，每个条目还会引用几个其他条目(在文本中用斜体表示)，您可能想要或应该参考下一个条目。这些都是本词典的作者建立的联系，这些联系对本文的发展起到了帮助作用，关于这些联系还需要更多的指针。

第一点注意: 这些对其他条目的引用(通常放在括号之间)有时会包含在定义的正文中，当它们遇到其他可能的说明或与其他可能的说明擦肩而过时。这些引用也可能出现在每个条目的开头。放置在括号之间，它们按照增加难度的大致顺序排列，打开一个可能的顺序和过程。因此构成这个词典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陡峭、更崎岖、更困难(也更抽象)，但一般来说，他们都试图彼此交流(如果你发现不是这样，请通知作者)，或者直接或者通过类比和内在亲和力(参见这些术语)。如果对于那些选择这些道路的人来说，空气变得太稀薄了，他们可以选择立即撤退，选择一个更容易的方式。

第二个注意: 标记这些路径的许多术语(大约四分之一)没有定义。在对潜在的博览会的预期中，这些博览会或多或少地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出现在其他定义和博览会中，或与其相关联，这些通常只是指明了方向。这样，读者就可以充实这些术语，对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作出不同的选择，对最适合它们的人给予特权，为自己发展它们所包含的可能性，并给予它们定义，从而证明新的分歧、新的顺序是正确的。

因此，第三点: 每个读者都可以想象许多其他尚未打开的段落。一个人也可能会对 these 路标的坚持性感到恼火，并拒绝遵循他们提出的方向，或者对没有大量似乎可能的条目感到惊讶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必要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通过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话语选择来清理自己的道路。一个人也可以为自己建立另一个词典——一个平行的词典

或者探索其他领域，能够构成其他可能的世界。

最后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这里采用的强制性或双指令语调——字典和手册的语调——显然是一种模仿，一种由这种语言体裁的语法规定的模仿，正如尼采和费雷所说，而且是故意这样说的。无政府主义，因为它没有学院，没有资格考试，教皇，大祭司，或中央委员会，授权任何人代表它发言。但是，在这个词汇中提出的绝对主观主义绝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辩护，它反驳了肯定概念在这里的重要性(见这些术语)。这仅仅是，可以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无政府状态定义的内在和主观条件，这种“陌生的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²

里奥·费雷(1916-1993)是法国颂歌传统中最受人喜爱的诗人和歌手之一，也是一位终身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一千高原》，译。布莱恩·马苏米(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158页。

A

A priori/a posteriori [amont/aval](见永恒的回归, 传统, 混乱, 世俗, 过去)。

行动(实践)(参见工具/武器, 运动和符号/标志)。我们能从人类身上期待什么? 只有一件事: 行动反思, 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 在人的行动中产生, 而不是在反思中产生。“1”在有组织的生命中, 生命、健康和力量的最佳状态就是行动。只有通过行动, 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增加自己的能量, 才能实现自己命运的圆满。”无政府主义拒绝理想主义及其至高无上的理论(“三思而后行!”)它赋予科学家、专家、语言和推理的特权来决定什么是必须做的、必须思考的和必须渴望的, 以便不断地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欲望, 更好地使它们服从于符号、等级和等级的顺序。因此, 自由意志主义者关于行动的概念涉及两个主要观点:

一种可以被描述为认识论或批判性的观点, 包括拒绝将事物和标志、力量和意义、行为和理由、法律或戒律及其应用分开。这种观点将这种分离诊断为支配的主要来源之一: 某些力量将其他力量从什么中分离出来的能力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革命和教堂中的正义》, 第3卷(巴黎: 河流, 1930), 71-72。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战争与和平》(巴黎: 河流, 1927), 53。

“在自然界中, 一切都是运动和行动: 存在只意味着去做”(Mikhail Bakunin, uvres, 卷3[Paris: Stock, 1908], 384)。

他们能够把他们束缚在语言、法律和原则的陷阱中，或者陷入谎言的陷阱中，这些谎言假装代表他们所说的事情(见代表和国家)。

这种观点恰恰符合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本质。正如这个词最常见的哲学定义所表明的那样，“行为是被认为是这个存在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其外部原因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是一个项目的表达，这个项目是建立在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拒绝任何人对另一个人的服从或依赖。也正是在这个第一层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可以与尼采的思想相提并论。2. 因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是对存在的肯定，在这种肯定中，存在构成他们作为自由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服从他们自己的自决，行动不仅反对话语和符号，而且也反对反作用(参见这个术语)，反作用于一个人满足于对他人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被动形式的行动(参见怨恨和内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促使我们行动的一切的决定性标准(行动和反应、肯定和否定、活动和被动)——自由意志主义行动提出了解放问题，并为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

活跃的少数派(见核心，事物中心，直接行动和亲密)。一个来自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概念。不要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特有的“先锋队”的专制概念相混淆，这些政党声称能够比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看得更远、更高、更深、更多——由于他们拥有理论——因此有权引导被剥削者走上解放之路(见异化)。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跃的少数派认为并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一个有利和潜在革命环境中的一种可能性的特殊表现形式(见这个术语)，但是这种可能性在表现形式、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可能永远是这样

安德烈·拉兰德，《词汇技巧与哲学批判》，第15版，第1卷(巴黎: PUF, 1985)，19-20。

尽管尼采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间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但这本简短的词典的全部内容都希望以一种足够令人信服的方式显示出他们之间深厚的亲和力。如果一个人必须通过一个外在又亲密的参考来证明这种联系(参见这个术语)，请看1906年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弗朗茨·奥弗贝格，尼采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不仅以最明确的方式长篇大论地阐述了尼采和斯蒂尔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前者曾读过斯蒂尔纳)，而且尼采和普劳顿之间“最大可能的亲密关系”。弗朗茨·奥弗贝格，《尼采纪念品》，翻译。让·尚波(巴黎: 艾莉亚出版社, 1999年)，59-65。

根据其他可能性(社团主义者、改革派、民族主义者、反动派等)，以不同的方式组成。虽然最初出现在行动领域(见本术语)，但活跃的少数群体既不是作为一种外部模式，也不是授权他们向其他人指挥或演讲的理论知识的代理人。在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选择他们认为是最激进或革命性的斗争形式和理由的同时，积极的少数群体试图通过传染或模仿采取行动，通过在自己的实践中表达与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存在于无数其他情况中，并可能以更大的力量重复。在这个意义上，根据西蒙顿提出的结晶模型，活跃的少数民族，在这个概念的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只能出现在“革命前”的背景下，在“一个过饱和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真正准备发生，”一个事件能够“穿越、活化和结构一个不同的领域，越来越多的不同和异质的领域，”“传播”通过他们

亲和力(亲和力群体，选择性亲和力)(见信任，公地，联合，反感，排斥和类比)。古代化学中的一个概念，由歌德和马克斯·韦伯复原到现代，用以理论化人际关系，在自由至上的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是通过亲和力来组织自己!”Charles d'avray 在他的歌曲“Le triump h d'anarchie”中大声说道与人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亲和力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除了某种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共享的纲领或平台意味着那些赞同它的人之间有着更深刻的“亲和力”。在爱情中，就像在政治中一样(如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激进分子之间在这个或那个位置或现实层面上的亲密关系(社区生活，技术任务的协会，或者，历史上，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地区的 fai2 的小型活动团体，等等)，激进的性情，各种形式的情感，各种品质的性格，以及各种方式，这些可以与其他人组成。我们总是根据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环境，以及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交往的事物(比如汽车，伴侣，自动步枪，或者郊区的房子)来改变自己。每个联想都会选择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特定的品质和倾向，这些品质和倾向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是令人惊讶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或设想他或她能做什么，不管是好是坏。交往是一种带来好的遭遇和避免坏的遭遇的艺术，从而从一个自我和自我中调动积极而非消极的、充满生命而非死亡的未开发的新资源。这个前提是大量的

吉尔伯特·西蒙顿，《个性化、精神与集体》(巴黎: 奥比尔出版社, 1989), 53,54,63。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技巧、天赋和实际意义，这些情况以及当前秩序所施加的模式和角色的粗糙性通常使得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困难。一个亲和力的例子，这是富有成果的内容和他们的影响：“亲密的圈子”，巴枯宁从未停止参与。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个更值得怀疑的例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是：Nechayev-Bakunin 协会或 1937 年西班牙民兵的军事化。

肯定(见解放)。

疏远(见缺乏、欲望和欲望)。集体力量与他们能够通过压迫性和破坏性的外部秩序所做的事情分离开来，无法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们所包含的无限资源，集体力量被导致徒劳地试图填补这种扭曲所造成的空白(见这些术语)，拼命地寻求补救他们在他人的外部(见外部/内部)中的无能为力(见外部/内部)。无论这种对他人的认同是以爱或恨的形式出现，无论是通过群众(见本术语)对老板和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膝，还是通过这些人物所激发的嫉妒和仇恨的斗争，或是通过否定和辩证法提供的距离幻想，集体存在脱离了自身的能力，被剥夺了自身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被疏远了：一个人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朋友或敌人——并且只通过另一个人而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一个人的行为(见主人/奴隶)或一个人对自己的形象，而且存在于一个人主观性的核心(见这个术语)。因此，异化为两种压迫提供了理由，这两种压迫是对称的，即使它们假装相互对立：(1)对现有统治的压迫，这种压迫可以吸收它们所俘获并认同它们的力量；(2)对未来统治秩序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由它们声称要解放的那些力量的无能所助长的，它们拒绝对这些力量实行任何自治，因为作为被异化的力量，据说它们完全依赖于外在的统治和解放，外在于它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或基督徒、革命者或人道主义者、人民的公仆(见本术语)——“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实际上(用蒲鲁东关于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解放的“缘虫”(见分类)

译者注：在 1847 年 9 月 23 日普鲁东的日记中，他愤怒地回应了马克思出版的《哲学的贫穷》一书，该书攻击了普鲁东自己的贫穷哲学：“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缘虫”(Carnets, 第 2 卷, 编辑)。皮埃尔·霍布特曼[巴黎: 里维埃尔, 1974], 200)。

联盟(见我们朋友和协会的朋友)。从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到少数活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是建立在亲和力基础上的亲密圈子(通常是秘密的)的同义词(参见这个术语)。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这一概念从根本上逃避了“联盟”一词在用于表示国家、当事方、家庭或企业之间的政治、经济或婚姻协议时的一般含义(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在这个词的常识意义上,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联盟”是反对联合的。如果联合允许关联的存在——通过组成和亲和力(参见这些术语)——解放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的内在力量和可能性,从而展示和肯定存在的力量,一个“联盟”——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

总是一个纯粹的外部力量(家庭,政党,氏族,国家,企业),一个功利组织根据(同样外部的)紧急情况或必要的恐惧,支配,或利润。

利他主义(见暗示)。

类比(同源性)(参见亲和力和中间事物)。普劳德洪用这个概念来理论化资本、国家和教会的共同特征:“资本,在政治秩序中类似于政府,在宗教秩序中是天主教的同义词...资本对劳动和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教会反过来对智力的影响。”类比是理解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逻辑和本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无政府主义中,革命主要不是现有秩序或制度矛盾的产物,不是这个制度的辩证产物,也不是它的否定(见外部力量)。它诞生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体系之外,来自于这个体系没有设法包围的东西,来自于这个体系忽视、掠夺、压制和否定的无限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总是困扰着这个体系,事实上,它只是无限其他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见无政府状态)。2 自由至上的运动不是从无限其他可能性中诞生的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革命者的自白》(巴黎:里维埃尔,1929),第282页。

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提出了系统内外之间的区别。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5-36, 但也是如 Alain Caillé 解释的那样, Claude Lefort 拒绝认为“社会是一个完全被各种系统所覆盖的齐性空间,没有任何余地”(Alain Caillé, 《La democracy à l'œuvre》中的“Claude Lefort, 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作者:克劳德·勒福特。克劳德·哈比卜和克劳德·穆沙尔(巴黎:精神出版社,1993),63-64)。(关于

它拒绝的秩序，即使这个秩序是矛盾的，但来自于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和可能性，这些力量和可能性与这个秩序格格不入，或来自于这个系统支配和破坏的那些力量和可能性。从这众多的力量中作出另一种安排，从所有可能的力量中选择那些允许其他力量自由发展的力量，对这些力量进行排序或排列，使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妨碍其他力量尽其所能：这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性质和野心。如果亲和力定义了自由意志主义力量相互联系的实验方式和主观方式，那么类比就有助于我们思考所有这些力量的共同逻辑和适用于每一种力量的逻辑，从而有可能通过直觉和理论澄清来验证联合合理的有效性以及指导这种联系的亲和力的相关性。亲和力总是可以建立在错误的借口上，而且往往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或错误的理由上(见常识)：例如，根据这样一个原则(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即我们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我们的朋友，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对手。类比使我们有可能认为选择能够体现自由至上的运动的力量。然而，由于它总是处于这些力量的内部，因此它预先假定了大量的技巧和实际意义。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当前秩序中彼此最接近的力量——那些在外在形式或身份上最相似的力量——并不总是最好联合在一起的力量。相反，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由意志主义协会基于自由和自主的愿望和逻辑，从身份和外表的角度来看，与最不同和最遥远的势力在一起，有时是最可取和最有解放意义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点通过口号“警察与我们同在！”1936年7月起义期间，巴塞罗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突击警卫的联盟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例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骄傲的霍尼亚式的类比使我们有可能理解，与斯宾诺莎一起，一匹耕马和一匹赛马，在某个特定的现实层面上(见这个术语)，如何比耕马和奶牛更少的共同点。¹

无政府主义。在主导秩序类别(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工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的分类和同一性登记册中，对认为自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实践、思想、运动和组织的指定。因此，无政府主义有两面：

这一点，雅克·德维特(Jacques Dewitte)写道：“社会的深渊：关于
[2000年4月]：346-66。”

参见 Gilles Deleuze,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Robert Hurle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8), 124。

作为一个可以自由获得的标题，与它试图表达的内容相称，它服务于所有那些在其中认识到表明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欲望的最佳方式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它适用于一切事物，无政府主义有一个宝贵的可能性来谈论一个项目是共同的许多情况，以无限的方式的理解，感知和行动。这是表达德勒兹所说的“只能描述多重性”的“陌生人的统一性”的最好方式

无政府主义作为主导秩序范畴中的一个分类范畴，与其他许多分类范畴相似并与之竞争，无政府主义总是冒着否定无政府主义的风险，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组织表现形式。与其宗教和政治对手一样，无政府主义因此倾向于产生锁在自己身份内部的机构——每个机构都有其内部和外部——包括其入门仪式、其教义、其警察和牧师、其排斥、其分裂、其诅咒和逐出教会。无政府主义将自己从多种不同力量的直接和直接表达，转变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实体，一种象征性的力量(Proudhon)，以其自己的方式，类似于它声称要打击的所有大统治(教会、首都、国家)。以这种方式，它最初的多样性往往转化为并列的宗派或个人之间的斗争，因为他们都渴望掌控整个项目的总体，这些项目被简化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或一个商业企业(见思想狂)。

右翼的无政府主义(参见新自由主义者)。一种脾气暴躁、充满敌意的生存模式，在选择被动反应(参见这个术语)时，往往带有马乔和偏执的力量，不断冒着产生坏脾气、没有反抗能力、充满怨恨的生物的风险，这种怨恨的虚无主义拒绝任何肯定。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不管关于它是否配得上“无政府主义”这个名称的争论如何)，右翼无政府主义(见这个术语)并不完全与所谓的“左派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潮流和方面格格不入，正如最直接的好战行为所显示的那样，以及例如，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某些潮流对反犹太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保罗·拉西尼耶(Paul Rassinier)所表达的长期和盲目的宽容。2 著名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例子：作家塞莱恩(celline)和(在他生命的尽头)里奥·马莱特(Léo Malet)。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页。

关于这一点，参见 Nadine 壁画，《反犹太人的制造》(Paris: Seuil, 199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无政府主义者的化学反应(见行动的宣传, 行动的通道, 焦点)。1880-1890年间的袭击和爆炸事件给无政府主义行动带来了持久的声誉, 称其为绝望的少数派的暴力行为。此外, 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 这些攻击不一定是两种不可接受的倾向的产物: 1) 功利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幻想, 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攻击那些自认为是世界秩序的基础或基石的人, 即国王和国家元首来改变世界秩序; 2) 怨恨(见这个词), 在这种情况下, 是穷人和弱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怨恨, 这种怨恨作为反抗的替代品(见这个词), 将会发展成所谓的“Bonnot Gang”(见犬儒主义)令人厌恶的罪行。然而, 这种对19世纪末袭击事件的负面形象决不能掩盖它们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方面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利用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方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这是一次由第一国际(1881年7月伦敦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大型国际会议, 他们采用了先前建筑师运动主要领导人(克鲁泡特金、莱克勒斯、马拉泰斯塔等)提出的行动模式, 他们认为“普遍革命的时代不远了”, 他们决定研究制造炸弹的技术和化学。无政府主义炸弹的“爆炸性”特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负面影响(造成作者和受害者的死亡), 但却象征性地传达了自由意志主义行动的意义和半个世纪以后构想世界的自由意志主义方式。事实上, 无政府主义炸弹的效果是瞬间的, 它被指控表达一个不可逆转的最后行动的所有愿望, 个人面对生死时的所有恐惧和希望(见这个术语), 它被直接指控(在其非常重要的方面)世界秩序的“爆炸”, 构成它的要素的彻底重组的想法。对于现代科学和政治的概念来说, 无序化学因此在隐喻和实际行动的双重语境中具有意义。作为象征性的和真实的, 它被赋予了无限的意义, 其中地方(见地方主义)、个人和直接经历者为革命理念和愿望提供了可见的参照物, 其中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变革、爆炸与革命以刘家道家的方式在炸药试管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旧世界的爆破者”(或“破坏者”)制造他们自己的爆炸产品, 当时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期刊都有一个专门讨论这一活动的技术和科学部分。在这一点上, 参见 Jean Grave, 《无政府主义宣传 40 周年》(Paris: Flammarion, 1973), 166 et passim, 和 Daniel Colson, 《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réfraction* 1(Winter 1997): 89-118。

第一国际和未来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化学无视文化和自然之间的界限，理想自由和物质必要性之间的界限(见这些术语)。以炼金术的方式，它试图统一已经分离的东西：人类和自然，观念和物质，纯粹功利的技术操作和神秘的关注与世界的根本转变。像炼金术一样，它试图将空间和时间压缩成一个单一的、直接的行为：空间，在硝化甘油和雷汞的混合物的微小作用下，通过它们的“传播”，能够改变世界和社会的秩序，从自下而上；时间，在弥赛亚式的确定性中，这个姿态的时刻对应于历史的时刻，革命即将到来，伟大的黄昏时刻(见这个术语)已经到来。

无政府工团主义(见直接行动、活跃的少数派、运动、伟大的夜晚和总罢工)。

无政府状态(见外部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创始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了其挑衅性的、颠覆性的和理论意义，逐渐转变为“无政府主义”，一个思想和组织的身体，往往与“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最初在它的第一个发明者的作品中的含义相反：désjacques, c urderoy, Proudhon, Bakunin, 等等。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无政府状态不能简化为乌托邦式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被推迟到时间的尽头：政府的缺席。无政府状态首先是拒绝任何首要原则、任何首要原因、任何首要思想、任何存在对单一起源的依赖(最终总是被认定为与上帝同一起源)。1 无政府状态，作为起源、目标和手段(见 entelechy)，是对存在的多样性、无限的多样性的肯定，以及它们构建一个没有等级、统治或依赖形式的世界的的能力，而不是完全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的自由联合(见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指的是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先于一种后于一个存在的能力。首先，“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指的是事物的先验条件，指的是随机相遇的力量和权力的盲目混乱(见共同概念和集体理性)。其次，它指的是一种后天条件(如果这种区分仍然有意义的话)，在这种条件下，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新主体性的自愿建构，是存在主体的能力

第一个原因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过。第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它本身没有原因，或者它本身就是原因。它是绝对创造宇宙，纯粹的精神创造物质，一派胡言”(巴枯宁，“思考哲学”，乌弗雷斯，3:34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表达他们所包含的力量。在 1848 年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普鲁东试图通过“积极的无政府状态”这个术语来思考后一种情况，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形式是自治的、矛盾的或对立的力量，它们只是为了彼此承认和相互联系而斗争，而不是为了解决反对它们的分歧。这是一种无政府的过度的力量和肯定，为了在相互矛盾的条件之间建立联系，以电池两极的方式彼此极化，可以说，为了“系列化”它们的丰富性，试图发现和建构巴枯宁所说的生命秩序。

痛苦(看到外在的力量)。

反独裁/反权力。无政府主义首先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其(非常相对的)原创性包括反对国家(以及极端自由主义者; 见新自由主义者)或谴责“权力”是体现在国家、法律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中的神秘本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是从构成现存关系的整体内部(参见这个术语)进行的，尽管这些关系可能是独立和微小的。限定词“反独裁”用来表示无政府主义者斗争和计划的广度。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至上的运动，通过其不断的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迈克尔·福柯对权力的描述，我们在这里几乎逐字重复：

权力首先并不等同于国家主权、法律、统治的原则或完全统一。

“权力不是一种获得、攫取或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人抓住或允许其溜走的东西; 权力是在无数个点上，在非平等和流动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行使的... ..。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关系(经济进程、知识关系、性关系)，权力关系并不处于外在地位，而是后者内在的; 它们是后者出现的分裂、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影响，相反，它们是这些区别的内在条件

“权力来自下面。”它并不依赖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无所不在的二元对立，这是一种二元性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著作选》，爱德华兹译，伊丽莎白弗雷泽译，(纽约花园城: 锚书出版社，1969年)，229页。

从上到下，一直回荡到社会身体的深处(见系统和决定论)。相反，正是工作生活、家庭生活和直接关系中的多重力量关系(见本术语)构成了大规模支配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并且通过其强度，使整合、同质化、连续化和关系趋同的效应成为可能。

“权力关系既是有意的，也是非主观的... .. 它们贯穿于计算之中... ..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个人主体的选择或决定产生的... .. 也不意味着它是由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集团或者那些做出最重要经济决定的人的选择或决定产生的。”¹权力的合理性的特点是，在其所刻画的有限层面上，战术往往相当明确... .. 这些战术彼此相连，相互吸引和传播，但在其他地方找到其支撑基础和条件，最终形成全面的体系：逻辑十分清晰，目标可以破译，但往往没有人在那里发明它们，而且很少有人可以说是制定了它们：这是一种隐含的特征，即伟大的匿名的、几乎不言而喻的战略手段，它们协调着那些喋喋不休的战术，其‘发明者’或决策者往往没有虚伪²

反对某些东西(见支持某些东西)。反资本主义、反神职主义、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核武器、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生产主义、反权威主义、反性别主义、反物种主义、反尺寸主义、反矮人主义、反代谢主义等。尽管这份长长的(并非详尽无遗的)清单可能会让人们相信，无政府主义既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项目，也不是一个需求的目录，通常是负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需求会被详细阐述成新的规则和新的道德和行为禁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平等主义力量，它通过反抗打破统治链条，只是为了在这种破裂运动中更好地肯定另一种可能性，世界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见这些术语)。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根本上脱离了对某些极左势力或接近情境主义的分析，这些分析往往建立在阴谋和隐藏的力量从阴影中操纵现实的主题之上。

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志，罗伯特·赫尔利译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90), 94 et passim.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反物种主义(反物种主义者)。在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环境中(参见这个术语)，无政府主义总是与特定思想(自然主义、素食主义、和平主义等)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有时会发展成为理想主义(参见这个术语和完整的和平主义)。举个最近的例子，反物种主义就是这种情况。类似于反种族主义或反性别歧视的反物种主义立场可以表述如下：“物种不是一个伦理上相关的类别，不超过性别或种族。因此，反物种主义者反对物种歧视，即基于物种的歧视。”¹反物种主义承认动物生命，拒绝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根本区别，谴责我们这个世界背后的标准化和技术化的暴力和残忍，这些都呼应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然而，它也在三个重要方面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同：

反物种主义提到动物“解放”，提到“斗争”，提到动物解放运动，提到许多其他解放运动共有的关于人类行为的词汇和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反物种主义显然在语言层面上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最为接近，但与此同时，由于下述原因，反物种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距离越来越远：无政府主义呼吁解放，支持争取解放的斗争——所有争取解放的斗争，尽管各有不同——但有一个条件：这种解放是有关各方自己的工作，是需要通过直接行动获得解放的力量的工作，除了任何代表以外，任何声称以他人名义发言、为他人行事、为他人利益行事的代表(见本术语)。动物如何才能解放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导致反物种主义者将自己与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区分开来的第一个问题。不管喜欢与否，反物种主义者都不能不把自己定位为动物的“代言人”或“代表者”，“代表”动物的原因，同时从这种代表中获益(见这个术语)。动物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妇女，也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非法移民，更不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区分它们的不是自然界的跨种族差异。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

少数民族、妇女、失业者、工人和无文件者可以战斗，

yves Bonnardel and David Olivier，《反特殊主义：为了无国界的团结》，La Griffes no. 10(1998)。

直接组织起来，组成集体，没有中间人和代表(见直接行动)。他们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观点，直面其他力量的观点。动物不能。他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一个无穷大，在我们与他们以及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打开了大量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不能像女人、年轻人、工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那样挣扎。这使得反物种主义者能够将动物的存在简化为人类的现实，代表它们说话，翻译动物应该想要的东西，使它们服从它们自己无法确认的利益和考虑，从而从它们的沉默中获益，同时禁止自己承认这种沉默为人类以及其他动物带来了什么

第二个分歧部分源于第一个分歧。由于动物不会说话，反物种主义只是人类的一种运动，反物种主义者可以满足于为自己说话，说明为什么动物事业对他们如此重要，展开他们自己所包含的成为动物的过程。但是反物种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潮流，并不满足于这种主观的立场，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可以渴望对现有的东西进行解放性的重组，使人类接受现有的东西的总体，从而接受其他动物物种。反物种主义者忠实于他们在保护动物方面所持的“人类，太人类”的利益，并没有重申制定一个一般性观点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将使动物拥有人类的声音，在这种声音中，动物将拥有权利，一种被承认的地位——在与人类同样的标题下

- 作为一个平等的(见这个术语)。但是，由于这种普遍的观点不能从所有有关各方的实际、直接和直接的对抗中产生——更确切地说，不能从有关各方、动物本身中最感兴趣的那些人中产生(参见共同的概念和集体的理性)——反特殊生物主义者不得不向第三方、第三种观点、普遍的观点(参见这个术语)、客观的和超然的观点：某种和平法官、伦理委员会或神性，作为外部的

在这一点上，参见 Elisabeth de Fontenay, *Le Silence des bêtes: La philosophie à l'épreuve de l'animalité* (Paris: Fayard, 1998)。

然而，在这方面，大卫·奥利维尔(David Olivier)的《美味与杀戮》(Le taste and Le murder)，《格里菲第 13 号》(La Griffes no. 13)(1999)。

对人的主体性，就像对动物的主体性一样，但是能够以客观的方式表达或衡量这些主体性的感受，并且根据这种外部衡量，宣布他们的权利平等(见法律/权利)。这第三方，这个和平正义或神性，是功利主义(见这个术语)，它承担这个角色的三个方面下的传统道德(我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痛苦，一个痛苦，我不经历)，一个客观的科学(我必须能够客观地确定谁受苦，以何种强度)，和一个诡辩或政治经济的道德(我必须始终能够精确地计算最佳分配我的行为和我的资源在一个幸福和痛苦的一般市场的框架内)。

无政府主义和反物种主义之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分流，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前两个大分流: 在实践层面上，在对动物、动物的生命和世界观的关注上，反物种主义似乎引起了人们对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的质疑，破坏了这种从基督教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和权利的混合体的稳定

- 从财产到灵魂或精神，到国家和道德- 成为各种统治国家和剥削关系的面具和基础。但是反物种主义在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上走得既远又不够远——表面上走得太远，深度上不够。通过强调将人类与动物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无辜、冷漠和所谓的自然的残酷，反物种主义确实开启了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开创了全新的关系。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反物种主义将不得不放弃人道主义的神奇边界，它的霸权主义和肤浅的表现。它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表述，这种表述使人类成为独立的、自足的、拥有权力、利益和权利的主体，只涉及决定他们做什么或者没有权利从他们周围的世界获得什么，决定谁应该得到“主体”的地位，谁应该得到“利益”(在这种表述的两种意义上)。反物种主义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而是满足于将其延伸到一些非人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愤怒，因此这种愤怒引起的讨论是无稽之谈。西方白人男性的神圣特权已经扩展到有色人种，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反物种主义者现在建议扩展到某些动物，在法律、道德和科学的三重庇护下。反物种主义并没有破坏物种的限制和模式

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统治和剥削关系的基础。通过将它们应用于其他一定数量的现存物种，来更新它们是满足的。我们如何结束人道主义的压迫和荒谬的特权？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渴望在我们与其他现存物种保持关系的这个领域中回答的问题。这是反物种主义无法回答的问题。

Apeiron (见外部力量)。一个希腊的概念，同时意味着无知和无限。阿纳克西曼德用它来思考无限存在永恒诞生的不确定和不明确的基础，“无限”的概念——尤其是吉尔伯特·西蒙顿引入现代思想的概念——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非常接近，也有助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欲望(见欲望、力量、厌恶、排斥和亲和力)。Gabriel Tarde 使用的概念。它是欲望的同义词，但也表明其他集体力量如何可以包含在每个存在的意志(见单子和缺乏)。如果存在物之间的相遇或回避从来不会受到量子物理学家冷酷的机械和外任概念的影响(见常见概念)，那正是因为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刻的每一个集体力量都是通过其特定的安排而被标记的，而不是由于其他力量的缺乏(见这个术语)，而是由于对相遇这些存在物的渴望——这种渴望对应于每一个存在物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包含着超丰富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可以认可雷内·汤姆的公式：“饥饿的捕食者是自己的猎物。”²

应用(见功利主义)。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事物的意义、价值和决定性始终是存在、情况和事件本身的内在，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应用”的概念，这种将行为和实践服从于第一原则、外在判断或衡量的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始终恰恰是一个“应用自身”于任务的问题，向工头负责，按照他的要求做他要求你做的事情(见解释)。

西蒙顿，个性化精神和集体。

René Thom, 《形态与个性化》，Gilbert Simondon: an Pensée of l'individual -
(巴黎: 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 1994), 101。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安排(集体安排)(见集体存在)。1 德勒兹术语。这个词使我们可以避免组织概念的生物化预设。排列是一个集体存在的组成模式，它决定了其欲望的质量以及权力和自主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集体存在或集体力量都是一种安排。

联合/分离(见集体)。正如 Simondon 和 Proudhon 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证明的那样，社团和与之相对应的集体力量绝不仅仅是在这种社团存在时所存在的个人联系的总和。它们的运作总是基于这些个人内部尚未个性化的东西(见个性化)，基于它们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东西或不确定的东西，这些东西证明它们愿意加入他人，创造一个新的存在，从而超越它们作为个人的限度，例如它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它调动的力量尚未个别化，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新的存在是能够-好或坏。任何联想都需要许多实验和许多过去的联想经验，但也需要一定的直觉技巧，对每个联想在我们内部调动的那些新的力量和潜力的关注。

从自由意志主义或解放主义的观点来看，可以考虑集体力量之间的三种形式或方法的结合和分离(见本术语)，所有这些都以肯定为特征，占据肯定的记录。

——一种力量可以避免其他力量，避免糟糕的遭遇，避免引起悲伤的遭遇，从而削弱它的力量。因为它确实如此

德勒兹和瓜塔里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法语单词 *agency* 通常被翻译成“集合”然而，正如 Jasbir Puar 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尴尬”的渲染，接近于误译，因为它暗示了一些比中介机构所需要的更加稳固或静态的东西(Puar, “‘我宁愿做一个机器人而不是一个女神’: 交叉性、集合和情感政治”, EIPCP: 欧洲进步文化政策研究所, 2011 年 1 月, <http://EIPCP.net/transver-sal/0811/Puar/en>; 参见约翰·菲利普斯, “代理/集合”, 理论, 文化与社会, 23,2-3[2006]: 108-109)。在通常的用法中, 代理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客厅里的家具的配置或者在一首歌中的音符的放置(j. Macgregor Wise, “Assemblage”, 在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斯蒂维尔[蒙特利尔: 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 2005], 77,79)。在我看来, 正如 Deleuze 和 Guattari 所使用的, 特别是 Colson 所使用的那样, 这个术语可以更好地表示为“arrangement”, 以便暗示一个过程的开放性(参见 Graham Livesey, “Assemblage,” in The Deleuze Dictionary, rev. ed.ed. Adrian Parr [爱丁堡: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2005], 18-19)。

一种力量总是可以选择——短暂地或长时间地——最大的孤独，只依靠它自己，依靠它所包含的可能性，同时等待更好的时机，其他遭遇，其他情况，其他事件(唯一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的东西)，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或者更多彩地，像一个深藏的“间谍”或者一个“休眠的病毒”因此，真实包含了无限的力量，这些力量已经退回到它们自己的能力之中，将外部关系限制在最低限度或者特定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语)

- 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必要- 但是它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见这些术语)。这就是为什么斯宾诺莎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一个物体能做什么，每种力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给定的情况或安排下能做什么

一种力量也可以纠缠在统治和依赖的关系中，选择通过反抗(参见这个术语)来解放自己，摆脱将其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束缚，这种束缚它认为是压迫的关系(参见直接行动)。任何反抗(罢工、起义、青少年逃跑，或梅尔维尔的《巴特比：我宁愿不要》中错误的否定公式)都是，正如米歇尔·佩罗所说，“美丽的逃离”，是时间和事物结构的租金(见停顿)，是一切都变得可能的时刻。

这种解放的裂痕或裂痕总是转瞬即逝，因此可以为新的力量的出现和力量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这是第三种结合和分裂的方法。从服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他们所包含的外在秩序对他们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叛乱的力量可以自由地加入其他力量，由于这种联合，通过这种联合产生更强大的力量，通过这种联合产生另一个完全致力于肯定、权力和自由的世界(见这些文字，但也包括力量的平衡)。

自治(见 nomos, nomad, scientific laws, and monad)。在自由意志主义和反独裁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术语(从 70 年代的“工团主义自治”到“自治主义者”)。与其伪博学相反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学院到命题 2，在斯宾诺莎：全集，撒母耳译

Michael I. Morga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inc. , 2002) , 280- 82。

米歇尔·佩罗，《罢工工人：法国 1871- 1890》(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自治并不意味着一个生物有能力给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把构成自己的东西服从于它可以想象自己是主人的法律形式。在这个词的常识意义上(见法律/权利)，所有的法律都是外部的，构成统治关系的一部分，包括那些被称为“自然”的“法律”——正如加布里埃尔·塔德所证明的

在莱布尼茨的词汇表中，当他提出“通过某些单子来解释自然法则... .. 他们渴望这些法则，... .. 强加这些形式，服从他们的枷锁，用他们的大镰刀平衡一个单子的民族，因此被征服并制造统一，虽然生来自由和原始，所有人都像征服者一样渴望统治和同化宇宙。”¹ 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所有的法律都是单一的，具体到每一个存在的本质——巴枯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一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法律，即它自身内部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见entelechy)。²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自治指的是构成存在的力量，指的是它们自己发展所需要全部资源的能力，以便 1)肯定自己的存在，2)与他人联系，从而构成一种日益强大的生命力量。

先锋派(见活跃的少数派)。

Gabriel Tarde,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ed. and trans. Gabriel Tarde,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ed. Theo Lorenc (Melbourne: re.press, 2012), 27.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52- 354。

B

平衡。这是一个引以为豪的奥地利术语，借自他那个时代的会计学。参见平衡力量。

力量的平衡(见斗争、自主、限制、辩证、等级和张力)。一个骄傲的奥地利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社会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功能和能力的等级系统，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自由力量相互平衡的系统。”¹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每一种力量都寻求达到其能力的极限，即超越外部和支配性秩序对其施加的限制(参见这些术语)。但是每种力量也有它自己的极限，这些极限是构成它的内在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始终是一个奇异的力，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力(见这些术语)，另一方面，矛盾的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力，由于什么构成它，总是能够比它的奇异性或它的个性(见这些术语)最初允许它做的更多。按照蒲鲁东的说法，他在这里借用了莱布尼茨的词汇，人们可以说，每个力量是一个单子或单子的组合，内在拥有所有存在的东西。这种占有是一种力量的自主性的基础，它作为一种自由力量的可能性得到确认，这种力量本身就足够了，但只能从某种观点出发，并通过某种限制它并且必须超越它的力量的特性(见这些术语)。在吉尔伯特·西蒙顿的词汇中，人们可以说，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个体，任何存在的力量之所以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是因为它总是能够胜过它本身：“个体只是它自己，但它作为优于它自己的存在，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会被个体化的过程耗尽，而是保持着新的和潜在的，由潜在的活力所激发..”

¹ 蒲鲁东，pj。蒲鲁东作品选，59。

个体本身并不感到孤独，作为个体并不感到局限于仅仅是其自身的现实。”¹从这种力量存在的双重模式——作为绝对的奇点，因为内在拥有所有存在的潜力——产生了构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基础的三个问题：1)力量相遇的模式的重要性，在某一特定时刻约束或分离的结合或分离的方法(见这些术语)；2)每一种力量的自主性，因此每一种力量都有可能以存在的整体的名义脱离任何结合；3)集体存在永远有可能试图创造另一种力量组合模式，以便更好地表达真实存在的全部力量。

正是在这种存在的概念中，才有可能接近骄傲的洪尼亚式的力量平衡的概念。任何力量都会立即引起它的对立面(也见分裂)，作为对其独特性的帝国主义的抵抗，作为对其观点固有局限性的肯定，正如它所肯定的其他局限性一样。这里可以提供许多例子。肯定大国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必要的团结，直接对应于肯定这些力量的自主性，以及它们在某一特定时刻为某一特定行动的目的脱离或反抗联系它们的纽带的可能性(见等级制度)。在某一特定现实层面的紧急情况下的断言(过于“自信”)——无论是经济的、物质的、军事的、浪漫的、行政的等等。直接对应于不同的，因此立即相反(或相反)的肯定或多或少环境或立即迫切的一个或几个其他层面的现实。³与黑格尔主义相反，有人认为是蒲鲁东(为了谴责他)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94。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蒲鲁东从根本上将自己与另一个可能的尼采区分开来，根据德勒兹的颠倒和扩展的公式，这个尼采将不再会遇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将不再有可能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关于尼采力量概念的一个(有争议的)解释，根据简单的关系，思想脱离所有的主观性，脱离不断的不平衡，特别是脱离不断的争夺统治的斗争，参见沃尔夫冈·穆勒-劳特，尼采，生理学的意志力，翻译。Jeanne Champeaux (Paris: edition Allia, 1998)，and Pierre Montebello, Nietzsche, la volonté de power (Paris: PUF, 2001).

如果一个人曾经参加过一项集体事业，即使是一项短暂的事业，他就会从经验中知道，在任何集体工作中出现的相互矛盾的需要之间进行这种无休止的斗争，这始终是一个评价、排列和优先考虑这些需要的问题，社会学试图将这些需要与数量有限的理由或决定制度联系起来是徒劳的。

这些矛盾绝不是从辩证法中产生的: 首先是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是无政府状态的, 但也是因为它们与构成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否定和综合是完全陌生的。

让我们从否定开始: 在自由意志主义关于矛盾的概念中, 相反或相反的力量与引起或极化其存在的力量的否定无关。相反, 它是对这种力量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下通过其奇异性所排除或破坏的东西的唯一肯定。矛盾, 对蒲鲁东来说(无论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是在他的作品中), 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和肯定的泛滥, 在寻求在每一点上相互对立, 相互极化时, 满足于将它们的丰富性“系列化”, 试图在真实的无政府状态中发现和建构一种秩序(见系列辩证法、积极的无政府状态和张力)。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的屈服——作为对其权力的限制——以及一个集体对另一个集体的毁灭——作为权力的丧失, 或者有时, 更积极地说, 作为解放和重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联系的一个条件(见 rebel)

是对立势力之间关系的直接视野, 是它们相遇的最可能的结果。但是, 这种权力的丧失, 通常发生在对立势力之间的对抗之后——甚至在斗争和反抗的时刻, 甚至在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概念中, 这些对抗被想象为尽可能短暂的时候——正是骄傲的无政府主义试图通过它的对立势力的系列平衡的概念来废除的, 在这个概念中, “各种势力除了认识自己、控制自己、确认自己和归类自己之外, 一刻也不会挣扎。”¹

由此产生了自由意志主义矛盾观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第二个根本区别。在解放运动中, 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不一定要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或两者的综合来解决(国家、首都、教会以及所有其他绝对的、支配性的和至高无上的力量都是这种综合的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它们必须是“平衡的”, 蒲鲁东告诉我们, 不是为了相互矛盾, 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展它们: “我赞同黑格尔的信念, 即二律背反的两个术语, 即论题和反论, 将在一个更高级的术语, 即综合中得到解决。但是我后来意识到, 正如电池的两极不会相互毁灭一样, 这两个矛盾项也不会得到解决。不仅如此

骄傲, 战争与和平, 134。

也就是说, 直到经济矛盾体系(经济矛盾体系, 1846年)。

它们是不可摧毁的，但它们是一切行动、生命和进步的动力。问题不在于实现它们的融合，因为这将是死亡，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矛盾的是，在实现暂时平衡的过程中，两种或两系列相反的力量并没有被中和。相反，通过这种张力(参见这个术语)以及这种平衡的不稳定性，他们可以解放他们所包含的和他们相互矛盾的遭遇所包含的无限力量。它们能够超越其观点的局限性和其独特力量的决定性特征，从而能够产生其他力量，其他力量的联系，然后它们还必须学会如何结合和平衡这些关系，以便无限期地产生其他力量。一个世界的组成将使每一种力量都能够做它所能做的一切，部署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力量，因此需要一个选择和实验的整个实践(见实验)，包括好的和坏的矛盾，好的和坏的联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安排中，集体的存在必须同意服从平衡，服从紧张或排名(见等级)的关系，这些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为了获得一定的权力效果？在什么时候，他们必须强制性地断绝他们的联系，创造其他联系，以防止其中一方以持久的方式强加其支配地位，以防止间接的等级制度变得“僵化”(如巴枯宁所说)？2 我们如何平衡多种因素，使力的每种性质、每种可能性及其与其他力的联系能够充分表达出来，能够做到它所能做到的一切？是什么微小的振荡，在最微小的相互作用中不易察觉的自主性的提醒，使得一系列的互补成为可能，在特定的现实层面上，在特定的时刻，没有它们，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变成暴政？各种集体安排必须维持什么样的总体关系，以便其中任何一种安排都不能强加给其他安排，以便这些安排中的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以对外关系的名义使其他安排服从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愿望？我们怎样才能每一个时刻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并分开亲密关系或敌对关系的质量？对于这种评价，对于在不同或相反的力量之间建立信任，使得能够感知和思考“他者”，感知和思考存在的差异和多元性，哪些集体原因或共同概念是必要的？自由意志主义实践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之多。此外，为了

蒲鲁东，p·j· 蒲鲁东作品选，229。

《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英译。

Maximoff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3), 259.

解决这些问题时，力量的平衡构成了试金石，因为除了它本身的影响(在平等、自治、权力和自由的层面上)外，它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和解放派力量逃避自己的限制，选择好的矛盾，从而表达这些力量所包含的所有可能性的具体标志——只有与其他力量相反的力量达成协议才能解放的可能性。

基础(横向)。在工人阶级和其他人组成的组织和协会的运作中，“基础”的概念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让基础决定!”这种对“基地”的呼吁一直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含义，只要人们清楚地看到，它只是一场运动的第一步(往往很快就被扼杀)和一个不再需要使用“基地”一词的断裂(参见这个术语)。一个基地总是以一个“峰会”为前提，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它将成为基地，或者应该表达基地的愿望，以执行其意志。在无政府主义中，既不存在基地，也不存在高峰，而是存在多种自治和主权的集体存在直接进入关系的绝对横向性，没有统治当局来协调这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和水平是平等思想的空间表达(见这个术语)。

成为(看运动，永恒的回归)。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正如巴枯宁所写的，存在被认为是成为：“成为真实的... ..就是成为... ..即，运动始终和永恒地产生于所有特定运动的无限和，直至无限小，相互作用和反应的总和，以及所有事物依次出现和消失的不断变化。”这个概念是吉尔伯特·西蒙顿思想的核心，他解释说：“成为是存在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影响到一个已经存在的、最初给予的和实质的存在。”³

译者注：术语“基地”在英语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语中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是类似的问题出现在诸如“从下面”(例如，巴枯宁的“从下面自发运动”(Mikhail Bakunin, *Bakunin on anarchy*, ed. 翻译。Sam Dolgoff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2] , 200)参见托德·梅的《后结构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48-9，对无政府主义话语中的“顶”和“底”意象的平行思考，以及玛丽娜·西特琳的《水平主义：阿根廷人民权力的声音》(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AK 出版社，2006)，对“水平主义”的许多共鸣的平行思考(六，3)。

巴枯宁，“思考哲学”，乌弗雷，3:345。

吉尔伯特·西蒙顿，《个人的起源》，马克·科恩和桑福德译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存在(参见亲密的存在和一)。

超越它的极限(超越一个人所能做的)(见有限的无限)。

身体(人体)(看人, 主体, 大脑, 性, 和外部力量)。“还没有人确定身体能力的极限: 也就是说, 还没有人从经验中了解到身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而不是由心灵决定的, 只是根据其自然规律, 只要它被认为是无形的... ... [我们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 或者什么可以仅仅从对其自然的考虑中推断出来。”¹ 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及其对集体力量概念化的方式中, “身体”的概念适用于所有存在, 无论它们是什么, 无论它们的自发程度如何(见这个术语)以及它们影响或被影响的能力如何。但正是因为人类有很大的能力受到影响和影响他人——因此, 通过他们的活动, 产生更广泛、更复杂和更强大的集体力量 2——人体在解放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一进程要求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所携带的自然力量(见这个术语和外部力量)。

就像任何其他集体力量一样, 人体也是多重的。再一次, 正如 Proudhon 关于人的解释(见这个术语), “实际上, 我们称一个人为什么? 当他说“我”的时候, 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是他的手臂, 他的头, 他的身体, 还是他的激情, 他的智慧, 他的天赋, 他的记忆, 他的美德, 他的良心? 是他的任何能力吗? [原文强调]”或者, 正如尼采所说: “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 我们的身体使许多人, 我们采取什么‘品格’

Kwinter, in *Zone* vol. 6: corporations, ed. Jonathan Crary and Sanford Kwinter (New York:

地带, 1992), 311。

Spinoza, *Ethics*, 280-81 斯宾诺莎, 伦理, 280-81。

“任何有组织或单纯集体的存在, 其产生的力量就是该存在的自由, 因此这个存在, 无论是水晶、植物还是动物, 越接近人类类型, 其自由就越大, 自由意志的范围就越大。在人类自身中, 自由意志更加积极地表现出来, 因为由他们的社会产生他的要素本身就是力量中发展起来的: 哲学、科学、工业、经济、法律”(Proudhon, *De la Justice*, 3:433)。

傲慢, 《战争与和平》, 128。

“人可以被看作是相互联系的自发性的综合体, 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 每一种自发性都从自己的一面吸引着它”(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经济学》, 德贝桑松市立图书馆, 2863[74])。

普鲁东, 《正义》, 3:172。

只属于‘人’，属于我们的一个面具... ..当我们根据孤立的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时，我们欺骗了自己：这种行为不值得一概而论。”¹“思想”、“力量”、“灵魂”和“权力意志”的多元化，2 人类的身体——尤其是在大脑中，它被认为是意识的所在地——是一个“力量节点”(这一次使用了 Tarde 的词汇)，它传递“来自远方并意欲远行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必须把自己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以便解放它所包含的力量。它必须把自己从良心和自我的方便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幻想中，主导秩序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来再生产自己(见自律、责任、自我)。通过向它所包含的他者敞开心扉，人类打破了自我，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更广阔的清醒”和“新的凝聚力”。从这一点开始，尼采不再把身体当作自我的财产，而是把身体当作冲动的中心，冲突的中心⁵通过利用“自我”成为他者，人类将“思想还原为这些‘肉体化’的力量(冲动)”，还原为尼采所说的“自我”，只有从这个“自我”中，“每一种创造力，每一种评价”才能产生“自我”，“自我”“存在于身体中只是作为混沌的一个延长的极端”⁶

一个新的身体是如何产生的？人的身体如何能够给自己一种新的凝聚力，一种解放的统一，从而通过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解放环绕和穿越它的世界的力量？这就是自由意志主义解放提出的问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里，这种身体的统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宗教的联系、由上帝或他的替代者、由顺服和服从上帝以及由上帝形象所保证的非常特殊的秩序所确保的。毫无疑问，正是圣保罗所构想和实践的基督教，通过“身体复活”的概念，最彻底地统一和限制了人体的能力，通过服从“信仰”，通过服从

尼采, *Nachgelassene fragment* (1884), 26[370], qtd. 在 Didier Franck, *Nietzsche and the Shadow of God*, trans. 贝蒂娜·贝戈和菲利普·法拉(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128 页。

在这一点上, 参见弗兰克, 尼采和上帝的影子, 特别是 135。

参见 Jean Milet, *Gabriel Tarde et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Paris: Vrin, 1970), 172: “人类的情况特别重要。它的身体, 特别是它的大脑, 是传递来自远方的精神冲动的机制, 这些冲动意在远行。”

关于这一切, 皮埃尔·克劳索夫斯基, 尼采和恶性循环, 翻译。丹尼尔·w·史密斯(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8), 30 et passim。

Ibid. 30-31.

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将人类身体的多重意志转化为一个单一的意志，即上帝赋予它一个新身体的意志。为了反对构成我们的各种力量的无政府状态，每种力量、每种意志“想要不同的东西，并且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力量相对立”，为此“身体不再是... 仅仅是我是什么，而是我拥有什么，以及我与什么相连接”(见占有)，神学因此提出了上帝的统治原则，将各种人类意志统一起来，“共同服从”上帝和一种外部力量，这种力量由各种权威人物所体现和传递。¹ 我们如何“摆脱上帝”(如巴枯宁所说)以及他所建立和保证的狭隘和强制性秩序？我们如何赋予人类一个新的身体，一个能够解放其所包含的所有权力的身体？我们如何发明联合的方法，如何平衡力量和意志，使他们能够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试图回答的问题。

炸弹(见无政府主义化学)。

老板(见领导和等级制度)。一个集体对其他集体的外部控制，通过压迫性命令或基于简单的暴力来保证。无政府主义憎恨老板。

大脑(见身体和单子)。加布里埃尔·塔德断言，“活体是机器”，尽管是由碳、氮、氧、氢等元素组成的，但这些元素“包含着隐藏的精神元素”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对于人类来说，“身体”和“特别是大脑”是心理冲动传递的机制，这些心理冲动来自遥远的地方，意图远行³ 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概念，一个可能解释不清的直觉，但是对于这个概念，认知科学的某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弗兰克·尼采与上帝的影子，58。对于一个稍微不同的分析，参考克洛索夫斯基，尼采和恶性循环，23 和被动。

Qtd. in Milet, Gabriel Tarde et la philosophie of l'history, 172。

同上。

对于第一种方法，参见乔治·维格诺《认知科学: 导论》(巴黎: 发现版, 1992)。

C

资本(参见上帝、国家、新自由主义、阶级和功利主义)。

捕获(参见统治，现实平面，符号)。

关心自我(见暗示)。

原因(见科学定律)。

混乱(见可能性，无政府状态，外部力量，身体)。希腊的一个概念，被 Hesiod 用来描述世界的原始状态——一个后来被赋予秩序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存在(“宇宙”)。在这个词的现代和自由意志主义用法中，混沌不再指一个时间起源，而是被一个线性和时间导向的变化过程所超越。相反，它构成了现实所包含的所有可能性的永恒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混沌是阿纳克西曼德的“先验”的同义词，正如通常的用法恰当地认为的那样，混沌是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存在辩护的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词，它不是一个后验(en aval)，而是一个先验(en amont)(如果这种区分仍然有意义的话)——一个没有时间深度的先验，一个始终存在的先验(参见这些术语)。正如许多自由意志主义文本所证明的那样，从 C urderoy 和 Proudhon 到 Bakunin (见外部力量)，无政府主义所见证的无政府状态或混乱根本不是任意性的同义词——这种任意性是所有乌托邦的虚幻基础——相反，是必然性的(见这个术语)

这种必要性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自由的唯一基础，正是因为它表达了存在的一切力量。再一次，从这个观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与尼采相提并论，尽管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将他们区分开来的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尤其是当他解释“相比之下，世界的总体特征是永恒的混乱，不是缺乏必要性，而是缺乏秩序。”¹

牧师(见良心指示，陈述)。教会或宗教的代表(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有牧师)，负责确保集体生命正确地服从外部或超然的集体权威的标准和价值观。在“政治委员”的名义下，威权共产主义乐于从宗教机构恢复一种早已证明其有效性的实践和检查机构。当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无疑在于它的能力——在守护天使、特别是“良心”(见责任、纪律)已经有了前途的实验之后——将经济建立在一个外部控制的组织之上(而且这个组织相当笨重)，并将其他时代的牧师和政治委员转变为一个内在化的超我。这样，通过对市场规律的亲密认同，每个人都是他或她自己的牧师，他或她自己的政委，他或她自己在市场秩序中的代表，他或她自己判断什么是最好的做法，什么是最好的做法，什么是希望，什么是满意。

自然的控制(见不确定性)。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用来表示每个集体所包含的外部力量的概念。对自然的控制是无政府状态的另一种说法。由于这个原因，一个种族主义，在其批评者的短视的观点，可能看起来像一个绝对的，特别危险的自然主义(见这个术语)。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拒绝将现实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见二元论)：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自然和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它拒绝所谓人类学的所有假设和框架——好像人类现实可以从根本不同的“非人类”现实中区分出来似的！正如Proudhon所申明的，人类的复合物在任何方面都不同于任何其他组成物，不同于构成自然的一切，除了在力量的程度上：“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它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因为它的器官、次要群体……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组合像吉尔伯特·西蒙顿一样，无政府主义不考虑

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性恋科学，翻译。约瑟芬·诺克霍夫和阿德里安·德尔卡罗(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109。关于“左尼采主义”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参见米歇尔·昂弗雷的《反叛政治：抵抗与放松条约》(Paris: Grasset, 1997)。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进步哲学》，肖恩威尔伯和杰西科恩译(新闻稿)。

人类特殊性的表现及其充分发展在于我们与自然的区别。相反，它在于人类发现自我内在和自我外在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见这个术语)——他们发出的性质，即使他们的暂时性和还原性个体化促使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可被剥削和支配的外部环境(见主题)。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在托尔斯泰的作品周围形成的)确实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然而，这种怪异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关于集体力量的综合性质和性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见这些术语)使人们有可能理解，一个特定的存在或现实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过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和仇恨进行粗略和外在的空间分类所赋予它的东西。因此，无政府主义可以立刻与基督教产生强烈的距离

- 与任何宗教一样- 与宗教习俗和观念的某些方面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全球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宗教从一开始就是与一个非异化的世界相联系的，它们不仅产生了教会、教条、神圣的经文和义务(饮食、仪式、道德)，这些往往使集体力量与它们所能做的事情分开，并使它们屈服于损害它们的外部力量。他们在自己和一定数量的实践中(甚至在最专制的一神论中)保持着与世界的关系(通常用术语“神秘的”²表示)，这种关系与现实和现实的可能性是内在的

LeftLiberty, 2009), 23(转:我自己的修改)。这一立场也可以在 Gabriel Tarde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28 et passim)的著作中找到, 在 Gilles Deleuze 和 Felix Guattari 的著作中, 他们解释说:“即使它们是无生命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机器的, 事物也有生命体验, 因为它们是感知和情感”(什么是哲学? 翻译。休·汤姆林森和格雷厄姆·波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4], 154)。

吉尔伯特·西蒙顿称之为“原始的魔法统一体”, 这种“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联系, 定义了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宇宙, 这个宇宙先于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 因而也先于单独客体的任何出现”(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Cecile Malaspina 和 John Rogove [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2016], 177)。

对于无政府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的重新评估, 参见 Onfray, Politique du rebelle。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可以支持“德莱弗萨德神秘主义”, 查尔斯·佩吉说, “迈向三个神秘主义的高潮: 犹太人, 基督教, 法国”(查尔斯·佩吉, 我们的青春[巴黎:加利马德, 1933], 63)。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 特别是米歇尔德塞都, 神秘寓言: 十六和十七世纪, 翻译。史密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5)。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包含和企图- 通过规避牧师，教条，仪式，和所有权威声称以神的名义说话- 直接表达的力量和可能性，没有中间人，现有的秩序否认(见直接行动)。

情况(见活动、安排)。

阶级(社会，性，世代等)(见反独裁，权力，可能性)。无政府主义从两个方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分析，几十年来，这些分析在左翼或极左翼的工人主义、第三世界主义、女权主义等话语中已经司空见惯。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贯穿和构建我们社会的巨大分裂(工人/资产阶级、男人/女人、年轻/老人、白人/黑人、城市/农村、高/低、进/出、左/右、支配者/被支配者等)并不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众多武力和支配关系的起源。相反，它们是这些关系的集合效应，这些效应随后对局部冲突产生影响，穿越它们，捆绑它们，将它们放在一个系列中(参见这个术语)，并赋予它们意义。正如福柯和普劳顿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统治是大量直接和微小的相互作用的霸权效应，这些相互作用不断维持着这些统治，并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力量和强度，以便它们复制自己，并假装自己是权力的起源(福柯的分析见反威权主义)。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国家、资本、上帝、父权制，以及任何其他形而上学的神性，既不是原因也不是起源; 它们是结果(参见这个术语)。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声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及其斗争的意义，这种斗争的信念是在存在的根源上有一个万能的第一原则

- 一个为其斗争辩护的基础(上帝，国家，资本，父权制等等)- 仅仅参与了它假装与之斗争的力量。无论其规模有多大，它只能构成一个由牧师、警官、教授和科学家组成的机构，这是一个专制机构，反过来，它渴望从专制的幻想中获利，剥夺被统治者的斗争权，剥夺他们在任何地方进行斗争的可能性，阻止他们成为自己斗争的主人(见异化)。自发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有时规模较小的自由意志主义斗争常常被严重误解，沦为一种夸大的民主，一种对细节的痴迷，一种过敏，一种需求的分散: 简而言之，放纵或干扰严重的武装分子和组织(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尤其是他们的知识)对资本、国家、教会、父权制，或任何其他支配性或结构性力量进行的诸神之战。相反，自发主义、地方主义、狭隘、直接，以及

自由意志主义斗争的异质性，远远不是浪费的放纵，而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认识，其他行动方式的表达，是唯一能够反对，甚至可能结束统治关系的方式。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社会、性别、代际、种族或其他)方面的第一个区别，有必要加上第二个区别，这个区别部分源于第一个区别。因为它们依赖于大量的权力关系，而不是第一原则或决定性的总体，因为它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从来不符合虚假的、虚幻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它们与许多其他不断变化的交换和统治关系结合在一起，任何类型的阶级关系都不能声称存在革命阶级、解放的阶级主体(“工人”、“青年”、“妇女”、“黑人”等)，无论这个阶级受到多大的压迫。由于他们是改变关系的结果，而且也由于他们密切依赖于对他们至关重要并且在特定时刻决定他们存在的统治(见解放)，被统治阶级只有一种解放的可能性，这取决于许多条件。这些包括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们的能力，组成一个更大的力量(见这个术语)与其他力量的组合，并与所有逃避的关系，统治国家界定他们(见停顿和类比)。简而言之，被统治者的地位绝不是一个没有统治的世界获得解放的充分保证或可能性的来源(见此术语)。

阶级斗争(见主人/奴隶、辩证法和阶级)。

分类(参见类比和系列)。因为它要求成为和运动，因为它与巴枯宁，它定义自然是“事物的实际转变的总和，这些事物在它的子宫内不断产生。”¹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任何分类，这是不可避免的外在的，还原性的，压迫性的。出于这个原因，Proudhon (像 Gilles Deleuze 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在自然科学的框架内，站在 Geoffroy Saint-Hilaire 一边反对 Cuvier: “是的，正如 Geoffroy Saint-Hilaire 所说，所有造物的动物都是从彼此进化而来的，否则它们就不会形成属和物种。分类学之王居维叶所犯的错误的表明，在声称反驳杰弗里·圣希莱尔的理论时，他自相矛盾; 在世代统一之外，秩序、阶级、属、种、变种不再有存在的理由; 就像宪法制度一样，它是思想的虚构，是幻想。”²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普劳东，经济学，2863[104]。对于德勒兹参考杰弗里圣希莱尔，参考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45,254。译者注: 科学史学家

集体(社会)。对蒲鲁东来说，每个集体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一个集体，一个“权力的组合体”但毫无疑问，吉尔伯特·西蒙顿最能使我们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出发，通过三个伟大的命题来思考社会或集体的现实。

第一个命题：“个人”，在心理学或传统意义上的词，像任何其他形式的个人化，总是超过自己(见超过自己，平衡的力量，家谱，有限的无限性)。西蒙顿提出的一个悖论如下：“个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是，但它存在的优于自己，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现实，一个个体化过程没有耗尽的现实，仍然是新的和潜在的，由潜在的动力... [t]个人并不感到孤独，作为个人并不感到局限于一个仅仅是自己的现实 2

第二个命题：个人的超越本身是集体的基础。换句话说，集体不是个人的总和，不是个人策略的结果，也不是个人与他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它不是个体的联合(西蒙顿称之为“个体间”)。恰恰相反，集体意识产生于个人的超越自身，严格地说，这种超越自身并不产生于他们(作为个人；见主体)：“集体意识不是由个人意识的结合所构成的，正如社会身体不是由个人身体所衍生的一样。个体包含某种可以成为集体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在个体中并不是个体化的。”3.“集体是一种个体，它将若干个人所包含的性质统一起来，但这些个人已经构成的个体并不包含这些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发现集体的意义对于前面的个人来说是先验的和内在的 4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命题：集体个体产生于个体的这种个体前现实被认为是自然界的最高境界，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

约翰·特雷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历史背景来说明蒲鲁东参与卡维尔-杰弗里辩论的情况。正如 Colson 在此引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Proudhon 赞同 Geoffroy Saint-Hilaire 的原始达尔文式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随着“生命发展的环境”而不断进化的，而不是“Cuvier 的四个固定‘分支’的观点”，这是一个不变的分类模式(326)。见 Tresch, “先知的秩序：早期法国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系列”，《科学史》48.3-4(2010)：315-342。

傲慢，《战争与和平》，128。

西蒙顿，《个性化的精神与集体》，194。

ibid. 195.

同上。

集体的个体，就像任何个体一样，也比自身更重要。它也包含了不确定性和被赋予潜能的个体，新的问题需要通过新的个体化形式以及通过永恒的回归存在的运动来解决(参见本术语)，在这种运动中，历史时间、新奇性和未来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人类学中构成存在和个人的基础之前：冒险、意志以及它们似乎从中产生的历史。

集体存在(见集体力量、安排和现实层面)。

集体理性(公共理性)(特别是常见的概念和理论/实践，还有表现、表达、符号/标志和内在联系)。A Proudhonian concept 骄傲的奥尼亚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理性本身并不存在，不存在于思想的天堂或逻辑的命令之中。依赖于语言和符号，理性总是表达存在或集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只有一个原因：事物或存在的原因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蒲鲁东在解读莱布尼茨之后写道，“智力无处不在，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有意识的... 智力沉睡在石头里，梦想在动物里，理性在人类里。为什么它不能在人类中也有理性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对语言进行了批判，他解释说，“创造意义的不是语言”；相反，“意义”先于语言：“如果没有意义来支持语言，就不会有语言。”²

有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继斯宾诺莎之后)，人们可以说，所有的现实都有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分离的方面：一个是话语方面，即表达的世界、语言和符号；另一个是“机械”方面，即内容的世界、身体、现实和力量。正因为如此，集体理性是集体力量的另一面，既是独特的，也是不可分离的

《正义》，3:267。

西蒙顿，《个性化的精神与集体》，200。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88。

“集体理性的机关与集体力量的机关是一样的：它是为劳动、学习而聚集起来的群体；是为工业、学术或艺术而聚集起来的公司；是为学术、学术、市政而聚集起来的；它是国民议会、俱乐部、陪审团；一言以蔽之，任何人的会议都是为了讨论思想和探讨权利问题而形成的”(Proudhon, De la Justice, 3:270)。

同上 2:298。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当理性宣称自己是“纯洁的”时，它总是表达了一种力量的安排，这种对纯洁的自命不凡总是标志着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始终是“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它指向国家本身，指向教会，指向资本，或指向被称为“自我”的小国家的幻想：个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幻想，支配的基础和传播者，无论在何种规模的“绝对”，都渴望用自己来代替构成现实的关系。正如蒲鲁东解释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提出“清除”一切绝对的思想，“以揭示事物的原因”，“通过历史观察和对社会交往的研究，确定人类行为的关系或原因，而不掺杂人类绝对的任何东西，更不用说超人类绝对的任何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可能取什么名字：天使、大天使、统治、君主制、王位、共同体、教会、议会、议会、大教堂、人格、财产等，直到并包括这个不可比拟的等级制度的首脑，绝对的绝对，谁是上帝。”¹ 理性总是“集体的”，因为它是一种力量安排的表达和观点。但是，由于任何安排都试图从其自身的角度看待其特定力量构成的能力极限，因此其存在的理由往往将自己转变为一种绝对和幻觉，想要使其他外部力量和构成其存在的力量服从其自身的愿望和观点(见全体/极权主义)。只有与其他力量相遇和相冲突，承认它们的差异性，以及发现这种相遇转化为联合所产生的力量，才能使集体力量认识到其存在理由的集体性和相对性，以及任何理由的集体性。也就是说，理性，就像法律(见法律/权利)一样，可以转化为一种越来越强大和自由的力量组合的表达，向自身揭示其作为结果的特性(见这个术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公共理性”，当它建立在“最大的矛盾”(见力量平衡)之上时，它给自己“最大可能的多样性”²

常见概念(见集体理性和实践理论)。斯宾诺莎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解读这位哲学家的重要性已经被 Gilles Deleuze 证明了。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取代一个革命项目，该项目要求政治实现人的解放，并赋予现实中许多具体的相互作用和事件以意义，它提议将这些作用和事件转化为政治记录

同上，3:248。

同上图 3:270。

分类、身份和禁令(右/左、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外表/现实、朋友/敌人等等)，无政府主义反而肯定了两种立场:

拒绝政治声称在其党派、象征性和官方形式中代表(从而包括、定义和变性)所有其他现实的拒绝。

解放力量对那些最直接、最日常的生活现实、事物和情况的整体的约束(因此是无限的延伸)。这些现实被称为社会和职业、个人和个人之间、浪漫、经济、艺术等等，它们包含了人类可以在自己之间和与事物之间建立的全部关系: 他们的饮食、工作、爱和对待动物的方式——构成现存关系和生活实践的最微小的关系和实践。

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项目和这些解放实践，通过思考加倍和强化它们，以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的人的方式。这篇文章的独创性可以概括如下: 表明通过感官、情感和符号获得的知识——这种被偏见和想象所支配的混乱和错误的知识，常常使我们陷入愤怒、爱情、仇恨、怨恨，最终沦为奴隶——也可以构成充分了解世界的起点和我们解放的手段(事实上，这是唯一的手段)。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或政治解释将人类的解放赋予了纯粹的推理能力或“政治”想象力，将其从“自然”起源中清除，而对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主义解读则假定了一种相反的解放运动，这种运动植根于自然的力量，人类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并且永远不会停止在我们内部的活动，对我们的利益和不幸，对我们的压迫和解放

对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来说，它始终是一个在存在本身的层面上行动的问题，在真实的模糊的构造中，正如德勒兹告诉我们的，“在模糊的身体混合物的最深层面上”，“奴役与解放之间的斗争”在哪里展开

对于这些问题的更详细的处理，参见丹尼尔·科尔森在《想象的纵火犯》一书中的“l'imagination spi-noziste and l'idea d'liberation”。Alain Pessin and Mimmo Pucciarelli (Lyon: ACL, 2000) and “Anarchist reading of Spinoza,” trans. Jesse Cohn and Nathan Jun, *Journal of French Philosophy: Bulletin of the Société américaine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e* 17 no. 2(Summer 2007) : 86-129 Jesse Cohn and Nathan Jun, *Journal of French Philosophy: Bulletin of the Société américaine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e* 17 no. 2(Summer 2007) : 86-129.

《评论与临床》，丹尼尔·w·史密斯和迈克尔·a·格雷科译

存在是把人类束缚在第一种知识的支配和幻想之中的不充分的想法和激情，这种想法和激情特别反对第二种知识的概念，即“从中产生真正行动的充分的想法”¹然而，作为“黑暗先驱”，这些迹象和影响在两个意义上仍然是人类解放的条件：1)它们通过“选择情感影响和它们所依赖的思想”，通过喜悦和悲伤的经历，增强和减弱行动的力量，确保概念的产生；2)这些概念一旦产生，就通过体现它们，通过防止它们落入暴君和牧师这些“生命中可怕的‘法官’的手中，确保这些迹象和存在的影响具有持久的解放力量，代价是“一场有可能死亡的无法解释的情感斗争”在“征兆对抗征兆，影响与影响相冲突”的“情感斗争”中，在我们希望生活的世界最亲密的生活体验中的这种选择和建构，始终是人类解放的“非常条件”

我们如何从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和紧张中走出来，走向蒲鲁东所谓的集体理性(见这个术语)？这将是一个永远不会与产生它的力量失去联系的理由，这个理由不会使自己自动成为一个外部和支配性的权力机构，这个理由将是集体力量解放安排的表达和观点。德勒兹·斯宾诺莎回答说，通过共同的概念，至少有两个实体(蒲鲁东词汇中的集体存在)共享的概念，这两个实体有能力选择与力量相容的“概念”，以及与彼此相遇和相联系的存在。渐渐地，通过越来越多的参与[暗示]，这些概念从仅仅是“共同的”两个存在的日益普遍和普遍的概念，到重新组合的总体存在，构成“一个日益广泛和紧张的世界。”⁵

毫无疑问，从这个普遍观念的角度来看，Deleuzean Spinoza 是最接近自由至上的运动。他很接近它

(纽约: Verso, 1997), 146。

ibid.143.斯宾诺莎的传统解读区分了三种知识：第一种知识，感官知识，混乱和错误；第二种知识，理性知识，它使事物和事件的逻辑得以重建；最后，第三种知识，一种直观的知识边缘，使人们能够接近事物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同上。

ibid. 145.

同上图 145,144。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6。

对科学的批判，正如巴枯宁关于物质的评论(见这个术语)，它认为“一个共同的本质，一个共同的性质本身并不存在，除了它所依附的独特和真实的事物或物体。”他接近于自由至上的运动所构想的结合，联邦制，以及它所谓的亲和关系(见这个术语)。他接近其实验的品味，即使是最奇怪和最危险的那种。他接近于将其存在建立在构成特定时刻存在的各种力量的自由联合和分离之上的意愿，从最脆弱的现实和关系、数以千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吃饭和穿衣、爱和学习、生育和衰老、不断讨论和修改最微小的关系，从而拒绝用任何固定和最终的表述来确定它们。相反，他们不断地根据每个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感受的唯一标准，根据其内部构成和与其他人一起构成的结构来评价他们，因此，他们是一个共同的“想法”和项目

常见概念从何而来，它们如何起作用？换句话说：对于德勒兹·斯宾诺莎来说，生存和经历如何能够使人类摆脱错误和悲伤，摆脱内部和外部将他们与自己的不幸捆绑在一起的统治，阻止他们独立思考，阻止他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行动？通过联想和实验，德勒兹告诉我们：“共同的概念是一门艺术，是伦理本身的艺术：组织好的邂逅，构建实际的关系，形成权力，进行实验。”这种伦理学的艺术从未停止在最直接的经验中运作，每一天，从命运把我们抛向的地方，从生活从一开始强加给我们的(幸运和不幸的)偶然相遇(家庭、性别、社会背景、肤色、文化、国家和民族)，其中“符号指的是符号作为效果指的效果，遵循一个依赖于物质身体之间简单的偶然相遇的顺序的联系链”。⁴正如伦理学试图证明的那样，我们可以停止服从这些偶然关系和相遇——仅仅是环境的结果——而是在幸福的影响和激情的基础上寻求关系和相遇。

巴枯宁，《考虑哲学》，uvres, 3:351。

“内部只是一个选定的外部，和外部，一个投射的内部”(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5)。对于自由意志主义关于联合、联邦主义和亲和团体的概念，参见克劳德·帕里斯，《无政府主义者和组织》(里昂：ACL, 1989)。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19。

《临床与评论》，第143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通过实验“选择”适合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快乐和行动能力的存在和联想：“从随机遇到的身体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与我们自身一致并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身体的想法，也就是说，能够增加我们力量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情感上的影响，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想法，这些想法必须释放出快乐，这是力量增强的向量标志，并抵御悲伤，这是力量减弱的标志。这种对影响的选择是离开第一种知识的条件，也是通过获得足够的力量来获得概念的条件。”¹

关联和选择。通过这个双重过程，相关的力量可以形成“共同的概念”，构成越来越新的关系，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强烈，涉及越来越多的可能的存在，在追求一个完全重组的存在。人类解放发生的世界就不再是一个组织或发展的平面——即使这个平面是无限的。² 它不再是一个占有的平面或捕获的平面。³ 作为一个构成和结合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无休止地试验不同的和不同的新的力量之间的相遇的影响，在可能的结合之间的相遇，它被转变成一个内在的平面(见这个术语)，“总是变化的”，“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新组合。”⁴

常识/良好的判断力(见经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声称打破常识和普通经验的科学的前张力——比如迪尔凯姆和布迪厄的思想，以及列宁、阿尔都塞和其他认识论断裂的伪君子的思想——以便从一个外部的位置来决定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命运和塑造它的决定论。相反，无政府主义肯定了集体存在者从某种角度自己拥有所有存在的意义的能力，也就是说，它的可能性(见共同概念和集体理性)。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科学的观点只是其他观点中的一种，它们的自我满足、宿命论以及对外在和优越性的自命不凡是其压迫性、破坏性和破坏性特征的最可靠的标志(见权力)。然而，对于怀特黑德来说，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应与理智相混淆，这种陈词滥调与已接受的思想的混合物，总是被指责说集体力量屈服于现有秩序的犬儒主义(就像拉姆齐教授

同上。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8页。

同上。

同上。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到灯塔去》(the lighthouse)一书中。在最普通的判断中,以及在“最雄心勃勃的理论陈述中”(因此在科学本身中也是如此),良好的判断力渴望将每一件事物置于一个已经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世界秩序中。相比之下,常识,“理论权威”下的“持续的低语”和“权威话语”中的陈词滥调,肯定了存在的事物的发明、创造和创新的无限力量。

公共项目,公共安排。公地是现实的平面(见这个术语)和存在的平面——持久的或暂时的,但总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撤销——自治力量通过他们的联合(经济、政治、滑稽、浪漫等)带来的。一个工会,一个书店,一个合作社,一个足球队,或者一个浪漫的关系是一个共同的安排,创造一个集体项目和一个集体存在,是所有人共同分享的自由联合在一起使它工作。由这种联合产生的任何联合或集体存在,都是一种不同的、比那些通过联合促进其存在的力量更强大的存在或力量。它完全依赖于信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随时取消信任,以便建立另一种看起来更合适或更有用的联系。公地从来不是一个斗争的地带,一个外部力量会像骨头、椅子或汽车轮子一样攫取和争夺的外部框架。公地既不是一个环境(如“公共”候诊室或健身房),也不是一个工具。虽然它大于构成它的各种力量的总和,但它从来不是它们的外部力量,因为它来自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于其他方面。交往(在爱情中,如在政治或任何其他活动中)就是同意在这种交往中改变自己,这是冒着变成另一个人的风险(无论好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真正的交往都以信任为前提。只有经历了这种转变的影响,经过测试,发现是好是坏,才能导致一个人退出交往。(相反,作为征服和工具化集体的一个例子,集体的内容被掏空,被剥夺了任何自主权,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共产党渗透工会)

沟通(见调解)。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正义:

在这一点上,参见 l'effet Whitehead, ed. Isabelle Stengers (Paris: Vrin, 1994), 12。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一种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它拒绝接受并反对这种正义，它以一种专制的方式加以实施，源自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法院、学校校长或工厂经理，上帝——他通过一项判决，按照参照某些法律从外部衡量的功绩分配奖励和惩罚，从邪恶到善良的等级。

基于直接交换、交换物的平等性、义务和负担的对等性、合同或结社或联盟的契约(见这些文字和法律/权利)的交换和自由主义的正义。这是一个内部的交换存在的协会，排除任何第三人或中间人和任何外部权威。

在一个更大的集体存在或力量中，集体存在或力量在他们的联合关系中的作用。

组成的团结。巴枯宁使用的概念(同时作为普遍因果关系，自然等)来思考存在的总体性(见多样性)。

组合(见联想、力量平衡和系列辩证法)。一个引以为傲的霍尼亚概念借用了化学(与物理概念的平衡-见平衡-和物理化学概念的张力)，以解释自由意志主义力量相互联系和连接的方式。这种联系很可能采取合同或内部规则的法律形式(见法律/权利)。因为它是一个结果，因为它从它所联系的集体存有那里召唤出意想不到的资源，它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存有的本质，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存在。事实上，与我们对世界的司法看法所希望我们相信的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构成这些人的外部因素。上述联想完全牵涉到这些存在。正是在他们内心最深处，在超越他们自身的东西里，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革命性的联合体，能够自下而上地改变现有的秩序，包容另一个世界(见亲密的、亲和的、类比的、直觉的)。

概念: 与定义相反(见这个术语)。

顺从主义(见群体，群众，群众)。一种平等的形式，在这种平等中，与他人相似的事物使自己迷失在统一的群体中。无政府主义以平等的名义强烈谴责这种形式的均等

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绝对差异和存在的唯一性之上的

意识(看到人、自我和身体)。

约束(见必要性)。

合约(见法律/权利)。

矛盾，矛盾(见暴力，力量平衡，辩证法和系列辩证法)。无政府状态和集体存在或集体力量的多元化必然意味着，由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它们增加力量而不是保持现状的意愿，它们必然会相互碰撞和冲突。只有实际意义上的实验、反抗以及避免不幸遭遇和寻找美好遭遇的艺术，才能教会我们如何避免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支配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的自杀式斗争，最重要的是，如何有利于集体生命的发展，从组成它们的各种力量的自由联合中汲取更大的力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取的。它们既是联合势力自由的标志，也是这种联合所产生的众生力量和活力的保证——它们有能力包含和重新安排真实世界的所有决定因素。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矛盾毫无关系。自然和人性“辩证”发展的概念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有好有坏的矛盾：一些矛盾扼杀并降低了生存的力量，而另一些矛盾则滋养并增强了这种力量。必须避免第一类问题——防止其发生——并谨慎地维持第二类问题，而永远不要妄想解决这些问题(见力量平衡)。

矛盾(见亲和力)。

约定(见法律/权利)。

另一方面，关于以群众运动为幌子的自由主义者中的从众主义的特点和影响(见本术语)，参见爱德华多·科伦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构成中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社会构成》(瑞士洛桑：CIRA, 1972)。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核心。Monatte 和 La Vie ouvrière¹ 杂志编辑用这个概念来定义能够从内部激励工会的小型激进团体，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书籍的“热情”和品味。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核心”与(在一个较为温和的时期和低潮时期)处于高峰时期的活跃的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少数派是一致的，并且以一种更原始的方式与巴库尼亚的亲密圈子是一致的(见这些术语)。

文化(见手册/知识分子)。

愤世嫉俗。一场流产的反抗变成了否定的持久影响。它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双重的怨恨，这种怨恨不满足于贬低和贬低他人，而是转而反对正在经历它的人。因此，愤世嫉俗者是一个被提升到第二种力量的人，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避开自由意志主义的环境。

埃埃尔·莫纳特(1881-1960)是一位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他于1909年创办了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这是法国总工会的官方期刊。1907年，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国际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他早年对阿纳基斯主义的同情，后来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杰里米·詹宁斯(Jeremy Jennings)指出，“工作生活是围绕着一群或者说‘noyau’的固定捐助者建立起来的。”参见詹宁斯的《法国的工团主义：思想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146-48,167,75。

D

Daoism (见宋明理学)。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道教之间的接近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1. 对农民起义、博学的道教徒的个人主义和不从众、这场运动的性实践、对男女平等的主张、对语言和等级制度的激进批判、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排斥以及“法家学派”的官方极权主义等方面的大量历史和社会学观察，都可以证明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道教之间的接近但正是在哲学领域(我们在这个小词典中关注的)，无政府主义和 Daoism 之间的同源性同时是最强烈和最隐含的。在《道德经》的众多可能译本中，老子的神秘文本，伯纳德·博图里的译本无疑最好地表达了无政府主义与道教(Daoism)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在第 42 章的开头：“道生太初合一，太初合一生天地，天地生间隔，间隔生万物。”² Like Daoism, in its action as in its thought, 就像道教一样，在行动和思想上，

尤其是 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 迪克斯(伯克利, 加州: 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42 和 45; 伊莎贝尔罗比特, 道教: 宗教的成长, 翻译. Phyllis Brook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é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trans.H.m. 赖特(纽黑文, 康涅狄格州: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4), 158,243 et passim; Jacques Gernet, 古代中国从开始到帝国, trans. 雷蒙德·鲁道夫(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8), 118-19。

老子《道德王: 道的传统及其智慧》，博图里译

译者注: 尽管《道德经》的译本很丰富，但英文版中似乎没有一本能充分体现博图里的观点。因此，这是一个译本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从现有的身份开始的(参见这个术语)，从一个给定的空间里，根据一个给定的秩序来定义或区分他们的东西，从而从不可避免地相互对立的東西开始(联盟本身就是这种对立的结果;参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它总是从事物的中间产生(见这个术语)，在这个间隔中，唯一能够产生无限可能性的地方(道德经中的“万物”)。无政府主义总是试图避免不同实体之间的直接对抗这种致命的陷阱，这些实体彼此不同，因而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见阶级、阶级斗争、权力和颠覆)。1 无政府主义以广泛的肯定和解放运动自居，这些运动完全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发展来维持。它作为另一种可能性，作为整体解放肯定的多样性条件，在所有存在的事物中不断地重复出现，作为颠覆力量的涌现(有时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见战争/好战，处死，亲密存在)。

定义(见分类)。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定义与概念是相对的。这个概念从事物的中间产生，是为了揭示和表达意义的焦点——能够重组现有事物总体的力量节点(见这些术语)——而这个定义，正如这个词所指出的，总是试图在既定的框架内，在既定的范围内，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在一种简化和压迫的秩序内，把事物表达清楚。取代定义，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肯定了不确定的，不明确的，阿纳克西曼德和西蒙顿的顶峰，这种存在的储备，一个新世界的概念和条件可以从中产生。

依赖(见政府和统治)。一个集体的存在屈服于一种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将它从自身能力中分离出来，破坏了它的主观能力。

欲望(见意志、集体力量、权力、欲望、缺乏和疏远)。力量的主观和内在定义，即力量中想要的东西，等同于尼采的权力意志

博图里的法语译成英语)。

正是在 1936 年的秋天，当反对军事政变的夏季起义最终转变为一场内战——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确定了它的失败。

对于新莱布尼兹主义关于武力与欲望之间联系的方法，参见塔德，《单子学与社会学》，19。关于

力量和权力意志之间的区别，参见吉尔·德勒兹，

决心(见遗嘱)。自由至上的运动所采用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意志(如当一个人说某人是“决定的”，这个人表现出“决心”)。不管人们相信什么，自由意志主义的决心并不反对不确定性(见这个术语)。它反对决定论的概念，因为与后者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决心完全内在于表达它的存在。正是权力和意志的表达(见这些术语)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情况下构成了这个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说“决心的力量”¹

宿命论。一个与支配相关的概念，它假定存在完全依赖于定义其主观性的外部原因和条件(参见这些术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决定论。

魔鬼(恶魔，恶魔)(见外界的力量，符号/标志)。大多数主要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经常正面地提到魔鬼和恶魔的形象——无论是巴枯宁的“魔鬼军团”，还是普劳顿对撒旦的赞美，撒旦是叛逆天使的首领，上帝的敌人：“来吧，撒旦，来吧，你们这些被祭司和国王诽谤的人，我可以吻你，我可以把你紧紧地抱在胸前！我认识你们很久了，你们也认识我。你的作品，我心中的祝福，并不总是

尼采和哲学，翻译。休·汤姆林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49 et passim。

关于这种解释的(有争议的)争论和这场辩论中的问题，参见 Paolo d'iorio, “Les volontés de power” in Mazzino Montinari, “La volonté de power” n'existe pas, trans. 帕特里夏·法拉奇和米歇尔·瓦伦西(巴黎：1996年版)，119-191；米勒·劳特，尼采，《权力意志的生理学》；蒙特贝洛，尼采，《权力意志》。

《正义的骄傲》3:375。

在许多可能的例子中，巴枯宁在1873年1月11日给 Jean-Louis Pindy 的信中提到了 Elisée Reclus：“他并没有人们所希望的所有的恶魔军团。但这是一个气质的问题，一个人所能做的并不比他所能做的多。”。

马克斯·奈特劳解释说：“Diable au corps(“恶魔附体”)是巴枯宁最喜欢用来描述无限革命能量和主动性的表达方式。”(在《elisée and élise Reclus: In memory, ed》一书中，“自然的视角、人类的作品和实际生活构成了获得当代社会真正教育的学院。”。约瑟夫·伊希尔[新泽西州伯克利高地：金莺出版社，1927]，200)。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美丽和善良，但只有它们才能赋予宇宙意义，防止它变得荒谬。”

虽然魔鬼和上帝之间的无政府主义对立提供了一个模型，听起来对每个人都熟悉(毫无疑问，以一种过于明确或暴力的方式)，但它显然与宗教无关。正如迪迪埃·弗兰克(Didier Franck)在其他地方与尼采(Nietzsche)有关的论述，2 它与一种激进的、一般性的本体论立场有关，在这种立场中，巴枯宁使用的“肉体中的魔鬼”(the devil in one's flesh)这一表述不再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教学评论(如塞古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égur)的“好小魔鬼”；3 see body))。反对上帝的人作为人类身体统一的保证

- 因此，一个完全“人性化”的、普遍有序的、没有任何“剩余”的世界的统一- 无政府主义肯定了一个摆脱了理性和宗教的“束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尼采所谓的“无政府时代”与蒲鲁东所说的构成人类的“权力”的“无政府状态”相对应，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的所有自发性、存在的所有致命诱因、宇宙中的所有神灵和魔鬼都汇聚在一起。”Varuna 和 Mitra，魔术师国王和祭司法官，暴君和立法者，债券和契约的神，都遭到了 Indra 的反对，Indra 是好战的神，是“纯粹和不可估量的多样性”的神，是“短暂”和“变形”的神，是“解除债券就像他背叛契约一样”的神。将秩序和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符号与无政府主义分裂和分离的象征符号相对立(见直接行动)，肯定了存在的自主性，使得完全不同性质的联想成为可能。

辩证法(见解放、主人/奴隶、矛盾和力量的平衡)。面对有序的表达(见这个术语)，他们想要修正未来的意志，并且通过将其奴役于他们利益的宠物而浪费现有的力量，辩证法假装在思想和现实中引入运动(见这个术语)。但是正如德勒兹所展示的，辩证法

法官蒲鲁东，3:433- 434。为了澄清蒲鲁东赋予撒旦在宇宙意义中的重要角色的神秘特征，看看外界的力量。

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

苏菲·罗斯托普钦，塞古尔伯爵夫人(1799- 1874)，因她的道德儿童书籍而闻名，其中包括《一个善良的小恶魔》(1865)。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174。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矛盾经济学》，第2卷(巴黎:里维埃尔，1923)，第253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352页。

关于“魔鬼”这个词的区别和词源，参见吉尔伯特·霍托伊斯，西蒙顿和“文化技术”的哲学(布鲁塞尔:德·博克大学，1993)，125。

无论它自称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主义，它总是一个“错误的运动”，一个“抽象的逻辑运动”，也就是说一个“媒介运动”(参见这个术语和直接的行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同于辩证思想，它拒绝一切调解，而倾向于在现实和思想中直接和立即地进行斗争。这样，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可以在尼采或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倾向中认识到自己：“将形而上学运动起来，付诸行动... ..使它行动起来，并使它执行直接的行动”(见行动章节)。事实上，正如德勒兹所写，像思考一样的艺术、反抗和所有的解放斗争 - 并不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运动代表; 代表已经是调解。相反，这是一个在作品中产生一种能够影响所有表现之外的思想的运动的问题; 这是一个使运动本身成为一种工作的问题，而不需要干预; 用直接符号代替中间表现”(见直接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次德雅克之后，思想和写作也可以用行动来代替宣传(见这个术语)：“这本书根本不是用墨水写的，这些页面根本不是纸张的叶子。这本书是用钢铁做的，折叠成八度，装满了雷鸣般的思想。这是一个权威的炮弹，我投掷在文明的人行道上的一千本。愿它的碎片飞得远远的，致命地刺穿偏见者的行列。让旧社会彻底摧毁它的根基！这本书绝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种行动... ..它是用心和逻辑、血和热锻造而成的。这是起义的呐喊，是思想之锤敲响的警钟，在人们热情的耳边回响... ..这本书是仇恨，是爱(强调我自己的)。”³

差异(见矛盾、观点、多样性、平等和不可辨别性)。在莱布尼茨(和他的不可分辨理论)之后，无政府主义(从斯蒂纳到巴枯宁)肯定了存在的绝对独特性。4. 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中，存在的身份不是通过其局限性和它在时空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外在和客观的方式来定义的。这是一种警察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中，问题总是在于确定事物，知道它们在哪里(地址、国籍、年龄、职业)，能够“定位”它们(见地方主义)，从而控制它们。身份是每个存在固有的，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存在的理由)

《差异与重复》，保罗·巴顿译(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同上。(翻译: 我自己的修改)。

约瑟夫·德雅克，《在厨房里》(1971年，巴黎自由冠军)，86-87。

“自我... ..是我的全部存在和存在，它就是我自己”(马克斯·斯特纳，《自我与他自己》，译注)。

史蒂文·t·拜因顿(纽约: 本杰明·r·塔克，出版商，1907)，206)。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Else)，以及在特定时刻赋予它存在的奇异力量(参见这些术语)。

尊严(见平等、自治)。一个人对自己独立自主、众生平等的主观认识，以及他们做自己能做的一切的权利。

直接(见单子)。直接性反对调解(参见直接行动)和代表(参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任何工具的概念，反对任何中立和客观的工具和缓冲，以维持集体力量之间的联系(见这个术语)。对于反对派来说，一切都是集体力量，好的或坏的，传递着压迫或解放。正是这些力量之间的直接和立即的相遇(见这个术语)，以及构成它们的内部，才能产生一个没有统治的世界(见这些术语)。

直接行动(见行动的宣传，行动的通过，塑料力量，和转化)。在一本关于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作品的书中，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解释了“绘画是如何直接试图释放表象之下、超越表象的存在”。色彩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系统。“这是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发明的一个实践和理论概念，是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早期先例的延续。²在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直接行动包括从社会斗争到绘画，从哲学到礼仪等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与世界的关系的总体。在某种情况下(但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只有情况)，直接行动的概念为理解 20 世纪初经济和社会背景下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键。1914 年以前法国 cgt3 的领导人之一埃米尔·普吉给出了以下定义：“直接行动，即工人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根据环境和背景，通过可能非常温和的行为表现出来，就像他们可能很容易很暴力一样。这仅仅是一个需要什么的问题。因此，直接行动没有具体的形式[强调我自己]。”⁴

吉尔·德勒兹，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丹尼尔·w·史密斯(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3)，45(转：强调我自己)。

论直接行动与行为宣传之间的联系及其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意义，科尔森，“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CGT (劳工总联合会，简称劳工总联合会)成立于 1895 年，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团主义联合会。

埃米尔·普吉特，《直接行动》，译者：凯特·夏普利图书馆(伦敦：凯特·夏普利图书馆，

作为一种塑性力(参见本术语)，它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

- 因此与尼采或德勒兹的单一存在中的物种活动概念非常接近- 体现直接行动理念的经验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所构想的工团主义实践密切相关。这是通过两个广泛的操作实现的，它们相继或同时发生：

首先，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操作。革命联盟必须通过冲突和分裂摆脱法律、代表和谈判的象征性陷阱。它必须拒绝作为“中间人”、“工人利益的临时代理大使”²在劳工运动及其与其他社会力量关系的现实的双重层面上，它必须拒绝成为“中间人”，因为它作为“代表”的地位，将它声称联系的东西分离开来，将它提出的联系转化为链条和障碍，禁止工人阶级“物质、智力和自然力量”的任何直接联系或有效结合。工会拒绝在错误的理性、透明和有序的法律和代表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它不仅必须退回到“不规则”、“多样性”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明显“不一致”中，而且，它还必须包括并暗示自己作为一个“自治团体”的孤独的亲密关系⁴由于这个条件——它所保持的亲密关系的自主性和它所假定的集中度——这个联盟就其本身而言，能够从

2003)，23(转换：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6与被动。

Fernand Pelloutier, “Du rôle des Bourses Du labour”, in Jacques 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 et les origines Du syndicalism d’Action Direct (Paris: Seuil, 1971), 41; Pouget, Direct Action, 23.

Fernand Pelloutier, “l’organisation corporative et l’anarchie,” in 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 407。在盖伊·德博尔德(Guy Debord)之后，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阐明了一种“纽带分离”，如下：“妨碍沟通的是交流本身；人类被团结他们的东西分开”(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3], 81)。塞特出席1882年8月13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宣言：“我们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分裂。”。乔治·伍德考克，《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英国，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86年，214页)。

Victor Griffuelhes, 《工团主义革命者》[1909](图卢兹，法国: CNT-AIT, 1977)

，14。

从某种观点来看，“工人阶级生活的表现形式和细节过于复杂，不能委托给无能的领导人”，也就是“表达”这种“工人阶级生活”，成为“工人内心关切”的“论坛”和“回声”²

作为一个“经济斗争的实验室”，用 Pelloutier 的话来说，³ 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集合体”，对 Pouget 来说具有“活力”和“影响力”，⁴ 是 Griffuelhes 社会革命的新炼金坩埚，⁵ 在这种条件下，工会可以与其他人联系和对抗，将其独特的亲密关系延伸到整个有组织的劳工(其他工会、合作社、各种团体、劳工交换所、贸易或工业联合会、联合会、国际组织)。通过这种联系和对抗，每个工会都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认识，扩大了自己观点的敏锐性和丰富性，以便最终“揭示”由此产生和积累的生命力，进一步“发展”生命力，直到“最高斗争将构成革命总罢工”⁶

直接民主。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对立。一般认为，它有三个主要程序: 1)召集某一集体所有成员的主权大会，以便决定与该集体生命有关的任何事情。这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 达成共同协议，举行表决(亲手提出或征求在场所有人的意见)，以表明出席者的观点并促成协商一致; 2)可撤销的授权，任何代表随时可能被替换; 3)强制委任，除了授权他的集体授权他作出的决定外，他无法作出其他决定，需要提出任何新问题供集体讨论。矛盾的是，因为它是直接的，自由意志主义民主需要时间。为了运作良好，它需要其参与者的大量其他条件(平等，亲和力，信任，实际意义等)。新的交流方式(互联网，移动电话，小群体立即协调的可能性，以及

维克多格里菲尔什, *l'action* 工团主义者[1908](巴黎: 工团主义出版社, 1982年), 15-16。

格里菲尔斯, 《革命工团主义》, 29-30。

ibid. 404.

同上。8和4。

同上。

同上。30; 乔治·伊维托, *abc* 工团主义者[1908](法国图卢兹: CNT-AIT, s.d.), 39-40。

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解决那些仅仅涉及会议和协调的实际困难的缓慢的问题。由于颠覆性的拨款[驱逐]和明智地使用新的通信手段，大会的协调以及代表的可撤销性和强制性任务几乎可以立即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作出决定的缓慢也经常构成自由意志主义实践的必要条件。

良知的方向(见牧师和政治委员)。一种古老的基督教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每个存在都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思想、意图以及最亲密的感知和内部运动置于外部权威的判断之下，而外部权威以超验规范的名义，负责认识、评估和纠正这种存在，使其权力服从于外部秩序。这种基督教服从集体力量的模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和概念中被广泛使用。它深深地植根于所谓的西方文化中，甚至在某些自称属于自由至上的运动中也是如此。

分离(见关联)。

自律(自律)。一种约束(参见本术语)，旨在使集体生命服从组成它们的外部秩序。纪律可以被这些存在内化(我们当时称之为“自律”)，但是只有通过使他们失去能力，使他们无法做出他们的天性使之成为可能的动作——就像有人说某人有一根棍子插在他的屁股上[il a avalé un parapluie]。

统治。集体力量的组成，其中某些力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使他们与自己的能力分离，使他们服从于与自己分离的一般秩序(见本术语)。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统治，因为它提议由自由和自治的力量组成(见自治)，能够做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些力量组成的力量更加强大，因为它们拒绝任何消极的东西，任何对可能性的扭曲，任何对潜在力量的捕获或拉拢。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接近于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但现在的问题是知道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哪些关系可以直接复合形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关系，或者能力可以直接复合形成更“强大”的能力或权力。这不再是一个利用或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捕捉，但社会和社区。”¹ 集体力量如何才能在不损害或压迫其中一些力量、尊重和维护每个力量所包含的整体力量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优越的集体力量？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元论(见一元论)。

记忆的责任(见永恒的回归)。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6。

E

经济(见统计学和新自由主义者)。提及经济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话语和思想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有时还披上了最数学化的外衣：例如，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但更广泛地说，在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总是努力抵制政治、国家、道德和宗教的陷阱的辩论方式中也是如此。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反对者们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并非没有理由)指出，在这个学科中，他们对经济学的重视并不一定伴随着很强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普鲁东著作《经济矛盾体系》的粗俗嘲弄中看出来。¹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在其重新组合现存事物总体的意愿中——正如其批判的激进性一样——拒绝把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和科学，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分离开来，人们参与性的批判必须通过这个领域来使其建议可信。正如这个简短词汇的全部内容应该清楚表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关于一个计划或提案的概念(见无政府主义、外部/内部、内部等等)，以及对于任何要求它在现有秩序的法庭上证明自己的要求，都是陌生的。经济的分离和过度升值——特别是在其数学表示方面，其野心远远超出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是一种压迫和还原秩序的最明显标志，这种秩序建立在统治、扭曲和压制我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其代价是无限的痛苦、浪费和权力的丧失。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看出来。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乏》，1847年。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效力/效率[效率](见目的/手段, 外部, 给定时刻和功利主义)。一种功利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概念, 它定义了一个存在或一个行动的价值, 这个存在或这个行动之外的一个目标或利益。人们常常指责无政府主义是无效的, 但这样做是因为无视这种明显弱点的原因, 从目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 无政府主义渴望从下到上改变的那种秩序的代码和账簿。无政府主义反对存在的有效性或其机械的和外部的工具化, 提议考虑那些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下由他们自己组成的存在(见这些术语)。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 两个存在之间的相遇和联系永远不能用外在的方式来定义。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将另一个维度整合到它自己的计划和利益中(奴隶和主人, 雇员和公司, 人和领导者等等)。或者, 两者之间的联系的意义来自于它们给第三方带来的有利影响(例如, 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是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崛起的联合条件)。

无政府主义反对由单独或外部利益界定的战术和战略联盟(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它提出了建立在亲密和内部协议基础上的亲密接触(参见这些术语)——一种能够改变联系人的性质并增强其力量的协议。

自我(看身体和人)。一种主观错觉, 它掩盖了构成我们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巨大多样性, 从而阻止我们产生其他被赋予更多权力和更多自由的主观性(参见这些术语)。

Élan vital (见 *vital/vitalism*)。

解放(肯定)(见反物种歧视)。在自由意志主义的项目中, 人民解放总是被认为是一种肯定的形式: 一种对完全不同的关系的肯定, 一种对能够使生活更加紧张和自由的其他存在模式的肯定。解放的愿望和意志往往源于过去或现在的压迫和统治的情况或条件。这可能是一种被消极地经历为无法忍受或不可接受的情况, 一种(作为一个“奴隶”、“雇员”、“家庭主妇”、“士兵”、“孩子”服从其父母权威的情况, 等等)能够渴望另一种生活的力量和身份被伪造的情况。因此, 这些潜在的解放力量具有三个特点, 即对统治国家的否定性和拥有属性: 1)通过它们所承受的压迫, 它们是压迫的产物;

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这些斗争总是处于被限制在仅仅拒绝压迫的危险之中；3) 通过他们进行这种斗争的手段(见这个术语)，这种手段通常是由斗争的要求所塑造和支配的，并且最终是由要进行斗争和消灭的敌人所支配的。因此，这一容易核实的历史后果是：即使在被压迫者取得明显胜利的情况下，被压迫者为取得胜利而采用的手段和身份也会立即重新获得压迫的永久胜利。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核心问题，一个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际上的问题：我们如何将这种三重依赖主导者的局面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自主的力量，即组成这些力量的主人？统治产生的集体生命如何将自己转变为解放的主体？如何使斗争的手段同时成为这场斗争的目的？(见“革命联盟”是否仅仅是一种斗争手段或他们渴望产生的社会行政机构这一激烈争论的问题；西班牙民兵的军事化问题；经常被误解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革命“纪律”、等级制度的有效性，最后是国家，国家最终总是被说成是解放被压迫者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手段。)自由至上的运动既不相信辩证法的神秘和魔术，也不相信神圣眷顾(甚至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外衣)。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斗争不会自动被赋予解放的特质。必须逐一、实际地、在构成它们的每一个最后细节中评价每一个国家：评价它们使用的手段，评价它们激励它们的意愿，评价它们从现在起确认另一个世界反对一切压迫和统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摆脱属于每一种统治形式的关系的陷阱，是因为它结合了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每一种力量都在自己的现实层面上自由至上的运动。

遭遇(见关联、事件和情景)。

Ends/means (参见 entelechy)。无政府主义拒绝功利主义和权谋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区别(“理想”的目的证明了最具争议性或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是，它拒绝了这种区分所预先假定的随时间推移的掌握(在短期和中期通过一系列操纵和策略运作的长期战略)。对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来说，目的必然包含在手段中。最终目标完全包含在当下。不仅如此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从历史上看，这种观点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国通过这种专政，声称要以最恶劣的奴役为代价，为人民未来的幸福铺平道路。这一立场也为最直接的军事行为提供了依据(例如，可撤销的授权和强制委任的代表权[见直接民主])。它意味着，通过这些直接的实践，拒绝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以来的战略。

能量(见张力)。一个借自物理学的术语，在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词汇中，用来定义一个集体可支配的力量的数量(见此术语)。这种能量，其数量随着所讨论的存在不同而不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取决于被考虑的存在构成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存在的关系。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能源”的诉求是一种呼吁，要求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新组合构成集体的力量(“个人”、间谍活动、工会、工会联合会)，将它们牵连到一种新的安排中(见这个术语)，这种安排更加强大，更少地依赖他人(见自治)，正如德勒兹所解释的那样，能够“超越其能力的极限”¹

Entelechy (见项目，集体原因)。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由莱布尼茨和普鲁东重新提出(见集体理性)，这使得我们特别有可能思考集体力量、自由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见这些术语)。2 正如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所使用的那样，“entelechy”传统上表示一个人的完成状态(从而表示完美状态)。在这个概念中，正是运动的“目标”，就像“最终原因”一样，允许从“权力”做某事到做某事的“行为”的通道。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运动的动态模型，而不是这种静态的“状态”的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内特勒希将指定最终状态。在他的著作中，术语“entelechy”表示一种“趋势”，从一开始就存在，它通过一个“扩张”或“展开”的过程引导每一个存在去发现它能做什么，它从它的构成开始就包含了什么。这排除了所有的“终极主义”“目标”(或“结束”)不是一个人倾向于什么，在外部方式，作为一个外部目的，后面我们的行动，并作为一个功能的意识，逻辑或理性的错觉。相反，它使我们在它之前，按照意愿和愿望，在我们自己最深处和最模糊的部分，按照在特定时刻构成我们的安排行事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正义》，3:267。

关于《Leibniz》中的“内在”概念，参见《哲学的修正与概念》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使用的概念，是事物和存在的同义词(参见这些术语)。

平等(参见自治、差异、基础、等级、限制和力量的平衡)。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平等是自治、自由和平衡的同义词。它与民主和人权的抽象法律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平等在抽象理想的幌子下，证明了各种真正的等级制度、统治和不平等(正如其倡导者的阴谋所证明的那样)是合理的。它也与威权社会主义的平等(在历史上相当真实)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社会主义中，绝大多数人被党的领导人和国家官僚主义所控制，服从于顺从和服从。无政府主义反对这些虚假的平等，无论是虚幻的还是外界强加的，肯定了差异(参见这个术语)，所有的差异，每个存在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绝对奇异性(参见不可分辨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不是衡量的平等，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平等。相反，这是一种基于无政府状态的平等，基于生命的绝对自主性，基于每个生命都有可能在一特定时刻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愿望、欲望和品质的极限，根据的原则是“最小的生命一旦不脱离其自身的能力，就等同于最大的生命”(见力量平衡)。这要求自由意志主义力量能够构建一个基于这种自治和自由的世界，基于拒绝任何一个人屈服于另一个人，基于每次反抗的无可置疑的价值，无论它是什么，基于这种自由在某一特定时刻通过构成他们的东西在那些真正受到鼓舞的人中间立即引起的团结(见这些术语)。

永恒的回归(见混乱，过去，给定的时刻，和外部力量)。这是尼采内部一个模糊而有争议的概念，但对于理解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本质，尤其是它与时间和历史的关系很重要。无政府主义运动经常因其不合时宜的性质、对历史规律的拒绝和对必要阶段的决定的威慑而受到指责。“我们现在就要一切!”可以啊

《哲学作品选集》。在 Gilles Châtelet, 计算空间: 哲学, 数学和物理, 翻译。施普林格科学 + 商业媒体出版社, 2000 年), 23; 埃米尔布特罗克斯, 《莱布尼茨的哲学》,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单一世界》(巴黎: le livre de poche, 1991), 133n1 和 254-255。

1 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 37(转: 我自己的修改)。

在盲目的批评者眼中，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座右铭，也是其最激烈的肯定时刻：从 19 世纪末的总罢工到 1968 年 5 月，包括更悲惨的 1919 年慕尼黑事件，俄罗斯和西班牙革命，或 1932 年冬天在安达卢西亚一些村庄宣布的自由至上的运动。有时候，无政府主义似乎支持进步的理念，这种幻想诞生于 19 世纪，是下一个世纪灾难的牺牲品。但是，无政府主义在其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想象中，与所有“进步主义”——无论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物质的还是道德的——的时间关系始终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主义解释所表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与线性时间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它所指的时间和定义它的时间是一个多重和定性的时间，它与存在的持续时间有关，与伯纳德·罗塞特所说的“持久事物的现实”有关，与增加、减少或摧毁这些现有事物的行动力量的组合、重新组合和分解的关系有关。在这里，对尼采的永恒回归的自由意志主义解释有助于澄清无政府主义者与持续时间和事物秩序之间关系的原始性。

在他们对尼采、卡尔·勒维思和在他之前的奥托·魏宁格的盲目看法中，他们无疑最好地阐明了永恒回归的自由意志主义意义，尽管是消极的，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如此。尼采为古老而神秘的循环时间概念增加了什么？勒维思想知道。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一种可怕的肯定，那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它等于拒绝基督教留下的不可逆转和不可逃避的时间。因此，它是对过去和未来、开始和结束的拒绝，对等待和希望的拒绝，对历史的“意义”的拒绝（在“意义”这个词的双重“意义”[即“意义”和“方向”]）。因此，它是对所有变化、所有进步和任何新事物的所有可能性的拒绝。“永恒回归的教导”作为相同的和作为“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的重复：3 这是勒维思和魏宁格建议的解释，其唯一和遥远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回声将是朋克“没有未来”的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一切

参见《空间与时代》（巴黎，1991 年），176 和被动，以及科尔森，《斯宾诺莎的无政府主义解读》

卡尔·勒维思，尼采的同一永恒循环哲学。哈维·洛马克斯（伯克利，加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奥托·魏宁格（1880-1908）。勒维思主要是指魏宁格的两部作品：《性与人格》，译本。Löb (London: w. Heinemann, 1906)(German edition 1903)和 On Last Things, trans. 史蒂文·伯恩斯(纽约路易斯顿：埃德温·梅伦出版社，2001 年)(德文版，1904 年)。

勒维思，尼采《同一事物永恒循环的哲学》，115。

返回，以恒星和宇宙的方式死亡和重生，没有目标或完成。对于勒维思的尼采来说，面对一个荒谬的、完全穿透了它的陌生世界(见外部力量)，人类被一种对自身存在漠不关心的自然的盲目力量所压垮，将不得不满足于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将意味着对这种冷漠和荒谬说“是”，从而打破人类长期以来渴望用其生命投入的理性和意义的谎言，彻底打破人道主义的挫折和幻想：一个能够通过宗教、道德、科学和技术统治宇宙的适当的人类历史的幻想，成为其中心，使其人性化并赋予其意义。

因此，勒维特和魏宁格非常错误地指责尼采及其永恒回归的概念，他们提出了三点：1)他的自然主义，拒绝区分人性和自然，拒绝承认一个被上帝创造和诠释的人的超越性和象征性层面，人类向上帝呼吁，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并保证将其用于拯救这个�界的故事；2)他的宿命论和拒绝自由意志，这种自由迫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见这个术语和有罪的一方)，并在他的创造者面前，在法院面前，或在内部的“道德法则”面前作出自己的解释；3)最后，他顽固地拒绝记忆，这种“记忆，通过这种记忆，人类可以回忆起自己的整个存在，”正如勒维思解释的那样，“给予人类内在的连续性，使责任成为可能[见有罪的一方]，并且本身已经是一种道德责任。”¹没有这种记忆，就不可能自由，勒维思坚持认为，不可能用一个人记得的过去、一个人记得的现在和一个人通过这种记忆准备的未来来建立一段历史。²然而，同时，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指责都是尼采的功劳。它们构成了一种与它们所要建立的东西完全相反的肯定：对另一种自由的肯定；对另一种时间概念的肯定；对一种文化、一种意义[感觉]的肯定，以及一种摆脱现代人道主义陷阱的新人类的肯定，在现代人道主义的陷阱中，自由等同于奴隶制，文化等同于压迫，记忆等同于罪恶、负担和监狱。

尼采和无政府主义仅仅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对存在的力量的肯定上，建立在特定时刻和特定安排下的力量和欲望的积极性上(参见这些术语)，从而拒绝了通常被记忆所理解的东西。以保罗·里克·乌尔所说的“现在的不合时宜性”的名义，“活在当下所带来的中断，即使不是过去的影响，至少也是它的影响。”

160.

关于这一切，参见同上，第7章，156节和消极态度。

尼采和无政府主义的确从根本上拒绝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长期以来“把我们的记忆能力... ..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伴随着它的教育则变成了“为死亡做准备”对于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来说，记忆，“记忆的责任”，以及他们在古老的怀疑论的时间悖论中所规定的持续时间的类型，是一个傻瓜讨价还价的基础，在这个讨价还价中——以记忆的能力为名，并将其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个记忆之上——人类立即被要求认识到它从中取得生命的时间的根本的“本体论缺陷”，并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以这个缺陷为食的超越。³过去不再是过去，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已经过去，没有任何现实，只有这一段不断的、转瞬即逝的、不可察觉的(参见这些术语)，而且没有内容，在这一段中，为了生存，人类只能记住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在一个跨世系(神或道德)法庭面前回答它如此短暂的存在，而这个法庭是人类未来的唯一裁判。

对于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过去的记忆，这个永恒的纪念碑和坟墓，人文主义想要囚禁人类——这种哀悼，这种缺席，以及它将使我们承受的这种无限的债务——只不过是压迫性的、凶猛的力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贬低他们所支配的人的生命和力量，剥夺他们任何可能的主动性，使他们在悔恨和罪恶中变得无能为力。与永恒的回归相反，只有当下时刻才算数，当下时刻是“时间的综合”，同时是现在和过去，现在和未来。⁴具体而言，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永恒回归的人文主义批判既不能维持其愤怒，也不能掩盖其真实面目和丑陋的利益机制。事实上，尽管人们可能会相信，勒维兹、魏宁格和人文主义对尼采的谴责并不是真的想要忘记过去——忽视它，拒绝记住它——而是相反，想要它回来。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们必须永远记住过去，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记忆，这种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依恋，这种对不再能够改变的事物的依恋，这种依恋是人类永远负有责任的，人类最终确保了它的奴役，它的无限债务，它的永恒

时间与叙事，第三卷，叙事时间，翻译。凯瑟琳·布拉米和大卫·佩劳尔(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312n42和235-236。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反对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哲学家能够最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在什么方面代替了记忆的“责任”。

伯纳德·埃德尔曼，尼采，《迷失的大陆》(巴黎:PUF，1999)。

关于这一点以及西方传统中关于时间的预言，参见《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保罗·里克，《时间与叙事》，第1卷，译。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5 et passim。

参考文献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48 et passim。

但是这个过去决不能再回来，因为那样它就会再次成为现实：它不再是过去，它可以再活一次，第三次，无限次。因此，它可以被改造、修改，从而使人类摆脱任何债务、罪恶或罪恶，同时使我们成为一个永不停止存在的现实的同时代人和参与者，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始终被赋予，除了解放关系尚未重新构建的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现在，人道主义在永恒的回归中受到了最严重的指责——宿命论和拒绝自由、自然主义和拒绝人类，以及拒绝意义和象征性——可以说，这些指责落在了那些将它们平等化的人的头上。现在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愤怒地否认建立在缺乏自由基础上的秩序，否认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的秩序，否认存在者屈从于一劳永逸的单一和简单的意义。这种秩序非常清楚地看到，尼采和永恒的回归从根本上威胁着它的伪善和奴隶制度：通过使其宣称的理想有效，而努力使它们无法实现。

人们必须时刻注意倾听人道主义话语，以便听到它在其原则和愤慨表达背后的真实意图。根据这一论述，尼采以其永恒回归的观念，将人类贬低为自然，贬低为盲目的力量和专横的本能，而不考虑人类的特殊性、文化和意义。根据这种论述，尼采和永恒的回归将使人类永远重复同样的事情，剥夺人类的任何自由。但在这些话的背后，我们可以听到其他人说的恰恰相反。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文化和象征。人文主义呼吁并以意义和意义为荣。这种意义超越了世界秩序，赋予人类“在整个超人类世界中骄傲的孤独”但它也超越了它以康德方式运作的那个人，以法律的命令形式：一种从根本上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它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主人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与他们肯定的其他东西相反

一神论宗教的过去，建立在亚当和夏娃的神话和原罪之上，一个只有上帝才能赎回的无力偿还的债务。

勒维思，尼采关于同样永恒循环的哲学，162。

“因此，他(人)也有自己的法则，因此，他自己就是完全的法则，没有滔滔不绝的任意性……这就是可怕的伟大之处：对他来说，服从职责的召唤没有进一步的意义……但他必须服从自己无情的、不容置疑的明确要求。”如果他还想行动，悲叹，欢笑，跳舞，或者反抗，让他一劳永逸地明白“康德最孤独的人不笑也不跳舞，他不嚎叫也不欢乐”，因为他必须给出的唯一“是”就是对他的孤独说“是”

魏宁格和勒夫如此强烈地谴责尼采不仅想让过去回归，而且特别想通过这种回归无限地重新定义过去的“意义”，宣称过去的意义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人道主义对尼采和永恒回归的谴责并没有剥夺人类解释的权力

- 使它屈从于世界力量和本能的盲目命运-但恰恰相反，赋予它无限的能力去解释和重新解释事件和事实的意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指责尼采剥夺了人类存在的理由，相反，人道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理由，特别是拒绝将这些理由置于来自其他地方的意义之下，这是上帝强加的一种明确的、单一的和命令性的意义。更糟糕的是，他邀请人类抓住这种解释的力量(迄今为止使用得如此拙劣)，并将其无穷无尽地倍增成为一种成就，在这种成就中，一切事物总是可以恢复、重复和重新估价。

一方面缺乏意义——尼采将人类降低到荒谬的境地，降低到漠不关心的盲目力量的境地——另一方面又过分地缺乏意义——尼采被证明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意义和虚构的力量。一个人不应该轻易地被人文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矛盾、隐藏的时代和恶意所欺骗。事实上，魏宁格和勒威兹指责尼采意志永远回归“谎言”和“虚假历史”，无休止地解释过去，不断地创造新的版本，说任何事情和它的对立面，这是非常虚伪的。他们非常清楚，对于尼采来说，一个人永远不能把现实和它的解释分开。但对勒维思、魏宁格和人文主义而言，这恰恰是一个不断地将现实与解释分离开来的问题，强烈地拒绝(没有任何解释)去想象它们可能只是同一现实的两面(见集体理性和共同概念)。过去带着它所有的生命力和决心回来了，正是因为它回来了，它才能改变其意义和现实:这就是对永恒回归的自由意志主义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永恒回归的罪恶和丑闻(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既不在于所谓的对意义的放弃，也不在于意义的过度，而是谎言和胡言乱语的同义词。相反，它们在于能够通过肯定事物和语言、它们所包含的力量和观点的无限力量使这些多重解释成为真理，能够使它们变得有效，从而使它们成为真理

以及建立它的法则:“只有那才是道德”(Otto Weininger, *Sex and Character*, qtd)。在 Löwith, 尼采的哲学永恒循环的相同, 162)。

“每一个谎言都是对历史的篡改... 这个谎言是不道德的，是时间的倒流: 因为改变的意愿，在这里，关注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在 Löwith, 尼采的哲学永恒循环的相同, 164-165。

对不可改变的时间秩序以及上帝、科学和道德所要求的事物进行攻击，拒绝向这种秩序屈服，不断地断言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这种秩序。事实上，如果人文主义唯一的和命令性的意义超越了世界，那么满足于在世界上(在科学和决定论的粗糙特征下)找到构成其基础的外在规律的同源性(参见这些术语)，尼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众多意义(参见透视主义和观点)对于世界来说是内在的。它们是世界的直接表达，是其无限可能性的无限表达(见此术语)。换句话说，人文主义对尼采的指责并不是接受事物不可改变的回归(被大多数人误解的“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而是相反，想要通过同一事物的永恒回归，即存在事物的永恒回归，来“改变”事物的这种秩序：1 在一个不断的运动中，用德勒兹的话说，回归本身就是“成为的存在”，来交换过去和现在 2 人文主义指责尼采不是否定人类自由，而是以它所表达的必然性的名义(见这个术语)，肯定人类的无限力量，因为它能够修改过去本身。

永恒(见亲密的存在和永恒的回报)。

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幼稚和愤世嫉俗的科学主义相反，正如 Murray Bookchin³ 所强调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是一个伦理项目，在其最小的实践中，直接参与判断关系和情况的价值。然而，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道德层面与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规范(宗教或其他)完全无关。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外在的和先验的规定，无论是在十诫的标题下，人的权利，或任何其他旨在规范行为和判断的“定言令式”，这将适用于特殊情况，证明法律审慎是正当的，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的祭司，法官和其他专家委员会。自由意志主义伦理是在各种集体存在所经历的事物、情况和关系的内部构成的(参见这些术语)。它完全取决于这些情况的质量

“不想承认过去(毕竟，所有的‘理性’和‘义务’都在其中)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不想改变和重新创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这是不道德的”(Lowith, 尼采的同样永恒循环的哲学, 164)。

德勒兹, 尼采和哲学, 23。

Murray Bookchin, “关于自由意志市政主义的论述”, 载于《无政府主义者论文集》, ed. Dimitrios Roussopoulos (蒙特利尔: 黑玫瑰出版社, 2002), 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些关系，他们有能力或无能力增加的力量和自治的存在，他们是原因或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伦理学可以在一个更古老的哲学传统中得到认可：从斯宾诺莎(Spinoza)到尼采(至少在所谓的西方世界)的传统。

评价(见观点和家谱)。构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基础的存在和观点的多样性，有时被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怀有恶意或无知的人视为纯粹的相对主义或自由主义，其中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因为任何事物都和其他事物一样有效(见平等)。相反，因为它是建立在存在的差异和独特性之上的，在这种差异和独特性之上，“最小的变得等同于最大的，一旦它没有脱离它自己的能力”，¹ 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见这个术语)和联合的方法，它使得有可能预先假定一个对行动、观点和立场的解放或压迫性质的持续评估。与一些人认为可以从多元主义中推断出的漠不关心的立场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肯定是建立在对存在及其交往质量的永恒判断之上的。这是一项没有法院或民法或刑法(见法律/权利)的判决，其中每个部队通过“普遍判例法”² 在某一特定时刻不断评估其他部队的质量，从而从解放的角度评估它们结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事件(参见停止，重复和给定时刻)。任何局部的(因此是支配性的)秩序都试图控制空间和时间，秩序和固定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并预测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因为它是局部的和支配性的，它从来没有达到这种掌握，必须不断地允许新的和不可预见的，令人惊讶的和未掌握的，逃脱。它不断地被各种事件所刺穿，这些事件既有微小的(玻璃杯掉落，交换眼神)，也有大规模的(战争，革命)，它们孕育着最直接的秩序和期望，也孕育着最永久的组织和项目。这是他们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向现存的力量(他们渴望主宰)和现实所包含的可能性(他们徒劳地试图掌握)敞开的大门。这个事件，无论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无限地重复着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吉尔·德勒兹：《莱布尼茨与巴洛克》，汤姆·康利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67页。

对事件概念的自由意志主义分析，参见 l'effet Whitehead, ed。

奇点，是最持久、直接、直接和积极的实验——对所有统治固有的限制，以及肯定另一种秩序的可能性，这种秩序将解放被这种统治所困住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为是停止的反面，以及它使什么成为可能(见这个术语)。社会和欲望机器的停止使现有秩序暂停(在所有起义之前的停止)，不但没有造成空缺和空虚，反而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的明显混乱的破坏。它构成了起义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和内容，起义宣称要解放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表现形式(见积极的无政府主义和超越自我)。

经验/实验[经验](见直觉和实践意义)。正如这个词最常见的用法让我们能够理解，“经验”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在最近的广泛意义上，经验[“实验”]表明，相当具体的科学操作，旨在通过同样具体的过滤器，即实验室，并通过选择、还原和净化，确定和确定一定数量的客观和决定性的事实，同样可重复，但受限于数量有限的最普遍可能的法则，然后通过科学家的声音，试图团结和组织我们的生活。¹在普通意义上，“经验”恰恰相反，总是主观的和单一的，因为它暗示了一个集体可以“尝试、感受、生活在自己的个体中”的方式²因为无政府主义宣称绝对主观主义(见本术语)，它只承认这第二种意义，并要求那些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意义的人，为他们自己和他人，明确表明激励他们并产生科学和技术安排的主观力量的独特性质(见专家)。

专家(科学家)。专家们声称自己是中立和客观的，描述和定义他们所处的外部现实。这种中立和客观的借口使他们毫不含糊地站在支配的一边(见这个术语)，特别是因为他们虚伪地试图掩饰激励他们的欲望的本质，并将现实置于外部力量之下。正如

我在这里主要是指布鲁诺拉图尔的工作，关于这类实验的逻辑和它的发明条件，以史蒂芬夏平和西蒙谢弗，利维坦和 Air-Pump: 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生活(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

埃米尔·布特鲁克斯，威廉·詹姆斯，阿奇博尔德和芭芭拉·亨德森(纽约: 朗曼斯，格林和公司，1912)，47。

见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德勒兹谈到社会科学的黑格尔主义和功利主义性质时说，“在这种抽象的关系中，无论它是什么，我们最终总是以第三者对这些活动的观点来取代真实的活动(创造、说话、爱等等)：活动的本质与第三者的收益相混淆，他声称自己应该从第三者的收益中获益，他声称自己有权收获第三者的收益(无论他是上帝、客观精神、人性、文化，甚至是无产阶级...)。”¹

表达式(见符号/标志)。Expression 反对表示(参见本术语)。在自由意志主义实践中，符号、符号、话语和理论是产生它们的力量直接表达(见本术语)。他们既不必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见直接行动)，也不必声称代表他们不同于的其他势力发言。他们可以为自己说话(尤其是在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他们自己的自主力量(见这个术语)，从来没有声称要替代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见反物种主义)。

外部/内部(外部/内部，外部/内在)(见现实平面，选择和外部力量)。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外在的联系(见社会联系)，无论这种联系采取服从的形式，还是一一在似乎相反的情况下——否定和辩证关系的形式。自由意志主义的解放对应于存在者内在的需要，对应于推动他们达到其能力极限的内在力量(即，超越其能力极限[参见本术语])，因此，它对应于解放这种力量的非常特殊的结社方式，而这种力量使之成为可能。然而，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是与支配和解放之间的区别同时存在的。

如果解放来自存在的内在，以肯定他们所能做到的形式，那么这种内在只不过是(用德勒兹的话来说)一种“被选择的外在”² 它只是外在的一种折叠，从某种观点来看，它具有某种力量的特性，暗示着存在的整体性——存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参见这个术语)，即一种没有外在的力量(参见 monad)。因此，统治纽带的外部性——一种与这种统治秩序有关的外部性——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外部性相对立，这种外部性必须称为本身的内部外部性，因为它包括所有的东西：统治的绝对外部性、它所包含的权力的外部性、破坏性的外部性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74。

“内部只是一个选定的外部，和外部，一个投射的内部”(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4)。

当解放的力量肯定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将拥抱存在的总体，一个对存在的总体的重新定位(见停顿，类比)。

相反，如果认为统治仅仅是被它捕获在网中的生物的外部，那将是虚幻的。这种联系的外在性，可以说，只是因为它需要将各种力量从它们的能力中分离出来，并排斥或压制存在的力量(除了它本身)，以便维持它对现实施加的有限和特殊的秩序。但是对于这些限制，这些限制确实是外在的，相当于一种在集体存有内部运作的劳动，这种秩序需要这种劳动来进行再生产：一种基于这些存有内在品质的劳动，一种在特定时刻选择构成它们的力量、欲望和意志的劳动(见现实层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存在对某种力量和欲望的内在服从，一种埃蒂安德拉博埃蒂称之为自愿服役的约束——主导秩序有能力将自己作为一种特定的秩序强加于人，将它们所服从的力量与它们所能做到的分开。

埃蒂安德拉博埃蒂，《服从的政治：自愿服从的话语》。

Harry Kurz (蒙特利尔：黑玫瑰出版社，1997)。

F

联邦主义(见联想)。在自由意志主义的话语中，联邦主义定义了各种解放力量相互联系的方式。联邦主义总是把不同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是相同的，他们就会合并，因此不再需要联系)。这种差异不是数字和数量上的(在空间上分布的“相同”：一组加上一组加上一组；一个连加上一个连等于一个营等)，而是定性的。每一个相关的力量在构成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联合的方式，联合的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联合的结果定义了这种联合的解放性质。决定其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条件在于组成社团的力量享有自主权和绝对的不介入权，以及组成社团的力量本身(它们本身就是社团)等等。

反馈[回缩](见身份和羊群)。民族学家 Jean-Loup Amselle 和 Elikia m'bokolo 提出的概念，用以界定压迫性命令所界定的身份和分裂如何被人主观地接受，转化为致命和消极的主体性

焦点(聚焦)(见联合、直接行动、给定时刻和力量节点)。在《正义》一书中，蒲鲁东解释了“事物和社会的所有关系”是如何在法律的“焦点”中得到“反映和结合”的

Jean-Loup Amselle 和 Elikia m'bokolo，在民族之源：种族、部落主义和国家

非洲，第二版。(巴黎：发现版，199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灵魂”和“自我”在不同的方面，这种聚焦的力量适用于所有的集体存在或主观性的类型(见这些术语)。每个存在都从特定的角度，通过对存在事物的特定描述或评价，聚焦于存在事物的整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解释说，每个集体存在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尼采可以用一种非常接近莱布尼茨的方式写道，“最小的细节包含整体。”² 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至上的运动从不害怕成为极端少数派，甚至有时(错误地或正确地)将转变与一种被误解为攻击的孤立行动联系起来(见恐怖主义和自由至上的宣传行动)。与掌握整体、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形式的循规蹈矩和大部分都是表面的大众成员(西班牙自由至上的运动本身无疑也是部分如此)相反，一种主义提出了局势的力量、集体安排和行动，这些局势、集体安排和行动是地方性的，因此能够集中某一特定环境中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能量，然后将这种能量传播到所有存在的事物中(见活跃的少数群体，核心)。历史上，亲和团体，尤其是联盟(在革命工团主义概念中)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行动的主要焦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会可以被佩卢蒂埃视为“经济斗争的实验室”，或者被格里菲尔赫斯视为社会革命的炼金坩埚(见这个术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通过他自己的“实践实验”和“准备”，“利用运动可用的行动形式... ..，提取它们，挖掘它们”，就像“石匠”工作在他的石头上或“矿石开采者”寻找他的金属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次 Simondon 可以说，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就像第一国际的劳工组织，巴库尼亚秘密社团，亲和团体，化学制剂，注意力，或者大脑本身一样，是以“信息张力”的形式构想的，“能够调节更大能量的安排”⁴

法官的骄傲，3:162。

《让·班卡尔：多元化与自我管理》，第2卷，实现

(Paris: Aubier, 1970)，41; Nietzsche qtd. in Michel Haar,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trans.

Michael Gendre (纽约州奥尔巴尼: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6)，127。人们在 Gabriel Tarde 的著作中发现这个观点并不奇怪，当他解释“一切都是一个社会，每个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事实”时(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28)。

格里菲尔赫斯，《工团主义革命者》，10。

西蒙顿，个性化，精神与集体，53-54。关于大脑，参见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他认为大脑是一个“力量的节点”，传递“来自远方的冲动”，这些冲动“意欲远行”(Milet, Gabriel Tarde et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72)，或者是约瑟夫·德雅克(Joseph déjacques)的技术新单子论：“就像热量一样。

“革命前”语境——“一种过度饱和的状态... ..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即将发生，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结构随时可能出现”——然后它变得能够“穿越、活化和组织一个各种各样的主要领域，越来越多样化和异质化的领域”，通过这些领域“传播自己”(见行为和传导的宣传)，并绘制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折叠(见直接行动、外部力量、主体、亲密和亲密的存在)。德勒兹从巴洛克思想中借用了这个概念，以思考各种形式的主观性

力量(集体力量，集体存在)(见结果，焦点，主体，主观性和安排)。正如埃米尔·普吉特(émile Pouget)解释的那样，“力量是每个运动和每个行动的起源，必然地，它是这些运动和行动的顶点。生活是对力量的运用，没有力量，只有遗忘。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是物质化的。”武力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无政府主义反对三种错觉：1)错觉，根据这种错觉，人类和人类(从本质上说)从根本上脱离了自然，脱离了它们周围的事物和存在，而这些事物和存在必须被无政府主义所利用和利用；

根据这种错觉，这个人类和这个人类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并列或先验相同的“个体”的集合——自足的，同质的，并被赋予相似的(工具性的)理性和自由(自由意志)的属性；3)根据这种错觉，人类的行动依赖于“思想”，依赖于对现实的纯粹理想的表现。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人类和人类与他们移动的现实和他们嵌入的现实没有区别。就像他们所构成的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一样，人类和人类是各种力量的综合体——物质的、有机的、心理的、伦理的——这些力量控制着我们能够拥有的一切思想。个体是力量的复合体，正如 Proudhon 所说的“活着的人类是一个

蒸汽在火车头的大脑中凝结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同样地，在人体内，我们感觉的沸腾，从我们头盖骨中的蒸汽凝结形成了我们的思想，驱动着我们智力的所有电力，驱动着我们身体机能的车轮。”！193).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与集体，53- 54。

参见 Deleuze, *The Fold*，以及 Foucault, trans. 西恩·汉德(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特别是“折叠，或思想的内部(主观激发)”一章
Emile Pouget, *Direct Action*，23(转换: 我自己的修改)。

小组。」¹“存在”(主观性)并不存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是组成他们的各种力量的无限可能的组合的不稳定和变化的结果，他们与这些力量相关联。意志的性质和命题或陈述的意义本身并不存在;相反，它们取决于产生它们的力量安排。自由意志主义的实践不在于孤立地判断命题、意志和存在，而在于总是将它们归还给产生它们的社团或集体安排(见本术语和族谱)，在那里事物可以改变，并且有可能试验其他社团、其他安排，以及其他包含更强大和更自由的意志和命题的集体存在。

分裂(见集体理性和力量平衡)。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经常因其无休止的争吵而受到指责，在这种争吵中，它经常呼吁的无政府状态，以如此明显的消极方式，显示出它的混乱组织效应(见停止)。自由至上的运动之所以喜欢争论和争吵，主要是因为其项目雄心勃勃，难以实施相应的做法和逻辑(见目的/手段)。分裂同时证明了这种弱点和野心。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以及大多数政治辩论中，易怒不仅或多或少是对组成任何联合或集体存在的力量的自主性的精神病态的肯定(见这个术语)。它也是无政府主义构想发展一个共同项目(见集体理性和共同概念)的方式的表现，这个项目与力量的平衡有关。在集体行动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中，任何观点都始终是一种力量的表达，一种力量以其野心和独特性迅速而必然地引起对相反力量和观点的肯定的散漫的面孔。正是在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游戏中，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试图- 通过不断测试和评价所涉力量的质量和安排- 建立一个没有支配地位的世界，能够解放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力量。

自由意志(见自由)。当前秩序的自私幻想，将抽象自由的抽象力量减少为个人自由的虚构，将集体力量的集合与它们的能力分离开来。人类的个性被迫(通过道德、教育、法律和语言)否认组成它的内在复合和变化的力量和欲望(见主观性)，否认使它能够重新构成自身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超自我(见个性化、选择、，

¹ Proudhon, *Philosophy of Progress*,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主体和力量的平衡)。与此同时，人类的个性被从自身和自身的能力中驱逐出去，从根本上服从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试图完全根据其自身的预设来塑造它，¹使它完全屈从于自身的命令和要求。通过自由意志，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上帝、法律和社会面前)，因而对实际构成人类的所有力量和愿望负责(见这个词)，而这些力量和愿望实际上构成人类的主体(见这个词)，人类总是被迫压制，体验作为人类本身以外的现实的危险和邪恶的现实，人类必须拒绝和拒绝这些现实，尽管这些现实是人类解放的唯一手段。从原罪学说到萨特意识的虚无，再加上笛卡尔的“认知”，康德的定言令式，以及契约和市场中规定的权利，自由意志是专制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正是巴枯宁最清楚地阐述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立场：“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是无稽之谈，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发明，它直接把我们引向神圣专制，把我们从天上的专制引向地球上所有的权威和暴政... ..”“唯物主义否认自由意志，以建立自由为目的；唯心主义以人类尊严的名义宣布自由意志，在每一个自由的废墟上建立权威。”³

自由(见必要性、权力、自由意志、奴隶制/自由和欲望)。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与所有道德和专制话语所宣扬的抽象和虚幻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它也与“为自己”、“毁灭性的断裂”的空虚无关，这种自由的义务是萨特哲学强加给它的。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自由和权力是同时存在的。每一种力量都是一种自由，每一种自由都是一种力量：一种不会与自身可能性隔绝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是同义词

而且还通过选择(参见这个术语)什么可以符合人类的这种秩序，体现它，赋予它权力，同意它。

Bakunin, *uvres completes* (Paris: Champ libre, 1982), 8:439-40.

米哈伊尔·巴枯宁，《上帝与国家》(纽约：多佛，1970)，48页。

让-保罗斯特，《存在与虚无》，trans. 巴恩斯(纽约：Citadel出版社，2001)，415。毫无疑问，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科尼利厄斯·卡斯托利亚迪斯的思想和他的完全萨特式的抽象解放思想，这种思想以二元论的方式(通过制度与制度、自治与他律之间的区别)，以虚无创造的方式。要了解卡斯托利亚迪斯概念的全貌，请参阅杰拉尔德·大卫，科内利厄斯·卡斯托利亚迪斯，《自治计划》(巴黎：迈克隆出版社，2001)。

“libertas这个词来源于libet, libido, 即，情感本能(饥饿)，驱动力，自发性[参见本术语]”(Proudhon, *économie*, 2863[7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必要时(参见本术语)。正如蒲鲁东在谈到人民这种潜在的单一集体力量时所写的那样(见这个术语)，“经过大量的工作，哲学从其长期的思考中发现了什么，即相反术语的同一性和同质性——例如，它用谚语“*summa libertas, summa necessitas*”所表达的自由和必然性——在人民中得到了实现。在人们的亲密体验中，生活的这两个方面，自由和必要性的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积极的、必要的、有机的，就像人类的意志，就像物质的吸引力。”¹

我们朋友的朋友(见 *affinity, put to death, Daoism, solitude, and analogy*)。因为无政府主义对所有的外在性都是陌生的(见表面)，所以它拒绝了政治的机械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它始终是一个定义他人的问题，将他们定位在一个地方和一个空间(见地方主义)，并将他们归类为权力棋盘上的朋友或敌人，以便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战略征服或捍卫他们。像尼采一样，无政府主义赞同德里达所说的哲学家之间的友谊：“作为朋友，我们首先是孤独的朋友，我们呼吁你们分享不能分享的东西：孤独。”² 因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友谊建立在亲和力和存在之间的直接联系之上(参见这些术语)——一种对构成它们的東西的内在亲和力和一种没有中介的关系——它拒绝任何工具化或逻辑推理。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朋友的朋友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朋友，而他们的敌人，在特定的情况和特定的时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可能是我们在另一个现实层面上的朋友(见这些术语)。因此，无政府主义不适合被理解为权力游戏的政治，因为它宣称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尼采所说的“伟大政治”，一种没有外部性的政治，一种没有权力或支配的政治。

逃亡(转瞬即逝)(见生命、成为、运动、事件和给定的时刻)。巴枯宁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生命的亲密关系，这是自由至上的运动试图重新构建另一个世界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就像尼采一样，没有任何现实本身是不可改变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接近的，结构化的，现象或现存现实，只是表象，将依赖于它们。没有后世，就像上帝一样，只会证明当前秩序的永恒性和义务性。正如巴枯宁所证明的那样，存在的现实完全与现象和“表象”相同，以至于即使是亲密的存在(参见这个术语)也恰恰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一面，并且立刻，

蒲鲁东，《经济学》，2866[9/2]。

雅克·德里达《友谊的政治》，乔治·柯林斯译(伦敦: Verso, 2006)，35页。

最真实、最短暂、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和存在: 这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 它们真正的个性(见个性化), 如它呈现给我们的感官。”只有语言和表现的陷阱(见这个术语)才能使我们相信它们束缚和限制的现实的永恒性。自由至上的运动本身也不能幸免于这些陷阱: 它总是试图把自己的历史变成古怪的、深褐色的图像, 把现实生活变成制度, 把实验变成教条公式, 然后要求人们从中推断生活和实践(见圣经和理论/实践)。

即使革命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实验在实践中最成功地实现了最大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也不总能逃脱代表性的陷阱, 代表性是一种主导秩序的机制, 它不断努力将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降低到简单的、无实体的代表性。毫无疑问, 穆雷·布克钦的伟大价值在于, 他展示了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原创性和脆弱性, 以及转瞬即逝的、临时性的和环境性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本质: 运动(参见这个术语), 德勒兹“逃亡路线”意义上的间歇性和逃亡性的“时刻”, 一切似乎都可能发生的时刻, 既因为它们与历史和经济上的秩序和逻辑的不同(和冷漠), 也因为它们反对这样一种秩序和逻辑, 这种秩序和逻辑本身绝不能保证人类的解放, 即基于正义和自由本身的另一个世界的出现(参见停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 通过对各种革命工团主义经历的仔细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从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概念(见阶级)。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毫无疑问, 任何具有阿纳齐斯特性质的运动都是如此)总是具有传导性(见传导), 无论是植根于工作关系还是书中恰当地命名为“过渡阶层”³(例如来自农村世界或移民的“分解的农业阶层”, 或者当它与更古老和更持久的职业环境联系在一起时, 受益于任何环境, 甚至是最稳定的环境中都会出现的变化、保留、回避或偏差, 最倾向于完全按照组成它们的顺序来定义自己。我们可以

巴枯宁, 《哲学思考》, uvres 3.39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可能被视为与怀特海的分析相交叉, 在怀特海的分析中, 存在的本质被认为是“暂时的凝结”、“事件”、“流动的单子”关于这一点以及怀特黑德和西蒙顿之间的联系, 参见《吉尔伯特·西蒙顿: 个性化和技术的思考》, 19-54。

Bookchin, “论自由意志主义市政主义”, 9-22。

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从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角度，在美国世界工业工人的短暂而激烈的冒险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具有这种传导性和环境性的特征——转瞬即逝，但总是以新的形式重复出现。我们可以在朱拉联邦钟表匠的简短历史中找到它，正如玛丽安·恩克尔所描述的那样，朱拉联邦钟表匠实际存在的时间不到十年。然而，我们也可以在法国找到它，在第一国际在第二帝国末期四到五年的高峰时期；在 25 年后，从 1895 年到 1901 年，劳动交易所独特而短暂的历史中；或者，用另一种方式，从 1901 年到 1908 年，在劳工总联盟(CGT)的七个革命年代，在法国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开始明确放弃它的希望，在维伦纽夫-新城圣乔治事件之后彻底改变。³即使是西班牙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尽管看起来持续时间很长，但也需要对其存在的几个时刻进行非常精细的分析，分析导致它从一场斗争和转变到另一场斗争和转变，到 1936 年悲剧性对抗的转变和分裂。我们必须提供各种各样的例子和具体的分析。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就像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从来没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和永恒性，它们的头衔在雇佣它们的人的表象和想象中是那么容易唤起的。一般来说，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是非常少数主义的实验，它们只是表达了生存的時刻和形式，而不是被记录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甚至是辩证地——或者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即使被历史学放大——而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在它作为另一种可能性逃避的另一种现实中，主张自己反对这种历史。它们是对存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解放性肯定，这个组成部分源于巴枯宁所说的事物和存在物的瞬间和逃亡特征，在这个特征中，活着的现实让位于生命，因为生命本身是“逃亡和短暂的”，而且只有生命本身“能够而且确实总是包括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所有的过去或转瞬即逝的生命”⁴

关于国际产业工人组织，参见拉里·波蒂斯的《工人革命运动史》(巴黎: CNT- RP/Nautilus 出版社, 2001 年), 第 49-67 页。

玛丽安·恩克尔, 《侏罗纪联邦: 瑞士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洛桑: 城市, 1971)。

正如肯尼思·h·塔克解释的那样, “1908 年在 Draveil 和 villeneuve-saint-georges 的罢工中死亡的几名工人, 被 CGT 内部的许多人归咎于工团主义领导层的激进言论,” 工团主义领导层发现自己被从内部清除, 从外部受到迫害(法国革命工团主义和公共领域[剑桥, 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 24-5)。

巴枯宁, 《哲学思考》, 乌弗雷斯出版社, 3:395。

G

宗谱学(见评价、观点和判断)。正如吉尔伯特·西蒙顿所证明的那样，集体的存在总是比他们本身更重要，因为他们包含着参与自然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见这些术语)。因此，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立场、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内在的他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这种观点、这种立场和这一行为的性质。“家谱”一词所指的是对这种性质的评价。评价与谱系是相辅相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可以解释“谱系是如何同时意味着起源的价值和价值的起源。系谱学既反对绝对价值，也反对相对价值或功利价值。”²

大会(见直接民主)。

将军(和起义者)罢工(见伟大的晚上，非暴力，战争和起义)。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表述

尽管与普鲁登或尼采不同，西蒙顿倾向于迅速地将任何形式的个体化(在普鲁登的词汇中是集体力量)指向无限和无限，如普鲁登和尼采，但他并没有忽视任何个体化的“复合”特征，这种特征是由其他个体的多重性复合而成的，如穆里尔·库姆斯所证明的(吉尔伯特·西蒙顿和跨个体哲学，译者注)。Thomas LaMarre [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22)。同时，“不确定性”本身只是“与个体存在有关”，从而与存在的“模式”有关，对于这一点，西蒙顿只注意到“概念是缺乏的”(西蒙顿，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4)-我们在蒲鲁东或尼采中发现的概念。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2。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 1914- 1918 年战争之前，主要是在法国，“伟大的夜晚”作为广大工人阶级的口号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在集合所有生产者的过程中，他们自己是由贸易、工业部门和公司联合起来的，工团主义定义了一个特定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语)，这个层面跨越了人类现实的全部——劳动(参见这个术语)。当每个人都停止工作时，生产者就停止了经济和社会机器的再生产，这种停顿(见本术语)为现有秩序的根本转变创造了条件，为所有解放力量的行动创造了条件。总罢工计划的独创性无疑在于它有能力在一种通常非暴力的集体表达方式下，恢复 19 世纪起义运动的叛乱和战争层面，因为它在特定时刻和特定背景下跨越了大多数人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罢工的想法和计划根本不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或人类形态，如劳动。它们在任何集体反抗的第一步，是任何其他可能性出现的前奏。

慷慨(见暗示)。对集体力量能够超越自身能力的肯定。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只有慷慨——即一种不受外部或内部限制的力量的力量(见力量的平衡)——才能成为利他主义的基础，以及不是建立在内疚和外部道德基础上的对他人的开放。

姿态(参见工具/武器，塑料力量和行动)。一个来自日常语言的重要概念，从它的多元感官，它与身体的联系，它的本质特征是“运动”，以及它频繁的伦理和审美维度(“美丽”和“丑陋”的手势，等等)，是一个罕见的词汇，使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条件出现的人(除了通常语言的还原作用)。哲学家、数学家吉勒·夏特莱(Gilles Châtelet)继让·卡瓦莱(Jean Cavallès)之后，进一步强调了手势概念在物理和数学领域的丰富性。在这个例子中，当思想不再害怕“把自己定位在晦涩难懂的前沿，把非理性的东西不当作‘恶魔’和难以表达的东西，而是当作产生新维度的手段。”¹ 作为行动、其创造力以及所有解放经验的语言表达(从行动的宣传到“Makhnovshchina”)，“手势不是实质性的：它通过决定自己而获得振幅[见决定] 手势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它决定、解放并暗示一种新的形式

¹ Châtelet, figure Space, 10 and 3.

这个手势是有弹性的，它可以自己蹲下来，跳过自己……这个手势在抓住它之前就已经包裹起来了，并且在表示或例证之前就勾勒出它的展开：已经被驯化的手势就是那些作为参照物的手势；……一个手势唤醒了其他的手势……”

给定时刻(见情况、事件和焦点)。埃米尔·普吉特解释说，由于“直接行动”的“无与伦比的可塑性”，“积极参与实践的组织”可以“以一切可能的战斗力活在当下，既不牺牲现在，也不牺牲未来，也不牺牲现在。”² 不应将特定时刻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与列宁主义的军国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危机”或“现状”概念混为一谈。³ 反对力量作用的机械和外在的观点——给我一个杠杆(党)和一个支点(危机)，我就可以移动世界，列宁想——在这个世界里，外来的代理人可以操纵和利用它们的结果为自己谋利，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反对现实的内在维度，这个维度是“当下最热的时刻”，普盖特和普劳顿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可塑性”(见塑性力量)，尼采和德勒兹的物种活动和单一存在，古斯塔夫·兰多尔的“单一精神”。在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力量的安排中所构成的特定时刻，聚焦和重复各种可能性，每次都不同，这既不是其他任何事物的象征，也不是其他事物的例子。这些可能性，在这一时刻或这种情况下与存在本身相关联，是存在及其单一性的表达

同上。

直接行动，13。

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门口的革命：从二月到二月的作品选》

1917年10月，埃德·斯拉沃伊克(伦敦：Verso，2002)，24,21。

科尔森转述了列宁的《该做什么》，其中列宁转述了阿基米德的“众所周知的警句”(“给我一个站立的地方，我就能移动地球”)：“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我们就能推翻整个俄罗斯!”参见《阿基米德的方法》(纽约：多佛出版社，1953年)，十九世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宁的基本著作：“该怎么办?”以及其他著作(纽约：多佛出版社，1987)，150页。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人类秩序的创造》(巴黎：里维埃尔，1927)，421页。

“当各种社会结构本身相互排斥和独立，充满一种单一的精神时，就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高度文化”(古斯塔夫·兰多尔 qtd)。在 Martin Buber, path in Utopia, trans. R.f.c. 赫尔[雪城，纽约：雪城大学出版社，1996]，53[转：我自己的修改]。(译者注：参见古斯塔夫·兰多尔《革命和其他著作：政治读者》，译者注)。加布里埃尔·库恩[加州奥克兰：首相出版社，2010]，129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自由意志主义力量试图发现、发展和追求的，是关于存在的总体的观点。这样，这一特定时刻就可以与 *Hélène Châtelain* 提到的与 1917 年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起义 *Makhnovshchina* 有关的“历史机遇”相提并论，这一“历史空间”与 *gulyai-polye* 周围平原的“自由和开放的地理空间”相吻合

上帝(见自然)。这是集体力量总体的一种虚幻的结果，只要这些力量与它们的能力分开，就无法理解它们的行动动机和这种行动的影响的性质(见这些术语)。上帝从结果变成了第一原则。因此，它从一种对内在力量的想象和虚幻的表达，转变为赋予它意义的力量，成为一种超然的力量，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命令它们，统一它们，使它们服从牧师和其他集体力量代表的真正力量，服从统治关系的专制和压迫枷锁。

好/坏[*bon/mauvais*](见善/恶)。

善/恶[善/恶](见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拒绝区分善与恶，这两个定言令式的范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超越世俗的权威(上帝、国家、定言令式)，就像伊甸园或西奈的上帝一样，被指控命令人类必须做什么：善在哪里，恶在哪里(“你不可吃那苹果！”“你应该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正如 *Giorgio Agamben* 所证明的那样，善与恶并不是相互之外的，在这种关系中，善的任何延伸都会减少或抑制为恶所保留的份额。² 对于这种外部关系(参见本术语)，无政府主义反对一种内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善与恶只是对存在方式及其相关联的关系的两种内在和主观评价。在这种关系中，这一次在吉尔伯特·西蒙顿的词汇中，评价主体不仅仅是个人的(参见这些术语)，因为它打开了自身所包含的外部(*apeiron*)，打开了阿甘本所说的“最里面的外部”(参见集体)。³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概念是平行的。无政府主义不问善恶，而是问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对于这样那样的存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好的(或积极的)是增加一个存在的力量；什么是坏的(或消极的)是

Hélène Châtelain, *Radio Libertaire*, 1993 年秋。

阿甘本，未来的社区，13 和热情。

同上。

是什么减少了它。每个存在自己决定通过经验来评估这种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一个存在的力量的增加表现为一种快乐的感觉，一种悲伤的感觉的减少。因此，好的和坏的东西是完全内在于生命体验的。

好的感觉(见常识)。

政府(见自我管理，特别是私人/公共)。这是 19 世纪的一个古老的名词，用来表示国家(“如果你真的感到幸福，你就会幸福/政府必须离开!”但是，同时，由于它的海洋词源(从拉丁语 *gubernare*，到舵[*gouver-nail*])，使得我们可以思考所有集体生命的自主性和相互依赖性。这表现在“治理自己”的想法中，因此“被他人治理”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认为，任何私人(见特定的和私人/公共的)——也就是说，任何存在于特定时刻的人——都是一个政府。这是因为，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每个集体根据其构成要素(见平等)，具有自主和自由选择的绝对特权，而当前秩序的维护者只为国家主权保留这些特权。正如 *Courbet* 所说，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本身(在传统意义上)仅仅是一个“特定的”个人(可以说)，过分要求将其权力从其他个人手中移交给其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怀特黑德也可以说笛卡尔，从他的窗口凝视着幽灵戴的帽子和穿的外套(在他的“第二次冥想”³)，那么他就是“一个特殊的，只有普遍性的特点”，同时，“每一个所谓的‘普遍性’都是特殊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与其他事物不同”(见不可分辨)

译者注：不要唱“*Faut plus d' Government*”(“*No More Government*”)，这是弗朗索瓦·布鲁内尔(*François Brunel*)的一首歌，他是一位好战的咖啡馆侍者，摄于 1899 年。

参见 *Gustave Courbet* 给 *Bruyas* 的信 1853 年 10 月 qtd. 在詹姆斯亨利鲁宾，现实主义和社会远见在 *Courbet* 和蒲鲁东(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 年)，15。

在《第二次冥想》中，笛卡尔沉思着“我的思想是多么容易犯错误”，例如，他反思道，“如果我偶然看到窗外有人穿过广场，我通常会说我看到了那些人自己……但除了帽子和衣服，我还能看到什么呢？”(22).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翻译。Cress (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93)。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过程与现实(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 年)，48-4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伟大的夜晚[伟大的晚上](见罢工和革命总论)。当我们读到在1914年之前的日子里，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在相信革命已经爆发的时候，至少从街上的噪音中跑到窗前，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伟大的夜晚”这个概念的力量。迈克尔·洛伊恰如其分地将世纪之交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描述为一场弥赛亚式的运动。几十年来，劳工运动的广泛领域预计，罢工和与国家的对抗(叛乱、骚乱和各种违法行为)将最终导致现有世界的彻底转变，一种事物秩序的彻底重组，在这种秩序中，正义和自由将在迄今为止被压迫、谎言和统治所奴役的世界的残骸中维护自己的权力。这种对所有现存事物进行彻底改造的救世主愿景——没有救世主的救世主，完全独立于当时欧洲(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机构——不应与它也彻底改造的革命思想相混淆，甚至也不应与大罢工的口号和计划、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表达方式相混淆(见这些术语)。与传统的革命思想相比，“伟大的夜晚”的概念无疑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最大的不同：(一)拒绝将社会变革仅仅与政治变革、国家最高层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共和主义、布兰奎斯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伸等同起来；(二)拒绝将革命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推翻旧政府的群众，另一类是负责以独裁统治的形式重建新的公共合法性形式的开明和受过教育的政治先锋；(三)拒绝将转型运动与或多或少的长期战略和令人窒息的工具化组织形式联系起来(政党、工会和其他专门从事这方面或那方面生活的群众性“组织”，坚定地服从于党的战术和战略方向)。“伟大的夜晚”，就像它在某一特定时刻所表达的所有自由意志主义项目一样，与时间和空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首先，时间：在它的流行形式，以及它的神秘和宗教形式，3 伟大的黄昏表达了激进和普遍的性质的转变，现实是能够在时间的领域。事实上，与革命以及人们对革命的看法相反，“伟大之夜”的时间激进性并不与未来以及即将到来的变革相联系

尚未出版的回忆录，洛朗·穆林，金属工人工会秘书，香槟-弗格罗莱斯(卢瓦尔)。

Michael Löwy, *Redemption and Utopia: Jewish Libertarian Thought in Central Europe: a Study*
迈克尔·洛伊，《救赎与乌托邦：中欧的犹太自由主义思想：一项研究》

霍普·希尼译(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

在这一点上，参见洛伊的《救赎与乌托邦》。

现在只是作为“乌托邦”的承诺而存在，通过征服权力而得到保证，从而赋予这个权力以责任，在未来某一天——将来某一天——使之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国家的消亡，等等)。“伟大的夜晚”的世俗激进性总是与一种先行性和一种积累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一种先行性或过去(参见本术语)与现在融合在一起(参见重复和永恒的回归)，因为它是事物的实际状态的特征；一种能够实现蜕变的解放力量，而“伟大的夜晚”就是这种蜕变的最终证明。虽然革命被认为是一个起点-一个转变即将到来的起点-伟大的夜晚被认为是一个结果：一个已经实现的转变的结果。

第二，空间：由于它包含了从微小到广大的所有存在的事物，在没有任何等级制度或功利主义表述的情况下，一个现实的某一方面与另一方面相比，“伟大的夜晚”概念所表达的转变是一种立即的转变(见本术语)，其中每一情况和每一时刻都包含这一革命概念所要求的转变的总体(见焦点，活跃的少数群体)。每一次斗争，每一条裂缝，每一次回避，在现实中都是最终爆炸的重复和表达(见这些术语)。正如埃米尔·普吉特解释的那样，“日复一日的斗争”和“为未来奠定基础的任务”既不是“矛盾的”，也不依赖于从外部思考的计划或战略。每一个致力于斗争和反抗的“过渡时刻”(参见这些术语)的生活方式都是“既不牺牲现在也不牺牲未来”(参见目的/手段)

“伟大夜晚的黎明来临！”正如这个幽默的短语所暗示的那样，“伟大的夜晚”既是一个晚上，也是一个早晨，既是黄昏，又是黎明，是现存秩序的直接蜕变，在这个秩序的裂缝中，可以感觉到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即使是现在，它仍然存在于事物的中心。

群体(群体)(见亲密的，集体的存在，和联盟)。

内疚(见怨恨、反应和责任)。内疚是怨恨的正面或隐藏的一面，在这种情绪中，一种支配的关系从支配的角度被内在化，从这个角度证明一种永无止境的补偿是正当的。内疚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它包含着自己的满足或利益，它授权一种微妙的权力、迫害、服从和统治的混合，这种混合反对所有的解放。一个成功的有罪化的历史例子：基督教。

1 émile Pouget, Direct Action, 13 埃米尔·普吉特, 《直接行动》, 1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有罪的一方[有责任的一方](见权力)。“Au poteau!”(“去鞭子那儿!”)这一古老的战争口号表达了 20 世纪上半叶破产的店主、股东或退伍军人的怨恨,可以作为本世纪任何一个极右翼运动的口号:渴望找到那些应为自己的疾病负责的“有罪的方(责任者)”——“富人!”“Spics! 犹太人! 共济会员! 匈牙利人! 堕落者!”“其他人!”把他们拖到法庭上,或者更好的办法是,自己伸张正义,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他们的喉咙,用他们的鲜血(暂时地)淹没自己的无能和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的愤怒,因为自己不幸只是一个人,没有更美丽或更富有,身体不好,衰老,不得不死去。正如伯南克所写,从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愚蠢的愤怒充满了世界。”事实上,“鞭笞柱”、“行刑队”以及为了事业或公共安全的名义在清理树林时发生的大屠杀,并不是极右势力的专利,甚至也不是那些总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由那些自相残杀的白痴,不管是前一天的邻居,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变性人,重新挑起的身份战争。鞭笞职位和政治暗杀同样容易产生,用更冷酷和科学的术语来说,是上个世纪左翼革命的一大部分:在俄罗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妻子”、“小资产阶级”、“富农”、“人民的敌人”、“看似左派但实际上是右派的机会主义者”、“反革命者”以及其他“好色之徒”都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集体和匿名地,为他们所谓的“客观”和“集体”责任的经济灾难,饥荒和灾难,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如资本主义,从未停止产生。因为自由意志主义道德拒绝任何道德,拒绝任何以一种外在的或超然的准则为名的召唤,这种准则声称要规定一个人是谁,该做什么,自由意志主义道德拒绝承担责任的概念,以及包括罪行、审判、法官、检察官、心理学家、教授、牧师、教育家和其他“教训”分配者在内的宏大进程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参与

在法语中, *métèque* 是过时的英语单词“*metic*”的同源词,是对“外国人”的通用贬义词,有时被比作“意大利佬”或“意大利佬”等冒犯性的美式英语单词

乔治·伯南诺斯,《我的时代日记》,帕梅拉·莫里斯译(伦敦:鲍里斯伍德,1938),

30.(译者注:伯南诺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作家,在这本 1938 年的书中记录了他对西班牙长枪党运动的幻灭。根据 Seth d. Armus 的观点,“愚人的愤怒是他在西班牙看到的”[法国反美主义(1930-1948):复杂历史中的关键时刻(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139.]

这个“教训”总是一个知识(被打成一个)和一个“分级[更正]”,两者都在

在长时间的协调行动中，需要大量的努力和自我控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总是与所采取行动的性质和质量有关，也就是每个参与者选择采取这种行动和接受这种行动所带来的限制的原因，这些限制随后转化为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信任(参见这些术语)。但是，这些联系的持续存在以及这些联系所预先假定的承诺从来不是建立在外在的道德基础之上的，这种道德基础是一种正确的行为准则，试图确定一项共同行动的框架(法律或其他方面的)，而与这种行动的性质和方式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意志主义进程中，任何一个相关势力总是可以断绝与其他势力的联系，恢复其独立性，或者，如果它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如果援引更高的必要性，即与所采取的行动有关的至高无上的必要性，它就可以反抗。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势力都可以选择不加入那些表现出过于轻浮以至于无法持续参与任何时间的集体行动的人。

由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在其宪法中拒绝这种责任逻辑[责任]，因此，与它所反对的那些人相比，自由至上的运动也同样拒绝这种逻辑。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暴力行为(见叛乱、起义、战争/好战)总是与特定时刻、特定情况或特定背景下对抗各方的各自情况和立场相联系。它所对抗或(有时)杀死的敌人，就其当时的地位而言，总是一个敌人，但肯定不是因为它要对一种想象成某种无形本质的政治或社会选择负责。的确，在西班牙或其他地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往往伴随着处决和“清算”(牧师、老板、地主)——统治暴力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事后或伴随着反抗和起义运动(见这些术语)。无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无论他们是在事实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被要求处决，这些“处决”本身与当前情况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扭转酷刑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完全违背了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动态和逻辑。他们只是再次证明，被统治者的地位绝不是解放的保证，反抗和起义总是可以变成报复、怨恨和“清算”，被产生他们的统治关系所腐蚀或污染，他们试图破坏但最终以一种形式复制的关系本身(见肯定和解放)

这个词的崇高和微不足道的暴力意义。

关于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伦理及其引发的争议，即使在内战最恶劣的条件下，见 ACL 出版的与 Simone Weil 和 Louis Mercier-Vega 有关的著名文本 in presence de Louis Mercier: Actes du Colloque autour de Louis Mercier, Paris, 1997(Lyon: ACL, 1999)。

H

圣经(见理论/实践, 常见概念和集体理性)。对历史的神圣(或虔诚)叙述, 虚假和压迫, 自由至上的运动对此并不陌生, 当它提到过去时, 它常常诉诸于口号和图像。任何实践、任何实验都包含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与它在特定时刻安排在一起的内在力量和欲望不可分离。产生最强大和最自由的存在的结合过程与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意志和力量的相遇相对应, 这些意志和力量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内部(见自由)。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解放性质的协会来说, 它决不能被任何外部的叙述或表述所束缚(见直接行动), 这些都是压迫、支配和剥夺权力关系的确切症状。因为它总是在军队行动的当前时刻颁布的, 这种拒绝代表权的做法(见这个术语)也反对任何对过去的外部重建, 认为它是一个已经结束和死亡的现实。只有在解放运动和工程中, 过去的意义和意志的内在实现和重复——它们作为另一个总是实际存在的东西的恢复——才能具有力量和意义。因此, 被认为属于过去的存在或安排的差异性并不比现在的存在或安排更大。尽管与这些过去的存在和安排的联系是独特的(任何联系都是独特的), 但这并没有引入任何性质上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会带来虚假的必然性, 即统治关系通常附属于过去的观念(见永恒的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巴枯宁可以肯定, 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Nicolas Stankevich)的亲密存在是永恒的, 而让·塔尔迪厄(Jean Tardieu)可以唤起铁匠铆接阳台栏杆的回归: “但铁匠仍然在附近, 如果我用钥匙轻敲他过去打过的铁器, 我仍然可以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它纯洁的声音中听到，从几个世纪的犯罪深渊中涌出，他的努力和胜利的呐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伯特·西蒙顿可以认为是永恒的或永恒的呈现了“反抗中奴隶绝望的、匿名的姿态”，2 不仅仅是一个图像——例如以说教场景或叙述的形式传给后代——而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存在”(见传导)，作为一种经验，在它出现和获得其意义的“环境”中留下了印记，“环境”的消亡也“预先假定媒介[环境]的消亡”³

(见群众和群众)。在尼采和自由主义话语中，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极端的贬义词，用来谴责现有秩序所界定的角色、职能和从属关系(阶级、性别、国籍、宗教等)的一致性(见这个词)和主观接受性(见反馈)。

他律(见自治，诺莫斯和游牧)。

等级制度(见领导、平等、差异、限制和力量的平衡)。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这是一个重要而模糊的概念，要求我们区分外在的等级制度(见约束)——压迫性的、支配性的和被自由至上的运动强烈抵制的

另一方面，自由至上的运动在构想自己的发展和现实的方式中所固有的内在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反对外在的等级制度，即现实的纵向和金字塔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一些集体存在以外在的方式服从另一些存在，给予一种地位和位置，这种地位和位置以一种抽象和一般的方式在一个以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广泛指挥规模上确定。但它也反对(并以同样的决心)虚假的平等，每一点都是外在的(蒲鲁东称之为“共产主义”)，在这种平等中，出于同样的地位和地位的原因，所有的生命，如奴隶或原子，都是平等的，但只有在法律、国家、上帝、政党、程序以及那些代表他们说话的人的自私和外在的注视下才是平等的。

《地下河》，戴维·凯利译(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血斧出版社，1991年)，141-143页。

西蒙顿，《精神与集体的个性化》，105。

ibid.102.(译者注:要进一步解释西蒙顿的“转换”概念，即“个性化操作的方式和手段... ..以便进行修改(转换),”参见大卫·斯科特，吉尔伯特·西蒙顿的《精神与集体个性化:批判性介绍和指南》[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4]，特别是。77-80)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于这些外在的、压迫性的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假定市场或法院的形式上的平等，也没有假定兵营的共产主义，而是另一种等级制度——人类组成中固有的等级制度，它以两种方式运作：1)通过对集体力量的质量和它们相互联系的可能性进行持续的、微妙的评估，而不是以二元的方式

- 在善或恶，黑或白方面-但在一定的情况下，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力量的永恒变化(见这些术语)；2)通过生命的差异，这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无政府主义肯定了存在的独特性，因此他们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给定的情况或现实平面(参见这个术语)中发现的集体力量永远不会相等，而且每一种力量或联系(对于一项任务或行动而言，它永远都是单一的)必然导致这种力量、这项任务或这项行动内部的一种积极的等级制度。这种积极的层次结构体现在一个新的集体存在的构成中，其中一些组成部分比其他组成部分更多地传授某种技能、品质、味道、能量和力量，这些技能、品质、味道、能量和力量同时产生于他们在特定时刻的能力，以及任务、行动或联想的短暂或持久的性质。即使是最微小的集体行动经验(做家务、付账单、奋斗、演讲、开会、唱歌等)也能证明这一点。正如巴枯宁解释的那样，“在行动的时刻，在斗争的过程中，角色自然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分配的，由整个集体来评估和判断。”¹在任何一种集体存在中，在某一特定时刻，由各种力量组成的这种等级秩序，蒲鲁东所说的这种“复杂的结合模式”，其中“社会中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或同一个人中的一种能力与另一种能力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差异”，²并不构成这种存在的限制(参见这个术语)或必要的邪恶(从功利主义的外在观点来看)。作为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秩序，它是这种存在的固有组成部分，它的可能性，它产生的力量，产生它在相互联系，低音吉他往往产生的强烈的快乐，伴随着一个特别雄辩的萨克斯管独奏，或满意时，一个人参加会议与一个称职和有效的促进者。

然而，在某一特定时刻，构成一个存在的力量所固有的这种等级秩序从来不会自动发生，仅仅因为一项任务、一种行动或一种形式的结合被宣布为自由意志主义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259。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什么是财产？》，本杰明·r.塔克译(纽约：多佛，1971)，242,238-239。

目标和职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避免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一方面,它在自身内部复制它本来要取代的外在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任何力量固有的支配意志,因此,它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试图使其他部分服从它自己的意志、它自己的观点、它自己的愿望的风险。传统的划分(例如男女之间,手工和智力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等等)和服从外在权威的做法继续在似乎是最和平和自由的行动中运作(见纪律、自律和责任)。一些集体力量(个人、团体或机构、秘书、秘书或委员会)以极大的谦虚(见人民的仆人)表现出迄今未曾料到的倾向,试图将其特权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试图通过暴力、法律或各种崇高的理由使这些特权永久化,并将自己转变为一个专制力量,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此,不断评估各种力量是如何按等级排列的——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安排下的解放或压迫性质——需要大量的技巧和对细节和最微小关系的关注(见反独裁)。此外,这尤其需要具备反叛的高度准备,对反叛、傲慢和讽刺的敏锐感觉(和类似战争的感觉;参见这个术语),以便能够拒绝(参见这些术语)在特定时刻、特定任务和特定背景下可能需要的任何等级制度的僵化和外化。

更广泛地说,根据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经验,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自由意志主义性质——当它们把它们的分歧结合起来,解放现实所包含的所有权力(从而解放所有自由)的能力——取决于三大条件:

首先,自由意志主义法(见法律/权利和直接民主)。支持某一行动或某一安排的集体力量发明或执行某些(正式或非正式)工作规则,以抵消现有秩序在这一行动的展开过程中以及在这一安排的(短期或长期)运作中产生的影响:任务轮换、代表可撤销、严格的报告回顾会议、成员模式、统计工具的使用、决策方法等等。这些共同的规则与集体理性一起,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巴枯宁谈到差异变得“僵化”的危险(Mikhail Bakunin, *The Basic Bakunin: Writings, 1869-1871*, ed)。译者注:。罗伯特·m·卡特勒[纽约阿默斯特: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92],126)。

但有一个条件:它们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关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只是暂时的表述和编纂。这些明确的规则旨在防止外在的、主导性的等级秩序在内部复制,它们象它们所反对的等级制度一样,总是容易改变,或者变成服务于外在秩序的形式,或者变成为霸权意志的权力工具。通过一系列规章和书面或口头程序来加强集体存在的内在逻辑,自由意志主义协会为自己制定的规则不断处于变形为类似于外在秩序强加其支配关系的令人窒息的模型的机构的危险之中(见本术语)。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必须立即被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所平衡。

第二个条件是力量的自主性(见这个术语)。无论集体力量如何很好地融入一个更大的力量,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必须始终保持其能力,首先,这种力量必须不断评估将其与其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质量,以及这些关系影响其自身力量的方式,其次,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鼓手加入一个新的乐队,工会脱离其联盟等),断绝这些关系。显然,就这种能力而言,在考虑的集体范围内,以及在其各个组成部分内,可以评估一个协会的自由意志主义性质。因此,自由意志主义集体力量必须保持其能力,在法律和习俗领域承认其每个成员有权脱离或对该联盟内的某些特定关系或情况提出异议。此外,它尤其必须建立和平衡自身(见力量平衡),使这种自治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产生,因为它产生于这种建立和这种平衡,并使任何争端或异议立即得到以前所有其他相关力量的理解(如果没有得到支持)。

最后一个条件是在同样多样化的现实层面上交往关系的倍增。集体存在的奇异性、差异性以及无政府状态毫无例外地影响着所有的存在,无论它们的大小和强度如何,从无限小到无限大。共同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使其与现有的整体相一致的意愿,根本不意味着构成这一运动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同质性或一致性,也不意味着这一运动的各种力量的同质性或一致性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推动力，也不在其行动的目的，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它将拥抱所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见无限平面)。相反，它们意味着自始至终有多种实践和结社形式，每种形式在某一特定时刻都要求具有同样独特的品质，因此也要求具有同样独特的力量等级秩序。爱、思考、奋斗、计划、感觉、看到、创造等等。所有这些实践只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微弱的概念，关于什么是由存在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关于这种力量开启的多样性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的实践都对应着同样多种不同的可能组成和力量的等级排序，选择同样多样化和多样化的品质和能力。因此，每个集体力量或存在通过试验每个联系、每个现实层面，通过选择似乎最适合更强有力地肯定其潜在力量的力量和品质，来发现其能力达到极限的可能性(即超越主导秩序对其施加的限制[参见本术语])。德勒兹对这种将等级概念化的自由意志主义方式下了定义，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等级的无政府扩散，即最大和最小的力量之间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等级，其方式如下：“有一种等级制度，根据它们的限度，根据它们的接近程度或距离原则的距离来衡量人类。但也有一种从权力角度考虑事物和存在的等级制度：这不是一个考虑绝对权力程度的问题，而只是知道一个存在是否最终‘跳过’或超越其能力极限，无论其程度如何”(见限制和力量平衡)

后世界(见逃亡者)。

历史(见传记和永恒的回归)。

同源性(参见类比)。

水平度(见底部)。

人文主义(看到外部的力量)。

1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观念(见行为和集体理性的宣传)。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总是用大写字母书写)不是一个理想，一个乌托邦，或一个抽象。它既不是一个程序，也不是一个规则或禁令的目录。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见直接作用力，塑性力)，表达了所有这些存在所包含的可能性的总和(见这个术语)。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种活力(见生命)，使我们超越自我，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时给出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这个思想应该被表现出来，不是在纸上，不是在报纸上，也不是在绘画上；它不应该被雕刻在大理石上，不应该被雕刻在石头上，也不应该被铸造在青铜上这是一种可感知的力量，有时就像爱一样，在我们内心深处抓住我们。正如约瑟夫·德雅克所写，“这个想法是一个情人，在她冲动的拥抱中，咬你，让你大喊大叫，一刻也不让你离开，气喘吁吁，筋疲力尽，除了用更热烈的爱抚重新准备你。为了追求她，一个人即使不是知识渊博，至少也要勇于直觉。”²

理想(乌托邦)(见想法)。理想经常被用来描述无政府主义。应该指出的是，这确实关系到无政府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怀疑的日常现实。然而，这个错误是双重的。如果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总是站在无政府主义和显而易见的一边

侏罗纪联邦公报(1877年8月5日)；参见保罗·布鲁斯，《行动的宣传》，翻译。

保罗·夏基，《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纪录片史》，第一卷，《从无政府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公元300年至1939年)，编辑。罗伯特·格雷厄姆(蒙特利尔：黑玫瑰出版社，2005)，151页。

约瑟夫·德雅克，《这是一个乌托邦吗？》(1859)，在《厨师们》中，134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种理想，无论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很可能在崇高的概念中，在仪式上净化的神圣历史中，在即将到来的正义、真理、美和纯洁的宏大概念中。然而，在目前，理想从来没有为自己获得一个非常具体和普通的身体-一个简化和重复的身体的祭司，理论家，代码，现成的形象，陈词滥调，义务和约束-是成比例的，在其邪恶，卑鄙和肮脏(这一次是相当真实的)，它宣称的理想的宏伟。任何具有合理一致性的直觉的反叛者只能以最大的厌恶(见这个术语)背离任何理想主义和所有的理想主义。

同一性(见集体力量、结果、差异、反馈、分类和不可分辨)。集体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形式，往往是虚幻的，试图巩固其存在(特别是通过家庭、宗教和国家)，以便再现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我们如何发明解放的身份和主体性的形式？无政府主义试图以两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1)通过谴责现有身份使我们的生活现实遭受贫穷、简单和还原性暴力，将这些身份限制在几个同源或同质的类别(性别、公民身份、种族、政党、个性、年龄、宗教、社会出身等)；2)通过肯定可能的身份的无限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用构成这些身份的新方法不断进行实验的同样无限可能性。

Ideomania (见观点)。一种盲目崇拜的、自治的观点，脱离其生产条件，决心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地运用它自己。理想主义者是自由至上的运动的诅咒。

特质(见性格)。

Imaginary (参见理想，可能性和单子)。想象常常与不存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一个虚幻的白日梦，它使我们从艰难而紧迫的现实中心分心。相反，由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拒绝分离或反对现实和思想，也拒绝自主表现，无论是在符号领域还是在形象领域，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认为

柏格森，《创造性思维：形而上学导论》，梅贝尔·I·安迪森译

约克：哲学图书馆，公司，1946），249

各种形式的想象(梦想、幻想、幻想)构成了现实存在和可能性的重要表现(参见这个术语)。作为“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见单子和主观性)含义的表达,想象与产生它的存在的身体密切相关(见手势和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永远不是对尚不存在的事物的未来的投射,相反,是对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的实际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罗·哈泽德可以听到莱布尼茨说,“研究了最多的动植物图画、机器图画、房屋或堡垒的描述或平面图的人,阅读了最多的巧妙的传奇故事,听了最多的奇怪的叙述——人会比他的同伴拥有更多的知识,即使他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或所看到的描述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写道:“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无论作为抽象思想多么荒谬,无论作为一个实体多么遥远,在任何一个实体的构成中,都有自己的相关性级别。”²

内在性(看到超越,但也看到外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绝对的内在主义。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内在的事物,存在,以及他们彼此的相遇。没有任何东西来自外在的源头(上帝、国家、法律、思想、宪法);一切都来自内在,来自内在的无限可能性,巴枯宁称之为自然(参见这个术语)。

马上。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时性指的是空间和时间。自由意志主义行为发生在瞬间,没有中介。它拒绝服从或多或少遥不可及的目标(见目的/手段),同时拒绝将其传播及其引起的联系关系委托给调解或代表,从它的角度来看,这只能切断它的可能性(见直接行动)。

不易察觉(见生活)。

强制委任(见直接民主)。

保罗·哈泽德,《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刘易斯·梅译,

纽约:纽约书评,2013),217-18,强调我自己。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148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蕴涵(利他主义)(见其他和外部/内部)。无政府主义厌恶利他主义、伪善主义和外在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声称人们有义务忘记自己以照顾他人，将强制执行这样一个强制性计划的任务委托给一个不可避免的外部保证人和监督者(法律、国家、教会、超我等)。真正关心他人首先是通过“关心自我”作为“与生活共同延伸的规则”来实现的。1 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是通过否定自己而从外部发现对他人的兴趣，而是相反，通过暗示，在构成我们的那些东西的最深处，因为每一个存在都与他人有牵连，无论是好是坏，因为每一个存在都与所有其他存在本身有牵连(见 monad)。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慷慨本身就可以成为真正利他主义的基础。然而，慷慨总是来自于人的内心，来自于一种无预谋的、自发的力量(见行动、直接行动)，这种被恰当地命名为“初始冲动(初始运动)”的力量，是由它们在存在的事物中所蕴含的意义所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接近于 Leibniz 的思想，接近于一个基于生命自发性的世界的概念，一个一切都来自内部的世界，一个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牵连的世界：空间，因为每个生命本身包含每个其他可能的生命，而时间，因为每个时刻包含所有其他生命，而且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未来不可避免地牵连于现在(见目的/手段)。

隐含的(见折叠)。

阳痿/无能为力(见缺乏和疏远)。从这个词及其最新的意义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能是任何集体存在与其自身能力分离时的状态。

冲动(见力量、力量、身体、自发性和内在性)。

Indefinite (参见定义，不明确，限制的无限性，和 apeiron)。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见停止，主题，无政府状态，无边界，限制的无极限)。因为它不断地试图把更多的力量转化为更少的力量，把力量从它们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分离出来，现有的秩序，在它否定所有不是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以缺乏或不存在的形式，以模糊和可疑的形式，构想着不确定的东西：一种青少年或未成年的不确定性，关于社会提出的角色、职业、职能和属性；当被剥夺时，懒惰和梦幻的类型的空虚

米歇尔·福柯，《主题诠释学：1981 年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1982 年，弗雷德里克·格罗，格雷厄姆·波切尔译(纽约：皮卡多，2006)，247 页。

这些人，不做任何事情，等待一种可能性或事件，社会机器否认任何价值或现实(见停止)。在其自由意志主义的用法中，不确定性产生了另一种含义。如果它明显地反对决定论，它就不是决定论的对立面(参见这些术语)。事实上，决定性表达了集体存在的力量，而不确定性构成了它的来源或条件。然而，这涉及到这个术语的主要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一种尚未由外部秩序“决定”的权力，尚未受到某一特定秩序的束缚和限制。这就是可能性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可能性的现实性”(参见这些术语)，也就是像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这样的哲学家赋予这些词的意义上的“可能性的现实性”，这种存在的力量是每一种集体力量、每一个主体本身所包含的，它使它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构成一个全新的或不同的世界

愤怒(见反抗和厌恶)。对不公正的一种亲密的、暴力的、完全的认识，对不尊重人的自主性的认识，对他人强加给他们的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欲望和目的的不可接受的服从。直觉上，道德上，而且无法衡量，愤怒根本不是个人的或者“感兴趣的”(在功利主义的意义上)。它的出现和起源条件总是独特的或间接的，它主要或仅仅产生于被压迫或被工具化的感觉或这种压迫或工具化的影响，而不是产生于缺乏正义本身构成的愤怒。这种愤怒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自己也是另一个人，在一种包含整个存在的感知中，因为任何权力的减少，潜在地，都是我自己权力的减少。通过愤怒，就像通过痛苦的感觉一样(见外界的力量)，每个集体力量都在一次飞跃中(见直觉)进入到存在的整体——它自身所包含的这种整体，使它对所有的存在，对可能联合它们的所有关系都敏感。与此同时，它承认遭到破坏和破坏的整体的根本意义，这种整体排斥和压迫各种力量，切断它们的可能性，它承认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世界的绝对和普遍可能性。作为一个积极的时刻，愤怒站在起源的反抗。在其积极性的短暂时刻，愤怒为反抗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此之前，反抗不会产生，甚至是短暂的，其自身肯定的积极影响。愤怒确实总是转瞬即逝或者是间歇性的。当它成为一个持久的存在，为了它自己而培养，忽略了最初赋予它生命的整体性，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不确定性和其他作者，比如克劳德·勒福特，给这个词的含义之间的区别，参见停顿。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空洞的姿态或狭隘的怨恨(见这个术语)，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敌人或替罪羊(见有罪的一方)。

不可分辨(见单数，单子，平等，联邦主义，差异，内在和身份)。莱布尼茨哲学的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两个真实的存在总是因其内部构成它们的特征而不是因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而不同(见地方主义)。继莱布尼茨之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拒绝仅仅基于数字差异(物质的奥姆、群体或群体的个体、政治组织的“细胞”或“部分”)或有机差异(身体有头、成员和各种器官、手表有各种齿轮和齿轮)来确定人的身份，同时，它否认人的身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个人”秩序(见人)，与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见自我)。正如 Pierre Guenancia 强调的那样，Leibniz 对身份的所有思考“都是出于恢复差异的考虑，这种差异使得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成为自己，而不是另一件事物的理由。”¹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的身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根据个别物质身份的复杂性，在生命的等级中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它是一种对每个事物的统一性的放大[参见这个术语]，每个事物形成一个物种，每个个体形成自己的一个物种。”人们可以在普劳顿的书中找到这个位置，当他解释为什么“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以至于它的器官、次要群体彼此之间达成了更完美的一致，形成了更广泛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的身份并不取决于“将其与其他所有事物分离和区分开来的限制的持久性，它的个别实质只能从外部被感知，就像一个简单地处于一个地方的事物，它所占据的地方的承租人”，因此“识别一个事物归根结底就是定位它，知道它在哪里，能够将它挑出来”(见局部主义)。⁴身份是“事物固有的”⁵巴枯宁解释的一个立场如下：“每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即它自身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⁶

Pierre Guenancia, “洛克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个人身份”, 《莱布尼茨视角》,

Renée Bouveresse 出版社, 154。

(译者注: 一个种属是一个种类的一个, 一个类只有一个成员属于。)

蒲鲁东, 《进步哲学》, 23(转: 我自己的修改)。

Guenancia, “‘I’身份, 洛克和莱布尼茨,” 153。

同上。

巴枯宁, “思考哲学”, uvres, 3.352-354。

个体(见集体力量, 个体化, 群体和主体)。在自由至上的运动的外在表现中, 无政府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替代)会站在集体一边, 无政府主义会站在个人一边。这种方便但过于简单化的反对意见与所有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西班牙革命、Makhnovshchina、无政府工团主义等)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相矛盾。无政府主义拒绝个人和集体之间的错误区分。在无政府主义的现实概念及其转变的可能性中, 任何个体(与这个词的词源相反)都是一个集体; 任何集体, 无论它多么短暂, 它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因此, 一个无限的个体或主体(见这个术语)是可能的。

个性化(见主题)。在加布里埃尔·塔德之后, 无政府主义拒绝物质化存在, 拒绝将个体视为“原始的来源, 绝对是基本的给予”相反, 它要求把它们当作“涌现的”,¹ 或者, 这次用 Proudhon 的词汇表来说, 当作结果(参见这个术语和无序)。但是吉尔伯特·西蒙顿提出了最发达的存在概念理论, 在这个理论中, 个体总是超越他们自己(见家谱和有限的无限性), 因为他们是不不断个性化过程的结果。给定个体的所有生产(个体化)都来自于一个无限的内容, 这个无限的内容在他们每个人的所有力量中涌现出来, 没有任何中继或中间阶段。虽然进化的历史可以按照不同的阶段进行追溯, 但例如, 集体或社会个体化并不是精神个体化的产物, 而精神个体化是生物个体化的产物, 其本身也是物理个体化的产物。每个个体都可以位于其他个体之内, 因为每一次它们都通过“重新开始”回归到存在的起源而重新调动存在的整体力量。因此, 一个新的个体可以出现, 一个全新的个体, 它既不是前一个个体的结果, 也不是它们的毁灭(通过替代), 而是通过对现实所包含的权力和紧张的原始回归而发生, 而前一个个体既不能耗尽也不能解决(见永恒回归)。

本能(见自发性、权力、生命力和内在性)。这个概念在 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词汇中经常使用, 但主要是指力量和欲望, 冲动和兴奋。与现在的方式相反

看 Milet, Gabriel Tarde 和历史哲学, 154。

西蒙顿, 《精神与集体的个体化》, 192。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本能通常被认为与遗传决定论毫无关系。即使“本能”与生物密切相关(尽管不是唯一的)，“本能”这个术语确实可以用来表示自发性或自由的表现形式(参见这些术语)——即权力——在某一特定时刻，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表征任何集体的存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不服从命令(见战争/好战和起义)。无政府主义词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内部(并不总是没有天真或夸张的言辞)表达解放力量的态度和自由意志主义性质。与此同时，从狭义上说，它有助于表明拒绝军事机构以及国家和其他权力机构制造战争恐怖的一贯做法。

起义(见战争和总罢工)。从19世纪到1936年西班牙革命的集体实验(在时间上非典型)，包括重要的马克诺维斯特运动，自由意志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想象中的军事层面或(更准确地说)战争层面。尽管有时因其大男子主义的内涵(见男子气概)而受到指责，有时因为某些主张非暴力的倾向(见这个术语)日益增长和可疑，但是，叛乱即使不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至少也是反抗的最直接和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及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的项目和运动的多样性特征。集体起义、起义及其好战或侵略性方面的伟大运动，从最大到最小，从民众起义到劳动、爱情和个人生活的亲密方面的直接关系所要求的有时难以察觉的起义，在所有存在的关系的总体内，都起着令人眼花缭乱和引人注目的作用。

整体和平主义(见战争)。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理想主义例子(见这个术语和令人反感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在1938年采用了总工会对抗纳粹主义的和平主义口号：“宁为奴，不为战争！”这种奴役实际上导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法国国家和纳粹主义的忠实仆人。

内部(内部)(见外部/内部，现实的平面，和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外在的束缚，在它看来，这就是约束和支配。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一切都发生在存有的内部，在他们的能力中包括外在的组成他们的东西，从而组成更强大和更自由的存有。

内心世界(见亲密存在)。

间隔(参见 Daoism, middle of things)。

亲密(亲密, 亲密的圈子)(见亲密, 活跃的少数, 核心, 主观性, 结合, 以及, 在另一个登记册上, 科学, 生活, 逃亡者, 亲密的存在)。一个哲学概念, 巴枯宁用来定义(除其他外)他在整个革命活动中试图建立的秘密“圈子”的性质。巴枯宁常常因其幼稚的嗜好或对秘密和秘密社团的狂热而受到指责, 但只有那些对自由至上的运动和计划的真实性质缺乏了解的人才会这样做, 因此, 巴枯宁的“亲密圈子”是他们最好的表达方式。巴库尼亚的亲密关系揭示了三个意义, 可以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首先, 它涉及到一个情感现实, 建立在一些“朋友”、“盟友”或“伙伴”之间的选择性亲密关系上(见这个术语)这是一种和谐, 在这种和谐中, 共同的“观念”(见共同的观念)仅仅是气质、情感与与世界关系的接近的表达。这种或多或少的亲密关系定义了一系列不同心的“圆圈”, 根据组成它们的关系的强度而变窄或变宽。1900 年左右的一个钢铁工人联盟是一个具有一定广度和强度的亲密圈子, 它总是试图吸引新的成员, 分解成组成圈子(按行业、工作场所组织的各个部分), 其内部生活和扩展自身的力量主要取决于大部分非正式、隐藏或隐含的内部圈子的强度(Monatte 将试图通过核心概念来思考这些圈子)。它们可以基于共同的项目和信仰(例如, 无政府主义者、Blanquist 或 allemanist¹ 集团的成员身份), 也可以很简单地基于共同的家庭或地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邻里关系、共同的小学、共同的苹果偷窃)等。²

因此, 巴枯宁人的亲密关系与特殊和独特个性的存在是同时存在的, 或者, 在巴枯宁人的词汇中也是如此

译者注: 德国主义者: 追随 Jean Allemane (1843- 1935)的领导, Jean Allemane 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巴黎公社的老兵。

关于这种亲密关系, 利穆赞在里昂建筑工人工会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Jean-Luc de Ochandiano, 工会组织和社会游击队在地下工业中的形成: 一个开放的身份, 里昂(1926- 1939), 迪斯尼, 卢米埃尔里昂二世大学, 1996。

这种亲密关系或多或少决定了他们存在的现实。这种集体力量，其力量是可变的，可以对应于这个术语通常意义上的“个人”，但它通常表示人类和非人类的或大或小的集体(一个石匠和他的铲子，马赫诺维斯特军队的犹太炮兵和他们的枪)，“亲密”集体——渴望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文化(例如，1914年以前的亚美尼亚、犹太、鞑靼、乌克兰或奥德萨的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团体)，根本不对应于身体和“个人”生物学本身的局限性。

巴库尼亚人的亲密关系最终揭示了第三层含义，这是更严格的哲学意义，拉兰德称之为“危险”并没有错。2“亲密”这个词指的是内在的、私密的和秘密的，而不是外在的、明显的和公开的。对于巴枯宁以及后来的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来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重新组合不能通过交流的方式，也不能通过透明或开放的方式达到其权力和范围的高度，这种方式允许迹象、专家、心理学家和压迫性机构张开他们的网，部署他们所有臣服和统治的权力。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通过构成众多内部力量，将其集中并缩回到人的最深处，这些内部力量实际上具有爆炸性(见能量)，而且只有这些力量才能够炸毁并重新组合旧世界。

亲密的存在(永恒)(见主题，亲密)。巴枯宁提出的概念来定义现实和存在的主观和独特的维度。对于巴枯宁来说，“亲密的存在”(人们可以把它与尼采所说的“存在的最亲密的本质”等同起来，尼采认为这是权力意志的特征)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内在性，而是深奥而难以理解的，据说一切都是从中产生的。对于巴枯宁来说，“这里确实存在于所有事物中一个隐藏的方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种亲密的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不可接近的，但却逃避了科学的掌握。它根本不是 m. Littré 和所有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种亲密存在

参见 michael Confino 的《意识形态与语义: 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词汇》

《俄罗斯与苏联世界手册》30.3- 4(1989年 7- 12月): 255- 284。

拉朗德，“亲密”，《词汇技巧与哲学批判》，1:394。

尼采，Nachgelassene fragment 1888,14[80]，in *Writings from the Late Notebooks*, ed. 吕迪格·比特纳，译。凯特·斯特奇(剑桥，英国: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247(翻译: 我自己的修改)。

按照他们的说法，构成了事物本身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现象。”¹对于巴枯宁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亲密存在”实际上是一个“内在世界”，例如，孩子们获得的程度和程度，“意志出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实现了一个“开始……帝国凌驾于自己之上”但是这个内在世界仅仅是外在世界的一个折叠，它完全通过存有与外在世界保持的关系的整体来“表达自己”，“这些多重的、往往难以捉摸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被观察到。”³对于巴枯宁来说，“亲密的存在”并不是指以事物和存在为基础的神秘本质；“相反，它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一面，同时又是最真实的、最短暂的、最不可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正的个性，如它仅仅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之中，任何精神反思都无法把握，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表面性和外在性——正如德勒兹对福柯所说，“内在”“比任何内在世界都要深刻”，因为它也是“外在的……比任何外在的世界都要遥远”⁵——存在的亲密存在可以达到永恒，在某种程度上，“它根本不是一个亲密存在，不能完全表现在它的外在关系或它对外在世界的行为的总和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枯宁可以肯定他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亲密存在是永恒的：“我年轻时有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伟大的智慧伴随着伟大的心灵。然而，这个人没有完成或写下任何能够在历史上保留他名字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亲密的存在吗？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言不发？完全不是。斯坦科维奇，尽管他是世界上最不自命不凡、最没有野心的人——或许正因为如此——是莫斯科一群年轻人的生活中心，这些年来，可以说，他们靠着自己的智慧、思想和灵魂生活了好几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他看作是我的创造者……他的亲密存在首先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达，然后在所有那些曾经拥有过他的人的关系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达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93。

同上 3:387。

同上。

图 3:393。

德勒兹，福柯，96 岁。

巴枯宁，《哲学思考》，uvres, 3:390。

关于这一点，参见 Alain Thévenet 的《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踪迹》，分析 1(1997 年冬)。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能够接近他真是幸运。”从巴枯宁到我们，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亲密存在，这种存在的折叠或微笑，因此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为之付诸行动。

以一种非常接近巴枯宁的方式，吉尔伯特·西蒙顿将这种永恒的事物和存在——无论是“奴隶在反抗中绝望的、匿名的姿态”还是“贺拉斯之书”的天才之处——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任何个体总是超越自身，无论是在作为主体的构成方面(参见 apeiron)，还是在与其个性“相关联”的“环境”结构方面。这就是尼古拉斯·斯坦科维奇的内心世界所表达的存在的折叠或结构，这个标记或符号(参见这个术语)是这个个体在某一特定时刻为整体存在的形成而构成的单一的“决定性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也可以说——这次和西蒙顿一起——任何个体都是永恒的，“不是作为物质、主体或实体、意识或活性物质”，而是“作为一个传导性存在”(参见传导)，它在其出现的“媒介”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媒介的湮灭也要求我们“预先假定媒介[环境]的湮灭”⁴

直觉。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将革命性的辛迪加主义与伯格森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他赋予直觉概念的角色联系在一起。自由意志主义的直觉来自于集体的存在(见这个术语)，来自于组成它们的最深处(见亲密的，单子，内在的，观念)。直觉支配着众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联合起来的潜能，构成了一个更强大的众生。直觉支配着我们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关系，也支配着我们考虑加入或不加入某人的原因的能力(参见类比、亲和力、排斥和反感)。直觉不仅仅是每个集体存在固有的礼物(作为这个存在特有的构成模式的结果)。它还假设在集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一种好坏遭遇的艺术。

非理性(见直接行动，存在的理由，常见概念和集体理性)。当前秩序所使用的一个争论性的概念，用来指出所有逃避其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89。关于巴枯宁的青年和智力形成，参见: Benoit-P. Hepner, Bakounine 以及革命者: 关于俄罗斯和欧洲思想史的五篇文章(巴黎: Rivière, 1950)。

西蒙顿，《精神与集体的个性化》，105。

“个人... 是一种决心的表达。他是... 另一个现实的补充符号，相关的媒介[环境]”(吉尔伯特·西蒙顿, l'individu 及其基因物理生物学[格勒诺布尔: 百万, 1995]，62)。

西蒙顿, l'个体化精神和集体, 102。

影响力。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一切都是理性的，因为每个存在，每个事件，每个情况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巴枯宁可以断言“每一件事物[看到这个术语]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自身的特殊发展模式”，¹和蒲鲁东可以写道，“每一种错误，每一种判断或公平的偏差，都只发生在它所隐藏的同一条理性规律之下。”²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并不反对真理与错误。它取代了这种错误的区分，取而代之的是对存在的质量以及由它们的联系所产生的的力量永恒评价。它并不反对善与恶(参见这些术语)。这两个还原概念被认为是为了维持世界秩序，它假定权力的不断发挥(见本术语)及其促进(或不促进)一个解放世界的存在的能力，去做(或拒绝做)它们能够做的一切。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52-354。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1808-1849)

(Paris: Beauchesne, 1982), 243.

J

快乐/悲伤(见好/坏)。

判断(见评价, 实际意义, 厌恶和法律/权利)。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 “判断”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作为一种外在的、超然的东西——例如, 当它吸引到第三方(国家、法官、精神导师、专家等等)时——它是当前秩序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 作为集体存在的内在和内在的东西, 调动他们所具备的和他们能够具备的整体性, 它恰当地界定了他们不断评估其内部关系以及他们与他人发展的关系的解放性质的能力, 从而界定了他们可以在其中部署力量的世界的的能力。

正义(见平等、自主、愤怒和力量的平衡)。对集体存在的激进自主性的内在认识, 对这种自主性所要求的尊重, 以及它所预设的平衡的内在认识。通过它的自主性和对所有存在物本身的占有(见主体), 每个存在物都是所有其他存在物的平等。因此, 通过肯定构成它的东西及其与他人的自由联系, 它能够达到其能力的极限。

正当化(参见描述和功利主义)。正当化是正义的反面。正义是对事物、存在和情况的尊重和亲密、客观和内在的。相反, 正当化是侵入性的, 不谨慎的, 对于那些被它网住的人是专制的。同时, 它是完全外部的存在, 它如此有效地召唤, 压制, 并牵连在其审判和供词, 它借给谁一个主观性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是令人信服和有效的，但同时，完全不真实的，完全陷入了语言和社会互动的陷阱。辩护，无论是在世俗意义上还是在宗教意义上，总是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外在的、更高的权威(上帝、党、法院或其他)，在这个权威面前，我们必须为自己辩护，对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我们的存在作出解释，用我们必须乞求承认我们的强制性外在性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来定义我们是什么(见主人/奴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为自己和他人辩护。评价一个集体存在及其与其他集体存在的联系的质量(在解放或权力增加方面)始终是这个存在及其联系的内在，与它们在特定时刻的内在联系密切相关。因此，它通过集体理性和共同观念发生(见这些术语)。

L

劳动/工作(见战争/好战和工具/武器)。在历史上，无政府主义长期被认为与生产关系、体力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的地位以及劳动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经验有关。与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和抽象的偏爱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尤其密切关注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和直接方面，以及从中产生的自由至上的运动可能性。然而，过去两个世纪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共有的最明显的特点不应掩盖这些运动的巨大多样性，首先也不应掩盖一个从不局限于一个特定条件或身份的 emanci- patory 项目的独创性，这个项目根据各自为解放提供的可能性将所有这些条件或身份联系起来。这种独创性可以通过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历的独特性得到证实，这些经历每次都是不同的，而且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抵制了所有的概括。在阐明 19 世纪下半叶各个工人阶级的解放潜力以及同一时期劳动的性质和关系方面，蒲鲁东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工作，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对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外在看法，摆脱这些运动的神圣历史，以及摆脱对体力劳动和认同体力劳动的“生产者”的非历史价值化，后者往往妨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和想象力。

虽然蒲鲁东将劳动定义为“社会的可塑性力量”，他指出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是一致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但“在其领域”——“就像创造本身一样”，蒲鲁东补充道——也就是说，它源自于一种力量

1“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是一致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就像创造一样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劳动”，特别是劳动，因为它是在现有秩序的框架内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使劳动成为可能的力量，劳动本身逃离了禁锢劳动并将其转变为奴隶的决定论(参见本术语)。从它所包含的力量中产生了一个更广泛的创造性活动领域，这个领域通过爱、战争(参见这个术语)、艺术(“人是一个工作者，即一个创造者和诗人”)或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来表达。从某种角度来看，从创造力的角度来看，工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体的人类活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这种劳动所展现的现实平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从限制其权力的局限性的角度来看，工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监狱，在这种监狱中，人类集体力量与支配所有动物物种的决定论毫无区别。正如 Proudhon 所写：“如果自然界把人类定义为纯粹的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动物，这是不可能的... .. 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会沦落到动物的地位，而动物的命运完全由社会决定; 生活在纯粹的社会中，我们的文明就会成为一个牛棚。”从这个意义上说，骄傲的霍尼亚式的工作和社会关系批判如此紧密地依赖于它，它预示着当代的工作批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过度价值化的工作中构想解放的方式。正如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所证明的那样，与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相反，工作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性，根本不是人类及其能力的物种特征。对于西蒙顿来说，工作，就像马克思构想的那样，与蜜蜂和蚂蚁的合作没有什么不同。它是一个“物种”社会，只关注作为“环境行为模式”的活着的个体“被理解为世界上有生命的东西，(人类)可以联想以开发世界，”但只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就像所有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劳动作为对自然的剥削而存在于生物学层面; 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反应，一个物种的反应(见本术语)。”⁴

换句话说，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通常用来定义人类物种的东西——通过劳动对抗自然——并不构成其具体的人类维度，而仅仅是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成员身份，

”(Proudhon, *De la Justice*, 3:89)。

傲慢，经济矛盾体系，2:361。

“因此，人类，在动物中独自工作，给予了自然界... .. 不能产生的东西存在，”同上。

傲慢，《战争与和平》，31-32。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89 和 191。

与所有其他动物物种一样，以封闭和重复的形式存在于“共同体”和“牛棚文明”中与它所拒绝的旧的人类学相反，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把人类主体性的力量建立在对自然开放的能力上，对自我中的他者，对构成它的外部(见这些术语)，作为一个物种，它的专业化推动它作为一个活着的物种与其决定论作斗争并服从其限制。换句话说，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有能力向非人类开放，抛弃蜂巢或牛棚的伪人性，即奥威尔所恰当描述的“动物农场”。它存在于人类总是回归到不确定的、前个体的能力之中(见这些术语)，从而发现新形式的主体性的可能性。正如西蒙顿再次写道，“自然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¹人类的力量正是在于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回归自然的整体性，重新调动外部力量的整体性的可能性，存在的保留，自然的控制，有限的无限性(见这些术语)。

实验室(见实验，专家和科学)

缺乏(见欲望、欲望、权力和主/奴)。从基督教到精神分析学，欲望与缺乏、缺席和剥夺的认同在使人们屈从于一种破坏性和压迫性的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取代了消极的概念——欲望，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怨恨的符号之下(参见这个术语)，只存在于没有目标的情况下，通过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力量都与其自身的能力分离(参见男子气概)——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取代了对欲望的认同，即权力、充裕、富足和慷慨(参见这些术语)。的确，在这两种情况下，欲望都被剥夺了一个客体：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欲望在一个已经消失或不可能的客体中被异化，从而无可救药地与之分离；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欲望不需要外在的客体存在，因为它从自身吸取一切(见 monad)。然而，这两种形式的缺失是彼此的对立面。然而在缺乏欲望理论中，与他者的相遇变得不可能，自由意志主义的欲望概念及其力量不断地使得与其他集体力量的总体相遇成为可能

ibid.196.必须记住，对于西蒙顿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自然”是存在和它的力量的同义词。巴枯宁提出这一立场如下：“人类不可能反抗我称之为普遍因果关系或普遍性的东西；普遍性包围和渗透人类；它在人的内部和外部，构成人的整个存在。在反抗这种普遍性的过程中，他将反抗自己。”(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91)。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现实的某个层面，因为这些力量也是主观存在，其中每一个都潜在地包含着从某个角度看到的其他力量(见欲望)。任何遭遇和任何差异，只要它们能够避免外部冲击和对抗永远不会失败的陷阱(辩证的或其他的)，就可以成为向每个人展示其所包含的无限力量的机会(见事件)，成为它超越自身极限和尽其所能的机会(见力量和矛盾的平衡)。

法律/权利(契约、公约)(见等级制度和自治)1. 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概念与绝对权力、自治、逻辑连贯性和法律的外在性质无关，无论它来自上帝、国家，还是所谓的“普遍意志”(卢梭的“社会契约”)。对于无政府主义，正如蒲鲁东所写，“每一种力量”“每一种力量”“包含它自己的法则”“权利”做它能做的一切。2 这样一个概念已经存在于马克斯·斯蒂纳(“你有权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有权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埃米尔·普吉特(émile Pouget)的书中发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直接行动是工人可能用于创造性目的的行动:它是产生新权利的力量，产生社会法律!”4. 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法律是集体力量内在的，与集体力量一样，法律的来源和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巴枯宁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每个事物都包含自己的法律[loi]，即它自身的特定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原文强调;参见 entel-echy]实验性和直觉性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权利与存在的力量，以及他们的联系和分离的方法是共同延伸的(见这些术语)。这些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乔治·古尔维奇称之为“行为-规则”——是始终将集体力量内部的正义称为“一项先前存在的法律的正式声明的技术程序，该法律本身确认了公约的效力。”6. 它不是遵循单一的超验来源(“主权”)，而是依赖多种主要来源(集体力量)、“法律的生成中心”、“法律的自治来源”，这些来源相当于在联合和组成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实验

译者注:在法语中，droit 可以同时表示“权利”/“权利”和“法律”，尽管法语也有同源的 loi (“法律”)。

蒲鲁东，《战争与和平》，133。

Stirner，自我和他自己，247。

Pouget，Direct Action，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52-354。

古尔维奇著，《让·班卡尔》，《多元主义与自我管理》，第1卷，Les Fondations(巴黎:奥比尔·蒙田，1970)，130页。

自由意志主义法作为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其特征的冲突和团结的表达，更具体地帮助表达和产生(连同集体理性[参见本术语])在特定时刻相反利益之间的平衡，必要的矛盾之间的平衡(参见力量的平衡)。在各种形式的合同、公约、条例、习俗、荣誉法庭、仲裁和契约下，与所有的法律科学相反，它产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法律[规则]的法律[权利]”²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实践接近于莱布尼茨的巴洛克思想，在这种思想中，人们不再问“什么可用的对象对应于一个给定的发光原理，而是什么隐藏的原理对应于给定的任何对象，也就是说，对应于这个或那个‘令人费解的案件’”，而不是“给定的案件”，人们发明了这个原理，从而使法律转变为“普遍法学”³

领导者(见老板和层级)。一个英语术语，它可以区分一个集体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行动中有时可能获得的卓越地位与老板的卓越地位。后者仅仅被定义为他们从外部强加给其他集体力量的地位或暴力。

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

生活(逃亡)(见亲密的，直接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活力主义)。无政府主义经常提到“生活”生命不应该被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它同时是力量和肯定的同义词(参见这些术语)，但也是自由意志主义项目试图从现实中发展和建设另一个世界的逃亡性、短暂性和亲密性(参见这个术语)的一部分。巴枯宁最好地阐述了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赋予“生命”这一术语的原始含义：“只有生命... ..与事物的有生命的、感性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可表达的方面有关。”“科学只关心它自己的影子... ..有生命的现实逃离它，并给予它自己。”

关于这一点，参见安托万·加拉蓬《原力》中的“社会权利的概念：乔治·古尔维奇”

皮埃尔·布雷茨(巴黎：精神出版社，1991)，215-

(加拉蓬显然没有意识到，古尔维奇的分析具有压倒性的、明显的傲慢的霍尼亚式的“原创性”。)

译者注：这个短语也可以被翻译成“没有规则的权利”

Deleuze, *The Fold*, 67.让·班卡尔，在描述骄傲的权利概念时，谈到了“法理学的行为”(骄傲，多元主义和自我管理，1:130)。对于当代自由意志主义的法律方法，参见罗纳德·克里格(Ronald Creagh)在《*réfraction*》一书中的“*Au-delà du droit*”

(2000年冬季)。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只对生命而言，生命本身是短暂的，可以而且确实总是包含着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所有逝去或转瞬即逝的生命。”这就是这种亲密存在的本质，科学永远无法触及这种本质。它是个体作为事物的直接的和真实的存在：它是永恒的瞬间，是永恒的和普遍的转变的无常的现实。”¹

有限的无限性 2(见 *apeiron*，超过自己，塑性力量，无政府状态，和可能性)。中国道教的一个基本概念(见本术语)。它可以在西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找到，尤其是在吉尔伯特·西蒙顿身上，他用它来描述存在的力量及其产生无限可能的集体存在的能力。正是通过这种“有限的无限性”，人们才能理解吉尔·德勒兹如何将平等定义为集体存在达到其能力极限的能力，即“超越其外部限制”，即压迫性命令强加给他们的限制，特别是(在与他人联系和面对他人时)他们的内部限制(见力量的平衡)，因为任何集体存在总是超越其本身，超越其当前的个性(见超越自我和个性)。

限制(见权力、内在、平等和力量的平衡)。德勒兹用一句奇怪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平等(参见这个术语)不在于众生的一致性，而在于众生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其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德勒兹立即补充说，超越其自身的“极限”³ 根据几个世纪的统治所形成的一个常识，一个“有能力”的存在怎么能够超越它的身体、智力、性和其他“限制”——被阉割和压迫我们的命令所强加的“无能的门槛”？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相比之下，存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样深刻的短视。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对集体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定义：第一种是对限制和被占领的地方的外部定义(见差异和地方主义)，因果关系，对整体的依赖；另一种是对力量、权力和欲望的内部定义。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3:394-395。

译者注：我借用了乔纳森·r·赫尔曼(Jonathan r. Herman)翻译的《*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ang-tse*》中的“有限的无限”一词，这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翻译的《庄子的谈话和比喻》(*The Place of Tao*)，收录在《我和道：马丁·布伯与庄子的相遇》(*i and Tao: Martin Buber's Encounter with 庄子*，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63页。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方式翻译成英语科尔森的法语表达，在限制中的无限，更字面上“在限制中的无限”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7(转：我自己的修改)。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限制确实是外部(但也是内部的;看到力量的平衡)固定,框架,并定义了一个无限的内在力量,是这些限制和它们所建立的秩序所无法约束的。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源自于阿纳克西曼德所说的“无限”(即直接行动),或者在当代哲学中,吉尔伯特·西蒙顿所称的“前个体”,即每个个体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授权出现新的、更广阔、更强大的个体(即主体)。任何集体不仅可以脱离其目前的“极限”(例如,为了暗杀某人或为了那个人献出生命),而且正是在超越这些极限,在其他情况下与其他力量构成关系,从而产生新的生命时,它才发现了实现其所有潜力的潜力,“尽其所能”

地方主义(见单子和不可分辨物)。这是一个贬义词(包括自由至上的运动内部和外部),指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在大量的斗争和团体中分散他们的努力(往往是小规模的和内向的),在他们眼前的环境和特殊关注的狭窄范围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和根据他们在特定时刻的行动。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限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和他们对事物的感知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个性的问题。这种模棱两可的批评(见个人)通常无助于防止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反复出现的分裂,实际上表达了对这场运动的现实和自由至上的运动的解放逻辑的深深无知,其中“地方主义”是其主要表现之一。事实上,不应将“场所”与主导秩序试图缩小其范围的“场所”混为一谈,这样,每个事物的位置(房屋、共产党小组、工作场所、城市、性别、“身份证”等)都在整体界定的范围内(见本术语),因此需要一个由越来越广泛的协调当局组成的金字塔,负责综合和协调较小的下属当局,因为它们较小(城镇、县、地区、国家、联合国;小组、部门、联邦会议、中央委员会等)。正如 Jean-Clet Martin 所证明的,1“本地”是“对整体的一种观点[参见这个术语]”莱布尼茨通过城市的例子解释了这一点:“每个城市综合体呈现自己作为一个集合或一个‘块’。它指定了一个有限的元素组合,分门别类,数量众多的建筑。另一方面,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无限可能的视角必然会超过元素的数量

Jean-Clet Martin, “Of Images and Worlds: towards a Geology Of the Cinema,” trans

Le Gac 和 Sally Shafto, in *The Brain is The Screen: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inema*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2000)64,62,73(转换: 我自己的修改)。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它(强调我自己的)。”“因此,全球范围的扩展没有覆盖到当地,这是一种扩展视角,其广度与场地的扩展空间无关(原文强调)。”“一个不能简化为外部性的空间诞生了,它不是谴责我们从外部看待事物,而是从内部澄清事物。”(见内部,单子)。最终,构建“新的交互主体性”成为可能地方主义远远不是自由至上的运动发展的障碍,而是它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多种观点基础上的真正联邦制的先决条件。

锁角(见视角,外部/内部和单子)。对于那些无用的对抗(通常是在晚餐后)的一种口语表达,其中涉及到是否正确、荣誉、挽回面子、是否拥有最后的话语权等问题,当时没有人再听别人的话,而只是试图在争论中提出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两小时后就很难记住了。这些冲突通常涉及少数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他们通常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能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的过敏,这种过敏通常会引发这种类型的争论)

- 在越来越安静的观众面前,他们最终忘记了存在。这种荒谬和毫无意义的争取“上位”的斗争(恰如其分地表现在一个“头”和另一个“头”被“锁住”的形象中)绝不能与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和必须产生的讨论相混淆(见这个术语),这些讨论不可避免地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讨论和对抗动员了信念或信念(从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来看),这些信念或信念来自于每个主角的存在本身,例如,到目前为止,它能够自我调整,并触及构成它们的最私密部分。因此,他们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虚荣,角的锁定(或“头”)。在这种遭遇中,恰恰相反,头脑被抓住了,而是被自己和他人内在事物中产生的问题抓住了。矛盾的是,正是在这些经常是紧张的情况下,有时是戏剧性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出现在自己最深刻的部分,而不是出自那个自我的表面和公众形象——真正的(和罕见的)相遇才能最终发生在这些存在之间,并带来他们的转变。

同上. 64,73; 让-克莱特·马丁, *l'image virtuelle*, 《论世界的建构》(Paris: Kimé, 1996), 32。

M

主战场/第二战场(见好战分子、组织、平台和平台主义，以及我们朋友的朋友)。一种古老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区别，试图从外部建立一个斗争和事业的等级制度，使其中一些从属于另一些。这种区分主要是专制政党和革命组织使用的，但有时(尽管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也被某些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使用，这些组织对其表面上的效力着迷。无政府主义既肯定了解放力量的绝对独立自主，又拒绝任何斗争和革命力量的高级组织，又肯定了他们的结社自由和自由决定斗争的理由。

手工/知识分子(见死亡、事物中间、理论/实践)。由于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发展了很长时间，因此被强烈地标记为反知识分子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强调这样一个悖论：一场对所有理论进行强烈批评的运动，其激进分子却表现出对知识的巨大渴求。这可以从折衷主义和即使是最小的工人图书馆在历史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百科全书性格中看出来。

他们渴望文化、科学和知识，但是他们认为“思想是从行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反思中产生的。”¹、无政府主义共济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激进分子拒绝理论和科学形态(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这些形态试图从外部决定他们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以及界定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框架和限制。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解放性知识从来不是它所说的外部的

¹ proud hon De la Justice 3:71.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以及产生它的集体存在。只有从生物的内部和它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使它们成为可能的关系——才能产生一种与统治无关的科学。由于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的总体，任何力量或情况都能够阐明这种总体的含义，但只能从某种观点出发，从构成这种力量或情况的特定时刻出发。正是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立场的矛盾之处在于：内在拥有事物意义的整体性，有权拒绝任何外在的决定或定义，但无法表达这种意义的整体性，或者只能从有限的观点，通过内在的张力，通过一种奇异的力量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意义的非一致性来表达这种意义，而这种力量和意义为了展现或被解释，取决于无限的其他力量和它们的能力，在联合起来，产生其他更强大、因而更清晰的存在(见集体理性)。

这种非巧合，或者用 Simondon 的词汇来说，每一种个体化形式内在的这种“退化”是它们作为主体存在的组成部分(参见这个术语)。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核心，是存在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渴望，以及能够实现这种另一种可能性的结合和分离的方法。但它也是实践与理论、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关系的核心。如果从某种观点来看，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情况、每一项活动本身都包含了现有事物的意义和力量的全部，那么这种全部性的表达就不需要仅仅等待尚未到来的集体生命的解放性重新组合的效果。由于其能力与其当前存在的有限奇点之间的这种内在张力，现在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情况、每一项活动都有可能唤起过去经验和观点的巨大差异(相反，参见圣经)。每种力量都有可能通过一般所谓的文化来发现，即通过文字、文本、手势、音符、画笔的笔触、数字等。它在某一特定时刻居住的生命整体的外在必然结果(见传统)。在过去经验的象征性资源与现在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这种关系中，以现在经验的能力——源于其最深层的存在和其特征的紧张——调动前者的力量和意义，这不再是一个外部联系的问题，也不再是代表任何一方表达对方真理的任何要求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它只是一个使不同模式之间能够直接相遇的问题，以便表达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像普劳登和西蒙顿一样，无政府主义通过类比的概念(参见这个术语)，设想了现在和过去的经验之间，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之间(只要这些是通过语言和其他文化规范可以感知到的)之间这种内在和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好是坏。

群体(Mass)(见循规蹈矩, 羊群和群众)。“群众”、“广大劳动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群众”、“群众路线”、“走向群众”、“群众要求”、“群众尚未觉醒”、“群众对社会主义有着潜在的取之不尽的热情”(毛)、“群众”作为政治的“原材料[原文]”等等。从马克思到包括列宁和毛泽东在内的意大利极左派,“群众”的概念(仅仅是这个名称就足以让最迟钝的墨守成规者气得发抖)构成了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确表达,是其自命不凡的傲慢和可怕的白痴行为的盲目表现。

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可否认的是,群众是 20 世纪的悲剧发明。19 世纪的人民——这个人民的概念,其革命潜力模糊不清,但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能够把它(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的条件为出发点)转变成复杂而不同的解放力量然后持久地转变为匿名的和不分化的群众。这首先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泞战壕中,在那里,一百万人学会了如何失去所有的奇点或差异,剥夺生命的所有价值。然后,它发生在莫斯科、罗马或柏林的右翼和左翼革命的暴乱和嗜血的人群中,在为劳动和战争而集结的军队中,在为种族或阶级的荣耀而举行的伟大的“群众”仪式的完美无瑕的芭蕾舞中,在明智地回归到体育场、住房项目和超市中顺从和诚实的大众消费之前。

主人/奴隶(见辩证法)。无政府主义拒绝主奴辩证法的陷阱(见解放)。在尼采看来,无政府主义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主人一边,而不是奴隶一边。解放的观点是主人而不是奴隶的观点:被统治者通过反抗从根本上解放他们自己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

122,40,122,128,122,128,124,123-124,126,121。

巴利巴,群众,阶级,思想:前后政治与哲学研究

马克思,詹姆斯·斯文森(纽约:路德里奇,1994),144-145,186,

《野蛮的反常: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和政治的力量》,迈克尔·哈特译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84。

关于对 19 世纪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人民”革命潜力的模糊认识,参见阿兰·佩辛《人民,神话与历史》中的“骄傲与人民的矛盾”。西蒙·伯纳德·格里菲斯(Simone Bernard-Griffiths)(图卢兹:未来大学出版社,1997)。

反对将他们与外部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束缚，肯定他们的新权力，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参见这些术语)，并打破统治所强加的边界。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总是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的一个变体)及其阶级斗争的概念如此格格不入。实际上，在无政府工团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概念中，工人阶级，从其解放的角度来看，最初或主要不是由阶级斗争或反对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定义的。它的革命力量主要取决于它作为一个自治的、独立的力量构建自己的能力，拥有其独立所必需的所有服务和机构。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来说，工人阶级首先必须以激进的方式分裂出去，必须与社会其他部分没有更多的共同点。在属于工人运动的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的话语中，这种分化运动被称为“工人分离主义”(从尼采的观点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工人运动必须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分离”。这就是蒲鲁东在他的遗书《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所解释的：“我所建议的分离正是生活的状况。区分自己，定义自己，就是存在；正如融合和被吸收，就是失去自我。脱离，一个合法的分离，是我们确认我们的权利的唯一手段... ..愿工人阶级，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幻想，记住：他们必须首先抛弃他们的监护，并且... ..从现在开始，只为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行动。”²

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并非不存在，但它不再是一种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吉恩·格雷夫所说的“垂死的社会”(工人运动所拒绝的社会)总是威胁要把那些反对它的人困在致命和麻醉的老虎钳里，迫使他们接受共同的作战规则，并采取属于这一运动首先要否定和摧毁的秩序的斗争形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来说，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特权表达，包括两个方面：1)它是一个永恒的重复建立

丹尼尔科尔森，“尼采和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翻译。保罗·哈蒙德，《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尼采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编辑。John Moore and Spencer Sunshine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2004)，16-17.

傲慢，《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巴黎：里维埃尔，1924)，237页。

《垂死的社会与无政府状态》，伏尔泰琳克蕾译(旧金山：a. 伊萨克，1899)。

行动，一个总是单一的和间接的“冲突”，打破了以前的联系和界限(见直接行动)。这是一种断裂，通过局部冲突的多次发生和运动本身，决定性地促进了工人生活的转变。这是工人们“教育自己”、“强化自己”和准备日益“普遍”范围的“运动”的方式，直到总罢工的最后爆发。在这众多的局部斗争中，工人协会当然可以给自己制定直接的目标并达成协议，但这些目标总是次要的，而这些协议总是临时的。由于它们构成革命力量，它们的目标不是达成这一目标所依据的框架所界定的任何“合理”妥协，也不是从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可以获得任何“满意”，因为经济和社会秩序受到该秩序的限制。甚至，特别是当他们签署协议的时候，工人们也不会把自己置于请愿者的位置。他们满足于暂时获得其“权利”的一部分，同时等待充分、自由和清楚地获得这些权利，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守卫者”。如果工人们什么都不要，那是因为他们对旧世界没有欲望，他们想要废除旧世界，他们蔑视和忽视旧世界。他们的反抗纯粹是对组成他们的势力和运动的肯定，他们只是以衍生的方式被迫与反对这种肯定的反动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不要求任何人，只要求他们自己的一切，从他们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和发展他们所包含的力量。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既是选择的关系，也是肯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事物的重新组合的关系：

从现有秩序中选择肯定这一新权力所必需的手段；通过资产阶级秩序以及价值观、道德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的根本转变，主张有朝一日占据整个社会空间的权利；
对现存事物总体的重新组合。

维克多·格里菲尔赫斯对这个项目的阐述如下：“工人阶级对其领导人和主人没有任何期望，否认他们的治理权，追求他们统治和支配权的终结，组织起来，集团起来，给自己结社，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研究、反思、努力准备和确定被征服的保障和权利的总和。然后，它决定了

格里菲尔赫斯，《革命工团主义》，11。

Yvetot abc 工团主义者 11 岁。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确保这种征服，从社会环境中借用它们，利用这种社会环境所包含的行动模式，拒绝一切企图使工人成为受制于和被管制的存在的企图，始终保持自己行为和行动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仲裁者。”¹

物质(参见上帝，国家和类比)。因为无政府主义宣扬激进的一元论，它否认任何独立和超然的存在，以“心灵”，“理性”或“思想”然而，正如巴枯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怀特海的分析，它同样强烈地拒绝将“物质”以对称或类比的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神性：“对我们来说，物质根本不是人类抽象所产生的惰性基质”，“它不是实证哲学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统一、无形和抽象的物质”；相反，“它是一切存在事物的真正集合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的感知、思想和意志”。这样设想的关于物质的通用词汇是“存在”，即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运动始终和永恒地产生于所有特定运动的无限和，直至无限小，相互作用和反应的总和，以及所有依次出现和消失的事物的不断变化[原文强调]。”²

中介(见中间的事物，Daoism，和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总是从事物的中间开始，在那里一切都再次成为可能，在那里存有可以通过亲和力和类比关系，从构成它们的内部进入真正的解放关系。事情的中间部分恰恰是调解的反面：在后者中，第三方或某种其他通信渠道假定充当中间人，将各种力量或利益从分离中分离出来，以便强加其自身的存在，将它假装团结起来的各种存在固定在原地，将它们包围在其确定的角色中，将这些存在所包含的无限的他者力量——一种它既损害又利用的力量——减少到它自己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无政府主义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无论是中间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牧师(在人类和上帝之间)、工会代表(在工人和所有者之间)，还是祝福你的朋友、有其需求的组织、强加其职责的角色、被认为赋予生命意义的法律和戒律的荒谬性等等。

Griffuelhes, 《工团主义革命者》, 19-20。

巴枯宁, “思考哲学”, uvres, 3.345 和 3.347。关于永恒和连续的物质概念及其对“多元现实主义的各种体系”的灾难性影响的当代批判, 参见阿尔弗雷德雷德诺思怀特黑德的《过程与现实》, 78 et passim。

中间的事情[环境的选择](见手工/智力,但也直接行动,理论/实践,常识,和 Daoism)。无政府主义通常表现为对知识分子和理论的强烈排斥。这种态度与长期以来自由至上的运动的工人阶级特征有关,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怀疑的,但它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的消极一面:拒绝任何超越性,拒绝任何从其外部视角的“高度”要求了解和界定每个人和每件事物的存在理由和意义的全能体系。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科学,在它求真和客观性的自命不凡中,它已经发展了三个世纪,是资本、国家和宗教的类比(见类比)。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任何知识或意义只能出现在事物的中间,在直接关系的中间(见这个术语),即经历或经历它们的力量立即感知到的关系。这种对直接生活关系的认识,一方面需要一种本地知识[自知之明],这种知识同时包含在实践和实验中,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具体的理论发展,这种理论发展的渊源如同整合和统治科学一样古老,这种科学和理论方向,在德勒兹和瓜塔里之后,人们可以称之为“次要”或“游牧”

Milieu (无政府主义环境) . 1 通常是组织对话中的一种贬义或贬义的表达,用来指称任何拒绝这些组织的陷阱和限制的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内容的个人或力量。“环境”,有时被比作营养丰富或难以消化的“污泥”,一种或多或少可以消耗的资源,然后可以想象成一种金鱼缸或水生环境[水生环境],在这里,革命的鱼会找到他们历史使命所必需的资源(寻找选民,招募示威者,征收资源等),一个“金鱼缸”,反革命机构主要感兴趣的是排干或控制。相反,在自由意志主义项目及其思想中,环境(见万物之中)构成了唯一的空间,唯一的现实,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东西可以通过自我组织进行解放性的重组,从自身发展出这种解放所必需的力量和关切的总体。

译者注:英语中最常用的等价表达(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场景”然而,

这个隐喻的内涵包袱(包括它对景观、表演、外观和凝视等的暗示)引起了与外来词“环境”完全不同的反思如果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无政府主义环境,请参阅劳拉·波特伍德-斯塔瑟的《生活方式政治与激进行动主义》(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激进分子(见战争/好战)。一个考虑不周的术语(见组织等术语)，借自军事语言，用来定义某一特定类别的集体存在，他们选择解放所有人作为其存在的首要理由。这个词的军事含义绝非偶然。它直接表达了那些宣称自己“好战”的团体和组织通常具有的独裁性质。无政府工团主义更喜欢谈论活跃的少数民族(见这个术语)，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试图思考解放运动可以发展的方式。

流动性(见环境、运动和变化)。

Monad (见可能性、地方主义和不可分辨性)。在《革命中的正义》和《教堂》一书中，普鲁东解释了与自由相关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回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一个终于从神圣抵押中解放出来的单子论：“对莱布尼茨来说，单子论只不过是一个假设，现在是把它变成真理的问题。”¹ 反对整体决定部分的虚幻和支配性的主张(见限制)，莱布尼茨肯定了唯一存在的无限的单一的，个人的存在不可约化的任何外部决定(见这些术语)：单子。从属于每个单子的特定观点来看，每个单子包含并表达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宣称，“人是一个工人，换句话说，是一个创造者和诗人”，因为他“从自己的深处创造”和“从他的内在存在中生活”单子既没有门也没有窗，莱布尼茨告诉我们，³ 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见这个术语和亲和力，亲密)，这关系到他们“相互表达”的世界的质量这是一个

35 年后的 1893 年，加布里埃尔·塔德用他的单子论和社会学重新开始了这一尝试。

蒲鲁东译于鲁宾，现实主义和社会视野于 Courbet 和蒲鲁东，113-21。

莱布尼茨，《单子论》，变性人。罗伯特·拉塔(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98)，219：“单子没有窗户，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它进出。”这允许一些人，相当错误地，把单子论作为现代个人主义的理由，这种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经常受到指责，这种“近自由主义，只关心自己，崇拜独立，牺牲社会”(Alain Renaut, *The Era of The Individual: a Contribution to a History of Subjectivity*, trans. M.B.DeBevoise 和 Franklin Philip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36-137)。

Deleuze, *The Fold*, 81(转换：我自己的修改)。在这里，康利的翻译说，单子“表达彼此”，但这显然没有捕捉到原来的法语表达的维度，“s'enter”实验，科尔森打算在这里，一个表达，仅仅一页前，康利翻译为“表达彼此之间”

随着神圣假设的消失，世界变得多元化，因此迫使我们，如 Tarde 所说，构想一个“更新的单子论”这将允许我们认为单子不再是“相互外部的”，单子能够从内部向他人“开放”，“相互渗透”，1 本身成为“多样性的内在原因”²，从而在无限可能的世界中选择适合其充分发展的(见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新的意义上，莱布尼茨的单子，摆脱了上帝的假设，使我们能够理解阿尔希诺夫在毁灭马克诺夫之后不久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所发出的呐喊：“世界无产阶级，看看你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真理，并且自己去认识它：你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它。”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路易斯·米歇尔是如何以厌恶女人的普劳顿的方式，在类似的思想运动中，把握“妇女的全面解放”(她们“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 .. 形成一个整体，每个群体，甚至每个女人”)和艺术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有一天，也许甚至很快，将成为人类的精神!”这一切都是在普遍解放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解放的背景下，“所有出现的人彼此联合起来，互相补充，就像和弦的音符一样”，因为“一切都有可能生命和群体的运动中发生，这些生命和群体被折叠在一起，被卷在一起... .. 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它们彼此和谐和结合，就像形成世界的星云一样”⁵

一元论(多元论)(见自然)。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激进的一元论。它不承认身体和灵魂、思想和物质、人性和自然(二元论)之间的区别和等级。正如 Proudhon 强调的那样，人类的复合体在任何方面都与其他复合体没有区别，与任何其他复合体没有区别

两者“相互表达”似乎都不足以满足科尔森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更为传统的概念，即某种东西从一个单子传递到另一个单子。马克·莱斯特和查尔斯·斯蒂维尔在德勒兹的《感觉的逻辑》中将同样的表达翻译成“表达之间”(纽约：哥伦比亚出版社，1990)，177。

Tarde,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26 塔德,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26。

Maurizio Lazzarato, *Monadologie* 和社会学博士, Gabriel Tarde (巴黎: 思考的企业家, 1999 年), 116。

关于这个新单子论或新巴洛克派，这一次来源于怀特黑德，参见德勒兹, *The Fold*, 81。

彼得·阿尔什诺夫，《马克诺维斯特运动史》，洛林与弗雷迪·帕尔曼译(底特律：黑与红，1974)，261 页。

1902 年 3 月 22 日写给艺术和职业女权主义联合会的信：我晚上给您写信：1850-1904 年，编辑。Xavière Gauthier (Paris: Les editions of Paris, Max Chaleil, 1999)，689。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除了力量的程度之外，大自然还包括：“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更有生命力、更敏感、更有感知力，因为它的器官、次生群体……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组合。”德勒兹·斯宾诺莎认为，无政府主义可以肯定：“一种自然适用于所有身体，一种自然适用于所有个体，这种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其变化方式无穷无尽。”²然而，这一次无政府主义和怀特海一样，一方面拒绝赋予一个主要的现实以特权，不管它是被称为自然、物质、上帝还是物质(参见这些术语)，另一方面拒绝反对“一元宇宙”而是“多元宇宙”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一元论和多元论是一致的。

超越自我(参见主体，单子，皮铁，力量平衡，无政府状态，外部力量和事件)。“我是另一个人，”兰波说。⁴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藏着另一个人，不是以双重身份、兄弟、守护天使或灵魂的方式，而是像无政府状态一样，就像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所说的，存在的不确定性总体性，或者有限性的无限性，以及在他面前的巨大的道教传统(见这个术语)。这种有限性的无限性使人类能够敞开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性，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发现他们所包含的力量，从而允许自由表达所存在的整体性。如果一个人不理解自由意志主义悖论的意义，就无法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独创性，这种悖论要求完全解放的人既是“自然界最伟大的东西”，又是“自然界所有东西的总结”，正如蒲鲁东所肯定的那样⁵。正是在无政府状态和积极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人类解放出现了，人类有能力通过反抗一切形式的统治和试验新的社团来表达所存在的一切，这两种状态是一切生物(物质的、生物的、精神的、社会的)所包含的不确定的力量和积极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种状态是对存在的力量的有序和坚定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吉尔伯特·西蒙顿写道，如果“心理个性的领域……作为某种叠加在物理和生物领域上的东西存在，严格地说，它不是插入在它们之间，而是加入它们，部分包括

蒲鲁东，《进步哲学》，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2。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96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96。

兰波，《致保罗·德梅尼的信》，1871年5月15日，诗，保罗·施密特译(纽约：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1994)，275页。

《正义的骄傲》，3:175。

即使它们位于其中(强调我自己的)。”同样在这个意义上, Proudhon 说“人——多重的, 复杂的, 集体的, 进化的

是他试图吸收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 “在任何有组织的存在中, 合成的力量就是那个存在的自由, 所以这个存在, 无论是水晶、植物还是动物, 越接近人类类型, 它的自由就越大。”³ 最后, 由于人类是多元的、复杂的、集体的和进化的, 他们总是有可能通过丰富的社团和创造来增加他们所包含的力量和自由, 以充分表达存在的力量和自由

运动(变成)(见生命和逃亡)。在当前的 anar-chism 词汇中, “运动”一词被用来替代生物化的和误导性的组织概念(参见本术语)。取代“组织”(自由意志主义或其他), “运动”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现实, 同时在其限度内开放, 其组成部分多样化, 最重要的是, 完全参与力量和生命的形成。正是在这最后一个用法中, 运动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无政府状态(参见这个术语)不仅宣告了多样性, 而且还在不断变化, 拒绝任何整齐的安排, 这只能是墓地的安排或者统治者的暴力(“谁也不许动!”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 运动的概念与行动的概念密切相关(见这个术语), 这是一个全面的哲学概念, 巴枯宁阐明如下:“在本质上, 一切都是运动和行动[参见这些术语]: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做。所有我们称之为事物属性的东西——机械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有机属性、动物属性、人属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没有例外, 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最无生命的东西, 包括最简单的物体和最复杂的组织: 石头, 化学原子, 以及天才和一切知识和社会的东西[强调我自己的]。”(见生命, 逃亡者)。⁵ 墓地, 阅兵式, 或昆虫学家的陈列柜的安息(见分类)构成的不过是一个压抑和支配性的小说, 因为,

西蒙顿, 1'个性化, 精神和集体, 152。

骄傲, 正义, 3:409。

Ibid 3:433.

“在人类自身中, 自由意志更加积极地表现出来, 因为由他们的社区产生他的要素本身就是在力量中发展起来的: 哲学、科学、工业、经济、法律”(同上)。

巴枯宁, “思考哲学”, uvres, 3.384- 385。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自然，严格地说，没有一个点是永远处于静止状态的，因为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秒的最小的无限小的分数中，每一个都被一个不停的行动和反应搅动着。我们所说的静止，一种静止状态，只是一种粗糙的表象，是一个完全相对的概念。”我们在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概念，当他表明“休息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时，一种运动“无限期地”放慢了速度。革命工团主义项目中也有这种概念，例如，在维克多·格里菲尔什(Victor Griffuelhes)的著作中，他解释了“工团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他们希望在工厂和作坊中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³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反，自由意志主义工人项目总是拒绝(甚至辩证地)使工人阶级身份认同本质化或实质化，并且拒绝在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下(见这些术语)短暂地将其所能做到的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Griffuelhes 澄清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往往被那些后来宣布效忠革命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人所忽视。当他想知道革命工团主义者对待“那些充满宗教思想或者相信统治阶级改革主义价值观的工人”的态度时，他用一种特别有启发性的方式澄清了这个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被共产国际著名的赞美诗“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我的朋友！”/在工人统一战线前进/你是一个工人，直到最后!”⁵ 就这一回应而言，用另一个标签取代基督教或改革主义者的标签就足够了，即“工人”的标签，这个标签被认为是前面的或更具决定性的，因为它被认为源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基础。相反，Griffuelhes 反对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格里菲尔赫斯告诉我们，如果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不必排斥基督徒和改革派工人，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是“工人”；相反(或以不同或矛盾的方式)，是因为仔细区分“运动和行动一方面，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总是一个好主意⁶ 在眼睛里

同上。

塔尔德，《单子学与社会学》，40; 让·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他的故事的哲学》，159。

格里菲尔什，革命工团主义，2。

Ibid. 3.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汉斯·埃斯勒(Hanns Eisler)，《统一战线之歌》(The United Front Song)，译。恩斯特·布希，《不朽的火焰：大屠杀的歌谣》。Jerry Silverma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6-8。

“如果它拒绝他们，这将使不同的因素相互混淆：一方面是运动和行动，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Griffuelhes，《工团主义革命者》，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思考和认识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价值，以及她们最激进的女权主义潮流的肯定和意义。同样地，他的反工会主义和他对罢工的激进谴责并没有阻止他(出于许多原因，好的和坏的)激发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和行动(见理论/实践)。

多样性(见一)。与一相对的，在当前意义上理解的第一原则或基础。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殊性和伟大的原创性：它不仅以多元的方式构想一个，以不同的方式构想共同的，而且还将这种思维方式指向存在的东西，说这对应于现实的整个维度，以及它的可能性和发展的最大条件。因此，它试图在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上，在构成它的力量的绝对奇异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培育一个普遍的解放运动。继 Proudhon 和 Antonin Artaud 之后，毫无疑问，Deleuze 为建筑师项目提供了最好的定义：“无政府主义和统一是同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的统一，而是一个更奇怪的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¹

群众(见群众)。“群众”这个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群体”(没有一篇文章)指的是无政府状态，指的是多元的和不同的，指的是由单一的力量和主观性的扩散所产生的潜在的无限的组成。在主流思想——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中，“群众”(连同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以大量相似的个人的形式存在的，这些个人可能聚集或积聚在同样没有区别的群体中——这种相同和数量的特殊力量对于成功的示威和革命、选举或市场胜利是如此必要。马克思主义灵感的某些革命潮流在这个术语的第二层意义上继续唤起群众。非常错误的是，他们把这个职业指向了斯宾诺莎，特别是他的政治著作。但是，即使是最不愿意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也已经证明，在这位哲学家的政治著作中，大众的概念完全没有出现在伦理学中，通常具有消极的意义。² 如果一个人必须把它与斯宾诺莎的主要概念联系起来，那也不是为了认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一场后天的解放，在这场革命中，人类被认为是从他们对自然的原始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将会聚集成大众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 页。

参见 Balibar, mass, Classes, Ideas, 10 et passim。

“政治宪法”的任意真空，¹ 它们的物质性沦为纯粹的人类激情。相反，继德勒兹之后，人们将不得不考虑一种先验的解放，在我们所包含的大量力量中，这些力量永远不会停止构成我们(见永恒的回归)，德勒兹如下描述：

身体(和灵魂)是力量。因此，他们不仅仅是由他们的偶然相遇和碰撞(危机状态)来定义的。它们是由组成每个身体的无限多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些部分已经将身体描述为一个“群体”。因此，有组成和分解身体的过程，这取决于他们的特征关系是否适合他们。两个或几个身体将形成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另一个身体，如果他们组成各自的关系在具体的情况下。这是对想象力的最高锻炼，也是激发理解力的地方，让身体(和灵魂)按照可组合的关系相遇。²

Negri, *The Savage Anomaly*, 226 内格里, 《野蛮异常》, 226 页。

德勒兹在《疯狂的两种制度: 短信和采访》中的《野蛮异常的序言》

1975-1995, 翻译。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Semiotext (e), 2006),

192.为了批评内格里的分析, 参见丹尼尔·科尔森, “斯宾诺莎的无政府主义解读。”

N

自然法则(见自治和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见至关重要的/活力主义，但也包括自然，外在的力量)。

自然(见无政府状态和内在平面，也可见塑性力、外在力、物种活动、普遍因果关系、混沌、组合统一等)。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的一个传统和普遍的概念，表明存在的东西的总体性，巴枯宁将其定义如下：“由于我必须经常使用这个词‘自然’，因此有必要使我的意思清楚地理解。我可以这样说，自然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总和。然而，这将给出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自然概念，相反，在我们看来，它是所有的生命和运动。在这个问题上，事物的总和是什么？今天存在的东西明天就不会存在了。明天它们不会消失，而是会被彻底改变。因此，如果我说：“自然是现在和将来在它的子宫中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如果你觉得它有趣的话，就称它为绝对——这真的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把上帝这个词赋予一个与我们刚刚建立的词不同的含义：普遍的、自然的、必要的和真实的，但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先设定的或预先知道的结合，即所有具有真实存在的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的特定行为和反应的无限性。”¹

必要性(自由)。必要性反对强制。强制总是外在的(参见这个术语)，是压迫和支配的同义词。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必要性总是内在的(参见这个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由的同义词。正如斯宾诺莎所说，“那东西被说成是自由的，它完全出于自身本性的需要而存在，并且决心独自行动。如果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决定存在并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那么它就被认为是必要的(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限制的(共同行动的)。”这就是巴枯宁的立场，他解释说：“在遵守自然法则时... 人不是奴隶，因为他只遵守自己本性中固有的法则，这些法则是他自身存在的条件，也是他整个存在的组成部分。在遵守这些规则的过程中，他服从了自己。”²

否定(见类比、矛盾和不确定性)。

宋明理学(参见自由主义和 Daoism)。在当前自由资本主义努力使存在的总体服从其秩序的过程中，从所有现存文化中选择(参见本术语)有利于这个世界的要素和机制(理性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常规主义者、普遍主义者等等)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阿拉伯思想中看到这一点，例如，摩洛哥哲学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贾布里(Mohammed Abed al-Jabri)对阿拉伯东方灵知的品味的批判，以及他对某些欧洲哲学家的非理性主义(见非理性主义)经常被谴责为“东方”思想家(斯宾诺莎·尼采[Spinoza, Nietzsche])给阿拉伯文明的神秘传统带来新意义的不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方面经历了可以称之为“新儒家”的重读，这种重读有时试图打开对方的陌生之处，但通常满足于重新发现最具压迫性的西方哲学潮流中的陈词滥调。在法国，弗朗索瓦于连无疑是这种重新解读的最重要代表。⁴ 西方人文主义(与卢梭一起，他可以概括为“人就是人”的宣言)重新发现了西方人文主义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 7，塞缪尔·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217。

Bakunin, uvres complete, 8:201 巴枯宁，完成，8:201。

Mohammed Abed al-Jabri, 《阿拉伯理性批判导论》(巴黎: La couverture, 1994)。

弗朗索瓦于连的《进程还是创造: 中国文学思想导论》(1989年，巴黎)、《内在的人物》(1993年，巴黎)、《易王哲学讲座》(1993年，巴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黎)、《思考的人物》(2000年，巴黎)和《思考的人》(2000年，巴黎)。关于这种新儒家思想在以西方为标志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参见 乔尔·索拉瓦尔的《哲学中的中国: 东方思想，西方思想; 人性及其人物》，《精神》(1994年5月): 5-38。

儒家习俗的奴役(如孟子的道德重言)。与此相对应的是,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在其自身的选择论著作中提出了道家的“自发性自由”, 也就是哲尔奈特所说的“解除束缚”。这种对立在道教(Daoism)和儒家对中国思想的开创性文献《易经》的解释方式上的分歧上尤为明显。

新儒家对阴阳的解释建立在一种等级二元性之上(天与地之间的二元性), 根据这种二元性, 人类既可以试图在其思想的还原性假设中“封闭”现实, 也可以非常正确地将其行动的目的与天堂的“发起者”²(天堂本身建立在帝国模式之上)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 这种解释包含了一种控制和支配的初期意愿, 意图把事物的秩序锁定在良心及其相应的社会、道德和经济习俗的狭窄的隔离牢房里。由于道家观念是一元论(见此), 对等级制度漠不关心, 并且与万物(道德经的“万物”)参与整体及其运动的世界有关, 因此有利于形成一种具有明显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的态度和观念: 拒斥对区分、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游戏的无效掌握; 不断地回归到“无差别”(见有限和无限), 回归到存在的单一性, “神秘是自发的第一祖先, 许多多样性的根源”, 5 回归到“神秘的”源头, “天地的根源”; 6 认识到“自发性”的事物, 把人类的活动置于现有的和导致它们存在的流动之中。为了反对一种虚假的新儒家的掌握, 由无数的奴役——礼仪、社会习俗、等级制度和道德——所支付的费用, Daoism 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单一的“服从”形式: “服从自然的[内部]秩序”作为整体的单一表达。这样一个概念非常接近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开篇: “那个东西据说是自由的, 它完全出于自身本质的需要而存在, 并且决心独自行动。答:

《中国的情报: 社会与精神》(巴黎: 加利马德出版社, 1994年)。

朱利安, 《进程与创造》, 184。

同上, 特别是第 13 章: “分析成为他的主人。”

关于这种冷漠, 尤其是在道教练金术中, 见伊莎贝尔·罗比内, 《道教: 宗教的成长》, 译。Phyllis Brook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5-256。

葛洪, 包朴子, 《机器人》, 道教, 82。

老子, 特道清, 罗伯特 g. 亨里克斯译(纽约: 现代图书馆, 1993), 60。

李约瑟,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第 2 卷, 《科学思想史》(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第 582 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如果某事物是由另一事物决定存在并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那么它就被认为是必要的(必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限制的(coactus)。”¹ 它也接近巴枯宁，当他解释说“每件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的特定的发展模式，存在和行动，在它自己之内[强调原文]”²

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³(见个体和个体化)。新自由主义者不应该与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见这个术语)。右翼无政府主义相当于一种单纯的个人态度，很少能够在怨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集体运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实践和意见的集体安排，与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怨恨或厌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Gilles Châtelet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给出了最好的定义：“一股知识潮流，常常巧妙地甚至开玩笑地将顺从市场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成熟的化身。因此，市场似乎是历史上某种无政府主义诡计的胜利，完成了对所有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和平综合，而这些社会关系只能从特定个人的角度来理解。”⁵ 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的欺骗行为可以通过两个对他们的世界观至关重要的假设得到证明：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 7，塞缪尔·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217。

Bakunin, uvres, 3:352- 354.

在法语中，自由意志主义者指的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支持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者。法语单词 *libertaire*，就像它在其他欧洲语言(*libertario*, *libertär* 等)中的同源词一样，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同义词；然而，在美国，这个英语同源词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被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创始人挪用，该党是一个拥护反国家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相结合的组织。正如穆雷·罗斯巴德所说，“‘你们这边’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关键词... ‘自由意志主义者’... 长期以来一直是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礼貌词汇，也就是反对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但现在我们已经接管了它。”(《美国右翼的背叛》，ed. 小托马斯 e. 伍兹[奥本，AL: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2007]，83)。同样的意识形态，传入法国，得到了新词自由主义，但更常见的是-在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它被简单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主义的起源，见瓦伦丁·佩洛斯的《约瑟夫·德雅克与新词学“自由主义”的创立》(1857)，《经济与社会》4.12(1972): 2313- 2368。

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Céline 的案例。

Gilles Châtelet, 《像猪一样生活和思考: 市场上的嫉妒和厌倦的煽动》

民主国家, 罗宾·麦凯(伦敦: *Urbanomic*, 2014), 181 页。

将个人确定为一个没有特殊品质的存在，与所有其他个人(见平等)一样，从根本上与任何力量或可能性分离，这种力量或可能性超出了产生它的系统的要求，而且它完全依赖于这个系统。在这个概念中，个人被降低到机械的和外部的贫穷(见这个术语)，被降低到“自由的粒子”，这种粒子预先假定并强加于市场、统计和民主的选举逻辑的测试。

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现代的上帝)，一个最小但是凶猛而全能的国家(绝对的君主)来强迫人们严格遵守一个无情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个人”——这些新的鲁滨逊漂流者，他们尽可能地“狂野”，为了利润和成功而斗争，但同时，作为大量的“合同饲料”，超市、体育场、政治或宗教集会的“炮灰”——“不过是一粒粒沙子，贪婪的单位，可悲的交战台球，他们每一次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努力只会使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对等中陷入更深的困境。”¹

力的节点(见焦点/聚焦)。Gabriel Tarde 使用的概念，他的观点(非常接近 Proudhon 的观点)“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的行为就好像它们是力量的节点，力量寻求与其他生物结合，构成新的、更复杂的力量节点，然后与其他生物结合，等等... .. 所有生物都是力量，猿类(Tarde 也说‘欲望’)，它们寻求彼此结合。”²

Nomad (参见 war/warlike 和 nomos)。

Nomos (见战争/好战和自治)。一个希腊单词，在其后期职业生涯中，同时指法律、财产和领土分割。有三个理由拒绝这样一个概念，即通过“自治”和“他律”的二分法，自治可以包括拒绝外部法律以给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而实际上所有的法律都不可避免地来自外部(见自治-我)，从而影响到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本身。作为国家、立法者以及财产管理者和监护人的俘虏，nomos 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起源——游牧起源，与所有法律相对立，与以空间和货物分割形式构想的所有财产相对立(见地方主义)。最初，nomos 及其衍生的 nomas 指定了没有边界的空间，没有围栏的牧场，以及穿越这些牧场的牧群。德勒兹和瓜塔里强调，

ibid. 55.

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德和历史哲学，172-173。

[t]游牧路线可能沿着小径或习惯路线，但不能实现定居路线的功能，即将封闭空间分配给人们，分配给每个人一份股份，并调节股份之间的交流。游牧轨迹则相反：它将人(或动物)分配到一个开放的空间，这是一个不确定和非交流的空间。游牧民族来指定这个法则，但这最初是因为它是一种分配，一种分配的模式。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配方式，没有分成股份，在一个没有边界或围栏的空间里... ... [It]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法律或城邦相对立，就像偏远的乡村、山坡或城市周围模糊的广阔地带 [原文强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nomos 在其起源成为法律之前，可以与 Ibn khald n 将 Hadara 比作城市的所在地，将 Badiya 比作 nomos，² 或者将 bilad 比作柏柏尔人的 siba，即“反叛国家”、“反叛边缘”或“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这个空间难以服从国家的权威... ... 国家既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主人”，Hélène Claudot-Hawad 在介绍自由意志主义者 Tuareg，Hawad 的诗集时谈到了这一点

非暴力(见暴力、战争和起义)。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反对支配性机构和势力的一个重要战术概念，有助于从内部摧毁这些机构和势力(见颠覆)，防止起义和起义本身采取它们打算反对的支配性和对外关系的压迫性暴力，防止它们变成压迫、支配和关系的新来源，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当它被转变成自由意志主义项目的核心概念时(见疯狂思想)

围绕它自己的需求和它自己想象的非暴力组织整个项目总是有损于解放性质的风险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80。

Ibn khald n, *The Muqaddima: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节选), trans. Franz Rosenthal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9年), 93。

哈瓦德, 《无政府主义的格林桑法典》(巴黎: 地中海, 1998)。

(译者注: 参见乔治·古格尔伯格的《沙漠海岸: 萨赫勒文学》, “Tuareg (Tamazight)

Literature and Resistance: The Case of Hawad,” in *The Desert Shore: Literature of The Sahel*, ed. 克里斯托弗·怀斯[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林恩·里纳出版社, 2001], 101-126 和千年诗歌, 第4卷, 加利福尼亚大学北非文学之书, 编辑. Pierre Joris and Habib Tengou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529-534

使其充满活力的运动，将其与自身能力分离，迫使其接受和内化在当前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框架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的统治和暴力的象征形式(见这个术语)。

O

目的。目标被无政府主义双重拒绝: 在其空间维度, 当一个人谈到“客观”事实时; 在其时间维度, 当一个人谈到要达到的目标时。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是回到“客体”和“主体”之间的旧有区别的问题, 在这种区分的幌子下, 以区分两种等级的存在(客体和主体)为幌子, 不断试图将所有存在的东西都降格为纯粹的客体, 无情地服从一种超然的外部秩序, 在这种秩序中, 唯一被容忍的主体被认为是上帝和国家。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 只有主体,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主体(参见这个术语), 作为构成它们的变量(在大小, 质量, 以及由此相关的存在的性质上), 作为现实所包含的无限集体存在。

对象(见工具/武器)。因为它拒绝任何二元论, 拒绝任何基于文化与自然、人与非人之间对立的区分, 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 客体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其他集体存在一样, 除了它们的权力和自由(或自主)的程度之外, 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区别

“自发性, 在无组织的生命的最低程度上, 在植物和动物的更高程度上, 在自由的名义下, 在人身上获得了它的丰富性”(Proudhon, *De la Justice*, 3:403)。

例如, 参见布鲁诺·拉图尔的《论客观间性》, 《思想、文化与活动 3.4》(1996): 228-245。关于物体的自主性和主观性对技术安排的历史和空间延伸, 如同一家 19 世纪的冶金公司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性, 见 Daniel Colson, *La Compagnie des fonderies, forges and acéries de saint étienne* (1865- 1914)。自治和主观技术(saint étienne: Publications

一劳永逸地被另一种性质的外部力量一劳永逸地引导，这种外部力量只被赋予了它们的物质特性(重量、密度、形状等)——这些工具会顺从地服从于意图、目标和构思它们的主人的命令。相反，客体有其自身的力量和性质，这种力量和性质来源于它所属的活动或集体安排的性质，以及它具有意义并反过来赋予意义和效果的情况的性质。这种属于客体的力量作用于所有的集体存在，包括人类，客体在特定时刻与之相关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给他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一间办公室、一件衣服或一把螺丝刀，他每次都会变成另一个男人(或另一个女人)，往往会产生不可预见或令人惊讶的效果。这些影响不仅或主要是由于所拥有的物体的社会和象征意义，而且还由于其排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人类活动的背景下能够产生意义的方式。

一(统一)(见多样性和无政府状态)。在安东尼·阿托之后，德勒兹和瓜塔里解释说：“无政府状态和统一是一回事，不是统一体的统一，而是一种更奇怪的统一体，只能用来描述多重性。”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并不排斥一个的观点。它满足于去掉这个词的大写字母，并赋予它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认为，“一”总是指定一个生命的奇点(见事物)，在明确或不明确的文章“a”，“an”，“the”(“an”愤怒的人群，“the”Gryffe书店，“the”建筑工地罢工)，指示词“this”和“that”(“this”日落，“that”愤怒的人群)，或相对术语“which”，“that”，“who”(“who”eat today?如何打开这个裂缝?“士兵”“谁应该”)。换句话说，正如怀特黑德所说，“术语多以术语一为前提，术语一以术语多为前提。”²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项目在1882年8月日内瓦国际大会上塞特镇代表的提法中如此容易地承认自己：“我们团结，因为我们分裂”³这就是为什么它有充分的理由在怀特黑德的评论中承认自己：“最终的形而上学原则是从分离到连接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新的实体，而不是在分离中给出的实体”⁴(见结果和张力)

圣埃蒂安大学，1998年)。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页。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25页。

《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880-1914》(巴黎：大学出版社，1955年)，105页。

怀特海，《过程与现实》21页。

并赞同这位英国哲学家的座右铭：“成为众多人中的一员，以及成为众多人中的一员的自我享受。”¹

压迫。对一种普遍秩序的亲密和主观的感知，在这种秩序中，一些集体力量受到其他集体力量的支配

被它们塑造、压制或否认。主观上，压迫感首先是消极的，因为它主要是由压迫秩序所定义和产生的(见矛盾)。它总是处于通过怨恨而最终固定在这个秩序中的危险之中。只有通过反抗，那些经历过压迫的力量才能摆脱压迫他们的秩序，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产生这种秩序之外的其他力量，从而摧毁这种秩序，并试图依次创造一个新世界(参见类比)。

顺序(系统)(见一致性平面)。一个局部的和支配性的组织，试图通过选择和压制，使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服从于它自己特定的存在理由。如果无政府主义是所有秩序的敌人，无论它是什么——一个人作为命令所接受的“命令”或者为它们辩护的比例——那么它就是以解放所有存在的东西的名义，解放一种不再与其自身能力分离的存在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巴枯宁所说，无政府状态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秩序”

组织(见运动)。一个从生物学中借来的不幸术语，用来指代武装组织(见本术语)以及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个粗糙的概念试图隔离元素，在分层的基础上对待它们(手/头、底部/顶部等等)，并使它们服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将赋予它们功能和价值。作为集体力量(参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工会，正确地说，团体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联合)服从组织以外的逻辑——一种基于有限性、亲密性和自主性的逻辑(参见这些术语)，没有等级制度或外部依赖性。

其他(其他)(见外部/内部和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被归类为脱节和利己主义，对个人的过分肯定，存在的绝对独立性，因此无法理解他人，因而无法接受与他人同居所必需的规则和限制。这种肤浅的解释未能感知到自由意志主义计划及其思想的原创性。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另一个是在自己的内心。只有向他人敞开心扉，一个人才有可能向他人敞开心扉

145 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集体力量，与此同时，拒绝现有秩序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支配性、盲目性和有限的外部性的纽带。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向他人敞开心扉并不是通过否定自我——否定自私和接受束缚我们与他人的外部枷锁——或者服从那些被认为需要我们牺牲自我的角色和职能来实现的(见主题)。相反，对于无政府主义而言，向他人敞开心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有意愿去探索构成我们的极限：我们欲望的极限，我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极限，我们所包含的这种他性的极限，只有这种他性才能使我们向他人敞开心扉，从而需要与他们建立关系——一种完全属于集体存在现实的内在关系——通过增加权力的方式。我们对他人的这种有效发现通常发生在“特殊情况”(参见停顿和事件)的背景下，“特殊事件的启示”，正如西蒙顿所说的，“从启示的外部呈现”，以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中走钢丝的人的尸体从他的高空钢丝上掉下来，人群转身离开，因为它刚刚失去了现有秩序在其中承认的唯一功能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只有像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的洞穴里那样，远离克鲁斯特式的交流平台，立即回归自我，人们才能找到与他人的新关系，一种解放的关系。1

外部/内部(见外部/内部，外部的力量)。无政府主义的明显悖论可以表述如下：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外在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与统治相联系——反而总是肯定存在的自主性至高无上，从构成它们的内部建立关系的能力至高无上(见亲密关系、亲和关系、直觉)，无政府主义同样强烈地拒绝它们希望自己足够的假象。它拒绝自给自足，不可避免地占主导地位，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以相当大的痛苦、不幸和压迫为代价)想要掌握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话语、他们自己的实践、在他们展现自己的现实层面上的东西的总体性，从而在他们个性的不可避免的有限形式内(见个人化、总体性/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狂)。为了反对这种自给自足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阿德里安·德尔卡罗(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12和被动；西蒙顿，1'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55和被动。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使我们有可能思考内在与外在、外在的他者以及自身内在的他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德勒兹在《叠与被动》中提出的“巴洛克式的房子”的寓言。

导致战争——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外部冲突和统治，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治，以及使其生机勃勃的意志或决心完全指向外部，指向其他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某种观点和通过特定的联系方式)增加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增长不是通过外部力量的增加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内部揭示每个存在自身所包含的力量和他性(参见单子，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自身)。由于根据德勒兹的提法，“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外在”完全是内在的存在，它同时是外在和内在的——它总是准备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存在的事物中部署它的力量，只要这些存在从他们自己中脱离出来，脱离他们目前个性的有限性质，只要他们与其他人一起打开构成他们作为子主体的不确定性(见这一术语)，从而形成更自由和更有力的个性。

P

特殊性(见政府、普遍性、基础性和私人/公共性)。一个 19 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最接近于它的通用用法。事实上，与其词源和学术意义相反，“特殊”既不是指整体的一部分(见局部主义)，也不是指粒子或原子的概念，而是指在特定时刻存在的集体的绝对奇异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事物或存在都是特殊的，因此“a”是特殊的，也就是人们说的“奇怪的种类”(drôle de particlier)或“通配符”(drôle de numéro)，意思是这些卡片本身就是狂野的(因为数字把它们自己也变成了正切)。1

行为的通道(见直接行动、行为的宣传、无政府主义者的化学反应和符号/标志)。精神病学家加埃唐加添德克雷宏波(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觉，即理想错觉和主动错觉。”一方面，“一个典型的偏执狂解释理想的重要制度”：施雷伯法官的精神错乱，他行为疯狂，相信自己怀上了上帝的孩子，但他继续明智地管理自己的金钱。另一方面，“一个充满激情的、后置的主观体制”：例如，克里斯汀和莉亚·帕平姐妹的精神错乱，她们似乎是完全合适的女仆，突然野蛮地暗杀了她们的情妇，或者是那些农村的农场工人，据说他们突然“行动起来”，杀死了她们的老板，或者放火烧了干草堆和农庄。德勒兹和瓜塔里证明了这一点并没有错

翻译注释：法语单词 particlier 的意思是“特殊的”和“个人的”

在关闭本条目的文字游戏中，以各种难以捕捉的方式激活的意义。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 121 德勒兹和瓜塔里，《千年高原》，121 页。

关于乡村纵火犯的行为，参见雷吉娜·舒尔特的《法庭上的村庄》：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通过精神病学(见主题),这两种精神错乱也可能与阶级或集体情况有关。前者与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有关,“(a)阶级具有光芒四射的思想(当然”,符号的主人或只是刻在他们的顺序,并从这些符号中获益。后者关系到一个被支配的阶级,在现实中受到这种秩序的暴力影响,而在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则沦为“线性的、零星的、局部的行动”然而,这一次,米歇尔德塞都,而不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我们可以拒绝减少这些局部和零星的行动-行动代替思想,行动代替迹象-仅仅是一个“逃跑路线”,一个纯粹的“激情”爆发,“威权主义”和暴力,在主导的象征秩序。²除了他们的“线性”和社会的疯狂和暴力,超越或超越他们的最极端的形式,行为的通道也可以与一整套“战术”有关,从最不可察觉的到最暴力的。它们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但它们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形形色色的,并且不断地重复。如果形而上学本身,比如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可以“付诸行动”,“为了行动而行动,并且为了执行即时行动而行动”,那么通往行动的通道——超越它们的“线性”和社会的疯狂和暴力,超越或超越它们最极端的形式——也可以与一种“弱者的艺术”相关联,这种艺术“在个案的基础上,在孤立的行动中运作”这种“在任何特定时刻抓住提供给自己的可能性”的艺术涉及到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关系,利用“特定连接点在监视所有权力方面打开的裂缝”(见停顿)。这就是为什么,在行动的宣传和自由意志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中,即使在最极端的层面上,在一个旨在替代符号与力量、语言与事物、意义与影响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的整体革命计划中,这个行动的段落也具有意义,以取代它所部署的主导秩序和特定符号秩序的陷阱。在这个项目中,正如埃米尔·普吉所写,“直接行动,即工人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根据环境和背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

纵火,杀婴,法庭记录上巴伐利亚州, 1848-1910年, 变性。

巴里·塞尔曼(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 25-78。

德勒兹和瓜塔里, 一千高原 120-121。

在这一点上, 同上。121 和被动。

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 8。

参见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37(转:我自己的修改)。在这一点上, 丹尼尔·科尔森(Daniel Colson)在《无政府工会主义与工人运动》(anarcho-syndicalism et luttes ouvrières, Lyon: ACL, 1985)一书中也提到了“无政府工会主义与权力”(anarcho-syndicalism and power)。

它们可能非常温和，就像它们可能很容易非常暴力一样，因为没有“直接行动的特定形式”¹

过去(见传统)。“再也没有传统的枷锁束缚我们了!”²用这个短语，国际社会的国歌——通常在其他诗句中更为恰当——试图赞扬 19 世纪末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对自身力量即将产生的感觉

- 通过它的意志(见这个术语)- 另一个世界。但它使共产主义和其他未来政权(“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的革命和唯意志主义幻想长期存在，为此，现存的一切都沦为了一块空白石板，党及其领导人以科学和国家的一切权力为武器，企图在上面刻画人民光辉的未来。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时间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观察到一个多重的、定性的时间，这个时间对应于属于每个集体存在的持续时间，以及增加、减少或摧毁他们自由至上的运动力量的组合、重组和分解的关系(见永恒回归)。如果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由意志主义的持续时间转移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范围内，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论先验和后验。无政府主义，不亚于马克思主义，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东西，但是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这种即将到来的转变不是后天的，在空虚、任意、权力的乌托邦和唯意志主义中。它是一种先验(一种总是存在的先验)，在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中(见这个术语)，人类实验在一个“内在的或一致的平面上展开(见这个术语)，这个平面总是可变的，并且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组。”³

父权制(见类[性])。

人(见群众和群众)。一个或多或少有点神话色彩的概念，在整个 19 世纪(及以后)用来界定革命的主题——革命行动，但也——反对大机构和特权阶级——成为一个更加公正和真正的集体的承诺和保证

Pouget, Direct Action,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译者注:这个翻译来自查尔斯·h·克尔长期流行的翻译

尤金·波蒂尔(Eugène Pottier)的《国际歌》(l'internationale)(在《工人之歌:在路上,在丛林里,和

在商店里[芝加哥:世界工业工人,1919])。在最初的法语中,这一行写着“*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这可以更忠实地表达为“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128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生活。像其他社会主义潮流一样，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但从未被这个概念的神话层面所欺骗。在这一点上，普劳顿无疑是最明确的。对蒲鲁东来说，19世纪的“人民”首先是一个“现实”，一个和任何其他现实一样复杂多样的现实：其功能、性别、年龄、行业、职位、历史多样化；观点多样化(参见这个术语)；简而言之，一个社会在现在和过去为了重新存在所需要的一切(以及许多需要的东西)。因此，人民构成了一种力量和权力(见这些术语)，因为其组成部分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及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和主导作用。但是这种真正的权力，就像其他任何权力一样，是模糊的。从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组成它的各种关系和要素的多样性、横跨和构成它的各种矛盾来看，人民的力量可以产生同样多样化的效果，将自己转变为一种解放力量，消极地接受不公正和统治，甚至成为其他变形的对象(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仇外心理和各种民族主义)。对于蒲鲁东(例如，不像马克思)来说，历史上没有什么是真正铭刻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将会联合起来产生这个未来的力量的性质和质量。

除了其现实的综合性质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之外，还必须加上人民的另一种模糊性(从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一次涉及其作为集体力量的规模和组成它的力量的数量。因为它是直接的、相互纠缠的力量超多的结果(参见这个术语)，人民的力量无限地超越了组成它的每个元素、个人和群体在这种力量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的任何意识。因此，这种力量倾向于逃避他们，并迷惑其自身的起源。从解放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戏剧性的结果：

人民的力量从一个物质的现实转变为一种表征，在这种表征中，“一切都变成了虚构的、象征的、神秘的、偶像的。”¹ 人民的力量脱离了使之成为可能的物质和直接条件，转化为一种来自其他地方的神秘和超然的力量，人民的想象力立即将这种力量归功于上帝及其在地球上的代表和国家，归功于声称体现这种集体力量的所有老板和暴君，他们声称是这种力量的源泉。

由于没有意识到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多样性和内在差异人们开始相信，恰恰相反，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联邦原则》，理查德弗农译(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年)，57。

这种权力必然要求其作为一种结果的特性所赋予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共和国的“一个国家, 不可分割”, 导致人民以极端暴力拒绝任何分离和任何多元化的集体墨守成规。然后, 一个民族被转变为“人民”——一个群众、一个平民、一个群众、一个国家、一个盲目的、有限的、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力量, 像一个人那样行事, 为所有可能的暴君和专制主义、领导人、国家、暴君、教会和宗教服务。

人(个人主义)(见身体和不可分辨)。在其最常见的用法中,“人”(以及它被认为有权得到的明显尊重)声称拥抱人的整体性、身体和灵魂, 身体是灵魂的所在地(穷人的“身体”, 人们照料它, 人们给它衣服和食物,“身体”的完整性和神圣性受到法律和宗教的保护)。像皮埃尔·布迪厄这样的社会学家巧妙地证明了这个“人”是如何建立在一种双重错觉之上的:“有自我意识的感知主体”的学术和科学幻觉, 把它面前的世界设定为一个客体,“作为一种奇观或表象”, 但同时也是建立在“孤立的、杰出的身体的自我证据”, 即“生物个体”的自我证据, 这个“生物个体”在一个地方、物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都“坐着”(见地方主义)之上的天真和直接的错觉。测量、称重、计算、分析、保存和像对待一件事物一样对待这个个体的责任落在了科学身上。另一方面, 以生物个体的自证为基础的道德, 又使我们回到了“人的独特性”的“个人主义”信仰布迪厄反对这种双重错觉, 他反对将实践意义(参见这个术语)作为接近构成存在的“内在关系”的一种方式(德勒兹会说, 事实上存在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单一折叠)。布迪厄总结这一点时说, 任何个人都“居住在自己居住的世界里, 全神贯注于自己积极干预的世界里, 处于参与、紧张和关注的直接关系中, 这种直接关系构建了世界, 赋予了世界以意义[原文的重点]。”²与蒲鲁东,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认为“[t]

关于这一切,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 《帕斯卡利安沉思录》, 理查德·尼斯译(斯坦福, 加州: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0), 131-133,142。

同上。142.一种居住在一个人通过身体生活的世界里的方式, 使得莫里斯梅洛-庞蒂可以肯定:“我居住在我的身体里, 通过它我习惯了事物”(莫里斯梅洛-庞蒂, 《自然》: 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笔记, 翻译。罗伯特·瓦利尔[埃文斯顿, 伊利诺伊州: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74[翻译:

他认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程度要高于其他群体。“1 事实上，人只是长期驯化和选择的结果——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与它所声称的相反，它试图否定身体的力量和现实，否定人类所能做到的。通过教育(伯纳德·埃德尔曼 2 提到的“死亡教育”)，人类获得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由社会要求它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则、身份和条例的总和决定的，这些规则、身份和条例轮流强加给它的身体，将它训练成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顺从、永恒和统一。人类的身体(参见这个术语)，特别是大脑，调动着“我们最直接的力量，以及那些就其起源而言最遥远的力量”，而它们“是传递来自远方、意图远行的心理冲动的机制”，它们试图通过大量的症状和迹象使之可以理解，而现有秩序灌输的意识却对这些迹象视而不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它们转化为一种“代码... .. 它颠倒、伪造和过滤通过身体表达的东西”5、“被意识所掌握”，身体“将自己从流经它的冲动中分离出来... .. 因此，它的“大脑”活动只选择那些保持这种活动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可以被它同化的力量。身体只接受那些允许它维持自己的大脑活动的反射，就像后者今后接受身体作为它自己的产品一样。”作为“意识的工具”，身体“不再是自身的同义词。”从它自身的能力中分离出来，它最终成为“人”的同义词，它的神圣座位：一个超然而神秘的“人”，与它本身完全相同，无论它的年龄、它的愿望或它的持续时间迫使它忍受的情况(即使它有时会失去一条胳膊、一条腿或由此产生的幻觉)；一个由它的社会保险号码和终身伴随的身份证保证的“人”；一个具有作为人的地位所必需的所有考虑因素的“人”，只要它设法在狭窄的法律和道德范围内狭隘地限制其身体所包含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无政府状态。

我自己的修改)。

蒲鲁东，《进步哲学》，23(转：我自己的修改)。

埃德尔曼，尼采，一片迷失的大陆。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23(转：我自己的修改)。

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德和历史哲学，172。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26 克洛索夫斯基，尼采和恶性循环，26。

Ibid. 27.

同上。

透视主义(透视)。基于某一特定集体力量的结果的观点的知识理论。从哲学上讲，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可以与两个哲学传统联系起来：尼采的观点是强制性的，而莱布尼茨的观点是存在自主性的。

扭曲(见性)。

怜悯(见暗示和痛苦)。

地点/地点(见地方主义)。

内在平面(一致平面，合成平面)(见自然，合成和不确定)。我们的生活所依赖的、我们在其中行动的、我们必须不断创造的众多现实层面，定义了解放力量可以在其中出现的空间。这些力量倾向于改变它们所展开的情况，并且通过加入在其他现实层面上行动的其他解放力量，可能构成更广泛、更强大和更自由的存在或力量的安排。

这种解放集体力量的联合或组合的可能性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通常称之为“自然”的整体中运作(见此术语)。正如巴枯宁写道，“自然是在其子宫内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 ..是普遍的、自然的、必要的和真实的，但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先设想的或预先知道的特定行为和反应的无限组合，所有具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不断相互作用。”¹

自由意志主义词汇所称的“自然”，在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之后，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内在的平面或者一致性的平面，甚至是构成的平面：“一个自然对于所有的身体，一个自然对于所有的个体，一个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在无限多的方面变化着。所涉及的不再是对单一物质的肯定，而是对所有身体、所有思想和所有个人都位于其上的一个共同的内在层面的布局(原文强调)。”²自然，内在的或一致的平面，它总是可变的，不断地被个人和集体改变、组合和重新组合。”³

在这个自然界，在这个共同的内在层面上，存在着一个可能的世界无穷大。例如，昆虫的世界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德勒兹，斯宾诺莎：实践哲学，53。

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德勒兹这样描述它，“一个只有三种影响的世界，在浩瀚的森林中进行着”：1 光的影响(爬上一根树枝)，嗅觉的影响(落在从树枝下经过的哺乳动物身上)，和热的影响(寻找毛发最少、体温最高的区域)。许多这样的世界——从爬虫到伟大的古代文明——可以在自然界中共存而不受太多干扰，对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但是，由于它们都是通过自然界中选择(积极和消极的)适合它们的东西来运作，通过分解不适合它们的关系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适合它们的关系，这些世界或多或少地以多种方式——潜在地或实际地、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并根据它们能够产生影响的数量和性质——在掠夺和竞争的情况下。他们努力肯定自己的现实，却不利于他们试图分解或适用的陌生世界，使其服从于自己的关系，以避免在其他现有或可能的世界的框架内被分解和重新组合。这就是为什么集体生命，作为一个特定世界的组合形式，可能已经或可能没有被更广泛的生命和世界所捕获(或多或少地限制或破坏)，在他们的存在和共存中，以斗争、反抗和统治为特征：努力确认自己的存在和自己存在的理由；反抗以逃避一个更强大的生命的破坏性或致命性影响；统治以使其他生命和其他世界服从他们自己的特定世界，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世界是无限的，因此可以从解放的角度来评价每一个世界，根据它是否有能力包括尽可能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解放大自然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性(见这个术语)，同时避免将这种可能性减少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徒劳和有限的斗争，避免耗尽自己在支配、残害和毁灭其他集体生命方面的力量。因此，所有被支配和破坏的势力都要进行颠覆性的斗争(见颠覆)，把自己从狭隘的霸权主义政权中解放出来，这些政权把它们与它们的能力分隔开来，确认大自然的全面和解放性的重新组合是存在的一切的总体。

同上号 124- 125。

通过空间分离、规模差异以及许多其他原因，即使他们有机会见面，也会彼此忽略。

正如通过劳动界定的与世界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参见本术语)。

因此，对于名副其实的自由意志主义斗争来说，这不仅仅是选择一个特定的世界(甚至是一个人认为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并将其强加给其他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从确认被支配的力量开始建设一个解放的世界的问题，这个解放的世界将与内在层面本身相吻合，与整个自然界相吻合，在一个永远有待恢复的运动中

现实平面(构成平面、世界平面)(见普通平面、外部/内部平面和内在平面)。集体存在(见这个术语)是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这种多样性和构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生存所在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不同的爱情体验、不同的汽车驾驶体验、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保安队伍、不同的武装民兵等等，都是不一样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特殊的，都属于许多不同的现实层面——实际的或潜在的，持久的或短暂的，长期的或暂时的——每一次，都选择和揭示我们和其他人所包含的可能性(见这个术语)，我们能够做到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见这些术语)。这些现实或存在的层面同时产生: 1)来自对层面所构成的存在的主观肯定，而这些存在又依次赋予层面它们的存在; 2)来自更普遍的、主导的和外部的秩序或命令(通过国家、法律、资本等)使它们相容，并将它们自己的需求强加给它们;这些命令捕获或击退这些命令，但它们通常逃避这些命令，甚至在它们最短暂的表述中，使我们能够瞥见其他命令的可能性，或者甚至是在没有任何特定命令的情况下出现一种命令的可能性，这种命令是一种一般性的力量安排，它将表现出存在的整体的更大力量(见停顿和内在层面)。

在这个被束缚和扭曲的世界里，秩序的再生产总是需要限制这个秩序所控制的存在的力量，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逻辑，从自身中驱逐出去，或者在自身内部压抑无限

“这不再是一个利用或捕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社区的问题... ..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点对点的关系，也不是世界的选择，而是大自然的交响曲，一个日益广泛和强烈的世界的组成”(德勒兹，斯宾诺莎: 实践哲学，126)。我们可以在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的《工人之歌》(Chant des ouvriers [Song of the Workers])(1846)中找到一个关于这个“解放世界”的神秘表述: “让我们相爱，如果可以,/让我们聚在一起喝一杯,/让大炮沉默或爆炸—— /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喝/为世界的独立!”(qtd.在沃尔特本杰明，拱廊项目，编辑。翻译: Rolf Tiedemann.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 710; 强调我自己)。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通过揭示它所排除的可能性而不断回来威胁它的剩余部分。在这一框架内，构成我们生活的各个现实层面(如性生活者、工人、摩托车手、武装分子、集邮者等)之间的关系和协调不仅由外部管理——即通过实施标准化程序、表述或限制性法规和统一的行动模式——也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市场和道德的客观要求——程序和要求，以确保国家、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教会和宗教机构的安全。现实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这种协调和一致性——这些层面是如此杂乱无章，如此开放，以至于主导秩序既没有设法封闭或排斥，也没有从它的力量中分离出来——也利用了这些现实的各个层面在特定时刻调动的所有力量所共有的品质，这些力量的内在品质(见外部/内部)，以及产生这些力量的欲望和必要品质。这些基本品质，经过精心挑选，并由主导秩序延续，确保了力量之间的类比关系(见本术语)，将它们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保证了所有力量的“对应性”。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行动首先不是对一切形式的统治的外在攻击(见反抗)，最重要的是，它也不采取广泛的“反抗阵线”的同样外在形式，这种广泛的“反抗阵线”将包括所有被统治的力量，无论它们在现实中处于何种位置，根据这种统治和这种单一斗争的唯一共同基础，根据我们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我们的朋友这一荒谬的一般原则。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行动首先试图在现有秩序的情况和存在的空隙中选择和解放新的力量，从众多的、微不足道或普遍存在的内在的反抗，通过“一场激情的斗争，一场不可磨灭的情感斗争，在其中一个人有死亡的危险”。它试图创造一个共同的解放的存在层面，能够穿越当今世界和现实的总体，也许有一天能够重新组合现存的总体，因此符合德勒兹所说的内在层面(见这个术语)。

塑性力量(见直接作用、无政府状态、无边界和有限的无限)。在《秩序的创造》一书中，蒲鲁东解释了“劳动是社会的塑性力量”，这是他在《正义》一书中以更明确的方式回到的定义，他解释说“劳动，在其领域[计划]中是一样的，在其应用中是无限的，就像创造本身一样。”然而，应用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力量的概念是相当短视的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45; see common concepts 德勒兹, 《批判与临床》, 145; 参见常见概念。

骄傲, 创造人类的秩序, 421。

骄傲, 《正义》, 3:89。

当劳动实际上涉及到所有形式的“创造”时，劳动的层面(参见这些术语)，并且由普劳顿平等地定位于，例如，艺术创作、爱情或好战活动的源头(参见战争/好战)。1 在人类活动展开的所有现实中，塑性力的概念使得德勒兹所说的“陌生人的统一”有可能表明，“那只能表征多重性”2 这是一种统一，巴枯宁有时称之为组成的统一，或者更经常地称之为自然(“自然是在其子宫内不断产生的事物的实际变化的总和”)，但也包括生命、团结或普遍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单一的、未定型的现实，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但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它只存在于无穷无尽的特定现实之中，每一个特定现实都通过无穷无尽的可能关系来表达整体，每一个特定现实都依赖于其他特定现实

埃米尔·普吉特运用可塑性的概念来具体说明他所说的直接行动是什么意思，这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或仅仅与工会主义相提并论。由于“力量是每个运动和每个行动的起源”，因此“直接行动没有特定的形式。”通过直接行动，未来、现在和解放力量的多样性发现自己联合在一起：“直接行动的战术优势正是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可塑性：积极参与实践的组织不必局限于幸福地等待社会变革的到来。他们生活在当下，有着所有可能的战斗力，既不未来牺牲现在，也不为现在牺牲未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话语的塑性力量可以被联系起来：

一方面，尼采的权力意志或物种活动，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活动，“历史呈现给我们的种族，人民，阶级，教会，”这种物种活动，“嫁接社会组织，协会，社区的反应性，寄生虫覆盖和吸收它”；

参见《战争与和平》，31-32。论《Proudhon》、《Rubin》、《Courbet》和《Proudhon》中艺术活动、爱情和作品作为同一“创造”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页。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

“世界，尽管组成它的是无限多样性的生物，但它是一样的”(米哈伊尔·巴枯宁，《论科学与权威》，翻译。史蒂文·考克斯(Steven Cox)，《文选》，编辑。Arthur Lehning [伦敦: Jonathan Cape, 1973]，159)。

Pouget, Direct Action, 23 and 13. (转:我自己的修改)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138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另一方面，对于西蒙顿用来解释个体化过程的潜在概念，或德勒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这种“权力”不能简化为它通过在社会形式和个人内部行动而帮助产生的社会形式和个人，“作为一种先验的原则：作为一种可塑的、无政府的和游牧的原则，与个体化的过程同时发生，它既能够消解和毁灭个人，也能够暂时构成个人”¹

平台，平台主义(见综合)。

富足(见慷慨、权力和单子)。

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见一元论)。多样性的同义词。然而，在自由至上的运动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为是联邦力量的集合，蒲鲁东将其定义为“自治集群”

多元化(见无政府主义、多元化和一)。

观点。与这个词的普遍用法相反，观点并不是在一种语言及其可用意义范围内形成的意见(不管是模糊的还是定义明确的，广泛的还是限制性的；参见综合和平台)。正如这个词的起源本身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必须始终回到起源)，观点总是与世界上的立场和它们所发出的现实(一个人离开的“点”，一个人有“观点”)有关。即使当它表现为最理想或最抽象的时候，一个概念首先是在构成现实的物质力量总体中某一特定时刻占据特定位置的力量物质安排的产物。它的质量和重要性密切依赖于产生它的安排。每一个“观点”都是片面的和带有党派色彩的——因此需要增加“观点”并不断尝试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是必要的，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结果，这只是一个领域的游戏逻辑，恶意和吹毛求疵。相反，正如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它必须“从下面”(见下面)进行——即，在产生这些观点的力量集体安排的层面上——进一步，在构成这些安排的力量层面上——这些力量本身由其他力量组成等等。无政府状态具有分解秩序和现实的无限能力，它找到了试图重建秩序和现实所需的理由和力量，而这种秩序和现实将是完全不同的(见家谱和评价)。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38。

政治委员(见牧师)。

政治活力主义(见生命与活力主义)。

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否定, 超过自我, 平衡力量, 紧张和外部力量)。这是一个骄傲的霍尼亚概念, 也被用来将自由意志主义项目与消极和怨恨区分开来。当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没有通过拒绝、分裂和反抗立即转变为一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解放的方式重新构建世界的积极力量时, 它总是可能引起消极和怨恨。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是对一种新的动态和新的安排的肯定, 这种动态和新的安排能够将集体力量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他们能够尽其所能。

占有(财产)(见身体)。蒲鲁东, 这位作家年轻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财产就是盗窃!”人们常常指责他在晚年成为这种财产的捍卫者, 在他看来, 这种财产是抵御国家要求的必要保护, 而且(以“小财产”的形式)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注视下, 证明了无政府主义主要理论家之一的资产阶级性格。这种指控(从某些角度来看)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但却掩盖并忽视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方向。在他 1848 年写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书中, 蒲鲁东宣称:“在财产和社区之间, 我将建立一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 占有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瞥见。占有和财产并不是对现有的所有权和享受的同质权利的较小或较大程度。这两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是世界不同结构的起点。每一个, 在强加自己的同时, 都改变了另一个的含义。

作为一个出发点, 财产(及其脆弱的法律变体, 占有)往往将现实切割成彼此之外的固定实体, 除了额外的当事方, 这些当事方从占有同一地点一段确定的时间的专有力量中获得其身份, 而其他任何东西都被排除在这个地方之外。相反, 占有的观点试图定义一种全新的“财产”模式, 一种“尚不存在”的模式, Proudhon 告诉我们, 这对我们的存在概念本身具有暗示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与最近重新发现的加布里埃尔·塔德的理论相一致。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解决社会问题的乌维尔完成, 第 6 卷(巴黎: 拉克鲁瓦, 1868 年), 131。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财产理论》(巴黎: 拉克鲁瓦, 1871), 231 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存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假定了一个建立在“拥有”之上的概念笛卡尔的“我是”将人与外在的现实(一个可以被否定的现实)区分开来，而笛卡尔的“我是”假定了一种拥有，因此“我是”我所拥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所拥有的定义了我是什么。世界不再是由笛卡尔“主体”、“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拥有各种“客体”(包括其他主体)或什么都没有的方式以外在的方式相互占有的自足存在组成的。相反，由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构想的“现实”指的是无限的集体力量(参见这个术语)，或者，在 Tarde 的词汇中，“冲动”努力表现自己，“意志”寻求表达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一切(参见意志)。然后，占有可以转化为“财产”，但是没有“所有者”的财产，这是一个词的物理意义上的财产，就像当人们谈论“一个身体的财产”时，一个身体能够通过它所组成的力量和它组成这些力量的方式。这个概念构成了一个总体思路的一部分，正如让-克莱特·马丁和让·米莱所说，现有秩序的粗糙表述，“被僵化的存在范畴所包围，发现自己被... .. 推翻，有利于单一的，个体的，个体的多样性，填充每个个体，”让位于一个由“力量节点”或“潜在欲望”组成的世界，能够构成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见这个术语)

可能性(见外部的混乱和力量)。“在午夜/他要求太阳/他想要太阳/他要求太阳/在午夜，在非午夜...”² 没有可能性的想法，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意志(见这个术语)彻底改变当今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中，一种可能性根本不是一个乌托邦，仅仅是一个“想法”，不是一个应该通过某种未指明的暴力奇迹或跳入未知的事物而变成现实的东西。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可能性已经存在，就像禁止它表达自己能力的秩序一样真实。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可能性意识可以与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见这个术语)和经常被嘲笑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联系在一起对莱布尼茨来说，有无数可能的世界，上帝在其中选择了“最好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这是一个必然和谐的世界(因为它是最好的)，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伏尔泰

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历史哲学和让-克莱特·马丁，《普遍反对派》序言：《反对理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勒普莱西罗班松，法国：综合研究所，1999年)。

让·塔尔迪厄，《先生，先生》(巴黎：加利马，1951)，74。

考虑到这个所谓的“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的荒谬和不公正性，嘲笑这个概念的天真(因而令人厌恶)的性质并不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的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并没有意识到，如果神圣抵押被取消，莱布尼茨的理论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随着上帝的死亡，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多样性不再受制于一种超然的意志，这种意志从外部(参见这个术语)中选择了“最好的”。1 如果现有的世界是“最好的”，据说它在三个方面是“最好的”：1)因为它存在；2)因为其他世界不存在于其他地方(既不存在于神的意志中，也不存在于社会主义光明的未来中)；3)因为这个现有的世界，尽管其目前的秩序可能令人厌恶，却包含了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全部。所有这些可能的世界共存，通常以混乱和暴力的形式存在，因此也存在着伏尔泰所谴责的悲伤、死亡和压迫。在这种混乱之中，从这个可能性极大的世界的内部(因此以一种严格内在的方式，没有“上帝，凯撒，护民官!”)通过实验，自由至上的运动试图使“最好的”这些世界出现，一个将在其充分表达的整体存在，存在的力量。

潜能(参见塑性力和可能性)。西蒙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所有可能的集体存在的起源，这种存在永远不会停止，是“亚稳定的”，总是处于变化和转变的状态。

权力[权力，力量](集体权力)(见反独裁，集体力量，自由，顽固，男子气概和可塑力量)。正如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从 Déjacque, Stirner, Proudhon, 和 Bakunin 到 Malatesta ——权力和自由是同一个现实的两面。每一种力量都是一种自由，每一种自由都是一种力量。一个生命的力量在于它有潜力去达到它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去超越它目前的极限(见这个术语)，去组成一个更大的力量，从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更大的自由。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有必要摒弃这个词的两种用法：一种是博学的，另一种是世俗的或日常的。

在重新解读莱布尼茨的《上帝之死》中，单子不再假设“存在的实体和身份来发现它的活动”，相反，它使得“解释存在的多样性和变形”成为可能，基于其自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参见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onadologie et sociology*, 106 的后记。

译者注：这是另一个参考尤金波蒂尔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国歌。

首先，博学的用法。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任何集体安排或存在都具有特定而有效的力量：在所有存在的“普遍运动”中，与这个存在的特定程度和质量相对应的物质力量。然而，它也具有主观力量，以特定的内在性和自发性的形式出现，正如蒲鲁东所说，这种主观力量对应于每一种安排内部关系的质量和复杂性，对应于与其存在相关的功能的或多或少的和谐。在这方面，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对权力的整个传统和哲学概念提出了质疑。对蒲鲁东来说——就像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后来的尼采一样——任何权力都是一种“主动权力”，具有“特定的意志”，因此也具有同样特定的“目的”作为一种力量的“目标”，它试图做它所能做的一切，这种“目的”适合于每个集体存在，“积极地追求”，并不真正是存在于自身或最终原因中的“外在”目标(见内因)。对于蒲鲁东来说，目的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见结果)，一个产生它的安排的创造。追求它的“意志”(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接近尼采)只不过是一种对“权力”的“意志”，这种权力的意志是一种既定安排的双重结果或效果，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性质。目的并不是通过追求目的而产生目的的活动的活动的外在物，也不是使这种活动成为可能的力量的外在物，或者是定义和产生这种力量的集体存在的外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存在，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根据定义，一个集体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力量”，蒲鲁东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权力存在于每个存在中……它是这个存在的特有的，固有于它的本质，……它属于它的基础或主体，它是个体的，独立于其他一切存在。”⁵

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权力的概念也从根本上区别于这个词的常识或普通意义。事实上，权力变得具体或有效，有时被错误地认定为权力和统治，这种看法往往归因于那些遭受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外部力量约束的人，在这种约束面前，他们要么不反抗，要么屈服于怨恨(见这些术语)。

《进步哲学》，12。

关于这一点，参见皮埃尔·安萨特，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巴黎：PUF，1969)，313。

ibid.156 和 161-162。与学术传统相反，“积极力量”是莱布尼兹的一个概念。阿尔弗雷德·吉迪恩·兰利[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96]，174)。

同上。

《正义的骄傲》3:403。

然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统治者，特别是牧师、专家和人民的仆人(参见这些术语)，他们急于掩盖自己统治的基础，以禁止任何反抗和任何对外国势力的肯定。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统治只是一种非常特殊和消极的权力形式(政权)，既有破坏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它将其他力量与它们的能力分离开来，以便以局部和外部的方式使它们受制于统治者自身发展的限制，受制于他们自己的观点。支配地位的力量受到双重破坏和限制：一方面是它禁止其他力量做什么，另一方面是它本身由于这种禁止而无法产生什么。相反，一个生命的解放力量是指，在设法打破强加于它的束缚并自由地与其他自由力量结合时，能够超越其自身的限制并允许发展更大的力量和自由的力量(见等级制度和力量的平衡)。因此，应该清楚的是，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一个人的权力范围(从而其自由)并不取决于其占有的范围或限制(参见这个术语)，按照当前秩序对这一概念所赋予的有限的法律意义，一种可由第三方衡量或在外部尺度上衡量的占有(例如，根据表面、居民或成员数量、坦克数量或国内生产总值)。权力也不取决于暴力的强度(参见这个术语)，它能够强加给组成它的众生，它与它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或屈从于它。相反，权力完全取决于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关系的或多或少的内在或外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见等级制度)最小的不仅可以等于最大的，而且可以指挥一个无限大于后者的力量，如果它解放了组成它的所有力量，允许他们做他们能做的一切或超越他们的极限(见这个术语)。因为它征服的是外在的存在，从而使它们屈服于存在的理由(见本术语)而不是它们自己的理由，支配力量不仅扭曲了这些存在的能力——从而通过这种扭曲限制了它自己的力量——而且还将这种力量转化为纯粹的消极力量，在与其他可比较的力量(国家、教会、政党、个人等)对抗的外部对抗中转化为力量的损失或浪费，以及在它对其自身构成力量施加的同样的外部约束中转化为力量的损失或浪费。也正是在这种实际和直接的意义下，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可以与莱布尼茨和尼采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可以与 Leibnizian 关于厌恶冲击和暴力的概念(见本术语)联系起来，与一个人的积极立场在辩论中转变为其他人争夺的消极立场联系起来，与各种力量的分裂和对立联系起来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但它也可以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通往另一个世界和新世界的双重开口，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它所构成的众生之中以及极限之中

外部力量(见无政府状态和塑性力量)。在当代哲学家中，吉尔伯特·西蒙顿无疑作出了最协调和最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对于“表现”、“前个体”或“不确定性”的概念(参见这些术语)——通过拒绝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对立，离开现有秩序的圈子(既是魔法的圈子，也是恶性的圈子)和人文主义的监狱。因此，他因为拒绝“人类学”而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指责，而且并非没有理由人们很可能会不安地看到他的分析是如何导致“奇点和断裂的绝对无政府状态，思想再也不能严重束缚”，促进“意义破碎成单子和瞬间”，“一个破碎的、奇妙的、可怕的宇宙，没有原则或真理，或有无限的原则和真理”，“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宇宙——在其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⁴与占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相反，对西蒙顿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肯定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问题，人类存在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有能力向他人敞开自己，向不是自己的东西，从而向不是人的东西敞开自己，向自身内在的外部敞开自己，向自然或存在的多形性力量敞开自己，从而能够不断创造新形式的个性化或主体性(见这些术语)。这就是西蒙顿拒绝传统人类学的原因，在传统人类学中，相反，这是一个把人类锁在堡垒的“不可改变的界限”之内的问题

关于莱布尼茨哲学的这个维度，参见克里斯蒂安·弗雷蒙特的《存在与关系》，以及莱布尼茨给老板们的 37 封信(巴黎:弗林, 1981), 20 和被动。德勒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每当有人对我提出异议时,我都想说:‘好吧,好吧,让我们继续讨论别的话题。反对从来没有任何贡献。’(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 II, trans.休·汤姆林森和芭芭拉·哈伯杰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2], 1)。(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

关于这一点,参见穆勒-劳特,尼采,《权力意志的生理学》,105 和被动。

西蒙顿,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5-206 和 181 与被动。关于西蒙顿的论文在法国哲学家中的受欢迎程度,参见《辩论》,《法国哲学社会公报》第 54 期第 5 期(1960 年):第 751-65 页,特别是与保罗·里克尔和让·希波莱的交往(758-65)。

Gilbert Hottois, Simondon et la philosophie de la “culture technique”, 116 and 110.

或“岛屿”，采用康德的表述，1，人类的特殊性建立在与其周围的自然的斗争上，以及它自身所承载的——非人类(或原始)——为了主宰的斗争上。对于西蒙顿来说，“自然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因为人类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回归自然的整体，重新调动外部力量的整体，存在的力量(“可怕的力量，吉尔伯特·霍托伊斯会这样说)，作为存在的保留，作为有限的无限(参见这些术语)。

因此，西蒙顿的哲学计划直接回答了尼采 70 年前给自己的指控：“我的任务：一旦‘自然’的纯粹概念获得了胜利，自然的非人性化以及人的自然化。”这种“自然”被认为是我们之外的，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承载的。5 西蒙顿呼应了尼采将人类从自己的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意愿，在这个监狱中，人类也试图锁住

“我们现在不仅探索了纯粹理解的领域，仔细地审视了它的每一个部分，而且还衡量了它的范围，并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分配给它应有的位置。这个领域是一个岛屿，被自然本身包围在不可改变的界限之内。它是真理之地，名字迷人！被广阔而狂风暴雨的海洋所包围，幻想的故乡，在那里，许多雾堤和许多迅速融化的冰山给人一种遥远海岸的假象，用空洞的希望再次欺骗冒险的海员，让他参与他永远不能放弃但又无法完成的事业...”(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qtd)。在 Jean-Clet Martin, *Variations: The Philosophy of Gilles Deleuze*, trans. Constantin v. Boundas 和 Susan Dyrkton [爱丁堡: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2010], 3-4)。

西蒙顿，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196。

他还总结了西蒙顿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层面：“整个生命历史，直到并包括人类的出现及其作为一个物种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不过是一个个体化的存在，一个复杂而支离破碎的个体发生过程，除了回归存在，没有其他的未来，它从中发出，然后重新回归死亡”(同上)。111)。

《尼采与上帝的影子》，1881,11[211]，qtd。

尼采，*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1,11[238]：“人类和哲学家们想象地把人置于自然之中——让我们把自然非人化吧！后来，他们会在自己内心想象更多，而不是哲学和艺术作品，将有理想的人，谁每五年将从自己形成一个新的理想！后来，他们更多地自我暗示，在哲学和艺术作品的位置将是理想的-人们，所有 5 年来自己一个新的理想形式](强调原文)(后释放片段: 1880-1882, ed.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Taschenbuch-Verlag, 1988], 532)。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世界没有最少的“剩余”，1 通过捕获它，也在其代码的粗糙陷阱。像西蒙顿一样，尼采试图创造其他的视角，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很强的人种”的视角，“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决定性很强的本能，一种群居本能”，通过这种本能，人类“试图统治世界”相反，这些是“一个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存在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一个存在在自身中发现了不确定的力量，混沌的力量：“我告诉你：一个人必须在自己身上仍然有混沌，才能诞生一个舞蹈明星。我告诉你：你的内心仍然充满混乱。小心！人类不再生出舞蹈明星的时代即将来临。”⁴

“起来吧，你们这些伟大的星际猎手，”路易斯·米歇尔喊道，随即又加了一句，“革命的海洋将带领我们升起。”无论它被称为混沌、不确定性、无政府状态，还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名称，外部的力量肯定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愿望的核心，它的意志是要诞生另一个世界，诞生新的恒星。然而，这也是一个赌注或挑战，毫无疑问，它会引起许多怀疑和痛苦。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然主义，而是一种天真或幸福地向自然的欲望和其他需要屈服的意志。无政府主义不是自然主义。无政府主义对“外部”力量的召唤常常与绝望和毁灭联系在一起，与 Curderoy 所说的“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联系在一起，与其旗帜的颜色明确象征的混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见战争/好战)。外面的世界

“整个现存世界也是我们评估的产物——除了那些保持平等的世界”(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4,25[434] , qtd. 在法兰克, op. 引用, 184)。

1886- 1887,7[16] , qtd. in Franck, *Nietzsche and the Shadow of God*, 185.

1882- 1883,4[172] , qtd. in Löwith,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the Eternal recurrent of the Same*, 99。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举一个更接近 Simondon 的例子，参见 Nietzsche , 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2- 1884,5[1]128: “在你自己身上保留一份混沌: 那些即将来临的人必须拥有形成他们自己的物质”[Ihr should Chaos in each wahn: all Kommenden must Stoff have , to sich zu formaus](Nietzsche , Nachgelassene Fragmente: 1882- 1884,201)。

Qtd. in Xavière Gauthier, introduction to Louise Michel: 《路易斯·米歇尔的简介》: 我晚上写给您, 通用舞蹈(1850- 1904) , 11。

经巴枯宁表示(见自然)。

Curderoy, “ Hourra!!!! or la revolution by les cosaques,”。

无政府主义的诉求，在它的眼中，包含了无限的其他可能性，自由的集体安排和解放的主体性，但也同样包含了许多压迫和致命的力量和身份，以及，正如 Guy Hottois 惊恐地发现，在 Simondon，盲目的和破坏性的，“奇妙的和可怕的”力量，“没有原则或真理”，对他们的权力的影响漠不关心。正如这整个词汇让我们理解，无政府主义绝不诉诸于“自然的”有益的原始力量，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一种历史的方向(甚至是辩证的)，一种创造性的或决定性的力量(在 Marx 中，被简化为生产力)。相反，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原始力量不可避免地以所有这些形式与神圣眷顾的虚假古老神话，以及神圣第一原则的压迫性幻想联系在一起(参见 anarchy 和 result)。在它能够对应(也许有一天)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宣称的积极的无政府状态之前(见这个术语)，在对应现实所包含的力量的总体的解放性表达和安排之前(见内在层面)，无政府主义所呼吁的“外部”必须首先指混乱，主要或原始意义上的不确定的“无政府状态”，一种确实令人恐惧的无政府力量，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证明的那样。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在一篇关于痛苦的优美文章中强调了这种恐惧，在这种经历中，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所包含的超越自我的东西(参见这个术语)：

主体痛苦地膨胀着，失去了它的内在性；它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被一个普遍的其他地方从这里分离出来；它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变得与存在共存；它是空间化的，时间化的；它变成了一个不协调的世界。存在的这种巨大膨胀，这种无限扩张，否定了它的任何避难所或内在性，代表了与存在本身相关的对自然的控制的融合[参见这个术语]：个体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相互混合并扩张，因为它们从对自然的控制中取走了这种无限的能力：已经个体化的存在被前个体侵入；其所有结构受到攻击，其所有功能被一种新的力量激活，使它们不连贯。如果这种痛苦的体验能够充分地持续和忍受，它甚至可能导致存在内在的一个新的个体化，导致真正的蜕变；痛苦已经存在

关于所谓的“法国尼采主义”，这次是以西蒙顿(Simondon)的名义，在一个完全传统的道德意义上，对这种冷漠的所谓庆祝，参见尼古拉斯·多迪尔(Nicolas Dodier)在《人与机器：技术社会中的集体良知》(Les Hommes et Les machines: La Conscience collective dans Les sociétés technicisées, Paris: Métailié, 1995)中提出的批判。

从不断扩散的混乱中预感到个体存在的新生;也许痛苦的存在感到它将能够把自己重新集中在一个本体论的超越预设的所有维度的变化中;但是为了使这个新生成为可能,旧的结构必须完全溶解,旧的功能必须降低为单纯的潜能,从而导致个体存在的毁灭[强调我自己] ... 现在被掏空,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跳入过去和未来溶解了现在的屏幕,剥夺了它的经验密度。个体逃离了自己,抛弃了自己。然而,在这种放弃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本能,即在别处以一种不同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自己,并将世界重新纳入自己,以便一切事物都能生存。痛苦的存在在宇宙中发现自己,以便找到另一个主观性(强调我自己)。”¹

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关于外部的危险和痛苦也可以在吉尔·德勒兹关于福柯的书中找到,尽管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本书中,外部力量的概念成为一个主要的概念。在最后一章,德勒兹引用了福柯(Foucault)的一段著名文字,他(不像西蒙顿)对人类无法逃离人性的牢笼,无法突破地牢魔幻和虚幻的墙壁感到惊奇,仿佛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总是同样无法跨越界限,无法跨越到另一边... 对于权力的一方,对于权力说了什么,或者它导致说了什么,总是同样的选择。”毫无疑问,正如德勒兹所强调的那样,福柯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权力并不以生命为目标,而不暴露或引发一种抵制权力的生命”,或者“外部的力量继续存在

西蒙顿, l'个性化,精神和集体, 112-113。这篇文章应该与德雅克的文章一起阅读,他独自一人在阁楼上,刚刚写下了“乌托邦”——“那个独眼巨人,用火热的眼睛将人类的邪恶进程拖入地狱的最热之中”

他把自己扑倒在床上:“我会失去我的生命还是我的感官?我觉得我的头要爆炸了,我的胸部被老虎钳夹住了。我快要窒息了:钢铁般的肌肉勒紧了我的喉咙... 我在抽泣中窒息而死。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在我的脑海里掀起滔滔的波涛,沸腾的洪水不断地涌过我所有的动脉血管”(约瑟夫·德雅克,《人类世界: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1857),在《厨师! 133-134)。

德勒兹,福柯。

Michel Foucault, “La life des hommes infâmes”, Les Cahiers du Chemin 29(1977), qtd. in Deleuze, Foucault, 94.

破坏图表，把它们颠倒过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解放意志的任何经验经常表明的那样——“如果抵抗的横向关系继续重新分层，并遭遇或甚至构建权力结，会发生什么？”“如果权力是真理的组成部分”，通过其范畴、秩序和定义，通过语言本身，“我们如何能够设想一种‘真理的力量’，它将不再是权力的真理，一种释放横向阻力线而不是整体权力线的真理”？¹ 我们如何“跨越界限”？这是无政府主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第一个问题立即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它的无能或绝望引发了一种相反的、甚至更强烈的痛苦，这正是西蒙顿强烈表达出来的愤怒。打破目前构成我们(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数据处理器、一个所有者或一个公民的公民身份受到法律、官僚制度、社会秩序的保障)的熟悉和令人安心的角色和职能的限制，这种暴力难道不比我们想要摆脱的监狱更糟糕吗？不管我们对它阻止我们经历的一切有多少预感？“如果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外在力量的生活，那么是什么告诉我们，这种外在并不是一种可怕的空虚，这种似乎在抵抗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缓慢、局部和渐进’死亡的空虚中的简单分布呢？”² 我们怎样才能在不死亡的情况下跨过这条线呢？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限制和压迫我们的人类，而不至于不可挽回地迷失自我？我们如何体现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死亡的力量，恰恰相反，是生命的力量？这些问题，西蒙顿、尼采、福柯——以及德勒兹——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回答。从1848年的起义事件到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从巴黎公社到上海公社，从德国和匈牙利起义到俄罗斯和西班牙革命、乌克兰革命、慕尼黑革命、喀琅施塔得革命、布达佩斯革命和巴塞罗那革命，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和思想在其最激烈的时刻总是面临着如此严峻的挑战。

从德雅克到巴枯宁，只要数一数最早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参考资料，人们就会遇到许多文本——从1848年事件后不久开始——呼吁外界的力量，特别是C urderoy 在1852年出版的小册子，名为 Hourra!!! 或者是西班牙人的革命：

德勒兹，福柯，94-95。

Ibid. 95.

C urderoy, “Hourra! 或者是海盗的革命。”毫无疑问，在1848年6月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一段文字以简略的形式写成并传播开来(关于这一点，参见马克斯·奈特利的《乌弗雷斯引言》，第一卷，欧内斯特·C. urderoy [巴黎: 股票, 1910]，第二十二页)。

“哦！伟大的人类，永恒的未来，巨大的世界在无限的空间里震动！而我们却是如此渺小，短命的文明人声称要把法律强加于宇宙和时间的边界！但你们又是什么人，光荣的君主和深刻的西方立法者，你们相信自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活在阳光下的生物吗？悲惨与怜悯！但你难道没有听到火焰深渊的咆哮吗？它在人们中间掀起革命，那永远裂开的深渊，永远饥饿，永远复仇？它会吞噬你和你的谎言系统还有你的教师们的虚荣心。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虚假的，所有的制度都是压迫性的！我们不会再忍受任何政府，财政紧缩，统治。无论你是凯撒，耶稣会，共产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还是法兰斯特主义者，都渴望不再领导我们。人类终于离开了奴隶制的学校！... 革命将我扫向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它使我的存在具有百分之百的潜力；它像飓风的呼吸一样掠过我... ... 这个世界是我的地牢... ...”

“作为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让我们在最高层次上宣布这一点：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洪水上；我们没有未来，只有混乱；我们没有路可走，只有一场全面战争，混合所有种族，打破所有既定关系，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走压迫的工具，他们用这些工具侵犯了我们用我们的血液[强调我自己的]购买的自由。”²

“... ... 当每个人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时，没有人再需要代表；在语言的混乱中，律师、记者、舆论独裁者将陷入沉默... ... 语言也是如此... ... 国与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将导致各种习语的交流。我们将用不完美的、不完整的术语进行交流；发音、拼写和语法将受到无数的歪曲。因此，现在的语言会发现自己被侵入了绝对规则的庇护所；因此，民族的混乱会导致语言的混乱，语言和思想的无政府状态。”³

C urdery, “ Hourra!!! or the revolution by les cosaques,”325,332- 333.

同上。

Ibid. 257 和 305- 306。

当然，我们可以反对 1848 年 6 月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写的 *curderoy* 的黑暗吸引力，反对巴枯宁对巴黎工人大屠杀前几周革命的回忆令人陶醉，同时注意到同样的观点，即废除空间和时间，废除现有秩序，这种观点不再是想象的和前瞻性的，而是积极的和真实的：

在这无限的自由中，在这疯狂的狂喜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宽容，同情，爱他们的同胞

- 正直，谦虚，有礼貌，和蔼，机智... .. 这是一个月的精神陶醉。不仅是我，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有些人因为不计后果的恐惧有些人因为不计后果的狂喜，因为不计后果的希望。我用我所有的感官，通过我所有的毛孔，吸收了革命的狂喜气氛。这是一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盛宴。在这里，我看到了所有人，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所有人都迷失在一个无穷无尽、漫无目的的人群中。我和每个人都谈过，但我不记得我对他们说了什么，也不记得他们对我说了什么，因为每一步都有新的话题、新的冒险、新的信息... .. 似乎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可能的事情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¹

然而，在同样的事件中，傲慢凭借他个人的秩序倾向、他对语法的鉴赏力以及他对词语或思想上的混乱的拒绝，最清楚地突出了无政府主义计划及其思想的挑战性。正如皮埃尔·安萨特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说蒲鲁东很早就谈到了无政府状态，那么这个词对他来说长期以来仍然是模糊和不精确的：只不过是一种意愿，要在道德和逻辑的基础上谴责蒲鲁东大部分思考都致力于的现有秩序或“制度”；对另一种秩序即将到来的肯定，对现有秩序的矛盾，因为它建立在自由、主体性和“行动的自发性”之上，但蒲鲁东首先(以马克思的方式)宣称，从这种现有秩序，从它的矛盾(见这个术语和停顿)，从它们在解决自身问题时产生一个全新的、性质不同的社会的能力中，可以诞生和推导出这种秩序。³ 一条死胡同，正如皮埃尔

米哈伊尔·巴枯宁，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忏悔：沙皇的边缘评论

尼古拉斯一世，劳伦斯·d·奥顿译(纽约州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55-57。

从他 1840 年的第一本回忆录开始，什么是财产？

主要经济矛盾体系(1846)。关于蒲鲁东重新考虑这一最初思路的方式，参见力量的平衡。

Ansart 显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奇迹或以什么样的上帝的名义，从“逃避人类意志和行动的必要运动”中，自发性、自由、主体性和无政府状态，甚至辩证地产生了呢？“一个完全活跃的社会，没有任何约束”是如何从“一个客观和限制的过程”中产生的？¹

对蒲鲁东来说，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发展这样一个自由社会的第一直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来自体制的外部及其矛盾。正是在 1848 年革命事件之外，他才完全接受了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制度的异质性，不再把无政府状态想象成前者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关系中，制度就是一切，因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既是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1848 年，骄傲党以国家、资本和教会三重身份对现有秩序进行了强烈谴责，现有秩序随后停止界定社会激进变革的未来将在何种框架或界限内进行；它不再被用来表达和构成整个社会现实。现有秩序的局限性很小，其决定性也很明确，它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特定方面，在它的自命不凡方面尤其值得怀疑，一个“人造社会”，远远没有“耗尽社会的现实生活”（甚至远远没有创造这种现实生活），而是满足于通过剥削和使这种现实生活服从于它自己的要求，把自己“叠加”在社会上。在无政府主义者 Proudhon 的著作中，这些经济、政治和宗教形式只不过是外在的手段，它们表面上的迫切需要（甚至在他们最坚信的批评者眼中）在更高的需要面前消失了：这些事件如此突然地暴露出来的社会的明显现实。在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最初的对立面中，他起初试图站在制度这一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普鲁东倾向于站在无政府状态这一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是毫无疑问的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148-149。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杂志文章》，1848-1852,3 卷。

在这一点上，参见 Ansart, *Marx et l'anarchy*, 159。

正如皮埃尔·霍布特曼遗憾地报道的那样：“让我们追溯自矛盾经济学以来走过的道路。现在，“真理”

不再像 1846 年那样包含两种对立倾向的“和解”，即财产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无神论倾向，而是排除前者和后者的上升”（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Sa vie et Sa pensée* (1849-1865)[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88]，196)。关于这种分裂造成的困难，普鲁东的作品整体解释，参见皮埃尔安萨特，马克思和

这种无政府状态不仅不再是体制及其矛盾的可能结果，而且也不再代表未来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在当前只占有一个消极的位置：一个空隙，一个由社会秩序的矛盾造成的真空。通过将它与他反对国家、资本和教会的诡计的“真实社会”等同起来，蒲鲁东建立了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作为任何可能生活的原始条件。因此，无政府状态从一个模糊和可疑的概念，在人类发展事实之后(事后)加上，变成一个现实，其多样性和力量过于丰富，更好地被视为这种发展的源泉(事先)，现有秩序和任何可能秩序的变相和隔离的源泉，任何机构形成的无限基础。因此，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自发性被转化为初始条件。

正如那些了解普劳顿这个有秩序和理智的人可能会怀疑的那样，在 1848 年事件最激烈的时候，对无政府主义计划的这种重新评估来之不易——一年后，他在《Le Peupl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如既往地坦率和一丝不苟，长篇大论地重新审视了那些事件和他当时的感受：

作为协会、工作室、研究所的共和主义者，当我看到接近共和国的事物时，我吓得发抖... ..我逃到了民主和社会的怪物面前，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冻结了我的心，使我陷入思考... ..这场革命

即将在公共秩序中爆发的社会革命是一场没有人能说出名字的社会革命的关键时刻。与所有的经验相反，与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一贯遵循的秩序相反，事实会在想法出现之前到来[见行动的宣传] ... 因此，在我对未来的思考中，一切似乎都令人震惊，令人惊异，自相矛盾，这种思考每一分钟都在我的脑海中升至现实的高度。在这种吞噬的焦虑中，我反抗事物的漂移，我敢于谴责命运... 我的灵魂在痛苦中... 在 2 月 21 日的晚上，我仍然劝告我的

无政府主义，311。

在这一点上，皮埃尔·安萨特(Pierre Ansart)在《p.j》中写道：“骄傲，权力和自由”。骄傲，权力与自由：1987 年 10 月 22 日、23 日和 24 日在巴黎举行的讨论会的活动。Pierre Ansart et al (Paris: Atelier Proudhon, 1989)，13- 14.

不打架的朋友。22日，当我听到反对派已经撤退的消息时，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自己的殉道已经结束了。23日的到来打破了我的幻想。但是这一次，正如拉马丁先生所说，命运已经注定。卡普切尼街的枪击事件瞬间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我们如何能够想象那些激发了 curderoy 和 Bakunin 的事件，它们似乎不仅立即超越了文字，而且超越了概念本身？我们如何才能深入了解一个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同样令人困惑的现实之谜？一个人怎样才能有效地成为另一个人，这个尼采在40年后肯定的超越人类的人，能够解放它所包含的权力和意志，从而使“陶醉”-这种由生活环境引起的“崇高的权力感”，这种“爆炸性条件”-强化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改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感觉”，并允许我们感知到“极其微小和迅速的东西”？塔德和西蒙顿这一次，我们如何能够想象和“支持”，作为“生命的表现”，“每一次爆炸”，“各种形式的异议，所有的叛乱，每一次起义，无论它们来自何处，无论它们何时发生”？³我们如何能够想象这些“革命前的状态”，这些“过饱和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个结构随时可能出现”？或者，用 curderoy，我们怎么能想象“浩瀚的世界”，“无限的空间”，和“遥远而可怕的地平线”的革命？我们如何能够想象从一个没有“法则”的“宇宙”和从一个“没有边界的时间”发出的“力量”的侵入和组合？简而言之(可以这么说)，正如蒲鲁东在他的矛盾经济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种在人类内部可以找到的“自然”的“力量”呢？我们如何才能“穿透那些无法触及的... ..置于凡人的眼前，一句话，无限”？⁵

《人民》(1849年2月19日)，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回忆录

伯纳德·沃恩(Bernard Voyenne, 巴黎：马斯佩罗出版社，1983)，《我的生活》(ma life, ed.)

尼采《权力的意志》。沃尔特·考夫曼和 r.j. 霍林戴尔。沃尔特·考夫曼(纽约：Vintage Books, 1968)，420-21,428-29。参考弗兰克，尼采和上帝的影子，141。(参见巴枯宁的生命概念条目)

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德和历史哲学，153。

吉尔伯特西蒙顿，qtd. 在阿尔贝托托斯卡诺，“不同的：本体论和政治在

Pli: The Warwick Journal of Philosophy (january 2012) : 113.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矛盾经济学》，第2卷(巴黎：里维埃尔，1939年)，第253和249页。

这些是无政府主义一直在解决的问题: 在理论上(尽管并非没有困难), 特别是通过普鲁登所说的积极无政府主义; 最重要的是(在大规模和半个世纪的过程中)在实践中, 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解放试验, 这些试验通常被归类为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在这些试验中, 新形式的主体性(见这个术语)努力表达现实的力量。

实践意识(见经验、直觉和事物的中心)。感知赋予我们生命的东西的能力, 从而根据我们促进更强大和更自由的生活的能力(或无能力), 评估我们在构成这些东西和关系的情况下遇到的事物和关系(与人或非人)的能力。因此, 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评价, 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 它涉及每种情况所固有的解放性质, 以及构成解放性质的情况。它与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无关(见功利主义)。或者, 更确切地说, 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 任何对局势的功利主义评估迟早都会涉及统治关系。

实践(见行动和理论/实践)。

预备个人。西蒙顿使用的概念, 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 存在的保留, 不确定, 有限的无限(见这些术语)。

私人/公共(见政府和特别)。和 *Elisée Reclus* 一样, *anar-chism* 从根本上拒绝了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区别。¹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来说, 一切都是私人的, 在“特殊”(pri-vatus)的基本意义上是“适当的”或“个人的”公众是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人, 它只是从它强加给其他力量、其他集体存在的暴力、约束和统治(参见这些术语)中获得它的“公共”身份, 无论这些力量或集体存在被导致自称为“公共”或“私人”1853年, 这位画家和骄傲的霍尼安·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在回忆他与一位艺术部长的谈话时, 最好地表达了他对私人 and 公共之间区别的拒绝, 这位艺术部长试图以“政府”的名义委托他画一幅画:“我立即回答说, 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因为他声称代表一个政府,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该政府的一部分, 我也是一个政府, 我要求他为我的政府做任何事情

无政府主义、地理学、现代性: 激进的社会思想

约翰·p·克拉克和卡米尔·马丁(*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92。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我可以接受。我接着说，在我看来，他的政府就像任何普通公民一样[特殊] 对此，他回答说: ' m. 库尔贝，你非常傲慢！' "1

挥霍无度(见超级富有、慷慨、好战、权力和肯定)。福音书的败家仔服从他父亲的律法，看到他的挥霍变成了毁灭和罪恶，这就要求他在故事结束时寻求宽恕，回到家庭经济的狭窄界限，无政府主义反对积极的挥霍，因为它利用了存在的源泉，因为只有它才能解放这种力量。

支持女权主义者(见支持某种东西)。

项目(见行动，目的/手段，集体原因和内在)。自由意志主义——一个项目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例如，以遥远的目标或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形式)并不分离。项目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任何运动——就像我们花时间彻底研究的任何现实一样，任何在特定时刻存在的现实(即，在所有情况下)——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项目、存在的理由、它所趋向的和使它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是因为项目同时是行动的开始和结束，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动机和目标，它的内在逻辑。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参与解放斗争的力量或运动的看法，总是要求我们审视这些力量或运动为自己设定的表面目的的背后，审查它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构成它们在特定时刻作为集体安排的愿望(或意愿)的性质(见先验/后验)。

通过行动进行宣传(参见实践、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化学、恐怖主义、行动通道和传导)。这个概念是 19 世纪 70 年代末由巴库宁主义的军事集团发明的，他们试图通过化学的爆炸性和各种形式的起义，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和变革性的行动，不管这些行动看起来多么微小和重要，用“行动”代替“言论”，用“行动”代替“话语”与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个人袭击事件相关，“以行动进行宣传”通常名声不好，但它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概念之一。有了这个概念，一个新兴的无政府主义爆发了

给阿尔弗雷德·布鲁亚斯的信，1853 年 10 月，马克，古斯塔夫·库尔贝，109-10。

关于行动的宣传，参考科尔森，“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从根本上与任何理想主义或意识形态政治概念。军事行动不再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宣传”，对此，首先是根据“意见”采取行动，以想法和理由说服他人(使他们投票给你或加入传达这一信息的组织)。无政府主义以行动宣传的概念，拒绝在思想(作为一种逻辑和认知上的先决条件，位于时间之外)和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的传播之间分离和建立等级制度。无政府主义思想从必须以话语信息的形式进行宣传的宣传，转变为通过行动进行自我宣传的直接宣传。通过模仿这些行为及其直接效果，这种行为为培养了一种革命性和变革性的力量，可以说，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回声、放大器或引爆器。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计划或一个乌托邦。它不再讲述事物的真相，也不再试图对它们采取行动或从外部塑造它们。相反，“事物”(“事实”[事实])、“情况”和“事件”通过它们的运动，通过构成它们的特定选择和组成，立即和具体地表达思想，向每个人展示另一个世界可能存在的方式(见行动)。在直接行动的名义下，行动的宣传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是革命工团主义和随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

财产(见占有)。

支持某事(见反对某事和人民公仆)。在 70 年代，有一个极左的政治倾向，“亲中国”，他们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目前，其他激进分子，男子，宣称自己是“亲女权主义者”，并声称，如果不是“服务”妇女，至少将自己置于其领导之下(见说明)。“黑人”、“妇女”、“动物”、“受压迫的民族”、“无证移民”、“环境”、“第三世界”、“自然”、“残疾人”以及其他“原因”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样一个怪物名单应该足以取消这些激进行为的资格，这些行为也许只能被完全假定的受虐狂所证明。无政府主义以暴力和厌恶的方式拒绝这种虚伪的倾向，即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为他人服务，在这种关系中，服从和支配、内疚和怨恨(见这些术语)与任何真正的解放愿望背道而驰。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来说，正如 C urderoy 所写的那样，每个集体存在都是它自己的原因

C urderoy, “ Hourra ! 或者西班牙人的革命,”257: “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时，没有人再需要代表了。”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他们找到了与其他生物相联系的理由。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每种力量都需要其他力量来表达它所能表达的东西。在这里，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互惠和平等的地方(见这个术语)：在存在的绝对自治中，同样绝对的平等是这种自治本身保证的，并且实验是这种自治和平等使多种结合和分离成为可能的唯一措施。

精神病患者(见易怒，脾气)。这个概念指出了一定数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积极和消极倾向，他们不善于与他人协商他们的关系。心理变态倾向保证了力量的自主性，但却常常反对力量的平衡或等级制度(见这些术语)。他们往往是被动的，他们总是可能导致怨恨，并提供了右翼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这些术语)。

公开忏悔(参见描述)。一种古老的基督教服从和谦卑的做法，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以自我批评的名义重新引入。一般是在法庭审讯的框架内进行，罪犯通过向社会及其代表坦白他们的个人错误和罪行，自愿将他们的身份和能力置于外部法律、外部秩序和外部力量之下。

处死(见暴力、战争/好战、有罪的一方和朋友/敌人)。一种奇怪的表达方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或行为总是压迫秩序的征兆。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不会因为其计划的死亡、一个人自己的死亡和其他人的死亡而退缩，这取决于存在者之间存在关系的环境和性质。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总是(而且理应如此)在一种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种特定的暴力关系中，当生命的确认和更强大的生命的构成需要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反抗和重组这些关系时。死亡，总是消极的，然后伴随着生命作为其肯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谋杀或暗杀的情况下，死亡也必须遵守它的规定。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死亡都不可能变成

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表。

在这一点上，参见斯宾诺莎写给 Blyenbergh (XXIII)的信，引自斯宾诺莎的 Deleuze: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关于处死的想法都是陌生的，在这种想法中，死亡变成了一种“逮捕”的行为，其本身具有政治性，产生了自己的仪式(例如，以法庭的形式，甚至是最即兴的或者所谓的“革命”的形式)。

实践哲学, 35。

在政治逻辑中，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疑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个逻辑，参见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 主权概念的四章》。乔治·施瓦布(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5)和朋友/敌人。(译者注: 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 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

R

存在的理由(见集体理性)。

理性(见非理性)。

反应(见动作)。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话语中，这一政治概念传统上表示依附于过去的政治力量，其行动仅限于对新的力量作出“反应”，对这些力量作出消极的定义。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反应”的概念成为评价试图为另一个世界而战的集体力量(见本术语)的解放性质的标准。与主动力量不同的是，主动力量只是根据它们自身的关系和它们所参与的联系类型来决定的，反动力量只存在于与其他力量的关系中，受到这些力量的影响，然后对这些影响作出反应，通常是以怨恨或内疚的形式(见这些术语)。压迫和支配的陷阱在于，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被支配和被压迫的力量转化为反动力量，转化为反动力量(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独创性在于它能够将被支配的力量转变为活跃的力量——这些力量只依靠自己，能够逃脱否定的陷阱，将自己的存在建立在无限的资源之上，这些资源逃脱了它们试图解放自己的秩序的掌控(见类比)。

拒绝(见反抗、破裂、起义和反对某种东西)。

力的关系(见力的平衡)。

相对主义(见评估)。

呈现帐目(见功利主义、罪恶感和支配)。一种起源于基督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见公开忏悔、良心指引和自我批评)，在北美涌现的某些潮流中复活，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潮流的思想和实践中，压迫局势并没有提供自治解放力量的出发点，这些力量能够通过反抗从统治的框架中挣脱出来(见这些术语)，并通过它们的联系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组现实。在自己的实践中再现现有秩序的划分和分类，提供说明的党派将这些分类反过来划分为自己的主导等级，从而考虑到这一秩序可能包含的所有犯罪和怨恨的可能性(见这些术语)。在无休止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歧视中——由于目前的秩序经常将这些统治和歧视写入身体(性别、肤色、鼻子或头盖骨的形状等)，这种统治和歧视更加持久和持久——每一个被统治的人相对于其他更被统治的人而言总是处于统治地位：男人对于女人，白人对于黑人，城市居民对于农村村民，大学毕业生对于非大学毕业生，健康状况良好的妇女对于残疾妇女，骑自行车的人对于行人，等等。基督教徒希望永远颂扬最贫穷和最弱小的人，同时让自己为他们指责他人的行为感到内疚(为了更好地防止他们造反和产生解放力量)，与此同时，改变帐户的党派要求每一个反叛力量立即服从一个比它更受控制的力量，向另一个力量“交代帐户”，在它的监督下行动和思考然后，肯定和解放被转化为否定和服从。由于执政者必须屈从于其他势力，他们脱离了自己的能力，不仅丧失了颠覆一种秩序的能力，而这种秩序又一次将其等级和分类强加于他们。此外，由于内疚，他们也失去了定义自己的能力，从什么构成他们的内部，联系的模式，甚至高层次的模式，他们被要求建立在自己之间。事实上，一个人如何能够精确地建立起一条长长的相互提交的链条，在“交代”的最后，导致最终被支配的，纯洁的所有罪恶的逾越节羔羊，所有人都应该向他交代清楚？毫无疑问，白人异性恋男性将不得不服从他们最大的

在基督教的表述中，这就是上帝本人，更接近我们的是那些声称有权利代表上帝说话的祭司，尽管

他们犯了罪，不值一提

对白人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亲密想法、行为和运动(见公开忏悔)，她们将能够对白人女同性恋者做同样的事情，她们自己将置于黑人女同性恋者的“监督”之下，她们依赖于身材矮小的黑人女同性恋者，黑人女同性恋者反过来又会对身材矮小的黑人女同性恋者作出解释，这些黑人女同性恋者也肥胖，然后遭受斜视、文盲或其他身体(或社会)特征的打击，这些特征标志着她们受到歧视或羞辱。但是，如何精确地定义哪一个——斜视或肥胖——是更多的耻辱，更大的压迫和支配的来源？在这个支配链中，亚洲女同性恋者的位置在哪里？以巴西种族主义的方式，人们如何将不同的“混血”类型分类？在哪个法庭上，人们必须在不幸的程度上声称这个群体优于那个群体？什么样的科学或革命权威可以界定统治系数，衡量苦难和压迫的程度，对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地位和处境进行分类和排序？如果一个黑人男性无疑可以要求一个白人男性提供他的叙述，在这种最明显的统治的倒置等级制度下，他自己是否必须接受一个白人异性恋女性的监督？肤色是否比性别或种族更具歧视性(从压迫程度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动物(通过它们的倡导者和代表的自私的声音)难道没有权利要求被视为长期以来由人类主宰的世界的最终受害者吗？是否有必要求助于自然分类(以行为学的方式)，并在动物中区分无数种捕食者和猎物，以精确地确定各种食物链的形式(见反物种歧视)？除了像基督教一样古老的快乐——痛苦和沉溺于罪恶之中，然后在他人面前赎罪和坦白自己的罪行之外，“交代情况”的支持者还可以因此增加同样强烈的请求——狡辩、讨价还价(见功利主义)和吹毛求疵(在法律意义上)，即盲目、残忍和无休止的争取承认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利”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它试图斗争的秩序之上，建立在从不平等、歧视、羞辱、挫折、内疚和怨恨的影响中获得的利益、补偿和利润之上，而这种秩序从未停止产生，更好的是使它永久存在下去。

重复(见永恒的回归)。人们可以谴责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罢工是一种革命

指出我们作为罪人和罪人的地位。

在动物保护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上，“利益”和大量的幸福和痛苦，看到反物种主义和功利主义。

“体操”¹或“排练[重复]”，在戏剧意义上的术语，在期待和准备伟大的夜晚，起义和总罢工(见这些术语)。这种指责表达了对自由至上的运动思维方式和解放运动的持续节奏、现实性和特征的真正误解。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断重复的斗争和反抗，这种在现有秩序框架内不断重新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性(见停顿和事件)，与托洛茨基或列宁的机械和决定性愿景没有任何关系，后来把1905年俄国革命变成了1917年的“着装预演”，在这一过程中，党及其技术总指挥抓住机会，完善他们的工具、公式和口号。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反抗或起义的重复性质，无论它们多么微小和难以察觉，都从根本上逃避了这种线性的时间概念——在这种时间概念中，是过去在排练[重复]和为未来做准备——以及对事实和事件表面的任何工具化和分类。²正如常识中的词语或儿童玩耍的方式一样，自由意志主义的重复总是重复过去及其可能性。它总是与一种先行性和一种积累的力量有关(见《伟大的夜晚》)。每一次冲突，每一次反抗，都以新的视角，新的环境，以新的强度重复着其他所有的冲突。每一次，尽管这些冲突和反抗明显不连续，但它们通过回报、变异和选择，再次肯定了存在的内在力量，毫无例外，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利用构成它们的东西。正如德勒兹(像尼采一样)关于自然的论证，重复，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是“一种通过一切变化自愿自己的意志，一种反对法律的力量，一种地球内部反对其表面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德勒兹来说，解放性的重复反对表现(见这个术语)，“正如运动反对概念和表现一样，表现又把概念引回到概念。在重复的剧场中，我们体验到纯粹的力量，空间中的动态线条，它们不以精神为中介，直接将精神与自然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语言在语言之前说话，手势在有组织的身体之前发展”(见直接行动)

¹“部分罢工是一种训练，一种有益的体操，它使无产阶级为将成为革命总罢工的最高级斗争而变得更加坚强”(伊维托，abc工团主义者，40)。

在这一点上，丹尼尔·科尔森(Daniel Colson)的《集体和单一的侦察：1956-1959年卢瓦尔铁路和锻造公司(CAFL)的企业协议》(Reconnaissance collective and montée in singularity: l'accord de la compagnie des aciéries and Forges de la Loire, 1956-1959)以人们赋予的名称：身份认同过程、公共经历、公共题词、教育。Étienne Savoie (Paris: l'harmattan, 2001)，55-77。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6。

同上。

代议制(代议制民主)(见符号、标志和辩证法)。“当每个人为自己的事业而战时,就不再需要代表任何人了。”1. 无政府主义反对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反对所有声称以他人名义发言、代表他人行事或(更糟糕的是)代表他人行事的“代表”(代表或工会官僚),从而对政治和制度领域的代议制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批评,这种批评构成了其革命项目的核心制度的基础。在自由意志主义词汇中,代表这个词必须被理解为各种意义:政治、宗教、科学和象征(见这个术语)——每当人、标志或机构声称代表某些事物或说出这些事物是什么的时候。事实上,对无政府主义来说,这不仅是拒绝政治代表权,而且是拒绝任何形式的代表权,这种代表权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外部的和操纵性的,与它所适用的真正力量分开,与它们所能做到的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对表象的批判可以与尼采的思想、他对科学的批判、对国家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国家是一只伪君子的猎犬... 它喜欢用烟雾和咆哮说话

科学,教会,国家——它始终是一个征兆和表象的谎言征服现实的问题,征服“运动”(见这个术语)征服“物质”,主动力量征服反动力量(见这些术语)。

反感(参见亲和力和类比)。“母亲,合上学校的练习本,/满足和非常骄傲地离开了,没有看到,/在他的蓝色眼睛下面,他的前额充满突起,/她的孩子的灵魂是一个猎物,再次反感。”尽管它的直接,物理维度可能会让人相信,厌恶涉及到生命的本质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每一种集体力量在与他人联系中的安排都定义了由此产生的欲望的质量。从这种品质和由此产生的结果中,品味和厌恶作为世界本质的无价指标而出现,在这些世界中,这些生物承担着他们的力量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厌恶是亲和力的排斥面(见排斥)。它以其主观的强度和暴力,以其表现形式的直觉性和显然的非理性特征,始终准确地表明对人们想要生活的世界的判断,以及对与之相应的社团的质量和性质的判断,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社团的判断。

C urderoy, “ Hourra!!! or la revolution par les cosaques.”。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亚瑟·兰波,《七岁的诗人》,译。斯坦利·阿佩尔鲍姆,《地狱和其他作品的一季》

(米诺拉,纽约:多佛出版社,2003),146-149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厌恶(参见厌恶、亲和力和联想)。自由意志主义的战略取代了正面和野蛮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冲突的存在严格和固定地依赖于破坏性关系，破坏权力(见权力和辩证法)，取而代之的是排斥：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欲望从不适合我们的力量中驱逐出去，因为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破坏性和破坏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试图建立的世界格格不入

存在的储备(见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力量)。

尊重(见平等和自治)。相互承认自主性，从而实现生命的平等。尊重作为联合和分离方法的核心意味着密切关注他人，关注他们的构成，以及这一宪法在新关系方面能够带来什么。作为反抗的源泉和与之相关的特殊暴力，尊重排除了任何统治的企图和任何侵入性或破坏性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自由意志主义关系的中心。

责任(见内疚和永恒的回报)。一种内在的保护伞或假体，意在稳定人类，并使他们服从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构成他们作为生命体的外在因素。如果上帝的眼睛一直盯着该隐直到他的坟墓，那么责任就是上帝和国家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植入的眼睛，以保证他们权力赖以建立的秩序的永久性。

怨恨。被统治者的挥之不去的反应，他们没有设法将他们所处的统治关系转变为反抗，转变为解放和肯定的力量(见这些术语)。怨恨(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也不例外)总是具有消极性、愤怒性、抱怨性和拥有属性。美国的男人和女人

关于“斥力”概念在天体物理学中的重要性(“暗能量”)，请参阅《世界报》布卢瓦第13届国际会议(2001年6月29日)的报告。(译者注：参见《宇宙的边界：十三世布卢瓦会面记》，法国布卢瓦城堡，2001年6月17-23日，编辑)。Celnikier and Jean t. trâsomething [s.l. ， Vietnam: Thé Giói, 2004]

译者注：这是参考了维克多·雨果的著名诗歌《良心》，其中叙述了该隐在世界上的流浪，“上帝之眼”追寻着他；甚至在最后，“上帝之眼在坟墓里，盯着该隐”(雨果，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波士顿：小布朗，1887]439)。

正如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在追随尼采(Nietzsche)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参见克拉克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地理学》(Geography)、《现代性》(modern)33)。

仇恨情绪总是声称要与他们遭受的压迫作斗争，要与那些支配或剥削他们的人作斗争，要结束这种支配或剥削，但是，他们不能没有这种支配或剥削。这已经成为他们生存的理由。他们需要它，需要在任何地方找到它，并继续能够感受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也无限期地授权他们发表对他人的永久谴责。

结果(见集体力量、联合/分离、个体化和 1)。伯格森解释说，与威廉·詹姆斯有关，“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精神唯心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泛神论者，就像一个人可以对哲学漠不关心并满足于常识：事实仍然是，一个人总是设想一个或几个简单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可以解释整个物质和道德事物。”¹ 结果的概念是普鲁东继莱布尼茨之后提出的，其目的是考虑集体力量的首要地位，但也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原始原则的拒绝，从而考虑到多数优先于一个原则。任何集体力量(即任何集体存在，任何个人)都是多种力量的结果，这些力量在联系和构成它们的关系时赋予它生命。在构成我们的现实中，没有原则，没有开始，没有主要的存在，只有结果。资本、国家、观念、理论、国家、阶级和性都是结果。上帝是结果。普劳登告诉我们，人类本身——连同其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幻觉——是一种结果，是“力量的综合体”³ 换句话说，在人类中，就像在一切事物中一样，原则上似乎存在的东西，从一开始——自由和灵魂一样多，能力和元素的总体一样多，或者显然是人类复合体起源的本质，创造的统一和自我的统一——只有在后来才出现——只不过是构成的效果。巴枯宁解释说，“每个人”只不过是“无数行为、环境以及无数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结果，这些因素持续产生了这种生活，直到它持续下去。”⁴ 对于存在的所有事业来说也是如此：“普遍团结不能具有绝对第一事业的性质；相反，它只是特定事业的同时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在原文中强调]，其总体构成普遍性

伯格森，《创造性思维》，249 页。

关于 Leibniz 理论中的结果概念(及其与实质内涵概念的关系)，参见 Yvon Belaval, Leibniz: initiation à his philosophy (Paris: Vrin, 1962), 245 et passim, 更一般地说，Frémont, l'être et la relation。

傲慢，《战争与和平》，128。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 3:245。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因果关系。它创造并将永远被重新创造;它是由所有现存事物的无限变化的无限总和永恒地创造出来的组合统一体... ..[强调我自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可以在怀特黑德的思想中认识到自己,对怀特黑德来说,"实体"(参见这个术语)"不是物质,而是过程;不是静态的现实,而是结果。"²

可撤销性(见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程序,代表的撤销表达了自由至上的运动的一种更普遍的态度:在某一时刻和某一特定情况下,决定集体行动或安排的有效性(见这些术语)。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宁愿等待,然后再决定这样或那样的立场或那样或那样的决裂,以确保不会以某种其他必要的名义而损害正在进行的行动。但是,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旦他们认为任何立场或承诺属于压迫性逻辑或带有太强的普遍支配秩序的痕迹,他们总是有可能通过权利(即他们承认的具体权利概念)质疑这些立场或承诺。承担从共同行动或项目中中断的后果的责任(见本术语),他们总是能够暂时或永久地从从事这一行动或项目的集体中分离出来。

反抗(见义愤填膺和起义)。解放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时刻是,当被支配的力量残酷和根本地摆脱支配关系的陷阱时,拒绝在这些关系中采取任何解决办法,肯定另一种可能性,并为根本性地重新构成现实创造条件。正如 René Furth 解释的那样,反抗总是肯定的:"因此,在反对中,人们假定他们自己。在最自发的层面上,这意味着力量的爆发,被既定秩序所阻挡的重要活力的突破... ..在反抗中爆发的否定揭示了更深层次的肯定,对构成人类现实的自由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可以支持让·吉奈的话:"我不爱被压迫者。我爱那些我爱的人,他们总是英俊潇洒,有时也会受到压迫,但他们会挺身而出,反抗"(见主人/奴隶)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3-54(转:我自己的修改)。

Domenica Janicaud, "翻译形而上学的过程", l'effect Whitehead, 71。

René Furth, "无政府主义或整体革命", in Dictionna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ed. André Nataf (Paris: editions universities, 1970), 52。

《玫瑰的奇迹》,伯纳德·弗雷希特曼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88年),246页。

革命。19 世纪的一个古老概念，源自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概念中，世界的转变被想象为政变或人民起义的形式，结果是宪法或政权的改变影响到国家元首(共和国、帝国、绝对君主制、君主立宪制)。19 世纪中叶，旧的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思想(见这个术语)——一种构想社会变革的非常不同的方式——所取代。一个世纪后，旧的政治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重新流行起来。国家问题再次成为变革的关键，无产阶级专政加入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行列，参与了国家为使其统治永久化而发明的长期悲剧进程。革命的概念不应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发明的“伟大的夜晚”(Great Evening)和起义总罢工(见这些术语)相混淆。

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见直接行动、运动和总罢工)。

右翼(左翼)(见分类)。一种模糊的政治区别，源于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代表大会 500 平方米内人民代表的席位安排。这种区分是在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狭窄范围内作出的，主要目的是使“公民”受到这种秩序的约束，使他们产生错觉，以为他们一般每五年在处理 and 计票时自由决定选票的方向。

破裂(见反抗、起义、等级制度和直接行动)。集体存在的自由结合(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政治中)必然要求他们总是能够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打破这种结合。如果反抗是统治和压迫关系破裂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那么一个社团中集体力量之间的破裂可能仅仅相当于一种带有悲伤的无益的矛盾，从而导致社团权力的削弱(见这些术语)。任何破裂都必然加剧这种悲伤的感觉，至少是暂时的，但是，除非它变成一种持久的怨恨(见这个术语)，否则就会产生新的联系的条件，从而对联系我们的关系进行解放性的重新组合。

S

悲伤/喜悦(见好/坏)。

科学(参见手册/知识分子、符号/标志、运动、变化和生命)。柏格森和他之后的德勒兹证明了科学的还原论和统治论特征。为了通过一种简单的、操纵性的“实用效用”来支配和利用众生，科学用符号代替事物，阻止它们的运动或成为，因此声称要表达它们是什么的真相，而它将它们与它们自身的能力分离开来。正如德勒兹所写的，“作为一种测量方法，他喜欢用一种应该表达它们全部的抽象关系来代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似乎是科学和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²[a]虽然它是从属于生活的简单手段，但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法官、最高实例。³但无疑是巴枯宁最有力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因为这个领域自 17 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⁴对于巴枯宁来说，如果“科学和科学家的政府... .. 不能不是无能、荒谬、不人道、残忍、压迫、剥削、邪恶的政府”，那是因为科学依赖于

“科学的本质在于处理符号，用符号代替物体本身。毫无疑问，这些符号与语言符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高的功效性；然而，它们与符号的一般状态相关联，这种状态就是在一种被限制的形式下表示现实的一个固定方面。阿瑟·米切尔[伦敦：麦克米伦，1911]，329

德勒兹，尼采和哲学，74。

同上。

关于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参考科尔森的《科学无政府主义者》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标志和声称说真理或事物的本质，没有抓住生命和运动-同时亲密和逃亡的性质-的存在，其中的力量展开自己。对于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尼采来说，最亲密、最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最不可捉摸、最直接、最明显的东西，只有“感官”才能理解，因为它们涉及到与世界的直接、直接的关系：“在所有的事物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隐藏的方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存在，它并不是不可接近的，但却逃避了科学的掌握。根本不是利特雷先生和所有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种亲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种亲密的存在构成了事物的本体和现象的原因。相反，它是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方面，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最瞬间的、最飘忽不定的事物和存在的方面：它是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正的个性，如它只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之中，这是任何思想的反映，也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人们在尼采的书中发现了同样的概念：“‘表象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只是被欺骗性地添加了... ..我们今天拥有科学知识的程度恰恰是我们决定接受感官证据的程度... ..其余的是堕胎，而不是科学：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认识论。或者公式科学，符号系统：例如逻辑和应用逻辑，数学。2正如巴枯宁写道，尽管它相信自己能够了解事物的最深处，“科学只关心它自己的影子... ..活着的现实逃离它，只把自己交给生命，生命本身是短暂的，可以而且确实总是包括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所有的过去或转瞬即逝的事物。”3

科学定律(原因)(见法律/权利、科学、物质和决定论)。如果科学，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只关心自己的影子”，它自己的理论和逻辑工具同样是虚幻的。自然科学断言的“规律”和“原因”更是如此。正如巴枯宁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所坚持的那样，“支配世界的自然法则”只不过是法律和政治表述(它们本身来自神学)在科学领域的转换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93。

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r.j. 霍林戴尔(伦敦：企鹅出版社，1990年)，46。

巴枯宁，《哲学思考》，乌弗雷斯出版社，3:395。

同上。

同上。3:341-342。

除了真实的事物之外，什么都不是... ..它们就是这些事物。”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事物不遵守这些法律，因为除了它们，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可以对它们发号施令，对它们施加法律。”“每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自身内部的特定的发展、存在和行动方式”(参见 monad, entelechy, and slavery/freedom)

科学家(见科学和专家)。

分离(见分裂、反抗和主人/奴隶)。

保密/透明(见直接行动，亲密关系，私人/公共关系，亲密关系和符号)。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被描述为阴谋家——隐藏在阴影中，穿着黑色长披风，以隐藏他们的炸弹和匕首——巴枯宁对秘密社团的喜好凸显了这一点。无政府主义确实站在保密的一边，而不是透明和交流的幻想，站在私人(或特定)的一边，而不是公众(或一般)的一边(见这些术语)。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与现有秩序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没有太大关系。最常见的是非正式的，这种秘密起源于亲密的，亲密的，隐含的。如果它拒绝交流的陷阱和主要旨在剥夺人的所有内在性(从而剥夺所有自主性)的透明性，使他们服从它自己的秩序，将他们固定在它的分类表上，并强迫他们在神父的祈祷长椅上忏悔他们是什么，或者精神分析学家的沙发-阿纳基斯的秘密，同时，完全是表面上的(见亲密的存在)，容易获取或摧毁，根据一个人的兴趣或怀疑它。不断更新的，它是在直觉、直接和直接行动(见这些术语)的一边: 没有中间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必要的解释，没有翻译或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立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内在关系，一种通过保持亲密关系而成为可能的关系。正如德勒兹和哈瓦德所证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或亲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矛盾的，它可以与游牧战争机器的开放和“平滑的空间”相提并论，在这个空间里，集体生命不再服从于“有机力量的垄断”，而是被“游牧空间中的漩涡体的力量”所带走³

ibid. 3:352-354.

关于这些陈述，特别是 1892 年至 1894 年在法国遭受攻击期间的陈述，参见 Uri Eisenzweig 的《无政府主义小说》(巴黎: Christian Bourgois, 2001)。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64-366。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选择(见永恒的回归)。像许多其他概念一样，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来看，选择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在当前盛行的等级制度和外部秩序中，选择指定程序，授权某些生物从一个等级晋升到另一个等级，从而爬上等级制度的阶梯。它还指出，这种秩序使用同样的程序，可以同时拒绝和压制现实所包含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从该现实中选择它所需要的所有要素，以便复制和扩大它自己的优势，正如“选择”一词所指出的那样(见外部/内部)。在这个术语的自由意志主义用法中，选择同时是内在的、水平的和永恒的。它设计了集体存在构成其关系的方式，选择一些遭遇而避免其他遭遇(见亲和力和)，从而构成了一个在他们自身内部以及与其他人联合的更大的权力和自由的世界，一种集体力量的安排，能够解放存在的事物的整体权力(见内在层面)。

自我(见身体)。

自我批评(见公开忏悔)。

自律(见自律)。

自我完善(见账目呈现)。一种来自道德和宗教的古老的、压迫性的、规定性的概念，它被所有现代的主观化和责备(心理上的、政治上的)机器所复制，目的是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或她自己的折磨者(见良心和自我批评)。虽然无政府主义谴责工作(见劳动/工作)及其服从关系并不妨碍它观察其条件和效果也可能允许确认新关系的方式，但它毫无保留地拒绝服从自我改进[自我劳动]构成的框架，即“自我改进者”[劳动者]以自己为原料，无情地将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罪恶和怨恨之源。

自我管理(自治)(见自治、集体力量、积极的无政府状态和力量的平衡)。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最近的一个概念在法国劳工运动中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强调，这个概念可追溯到 1970 年代初，随着工会融入国家机器、与雇主共同管理以及构成其动力和可能性条件的工人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出现在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候，自我管理的概念可以直接放在内部

一个长期的解放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国家、资本或上帝及其代表所垄断的权力必须被产生这种权力的众多集体存在重新分配，每个集体存在都有自己的人格，无论这种人格多么微不足道。一个世纪前，继蒲鲁东之后，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在他 1853 年对一位“政府”成员的采访中，最有力地表达了自我管理思想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这位“政府”成员打算以国家的名义委托他创作一幅画。”我立即答复说，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因为他声称代表一个政府，我不认为自己以任何方式是该政府的一部分，我也是一个政府，我要求他为我的政府做任何我能接受的事情。我接着说，在我看来，他的政府就像任何普通公民一样。”18 年后，在奥斯陆协议下，这位画家在他关于选举该地区代表的原则声明中，邀请艺术家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创立“艺术家联合会”：“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在我的鼓动下，画家们刚刚采取了这种思想秩序[联合会原则]的主动权。愿我们社会的所有行业都以他们为榜样，这样，在未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战胜我们。所有自我管理和根据自身利益组建的协会都将成为我们的州，它们自我管理得越多，就越能减轻公社的任务”² 尽管这个案文可能(错误地)使我们相信，在企业、宣传或政治组织的管理方面，自由意志主义的自我管理并不包括下放权力，将一点有限的自主权赋予社会组织的较低级别，以便使他们“感兴趣”他们应该做什么，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执行所要求的任务，更有热情、主动性，甚至可能还有工作满意度(见自律和新自由主义者)。无论正在考虑的集体的本质是什么，与自由意志主义自我管理相关联的自主性(见这个术语)是一种绝对自主性。这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的主观性基础上的自治(见这个术语)，与任何主观性一样，它具有通常与主体主权、敏感性、生存权、分离和尊重、对世界的总体观点、平等的发言权——不论集体力量的大小——这一概念有关的所有特权

Courbet, Letter to Alfred Bruyas, October 1853, in Mack, Gustave Courbet, 109 - 10.

Gustave Courbet qtd in Gonzalo J Sánchez, Organizing Independence: The Artists Federation *巴黎公社及其遗产, 1871-1889 年*(林肯, 东北: 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97), 46-7(转: 我自己的修改)。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正在考虑中(见平等)。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我管理总是处于紧张(见这一术语)、冲突和必须不断寻求的不稳定平衡(见力量的平衡)的状态之下，这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我管理总是处于紧张(见这一术语)、冲突和必须不断寻求的不稳定平衡的状态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见这个术语)在混乱和自愿建设的双重方面相联系。

自给自足(见他人和超越自我)。在它的模糊性中，这个词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在其恰当的意义，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的意义)似乎刻画了通常归因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意志。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给自足使现有秩序规定的角色和职能个性化，从而阻止集体存在向其所包含的无限力量敞开大门，而这种力量只能通过与他人联合才能得到解放(见力量平衡)。它将这种权力降低为无效的、消极的、外部的竞争游戏。它将这种力量置于一种秩序的限制之下，而这种秩序是自给自足的生物徒劳地相信自己能够适应的(见总体/极权主义)。

敏感性(见敏感性)。一个集体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察觉到组成它的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往往微妙的微妙之处，并且能够将它与其他集体联合起来或者与其他集体对立起来。与感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些关系之外，令人放心的自动语言机能，往往代替了这种判断和欣赏。正如尼采所写：“愤怒、仇恨、爱、怜悯、欲望、知识、欢乐、痛苦——所有这些都是极端状态的名称：温和的、中等的，更不用说那些不断发挥作用的较低等级，它们逃避着我们，然而正是它们编织着我们性格和命运的网。这些极端的爆发

- 即使是最温和的有意识的愉悦或不愉快，当吃东西或听到一个音符时，也许正确地理解为一种极端的爆发——经常使网络四分五裂，然后它们构成暴力的例外，毫无疑问通常导致拥挤：- 因此，它们多么容易误导观察者！对他们来说，误导他们所在的人并不比误导他们更容易。我们都不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这与我们只有意识和语言的状态是一致的。”

—《115: 所谓的“自我”》，《黎明：对道德偏见的思考》，R.j.

Hollingdale, ed Hollingdale, ed Maudemarie Clark and Brian Lei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1. 虽然科学声称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但它仍然处于决定性的内在性之外，这种内在性只在最直接、最直接的事物中表现出来

敏感性(见敏感性)。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一个集体内部,确保对组成这个集体的各种关系的多样性和细微差别保持警惕的关注,保证自治和尊重它所联系的各种力量。

分离主义(non-mixité)(见无政府状态)。“1968年5月废除了男女分校,现在女权主义者想恢复它们!”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权主义者要求自己满足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组成一个自主的团体。以抽象的普遍主义的名义,以无政府主义转变为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结构,对其自身运作的现实视而不见,这种对单独联系的拒绝表明对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完全无知。妇女运动对单独结社的要求只是无政府主义项目的多元化和基本要求的唯一表达:集体存在的自主性;需要组成无限多的完全自主的集体力量,负责通过试验各种结社和分离方法,具体证明其有效的解放性质。各种力量的自主性,一种相互纠缠的多种力量,它们使归属模式和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立的关系成倍增加,构成了自由意志主义重新组合现有世界的主要、必要和永久条件,使世界能够解放现实所包含的一切力量。

系列辩证法(见系列[系列]、力的平衡和张力)。蒲鲁东(特别是在《秩序的创造》一书中)用来思考集体力量通过掌握和选择其对手所形成的内在秩序能够解放最大的权力,从而解放最大的自由的方式。在他发现黑格尔的短暂间歇期间,普劳顿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之前的几年,利用这一系列的辩证法,阐述了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了思考,为了允许生命和运动,他必须肯定和建构“不可解决的矛盾,同时并且丰富。”²

显而易见的,最逃亡的。

1844年秋天,普鲁东一直孜孜不倦地追随着马克思。在1865年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解释了“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我是如何把黑格尔主义传染给他的——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偏见,因为他不懂德语,不能从根本上研究这个东西……”(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穷》,翻译。奎尔奇[芝加哥:查尔斯h.克尔和公司,1913],186)。

勒普莱西罗班松的《社会逻辑》一书的前言,勒内·舍雷尔对塔尔德采用的公式是:“卢登人:生命战略”,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系列(序列)(参见序列辩证法,力的平衡,类比,现实平面和张力)。这个概念是蒲鲁东在阅读了查尔斯·傅立叶的著作之后提出的,主要是在《秩序的创造》中,为了思考使无数可能的存在相容的关系和安排的本质。序列化不仅仅或主要是知识的顺序,它与每个主导顺序所建立的固定的、任意的、破坏性的类别划分(见分类)没有任何关系。它发生在各种力量及其关系之中,也发生在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之中。普劳登的序列通过类比、亲和力和对立性运作——西蒙顿会说,以一种传导的方式——跨越存在的最广泛的多样化领域,使得大量不同的顺序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一个生命在它所参与的事件和它所经历的情况下,或者在它所遇到和联系的生命旁边,它会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巴塞罗那突击卫队的一名成员可以在 FAI 的激进分子身边找到,1 向叛乱士兵开火;一名虔诚而谨慎的德国会计师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的集中营指挥官;一名模范雇员可能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一个反抗的信号可以变成权力的象征或崇拜;一把锤子可以变成武器;一把剑可以变成犁头;风可以摧毁森林,使鸟类得以飞翔;海洋可以摧毁海岸,并允许发现新的大陆,“就像船是海洋的褶皱”²

人民的公仆(国家或任何其他事业或被称为“高级”的权力机构的公仆)(见支持某事和专家)。警惕那些声称自己是“仆人”或者把自己置身于服务于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现实的人。尤其要警惕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最虚伪的人。正如这个词应该指出的那样,“仆人”总是从压迫中汲取力量(参见这个术语),一般来说,在服务或共同利益的表象背后,努力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性(见身体、人格和权力)。因为“活着的人是一个群体”,是“权力的综合体”,³我们包含了大量的欲望和信息

法国:合成拉博,1999)。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建立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突击卫队,以重新确立对城市的纪律,尽管如此,还是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法西斯政变作斗争[海伦·格雷厄姆,《西班牙共和国战争,1936-1939》(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37-38,92]

德勒兹,福柯,97。

蒲鲁东,《进步哲学》,23(转:我自己的修改);蒲鲁东,《战争》

脉冲，现有的秩序和它的语言分类和固定在一些等级排列的领域(消化，运动，性，精神等)。性只是这些领域中的一个，临时的和受限制的，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中，不能比任何其他领域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或主要动力(Eros, libido)，或者被认为或多或少地支配或主要的人类活动。像任何事物一样，性或性欲只是一种结果(参见这些术语)：一种特定的力量安排的结果，由其运作的顺序赋予其形式。社会秩序为使这一结果服从规范和污蔑偏差(例如，以扭曲的名义)的任务提供了大量的精力和关怀，最好将这一结果转化为有益或危险的第一原则，使这一结果成为原因，使自然和文化，无论好坏，都能同时无可救药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对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试图重新组合存在的事物的总体，它也试图重新组合性的构成要素到新的安排。它试图产生与其他需求相对应的新的联想和新的欲望。因为它向斯宾诺莎确认，“还没有人确定身体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还没有人从经验中学到身体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完全依据其自然法则，”¹它试图(反对基督教和加强统一性的众多其他力量)发明新的身体，在这些身体中，构成传统上称为性的力量将在意义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最终能够在其他安排和其他协会的范围内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

意义(见符号/标志，主题和集体理性)。

奇点(见差异和不可分辨)。每个集体的存在都与众不同。巴枯宁对这一立场的阐述如下：“一切事物都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恰当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特殊性质；... ..每一件事物都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行动形式... ..”²

情境。因为它拒绝二元论(见这个术语)，无政府主义拒绝高贵的生物(人类)和其他生物(工具、动物等等)之间的任何区分。但是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也拒绝区分稳定的存在(能够在纯粹的状态中被孤立，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固定)，因此值得研究，而且仅仅是

还有和平，128。

Spinoza, Ethics, Part III, Scholium to Proposition 2, trans. Samuel Shirley, in Spinoza, Complete Works, 280- 81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学院到第二命题，塞缪尔·雪莉译，《斯宾诺莎全集》，第280-81页。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54。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逃亡的生物(见这个术语)，是第一类生物的意外事件或外部事件，即使第二类生物可能决定第一类生物可能成为什么(风暴，汽车事故，偶然事件等)。相反，与巴枯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莱布尼茨，或尼采，无政府主义试图表明，稳定和永久的存在只是显著的例外，“无限慢的运动”(塔尔德)，掩盖了不断成为的存在，无限的“小知觉”(莱布尼茨)，组成了存在的现实。正如巴枯宁所写，“在所有的事物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方面... 最不必要的、最不内在的、最外在的方面，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最短暂的、最难以捉摸的事物和存在：它们直接的物质性、它们真实的个性，如同呈现在我们感官中的那样。”¹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况构成了集体存在结社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这些结社的背景或背景，而且是(非高级别的)各种力量的总和，这些力量有助于界定由此形成的集体的解放或压迫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情况本身总是一个集体的存在(一个暴动的地区，一个成功的政党，一个日落)，一个事件是决定性的潮起潮落的解放。情境主义者²谈到“构造的情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它以一种单一的方式调动了存在的整体，在任何情况下，一种情境都不能仅仅服从于有关集体中一个人的意志、支配或愿望，除非它立即转变为支配的外部关系。

奴隶制/自由(见外部/内部、自然、法律/权利和自由)。在 l'empire knouto-germanique 的一段文章中，巴枯宁问道：“什么是自由？奴隶制是什么？人的自由是否存在于对所有法律的反抗之中？我们说“不”，因为法律是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律，不是权威强加的，而是事物、关系、情况中固有的，这些法律所体现的自然发展。如果它们是人类强加给人类的政治法律和司法法律，我们会说“是的”：无论是以暴力的方式；无论是以宗教或任何教义的名义，通过欺骗和伪善；或者最后，通过虚构的方式，通过被称为普选权的民主谬误。对于自然法则，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巴枯宁 3.393。

情境主义者：情境主义国际组织(1957- 1972)的成员，该组织由激进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组成，其名称来源于“建构情境”的概念和实践：“由单一环境和事件游戏的集体组织具体和有意构建的生命瞬间”(情境主义国际选集，编辑)。翻译。Ken Knabb [Berkeley, CA: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1989]，45).

人的一部分，简单的理由是，他自己是大自然的产物，他只是凭借这些法则而存在... ..大自然包围，渗透，构成了他的整个存在。他怎样才能逃离这种自然？[原文强调]”¹

人们很容易对巴枯宁的不一致感到讽刺。人们如何区分压迫性法律和解放性法律，那些自由和必要性相吻合的法律(见这些术语)？人类怎么可能完全被一种“包围”、“渗透”、“构成他整个存在”的本性所穿越，这种本性必须遵守，但同时又产生必须反抗的压迫性法则，这些都是不自然的法则？大自然(见这个术语)怎么可能既是存在的一切，同时又受制于除自身之外的现实的暴力和力量？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上帝的信仰，如果没有一种总能证明其自由意志的超越性，如果没有在“是”和“否”之间不断摇摆的超越性，这种错误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以如此讽刺的口吻谴责了它，它真的能做到吗？

然而，巴枯宁明显的不一致超出了语言规则的范围

C urderoy² 谴责的“说谎系统”和“校长的虚荣心”

- 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问题以及它提出的解决办法的最明显的矛盾的迹象。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要求一种激进的一元论和内在论(见一元论和内在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渴望把自己从一种“包围、渗透、构成他整个存在”的自然中分离出来但是这种天性的安排对应于内部构成的无限模式。在这些组成方式中，人类被导致区分两类法律：压迫性法律和解放性法律(见善/恶)。³ 这种区分并不涉及有关法律的性质，而是涉及法律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维持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对于某一特定的存在或事物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是任何“内在”于这个存在或事物并且“表达[它的]发展”的法律基于这个原因，巴枯宁可以解释“每个事物都包含它自己的规律，也就是说，它自身的发展、存在和行动的特定方式[原文强调]。”人们所说的“压迫性”，是指在某一特定时刻某一特定的存在或事物之外的任何法律，这些法律服从或服从于某一特定时刻之外的命令。为了构建一个一些人的自由乘以另一些人的自由的世界，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263。

C urdery, “ Hourra!! or the revolution by les cosaques,”325。

对于巴枯宁文本的一个相当不同的解释，见爱德华多科伦坡，“无政府主义，社会义务和服从的义务”，第2部分(1998年夏)：83-117。

巴枯宁，“思考哲学”，uvres, 3:352- 354。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的法则在一个更强大的存在中变成了另一些人的法则，授权其组成部分去做他们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计划(见单子、平等和内在平面)。

社会(见集体)。

社会联系(见直接行动)。正如这个术语所指出的，社会联系是一种约束或束缚的形式，它使集体力量屈从于组成它们的外部秩序。以直接相遇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组合的名义，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反对任何联系。

社会爆炸(见无政府主义化学，伟大的夜晚，总罢工和反抗)。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短语，它的发明直接来源于行动的宣传和无政府主义者袭击的时代。许多年后，一本像《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温和的革命工团主义杂志竟然能够颂扬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让让·麦特龙感到惊讶是错误的。1907年，皮埃尔·蒙纳特(Pierre Monatte)将革命工团主义确定为该行动宣传的直接继承者，“因为无政府主义炸药的伟大声音已经消失了。”²如果在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话语中，直接行动取代了行动的宣传，如果呼吁进行“总的和起义的罢工”是为了传递化学的爆炸性力量，那么，这仅仅是自由意志主义计划的一个新的变形，其要素已经改变了地方和意义，而不是停止构成符号和现实、力量和思想、科学和政治的混合物(实际上是一种爆炸性的混合物)。正如这个词所指出的，社会爆炸逃避了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反抗扩展到广大人口阶层，打破了阶级关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一段时间内，正如俗语所说，“一切皆有可能”，直到社会关系的游戏恢复，重新牢固了社会爆炸曾短暂中断的纽带(见停工和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革命和总罢工的概念直接依赖于行动的宣传及其化学成分(见这些术语)。随着革命性的大罢工(大众想象中的伟大之夜)，无政府主义化学的现实和政治及社会意义仅仅被颠倒了。无政府主义炸药的革命意义在强烈的动员中被制造得足够物质化

无产阶级革命，1937年11月和1947年10月；见 Jean Maitron，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第1卷，起源于1914年(巴黎：f. Maspero，1975年)，259。

皮埃尔·蒙纳特(Pierre Monatte)，《工人生活》94(1913年8月)：235页。

集中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大罢工做准备。与此同时，其化学和爆炸性的现实负责赋予一项战略和一个项目以政治意义，其形式是社会“爆炸”，“一场来自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革命”，“突然爆发”就像“闪电”(Pelloutier, Griffuelhes)。正如 Fernand Pelloutier 所写，集体行动的“炸药”再一次取代了企图者的“个人诉诸于炸药”¹ 随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不再为社会革命发声，社会革命开始发声，取代了硝化甘油和雷式炸药的物理和化学话语。

社会革命(见《伟大的夜晚》和《总罢工》)。一项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计划，一时间取代了法国绝对君主制的毁灭所遗留下来的革命思想。在变成社会的过程中(与所谓的“社会问题”平行)，革命不再被认为是从国家、政治权力和权力机构的最高层次上进行的。相反，它是在社会关系中的——在阶级和差异、财产和正义、权力关系和结社方法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社会的一般秩序或平衡运作的任何领域——并以多种方式发生，通过一种全面(因为多种形式)的转变，取消了巨大的支配作用：上帝、国家和资本。社会革命是反对现有秩序的多样性起义的同义词，这种起义拒绝以任何方式被利用，成为解放历史的唯一主题，社会革命也不再仅仅被视为仅仅发生在“起义日”的群众运动，而是发生在革命的关头，尽管这种运动极为罕见，因为它们是短暂的。社会革命是在事物的核心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斗争而变得坚韧，经过解放力量的全面重组而变得强大，社会革命最终可以导致一场更广泛的、完全以其力量武装起来的战争。这场大火——前一天流行的想象中的“伟大之夜”——是一场所有人都发现自己发生了转变的大火，因为所有人都为这场转变运动做出了贡献，没有等级制度，没有战术和战略上的区别。社会革命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见 1849 年蒲鲁东在《人民之声》(La Voix du peuple)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社会革命的计划一直持续到 1914-1918 年的战争，特别是通过伟大的夜晚和大罢工的想法(见这些术语)，直到它

Fernand Pelloutier, “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联盟”，在没有上帝，没有主人：—

《无政府主义选集》，丹尼尔·格林，保罗·夏基译(爱丁堡：AK 出版社，2005)，409 页。

取而代之的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事领导人的欲望发明的新形式的政变。

团结(见单子)。这个概念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词汇来说很重要，用来表达，从内部的观点来看，将解放的集体力量相互联系起来的关系的质量。但是巴枯宁也用它来表达普遍因果关系的中性和普遍意义，或者是生命和自然的意义。在这个用法中，团结表示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现实所包含的所有存在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总体性，道家传统所说的“万物”。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是由于这种构成集体力量的关系的无限性质，因此也是由于它们能够在自己之间建立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团结”这个词在自由意志主义话语中的实际意义或主观意义表明，集体力量相互之间建立的关系具有某种解放性质——这种关系是通过斗争和选择，从大量其他可能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其中往往包括带有死亡和压迫的关系。

孤独(见我们朋友的朋友)。在他告别被红军镇压的马克诺维斯特起义时，与第一国际的号召相呼应(“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彼得·阿尔希诺夫发出了如下呼吁：“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看看你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真理，并自己认识到它：你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¹事实上，有些时刻——微小的或历史的、显而易见的或难以察觉的时刻——所有的交流、所有的联系都应该被拒绝(见中断)，以便在最深的孤独中寻求庇护：唯一一个可以重建呼唤他人的条件的地方，开启其他可能性的新联系的地方。正如西蒙顿所证明的那样，群体和个人之间建立的联系和沟通形式通常仅限于指挥和维持在主导秩序框架内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服从和外部性的纽带，使这些秩序所必需的作用和职能发挥作用，正如第三国际的情况一样。为了反对这些他称之为“个体间”的功能关系，西蒙顿提出了他称之为跨个体的关系。这些关系跨越个人和群体，呼吁其内部不能简化为目前将他们定义为个人和群体的东西，呼吁他们所包含的超越他们自身的东西，以革命可能性的表现形式，从而以新奇的形式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退隐到孤独的过程中——这种逃离所有贫穷的交流形式的过程中

Peter Arshinov 《马克诺维斯特运动史》261 页。

根据现有的秩序，从这个秩序的垄断强加的要求，帕斯卡能够理解，整个他的存在，基督是痛苦的，直到时间的结束，查拉图斯特拉可以“有一个宇宙之谜的预感和... ..与太阳说话，”发现不是“上帝的创造者”，而是“一个世界的存在，服从永恒的回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愿望可以重新出现在被征服和绝望的人们的心中，邀请他们再次反抗，重新结合。正如西蒙顿所写，“真正的跨个人关系只开始于孤独的另一面。”²“怎样才能建立一种分离的政治？”雅克·德里达问道。这是无政府主义试图回答的问题。

物种活动。尼采的概念(见塑性力)。

自发性(见自发性)。自发主义有两种含义之一，这取决于一个人指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逻辑(见这些术语)。自发主义在其内在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指的是一个存在在其自身资源的基础上独立行动和为自己行动的能力，在一个向外部的运动中，吸引它与其他力量联合，以便构成一个更强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发性是自由的同义词。工厂、地区或大学逐渐自我组织起来，组成协调机构、工会、理事会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表达的任何解放和起义情况，都符合这第一个含义。这种解放的自发性(参见这个术语)不应与外在的和专制的“自发性”相混淆，这种“自发性”指的是集体存在可以服从于他们以外的一般历史逻辑的方式。这第二个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其自发主义和自愿主义(见本术语)这两个方面特别发展出来的：作为历史规律科学的保存者，党以这些规律的名义使解放力量的总体服从它的独裁统治，就像教会以上帝的名义所做的那样(见决定论和决心论)。

自发性(行动的自发性)(见自由)。这是一个引以为傲的重要概念，允许我们思考集体生命的无限多样性，以及它们的复合特性赋予它们的共同维度。虽然最初只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以创造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形式，在对立面思考

西蒙顿，个体化心理与集体，154-156。

Ibid. 154.

德里达，《友谊的政治》，55。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样，自发性的概念就使得蒲鲁东能够在现存事物的整体性的背景下构想人类的行为：“活着的人类是一个群体，就像植物或水晶一样，但在更高的程度上比其他的群体要高。”² 由于这个原因，自发性——作为任何力量组合的结果——使得有可能把自由的概念扩展到所有生物：“自发性，在无组织的生物中，在最低程度上，在植物和动物中，在自由的名义下，在人类中获得了充分的自发性，只有这种自发性才试图把自己从一切宿命、客观或主观中解放出来，而且确实解放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蒲鲁东接近尼采，他希望把“感觉”、“思想”和“意志”延伸到无机世界，但他也邀请人们与查尔斯·皮尔斯、威廉·詹姆斯、a.n. 怀特海德等人进行比较，用大卫·r·格里芬的话来说，“一定程度的真正自由(自决)应归功于所有个人，包括非人类，每种类型的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由。”⁵

州政府。尼采对国家给出了两个最好的无政府主义定义。第一种是众所周知的：“国家是所有冷血怪物中最冷血的一种。它甚至冷冷地撒谎，这个谎言从它嘴里爬出来：‘我，国家，是人民[看到这个词]。然而，第二种说法无疑更加准确：‘国家是一只伪君子的猎犬；... 它喜欢用烟雾和咆哮来说话——使人相信... ..它是从事物的腹部说话的。”⁶

统计学(数学)(见手势，无政府主义化学，符号/标志)。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自命不凡和讽刺，一些历史学家无端地嘲弄了人民解放工人运动对数字和统计的天真和顽固的热情。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无视自由意志主义对语言的批判及其支配效应，以及大量的符号和表达模式，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通过这种批判来表达

在这一点上，参考安萨特、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141 和消极主义。

蒲鲁东，《进步哲学》，23(转：我自己的修改)。

《正义的骄傲》3:403。

关于这一点，特别是蒙特贝罗，尼采，权力的意志，97 和被动。

大卫 r 格里芬，“怀特海德和建构主义后现代哲学，”在 l'effet 怀特海德，174。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34,104。

《第一国际》，参见《卡尔·马克思，第一国际与统计》，《社会运动》6(1969): 51-84。关于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参见 Peter Schöttler 的《劳动力市场的诞生：十九世纪末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Paris: PUF, 1985)。

现存事物的力量和复杂性。继尼采和米歇尔德塞都之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压迫，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信任的话语和话语-话语，谎言和话语，试图固定和陷阱的现实在他们的网，包围在支配关系，他们都合理化和使之成为可能(见捕获和宣传的行为)。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工人阶级现实的复杂性、理论家试图加强他们的观点以及语言的修辞力量，劳工统计既是一种替代手段，也是一种辩论手段，可以平等地和共同地肯定工人阶级力量的总体，特别是当他们在第一国际组织内部联系在一起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论点，这些力量可以要求他们运动的协调当局将自己限制在一个仅仅是“通信和统计的邮箱”，并且可以相信，正如拉迪斯拉斯·米西罗维茨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统计将“把即将到来的社会从所有卡尔·马克思在现在和未来的智力暴政中解救出来”，通过创造可能的关系，“在没有计划者的情况下进行规划，在没有市场盲目机制的情况下进行自由交换”，通过“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将通过自发性 and 自由得到解决”¹

然而，把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解放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对数字和统计学的盲目崇拜是错误的(见功利主义)。随着力量、平衡、本能、欲望、组成、正义、可能性、集体理性等概念的出现，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吸引了大量其他表达模式：电化学、生物学、伦理学、哲学、宗教、化学(见无政府主义化学)。此外，它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数字和统计的局限性和危险性，正如1840年普劳登的评论所证明的那样，数学模型的狂热者，在哲学家和数学家安托万·奥古斯丁·古诺的一部著作上说：“m·古诺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证明财富、分配、占有和贫穷的不平等是在数学基础上运作的。这对我来说不是很有趣，我知道任何一种错误，任何判断或公平的偏差，只能在理性法则的条件下发生，这正是它隐藏自己的原因，但我知道的是，数学能否证明道德或不道德，条件不平等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毫无疑问，一个计算总是回答人们的问题：如果我必须有99股，当其他人除以100股时，计算将有助于调节我在股票上的利益

Mysyrowicz, 《卡尔·马克思，第一国际和统计》，73-74。

安托万·奥古斯丁·古诺，《富人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巴黎：l·阿歇特，1838)。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但是，不管我是否有权享有 99，那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停止(见一般罢工，事件，重复，不确定性和外部力量)。“我们已经停止了一切，我们有时间思考，这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停止了一切，我们在思考，这并不可悲)!”² 这个 1968 年 5 月的口号(即使它对“思考[反思]”的高估可能会受到质疑)恰当地表达了自由至上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停止[l'ar-rête]不应与法令[l'rété]相混淆，例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谈到死刑[停止死亡](见处决)。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证明的，我们的现实可以用“机器”来构想：机器之间的耦合，在这种耦合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的，每台机器“产生一个流”连接到另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或多或少地以混乱的方式“中断”它，产生一个新的流，而这个新的流本身又被中断，等等。³ 社会或欲望，我们实际存在的机械生产，因此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体，我们生活的组织(见这个术语)(包括吃、睡、生产、消费、移动、繁殖、军事化、爱)。但是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不断更新的序列中，我们因此“因为没有其他类型的组织或者根本没有组织而受到这种组织方式的折磨。”正如 Proudhon 所写，“人类不想被组织，不想被机械化。他的倾向是杂乱无章，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无论在哪里，他都会感觉到宿命论或机械化的重量。这就是作品，自由的功能。”⁵ 这种自由从哪里出现？在空隙和停顿中，当一个人梦想片刻或卷烟的时候。正是在从一个机器到另一个机器的过程中，从一个机器流动到一个机器中断的过程中，社会机器标志着大量的停顿或犹豫，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停顿或犹豫，这些停顿或犹豫让位于对另一个组织的渴望或任何组织的缺席。在人类生产的线性系列中，有一个“第三项”，即在“整个过程将重新开始”之前，“所有东西都停止了一会儿，所有东西都冻结在原地”正是在这种停顿中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见这个术语)：

Qtd. in Pierre Hauptmann, Proudhon: 他的生活和思想, 1809- 1849, 243.

Gébé, l'an 01(巴黎: l'association, 2014)。

《反俄狄浦斯: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海伦译

Lane, Mark Seem, and Robert Hurley (Minneapolis, MN: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1 et passim.

ibid. 8.

《正义的骄傲》3:422。

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 7 分。

例如，罢工仅限于一个服务机构或工作间，但也限于延伸到整个社会的罢工；或者，以更一般的方式，在这些多次停工中，通常很小，几乎感觉不到，当一个人暂停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系列动作或当一个人停下来——总是——买烟时。但是这些在所有反抗之前的罢工，没有任何消极的一面。因此，自由意志主义的罢工不同于克劳德·勒福使用不确定性概念的方式(见这个术语)。自由意志主义的罢工不能与纯粹的“偶然性”相提并论，“偶然性”是一个可以插入“选择”和“发明”另一件事物的“间隙”。它不能被比作一个“空”的地方，相反，它指的是充足，指的是存在的无限力量(见外部力量)——这种力量，在 Tarde、Proudhon 或 Simondon 之后，属于一种与 Lefort (或者，用另一种方式，Castoriadis)所描绘的思想和行动相当不同的传统。²相反，因为它们表达了存在的无限力量，表达了它“能够”做的事情，自由意志主义的停顿包含了一切可能性(见这个术语)。从历史上看，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以最广泛的方式考虑这些问题，通过工人阶级独特的大罢工口号(见这一术语)，当“一切”确实停止时；当“一切”停止时，社会行为者一度认识到他们集体力量的表现和来源，并在那里对现有的一切进行全面重组。

主体(革命主体)(见主体性、选择性、个性化、身体性、力量性、外在力量性)。什么是主体？什么是生命？它是一种力量。“无政府主义者的主题与这个概念在现代西方传统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见主观性)、它的规模差异和它的不断变化(根据事件和集体力量之间的联系方式)，但也是因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概念所表示的力量和可能性与这种力量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时刻产生的集体存在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差异。尤其是吉尔伯特·西蒙顿，他让我们认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主体是一种最精确的解放力量。对于西蒙顿来说，“主体不仅仅是个人。”换句话说，它不是

关于即使是最微小的罢工的“停止”的性质，参考科尔森，“侦察集体和山在奇点，”55 - 77。

关于勒福特和卡斯托利亚迪令读者惊讶的“谜团”和“挑战”，他们忽略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咆哮，参见德维特的《社会的深渊》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经济学》，2864[184]。

见西蒙顿，个性化的心灵和集体。

同上。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在给定的框架内，只在这个框架内，认同构成个人的职能、身份或教派和角色(家庭、专业、种族、宗教、个人等)。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力量的总和——这种力量是每个社会秩序都渴望减少、固定和支配的。它包含了这个秩序的另一一个(参见其他和类比)，它的外部(参见外部的力量)，一个 Gabriel Tarde 总结如下的概念：“存在是将无限整合到有限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勒兹可以肯定，主体被“剥夺了内在性”，因为它的内在只是外在的一个折叠——一个“外在的内在和反向的”折叠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体与那些呼吁主体概念并声称以此概念为基础的宏大理论截然不同，例如语言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理论。

事实上，如果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主体完全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就不依赖于语言，而语言是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见行为、行动、集体理性和符号/标志的宣传)。意义产生于可能的力量之间的差异，有限的无限性，和个性化的形式存在于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顺序，并根据这个顺序。意义，在艺术中，就像在政治或爱情中一样，总是先于那些声称要把它编纂成文字，把它封闭起来，并且像上帝一样，要创造它，使我们相信它依赖于这种语言的语言。5. 意义来自于存在的力量，来自于无政府状态，“与主体所定义的个性相关联的外表”(参见集体理性)

Gabriel Tarde qtd, in Milet, Gabriel Tarde et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57。

库姆斯，吉尔伯特西蒙顿和跨个体的哲学 41; 吉尔德勒兹 qtd。

西蒙顿，个体化精神与集体，199。

从变形虫到人类，仅仅谈到生物，每种集体力量对周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不是所有的环境对它来说都是一样的(每个环境或多或少都是好或坏)。这种对集体生物的观点提供了一种“事物的意义”，一种对现实内在的意义，同时把它们构成主体。关于这一切，参考卡尔·波普尔，伊莎贝尔·斯泰格斯在《现代科学的发明》中的文章。丹尼尔·w·史密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0)，44 et passim。

“如果没有意义来支持语言，就不会有语言”(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200)。

ibid. 关于这个问题对阿尔托思想的重要性，参见诺伯特·班迪尔的《超现实主义社会学》(1924-1929)(巴黎: 争论, 1999)，第 207 页和被动。

Soulages 可以解释为“绘画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我宁愿说，不是说它传递了一种意义，而是说它只产生了意义。它给观众带来的意义取决于观众是谁。”¹

就弗洛伊德而言，如果他通过无意识、力量、力量以及人类所隐藏的无形的、隐藏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概念来感知，那么他就错了，他把这种力量简化为个人的心灵，把人类包围在令他们感到厌恶的孤独之中，并把他们交给牧师，而牧师声称在他们的痛苦中谋生。他尤其错误地将这一治疗过程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是无限长的)与社会在某一特定时刻所界定和指导的个人确定为一致。如果说精神病理或“心理”痛苦与前个人有关，与任何存在所包含的外部力量有关，那正是因为这种外部力量构成了个人主体性的基础，无法在现有秩序所限制的个人监狱(心理和社会)之外表达自己，而不能形成与限制其权力的秩序相异的其他主体性。正如吉尔伯特·西蒙顿所写，“心理病理学……出现在缺乏对变性个体的发现时，也就是说，当主体与个体之间固有的自然电荷在其他主体中不能遇到其他自然电荷时，这些自然电荷就可以形成一个个体意义世界。”²

主体性(见亲密的、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存在、个体化和主体)。无政府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激进的主体主义。³无政府主义者的主体性与现代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无政府主义者的主体性很满足于携带身分证，扮演角色，思考思想，以及成为社会要求服从其法律的人具备的一切东西。与自由至上的运动相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观性与“个人”也没有多大关系

现代主题的另一面。无政府主义者的主体性指的是一个更大的特征：它是多元化的，包括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人和非人的因素的多样性，以及在其形式和范围的不断变化中的多元化。传统上或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区分了三种广泛的主观性类型，尽管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排除其他类型的可能性：

个人主义的主体性，斯蒂纳是第一个和主要的理论家。这种个人主义经常被混淆，错误地，与现代

世界报(1991年9月8日)。

西蒙顿，个体化精神与集体，203。

关于这一点，参见丹尼尔·科尔森，《自由文化：格勒诺布尔学术会议学报》，1996年3月(里昂：

ACL，1997)，149-162。

个人主义。然而，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个体——远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广义的模型中与其他完全相似的个体一起定义它的存在——强烈地肯定了它的绝对奇异性，从而将自由意志主体性的不可还原性扩展到所有人类可能性的范围；

一种叫做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亲主体性(参见这个术语)，在特定的时刻，个性将他们独特的力量(他们的气质、品味、敏感性、倾向、欲望)联系在一起。因此，通过“关系越来越亲密[参见本术语]和复杂”(Malatesta)，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和更强的主观性，一个同样奇特的结果(Proudhon 和 Malatesta; 参见本术语)，反过来又能够加入其他类似或不同的主观性，“以至于这种联系延伸到所有人类和生活的所有方面”(Malatesta)；

一种集体主体性，从其规模的角度来看甚至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其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与劳工和工团主义运动有关。工会、工业联合会、地方工会联合会、联合会(按行业或工业)、联合会、国际组织各自构成了许多主观性，每一个主观性都不同于其他主观性，也不同于自身，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任何特定时刻。这些差异不仅来自于人类的奇点，而且来自于物质上的奇点(木头、煤、铁、纸、铲子、电锤、刷子、弓、速度、季节等)。这些集体的个人或主体性，可以与任何其他现实层面(性别、家庭关系、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艺术、阶级、年龄、革命时期的“群众”、革命情况下的他们自己等)产生的无限多的其他主体性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体性，在其所有的多样性中，表达了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要求的无政府状态。

Subversion (参见停止)。这是一个古老的犯罪学术语，它恰当地表达了一个国家如何习惯于在权力范围内定位它的敌人和对手

这就是 Rene Schérer 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奇点”，这意味着，甚至在 Stirner 一书中，所有“其他人”都构成了“他自己的奇点球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ne Schérer, *Regards sur Deleuze* [Paris: Kimé, 1998], 124)。

埃里克·马拉泰斯塔，《无政府状态》，弗农·理查兹译(伦敦: 自由出版社, 1994)，28。

当面临多种多样和令人不安的威胁时，它本身就会痴迷于将这些威胁本地化(见地点/地点和地方主义)，将其置于一个机构、一个政党、一个领土、一套制服之中——任何可以明确界定和标记的东西，任何可以与之抗争的东西，但也可以与之做出妥协、签订条约和结盟(军事、经济、婚姻等等)的东西。颠覆既不是秩序的另一面——它隐藏的、邪恶的一面——也不仅仅是颠覆，这与权威的幻想相反，也与许多确保其长久存在的神话以及颠覆这个词的词源相反。如果颠覆行为在权力的注视下常常显得无形，如果它能显得如此具有威胁性，那么首先，这是因为它在一个与权力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运作，其规模也与权力截然不同。它在其法典和法律的边缘运作，在构成其秩序的最小关系的总体内，在当权者的身体和灵魂深处，在它总是威胁要炸毁并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可能性的权力机构内运作。

痛苦(见暗示)。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对痛苦麻木不仁，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还是他人的痛苦(特别是通过怜悯之情)，只要这种感觉不受道德和宗教的托词和伪造的影响。但是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解放行动的外在理由(见这个术语)，这种行动会立即转变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见功利主义)。由于痛苦完全是消极的，是丧失权力的症状，因此，如果痛苦不能(通常如此)立即转变为反抗和创造性的肯定，痛苦——即使是那些反抗和拒绝痛苦的人直接经历的痛苦——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解放的来源。

超级富足(见权力)。伯格森(Bergson)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用来描述自然力量的一个概念是：“尽管我们的智力以其节俭的习惯将效果想象成与其原因严格成比例的，但大自然在其铺张浪费中，对原因的投入远远超过产生效果所需要的。虽然我们的座右铭是必要的，但是大自然的座右铭是不必要的——太多的这个，太多的那个，太多的一切。在詹姆斯看来，现实是多余和过剩的。”¹

符号(符号)(见表达、表示、行为的通过、对象和集体原因)。Proudhon 最清楚地表达了符号和符号的模糊性。

¹ Bergson, *The Creative Mind*, 249 伯格森, 《创造性思维》, 249 页。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符号在“互惠”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是各种集体存在之间可以维持的。1 通过这些互惠和交换的关系(经济的、浪漫的、知识的等等)，并通过他们为此目的而共享的符号(金钱、语言、理论、推理、艺术和模仿)，集体存在不仅有可能增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通过联合，产生更大的集体存在，这些集体存在具有集体理性(见这个术语)，并且能够在符号和语言领域“翻译”这些集体存在所包含的“行动方式”。但是，这种积极的力量迹象必然要求他们永远不停止表达(见这个术语)的力量和组合的力量，他们帮助使成为可能。因此，在“集体理性”以“具体逻辑”的形式“内在于集体存在”的关系中，自由意志主义行动和民族主义行动实现了“同时具体化和意义化”³

另一方面，符号和标志的力量和危险恰恰在于它们能够用自己来代替它们应该表达的现实，取而代之，并把自己变成代表(见这些术语)，从而使自己凌驾于集体力量之上，成为牧师、领导人和财主手中的超然力量。然后，符号和符号被转化为“陷阱”，4 被转化为“捕获的老鼠”⁵。根据蒲鲁东的公式，作为与资本和国家并列的“第三种力量”，象征性力量通过赋予人类创造的东西以绝对性，来完成压迫的工作并使剥夺合法化

综合，综合(平台，平台主义)。一个古老的，无用的组织和辩论的区别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某些特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这是一个时刻

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156。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看到，西蒙顿，l'individual 及其物理生物学基因，特别是 62。

Ansart, Marx et l'anarchy, 293 安萨特，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293。

同上，290,275,271。

看看路易斯·马林(Louis Marin)的《午夜出版社》(Paris: les editions of midnight, 1978)

注: 本文节选译为《与太阳王共同书写历史: 叙事的陷阱》。理查德·米勒和爱德华·施奈德，《论迹象》，编辑。马歇尔·布朗斯基[巴尔的摩，医学博士: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267-288。]

参见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

“骄傲，权力和自由”

除了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在社会和革命舞台上被永久地消灭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保加利亚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镇压，俄罗斯的 bolshevism 的胜利，法国、阿根廷、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会运动的普遍崩溃... 以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持久霸权)。在与所有实践隔绝的情况下，“平台主义者”和“综合主义者”争论谁更清楚什么组织适合无政府主义(无论无政府主义后来失去了什么)：它是应该围绕一个严格和必要的理论和战术方案(“平台”，大致建立在刚刚在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模式的基础上)统一，还是围绕一个协商一致和折衷的理论“综合”因为无政府主义呼吁联邦主义以及集体存在和观点的多样性，所以它既拒绝平台也拒绝综合。在这两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参考相反，无政府主义从来不在广泛思想的“综合”或在狭隘和排斥的“平台”内统一的方案和“意见”或“思想”联邦主义和观点的多样性建立在真实、实际、具体的力量和运动的基础上(妇女反对和组织自己反对男性压迫、雇员反对和组织自己反对经济剥削、邻里或学生团体反对法西斯思想和做法、文化少数群体反对统治或殖民化、自我管理试验、艺术创作等)。由于这些真正的力量和运动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性和单一性，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根据定义)被简化为任何“综合”或“平台”，这些“综合”或“平台”旨在将它们的差异粘合在一起，界定或排列它们的作用和政治意义，将它们简化为最小公分母，或使它们服从组织、战术和战略的需要。因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纲领和综合都是与实践的现实相对立的，因此倾向于破坏蒲鲁东和巴枯宁所构想的、在西班牙或任何自由至上的运动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真正发展的开始的地方所实行的联邦唯物主义原则。事实上，只有当它们是真的力量和真正的自由至上的运动时，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才能同时 1)彼此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现实也是如此，任何认同无政府主义的人都应该感到高兴)，2)让这些差异和矛盾发挥作用，将它们联系起来，分离出来，评估它们的所有后果。这种评估不是在思想、方案和旗帜的天堂里进行的——在那里，斗争的对象只不过是权力，有权利排斥和逐出他人——而是在现实和真正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视角目睹这些问题，每天都可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经历、分析和评估这些问题。

T

气质(特质)(见感性、构成和亲和力)。古希腊医学中的一个古老的化学概念，经常被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的迷思中，以表明每个存在的独特性，并强调需要在各种关联方法中考虑到这种独特性。每一个集体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因为它是受其他集体存在影响的特定力量 and 能力的原始组成部分，并通过它与他们建立的关系影响他们。无政府主义把气质的概念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的唯一组成部分，这个集体存在本身就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因此是相对持久的)，无政府主义在它构想现实的无休止的交往和分离中引入了某种稳定性。但是，由于气质是一种混合物、一种组合物、一种适当的个人炼金术，所以不应该把它(有时候是这样的)看作是一种决定论，或者是一种注定的、无形的命运，它需要采取行动(公平)，但既不能被摧毁，也不能重新组合(重新公平)。气质不位于构成、分解和重构的不断运动之外，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这种运动无一例外地影响着所有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只是一个结果(参见这个术语)。1 蒲鲁东和巴枯宁本身可以作为不同性情的例子，正如他们经历 1848 年革命事件的不同方式所证明的那样(参见外部力量)。

张力(见力量和一的平衡)。一个重要的概念，从电化学借用来描述自由意志主义方法的本质

关于《斯宾诺莎: 力量与本体论》中的气质概念，参见弗朗索瓦·祖拉比希维利的《斯宾诺莎: 力量与本体论》。Myrian Revault d'allones 和 Hadi Rizk (Paris: Kimé, 1994)。

: 联想。如果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是指一种秩序的能力，这种秩序基于多重性来表达外部力量而不至于死亡，那么 Proudhon 并不认为这种能力仅仅存在于某一特定时刻碰巧存在的集体存在：“个人”、家庭、工厂、工业公司、工会、合作社、贸易、公社、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等等。他发现这种能力并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所能产生和依赖的社团，以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他还设想了一种似乎更为抽象或脱离这些存在和主体的形式：基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些力量以同样奇特的方式标志着这些存在和力量的存在和力量，它们穿越所有这些存在和力量，使它们的能力两极分化。他根据电池极点的模型进行理论化，1 以自主的、矛盾的或对立的力的形式存在，努力只是为了认识它们的相互极性，彼此结合，找到平衡，从而产生最大的能量和意义。这种矛盾和张力的概念，多重和“不同”作为存在的条件及其能力，也可能与西蒙顿批判和完全反思信息和“良好形式”概念的方式有关 2 这种骄傲的霍尼亚式的“张力”在两种力量之间，它们是完全自主的、相互矛盾的，彼此之间截然不同，却又矛盾地富有亲和力，它们从它们的效果和它们的能力中汲取力量，这种能力不是解决反对它们的东西，而是选择和系列化“好的”矛盾，通过类似的模型选择(电化学)，与西蒙顿所说的“信息张力”相对应。在这个概念中，由于“定性指的是潜在的差异”，所以能量的可能数量既取决于相互对立的“对立术语”的接近程度，也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的“良好”隔离程度。3 在一个 Proudhon 可能认可的模式中，因此，与 Simondon 一起构想一种“良好的形式”(即现有事物的最佳安排; 见可能)是可能的，而不是作为一种相似事物与相似事物的概率相遇，在这种相遇中，“最好的形式是... .. 需要最少量信息的那种”，而是作为不同事物与不同事物之间的有序张力。这将是稳定和明确的有序的存在，在他们的共性和兼容性方面，而是一个张力的信息，能够“结构化一个领域，通过它传播，命令它”，“动画和结构化... 越来越多

一个普鲁东从未停止尝试去理解和灌输到他的整个作品中的模型。

西蒙顿，1' 个性化、心理和集体。

Ibid. 52.

同上。

各种各样的领域。”¹好的形式，根据 Simondon (或积极的无政府状态，根据 Proudhon)，因此将是“包含一个特定的领域，即，两个对立的，相互矛盾的术语的分离，尽管如此，在同一时间，在一个互惠的关系，”或更好地，“多个二进制协调彼此，即，已经是一个网络，一个模式，一个东西和多个东西在同一时间”：“在一个联合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蒙顿非常接近蒲鲁东和 150 年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他将帮助给德勒兹提出的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及其与统一的联系赋予意义和内容：“无政府状态和统一是一回事，不是一个人的统一，而是一个更奇怪的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³

恐怖主义(见无政府主义化学反应，行为宣传和行为通道)。恐怖主义被错误地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宣传的行为。世纪之交的无政府主义暗杀和爆炸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六点不同：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所表明的那样，“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公众舆论产生恐惧效应，从而勒索政治领导人，以获得政治利益。与此相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行为(即使他们没有因为直接威胁他们而“使领导人发抖”的快感而退缩)，表现出一种蔓延的意愿，在这种意愿中，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目标除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标，在这种意愿中，行为本身就是其预期的效果。它是对反抗的邀请和煽动，是引发类似于其自身物质和象征现实的普遍爆炸的触发器，它通过模仿、延伸和传染的简单效果，以未来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活跃少数派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根据 1888 年《开放思想报》的宣言：“你们每天都被剥削和抢劫；你们创造了所有的社会财富；你们厌倦了这种痛苦和堕落的生活，反抗吧！工作的囚徒，烧掉工业监狱！勒死那个奴隶主！打倒逮捕你的警察！唾弃那些谴责你的魔法师！绞死那些在你手头拮据的时候把你扔到街上的房东！营房的囚犯，用你的刺刀刺穿你上司的身体！... 反抗万岁！”⁴

Ibid. 54 和 53。

Ibid. 53.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 页。

《开放的想法》23(1888 年 2 月 11-18 日)，qtd, Maitron, 《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91。

恐怖主义行动是由一个组织、一个秘密机构、一个有自己领导人的小型国家机构、宣传部门、等级制度和指挥结构、突击队员和追随者、间谍和同行者、叛徒和告密者实施的。正如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所说,这些袭击严格来说是个人行为,它们完全来自一个充满反抗欲望的“超饱和”环境,没有领导人或战略家,没有组织总体规划,因此,即使事后证明,行为的效果与行为本身相混淆,其原因或决心(见这个术语)也完全包含在行为的实施中。

恐怖主义行动是一种及时计划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袭击的时间、日期和严重程度,以及为利用或衡量其影响而进行的休战和谈判,都属于单调和可预见的战术和战略设想,由僵化的武力政治关系规则决定。与此相反,行为的宣传构成了行为的通道,一种自发的行动,一种立即改造世界的意志的突然破裂,只有模仿的效果才能使一个及时制定的协调一致的计划出现。

恐怖主义行动是在暗中进行的,行动者小心翼翼地逃避其攻击的影响,并为自己消除任何危险。与此相反,攻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提交人直接将自己的生活暴露于攻击本身或其司法后果及其不可避免的影响之下

恐怖主义意味着一种机械的、工具化的因果链——从秘密领导人到他们渴望(而且往往确实成为)的未来国家元首,通过恐怖主义组织的各级,攻击本身,它们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有关国家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不可避免地进行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所涉及的领土或法律重新分配或分割。恐怖袭击是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独特行为,没有分裂或外部性

目前只有一定数量的具有强烈宗教含义的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在巴勒斯坦,似乎表现出这一层面——“无私的”、绝望的或盲目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进行宣传,尽管有无数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意愿和实施自杀性爆炸,因为有无数种方式来表达任何事物的意愿和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虽然出于宗教原因而采取的行动无疑完全有理由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截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它似乎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

他们的作者在一瞬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动员起来的解放美德。

恐怖主义行动往往具有歧视性: 几乎所有恐怖主义行动都与一个独特的宗教或民族团体(科西嘉人、巴斯克人、新教徒、爱尔兰人、泰米尔人、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巴勒斯坦人、布雷顿人等)有联系, 并将敌对团体的人作为其目标, 而敌对团体唯一的不良行为是由其他具有环境支配地位的宗教或民族团体来界定的。与此相反, 这些攻击是拒绝任何外部分裂的攻击, 这些攻击针对的是现有的一切(正确或错误地, 就所使用的暴力类型而言), 以便完全重新组合它, 针对构成它的无限关系和可能性的内部。

理论/实践(见中间事物, 人工/智力, 集体理性, 和共同的概念)。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中, 社会现实包含了无限可能的不同的现实层面(参见这个术语): 在特定层面上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临时安排(例如, 战争、劳动、性、园艺、工团主义等)。这些安排或现实层面, 就像组成它们的存在和力量一样, 都具有两个维度或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德勒兹的词汇中, 是一个话语方面——形式、表达和符号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内容、身体、力量和欲望的机械方面(见集体理性)。但是, 这些安排或实相层面也像任何集体存在一样, 在更广泛的安排中联系或结合,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相对于另一个占据话语维度或机械维度。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任何实践都有其话语方面, 任何理论都有其机械方面(参见手势和这个概念在数学中的作用)。然而, 由于构成它们的东西, 理论和实践也可以作为一个特定的存在一起发挥作用(同时不失去它们的双重象征性和机械性维度), 在这个存在中, 通过西蒙顿称之为“类比”的过程, 一些特定的理论安排成为与之相关的某些特定实践安排的话语方面, 而这种特定的实践安排本身占据着机械性维度。在那个特定的联想中, 在它所处的水平上(就像在任何其他联想中一样, 不管它有多小), 话语方面和机械方面之间的时间对齐并不是完全自动的

话语方面和机械方面之间缺乏自动的一致性, 并不违背这样一种观点, 即在特定时刻存在的任何存在或集体安排总是具有这两个维度, 并且它们与其中一个维度不可分离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这种相互排列一方面要求相关力量作出大量的自愿努力和实验——正如德勒兹所强调的那样，这是一个直接构成“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不断受制于实现这种关系所必需的条件，无论有利与否。(关于这种同步的不确定性以及从解放的角度看它的影响，参见常见的概念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自由至上的运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无政府状态的短暂历史的矛盾可以这样表述：在普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在社会和政治现实中，特别是在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找到明确和重要的实践必然结果的时期，这些运动和实践——不仅或甚至主要是由于它们之间的时间差距，而且由于许多因素(除其他外，见人工/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无法使这些理论成为它们自己的理论，无法履行它们的诺言，无法在它们中认识到自己，除非以圣徒或外在的方式(见这些术语)。由于这种无能，这些运动和实践不仅被剥夺了它们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自由至上的运动和实践通过它们建立和传播的自己的现实的形象，使它们在今后的时代中部分地变得不可理解，而在它们消失之后，它们又变成了不同准确性的单纯的外在表现。正如这本词典所展示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成功地为自己装备了相当有效的理论和理论，仅引用法国的例子(见直接行动，社会爆炸，主人/奴隶，焦点，运动，但也

: 另一个。这种不可分离性只有在连续和无休止的联想和分离过程(参见给定的时刻、运动和成为)的当下时刻才成立，通过这个过程，力量和陈述、内容和形式、身体和表达、欲望和符号之间的联系的本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建。

德勒兹，斯宾诺莎: 实践哲学，126。

关于实践与理论、真实运动与表现之间的这种历史性转变，参见丹尼尔·科尔森，《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 圣埃蒂安，1920-1925》(里昂: ACL, 1986)。关于将自由至上的运动历史转变为图像(圣像或怀旧肖像; 参见圣像)的风险，这些图像从根本上掩盖了这场运动的现实，产生的实践与它是什么和它可能是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参见米歇尔·昂弗雷在《彗星群岛》(巴黎: Grasset, 2001)中的严厉批评。

在这个词典中，理论家的重要性，如 Pouget，Griffuelhes，或 Pelloutier)。虽然这种理论表达方式与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文本和思想并非毫无关系，尽管是弥漫性和间接性的，但它并没有发现——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本身方面(除了一些伟大的历史文本 2)——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哲学推论，即这两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在 19 世纪如此有力地开创了无政府主义

事物(参见对象)。巴枯宁经常使用这个概念来表示任何集体存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在加布里埃尔·塔德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个立场，对他来说，“一切(从分子到人类现实，包括植物、动物和其他所有‘现象’)都是一个社会”，但在怀特黑德也是如此，对他来说，“事物”、“存在”和“实体”是同义词，对他来说，任何“普通的物质对象... .. 都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甚至一块“石头”也是“一个由暴力骚动中的分子组成的社会”⁵

时间(见混沌，内在，目的/手段，塑性力量，运动，暗示，给定的时刻，传统和永恒的回归)。

与自己分离。任何集体存在都比自身更重要(比自我和个体更重要)，因为它自身包含了所存在事物的整体性(见单子)。在这个意义上，它拥有包含其他可能性的主观性(见主体)。然而，任何主导的(因此是部分的)或秩序都要求它所包含的集体存在仅仅是这个秩序中的他们(一个角色，一个功能，一个地方，一个身份)。因此，它将他们与他们的能力、他们所包含的权力区分开来(见外部权力)。

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所有能做的事情/去到能力的极限。

对于这种扩散的评价，参见所有 120 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评论《工人生活》。

特别是 Voline (v.m. Eichenbaum)，The Unknown Revolution and 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 documents et souvenirs (1864- 1878)。

然而，恰恰相反，与这种普遍缺乏形成对比的是，看看加斯顿·勒瓦尔的著作，他是 20 世纪上半叶为数不多的真正读过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之一。特别是 Gaston Leval La Pensée constructive de Bakounine (Paris: Spartacus, 1976)。

塔德，单子学和社会学，28。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21,35,78 Whitehead, 过程与现实，21,35,78。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冒着生命危险(见战争/好战和外部力量)。达到个人能力的极限，即超越个人能力的极限，直到个人内在生命的尽头，因为他知道，根据德勒兹的表述，这种生命也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一个人总是冒着失去目前构成我们的个性的风险(参见其他无政府状态)。

去邮局! (见罪人)。

工具/武器(见物体，手势，劳动/工作和战争)。每一个物体，在其平淡的意义和当下的用途背后，都有其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其作为集体安排的双重性质，即形式和内容、意义和力量(见集体理性)，以及它的起源和历史、产生它的力量和它仍然包含的力量。

从这种产生意义和可能性的原始力量(Daoism 中“万物”的来源)，从这种无限的力量，在符号和文字之下，物体找到了它们所包含的力量，它们是一种表现形式，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通过两种方式重新开始:

首先，通过斗争和实践: 例如，通过行动和直接行动进行宣传(见这些术语); 通过回到行动，回到极度集中的行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某一瞬间，试图发现人类现在和能够发现的所有意义和力量; 通过不断重复的运动来做到这一点，这种运动必须在回归原始力量的同时，拒绝压迫性的标志自治(以及这种做法所允许的各种“专制主义”)，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部署人类所拥有的力量; 一般而言，这样做是通过一种破裂和毁灭的暴力运动，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回归原始力量的方式如何总是带着它曾经产生并从未停止产生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全部，那么这种回归的人的层面仍然是不可理解的(见永恒的回归);

其次，通过理论，当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从普鲁东到德勒兹，努力在一个系谱和类比的方式(西蒙顿)，把握的原始意义和权力的关系之间的客体 and 符号，内容和形式，意义和力量。普劳顿寻求这种起源的复苏，在那里符号和力量合并，首先是在劳动和工具中，原始人类凭借这些工具可以最终脱离“自然状态”，拥有目标

1 Deleuze, Foucault, 95 et passim 德勒兹，福柯，95 等。

外部代码能够“启动”他们，“一步一步地引导他们”，“停止他们”在“关系”的每个“术语”，他们的“行为”最初表达得如此糟糕，以一种“直觉”的方式，以没有“反思”的“图像”的形式普劳顿认为，“原始人在自发行为中遵循的内在视觉”，这个栖居在他内心的“梦”，在工业的“机器”和“工具”中发现了人类“直觉”的客观必然结果，“系列”能够“与心灵对话”²在这个意义上，对蒲鲁东来说，“所有工作的工具都是分析工具”：

压缩、夹紧、支撑、筑坝、外壳的工具；
握持工具；
打击乐器；
穿刺说明书[原文]；
分割或部分的工具；
运动器械；
转向工具等

对普劳顿来说，这些人类工业的“工具”起初可能是“粗糙的”和“原始的”，但它们不仅仅是表面上抽象的语言或数学符号的粗糙、过时的祖先。⁶就像它们通过客观化它们所包含的关系而加倍的“行为”一样，工具总是在调动人类的潜力和能力，以准确理解现存的规律。普劳顿提议在理论上重振这一固有的重要角色，从而在一场与无政府主义回归行动平行的运动中为工人们辩护

参见 Proudhon, *De la Justice*, 3:78,72 and 74。“这些是第一批工业机器，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要素或劳动要素”(73)。

Ibid. 74 和 78。

同上。

我们在这里保留了 Rivière 版本的措辞，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它以印刷错植的形式正确地翻译了蒲鲁东的思想，因为对他来说，这个工具确实是人类智力的“导师”，“来自外部的导师”(同上)。78)。

同上。

关于“发明”的“文字符号和计算”、“纯数学”和“理解范畴”，从“分解”的产物中人类的工业，参见同上。77.关于工具的符号维度，伴随着语言的符号维度，参见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trans. Anna Bostock Be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和 *l'homme et la matière: evolution and technologies* (Paris: Albin Michel, 1971)。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斗争和解放的意志。他试图“颠覆”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从“自下而上”，培育一种“新的哲学形式”，在这种哲学形式中，“工人，文明的退化的农奴，”将再次成为“思想的作者和君主，哲学和神学的裁判。”作为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关系以及与万物原理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劳动工具”，如文学的“字母”、数学的“数字”或音乐的“音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革命性的“字母表”，一种“工业字母表”，蒲鲁东以其一贯的大胆，立即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表述：“工人字母表”²

因此，蒲鲁东试图为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斗争和实践提供一个劳动领域内部的理论和迹象谱系，这可以证明劳动反对资本的肯定，以及通过类推，逐渐反对所有绝对权力(国家、教会等)的肯定，即一个完全解放的世界的肯定。但是，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解放的目的来说，这种工业理论和这种标志谱系是否过于狭隘了呢？工作及其机器、工具和产品与特定世界和象征系统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才能真正说明工人斗争所必需的实践和愿望？正如蒲鲁东告诉我们的那样，从劳动中产生的标志的谱系——作为“知识的载体和工具”，“在人类思想的档案中”——在什么方面使得有可能解释通过行为和直接行动(例如，表达回归自由意志主义项目试图发现其力量和新奇性的原始权力)回归事实和宣传行为？(参见塑料力更糟糕的是，除了意图取代的语言之外，标志和劳动的“分析”力量难道不是与工人起义旨在谴责和击败的奴役关系密切吗？人类活动的其他客观产物、其他对象、其他现实层面(参见本术语)能否比工具和劳动更好地表达人类的解放力量，作为构成人类解放力量的关系的表达？这些就是 Proudhon 和 Deleuze 以及 Guattari 试图回答的问题

《正义的骄傲》3:73 和 75。

工人字母表: a 杆或杠杆(桩、杆、柱、桩、桩、尖桩); b 弯曲、弯曲杆(钩、钉、钥匙、梭子、夹子、锚、槓、鱼叉); c 握把(剪刀、钳子、两个钩子的组合); d 邦德(最初由一个可弯曲的杆组成，滚动着，物体;- 钢丝、绳索、链条); e 锤(大棒、锤子、岩钉、连枷、磨石); f 尖(长矛、长矛、标枪、箭头、飞镖、针等); g 角[等]。75-76).

“我现在说，在人类心灵的档案中，有些东西比一切自古以来就充当知识的载体和工具的标志更早”(Proudhon, *De la Justice*, 3:73)。

把工作和战争、工具和武器结合在一起，作为人类活动两个历史上重要的现实层面的表达。

从 Proudhonian 符号学的角度来看，1 个武器和工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客观化自己成为外部的“工具”，固定和孤立的“对象”，具体化自己的意义，这可以安排分类，命名和零售货架。然而，正如蒲鲁东所看到的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对象化及其赋予的象征性智慧，处于与世界截然不同的运动和关系之中。这在四个方面都是正确的：

“工作是一种遭遇阻力的动力事业”，“在外部运作”，“工具化”和客观化的外部，用骄傲的奥尼亚语来说，就是“引导”和“启动”人类智能。“内省”和“内省”，这个工具是由它与一个外部事物的关系决定的，人类通过劳动，试图收集到自己和适当的。2“被动”和“惰性”，不同的一致性，这个事物“抗拒”这种“抵抗-一致性”

具体到每个场合，分开，分开，连接，捆绑，网状，切割，锻造成形，加固

决定了所使用的工具的含义、形式和阻力。武器涉及到一个相当不同的运动。类似战争的活动不再涉及收集外部材料以便适当使用、克服和选择抵抗或分开、解开和解开它们以便通过获得与这一目标和这种关系相对应的工具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结合、捆绑或联系起来。在战争中，就像在狩猎中一样(至少这两种活动是传统上实行的)，外部不是一种惰性和被动的物质。人或动物的“他者”，在它的意义来源于现实的平面上，就是一个“他者”，一个同样具有运动、意志和欲望的组合物。它是一种“移动的”、“主动的”其他武器，可以被克服或驯服(当它没有被杀死时)，就像大力神与克里特公牛或 Ceryneia 的后面一样，正如 Proudhon 在《La Guerre et La Paix》中所描述的那样。“投射的”在反击和格挡中，在移动中是孤独的，这种武器不依赖任何外部物质锚，不依赖任何可以确定和定义其行动意义的东西。它的锚是纯粹的内在的或者同样性质的，与命令的冲动相同

Proudhon 谈到“séméiologie”(Proudhon, De la Justice, 2:362)。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 395- 397 德勒兹和瓜塔里，《千高原》，395- 397。

《正义的骄傲》3:77 和 79。

骄傲，战争与和平，16。

它和它表达，或与闪避和威胁，表现自己的运动和表达的相同类型

因为它是在外部运作的，在它操纵的对象所受到的阻力上，“工作是一个发动机，它遇到阻力，在外部运作，在其效果上消耗和消耗，并且必须从一个时刻延续到下一个时刻。”正如普劳登所写的那样，“蒸汽机需要加油、维护和修理，直到有一天，由于自然磨损，它不能再被维修或修理，必须被扔到废料堆上，所以每天消耗的人力需要每天修理，直到有一天，工人失业，进入医院或者进入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令人厌恶和艰苦”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奴役和堕落的原则”⁴与这种劳动的消耗相反，在这种消耗中，运动活动必须始终面对外部压力，并由外部资源供给，战争的“自由行动”⁵也是一种运动原因，但这种原因没有任何阻力可以克服，只对机动身体本身起作用，其效果没有消耗，而且从一个时刻持续到下一个时刻⁵。工作中需要的勤奋和精力的损失与战斗的“游戏”、“超人的力量”、“勇气”和“技巧”是相对立的。蒲鲁东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游戏，他可以阻止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战车疾驰而去，他可以抓住一头公牛的犄角，扭转它的脖子使它转向。他的手是钳子；他的大腿，又长又壮，不知疲倦。他可以在 18 小时内跑完 45 英里，并且在同一条路上坚持 7 天。”⁶

战争和工作、武器和工具的第三个区别是关于主观性、智力、“欲望”和“情感”的定义

关于区分工作安排和战争安排的重要性，以及从一种安排转移到另一种安排的困难，实际上，从后者转移到前者，关于通过繁殖生产扇贝的可能性，从而将渔船水手从“狩猎采集者”转变为“饲养者-农民”，Michel Callon，“翻译社会学的一些要素：圣 Brieuc 湾扇贝和渔民的驯化，”权力，行动和信仰：一个新的知识社会学？他说。约翰·劳(伦敦: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196-233。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7。

《正义的骄傲》3:15。

同上。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7。

骄傲，战争与和平，16。

正如 Proudhon 所证明的，工作所带来的“智慧”最终是“学生的”主观性。2“反射性”和“分析性”，它迫使一个人“停下来”，“一步一步地”，通过“劳动及其工具分解成序列和可见标志的直觉的每个术语”德勒兹和瓜塔里把属于这种劳动主观性的“欲望”或“情感”称为“感觉(情感)”“感觉意味着对物质及其阻力的评价，对物质形成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整个重力... ..感觉是一种总是被置换的、迟钝的、抵制情绪的东西。”在这里，战争再一次调动了一种欲望和一种截然不同的主观性。战争超越了劳动及其在意识出现中的作用，与“行为”和“事实”的主要推动力重新结合，它“呼吁”人类的“自发性”，呼吁“创造力”的“即时性”，在任何“分析”、“解构”、“反思”的精神之外或之前。6 蒲鲁东称这种属于战争活动的“自发性”为“神圣的”“战争是一个神圣的事实”：“我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为神圣的，它们直接来自人类的创造力，来自头脑或意识的自发性。我称之为神圣，换句话说，所有发生在这个系列之外的事情，或者作为这个系列的初始条件，对哲学家来说既不承认质疑也不承认怀疑。神圣以强大的力量自我呈现：它不会回答人们对它提出的问题，也不会遭受证明。”这种属于战士的“思想或意识的自发性”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情感”：“情感是情绪的主动释放，是反击... 情感就像武器一样是投射物；情感就像工具一样是内省的。”⁸

战争和工作、武器和工具之间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区别：战争和武器接近人类的力量及其行动能力，因此战争及其武器并没有丧失象征性的力量。因此，历史上它们为人类实现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工作的符号学的代表，客观化的工具将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399- 400。

法官的骄傲，3:73。

Ibid. 78.

译者注：在法语中，sens 既可以表示“方向”，也可以表示“意义”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 399- 400。

骄傲，法官，3:72。

骄傲，《战争与和平》29 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400。

战争提供了另一种符号学，具有表现力和移动性，刻在原始人的身体和武器上，贴近他们，直接展示他们的力量。毫无疑问，“金属加工”、“珠宝制造”以及身体和武器的“装饰”并不构成文字”；尽管如此，它们“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与文字同等的抽象力量”“这些腓骨，这些金牌或银牌，这些珠宝... ..构成了纯粹速度的表现特征，携带的物体本身就是可移动和移动的... ..它们附着在马具上，剑鞘上，战士的衣服上，武器的把手上；它们甚至装饰着只用过一次的东西，比如箭头。”正是如此，用普劳顿这次的话来说，“战士昂首阔步，头盔上插着羽毛，盔甲闪闪发光... ..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被远远地认出来，与众神所爱的对手相比，... ..显示自己配得上这个对手，在两支军队之间，在太阳的注视下。”⁴

全体/极权主义(见观点，个人，无政府主义和单子)。正如人们可能注意到的(尼采)，即使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不能阻止自己去感知“生命的脉动在多大程度上... 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⁵但是它能从自身解放的生命是多么的少，它能向自己和他人表达的生命是多么的少。无政府主义基于对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的解释(见这个术语)，认为人类有能力(除其他外)掌握基于自身资源而存在的事物的整体性——尽管是从有限的角度，通过一个无限小于其所包含的可能性的个体化。无政府主义设想和实验存在的能力，以部署这种无限的权力的可能性，他们从某个观点看到，并使这种潜在的权力实际上通过联邦制-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承认他人-在自己(也见亲和性)-作为单独能够揭示每个人拥有的权力。这就是日益强大的力量的集体构成

同上。401。

同上。

同上。

骄傲，《战争与和平》58页。

乔治·科利(Giorgio Colli)，《尼采之后》，帕斯卡·加贝隆译(Pascal Gabellone)(巴黎: éclat 版，1987)，42-43页。

在一个“统一只能描述多重性”的世界中的力量(见多重性和力量的平衡)

但是,即使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解放世界实验也与人类表达整体性的疯狂愿望相冲突,这种整体性他们自己就有预感——完全基于他们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并使之服从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使所有其他人都服从于他们自己。失败的向整个现实开放,然后转化为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占有和主宰世界的意志。不是横向地向他人的观点和愿望开放,从现实的内部产生一个更强大的存在,而是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情况下,将每个存在特有的观点和愿望投射到他人身上,使他人从外部听从他们自己的运动和他们自己的逻辑。因此,以一种唯一的观点和唯一的欲望来征服世界的极权主义需要一种等级模式,在这种等级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希望从它们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位置来解释和精神化它们从中产生的基础,以便适当地利用“生命的总体性”,使它陷入抽象的网中,陷入诱惑和约束的束缚之中。

传统(见先验/后验)。兰多尔说:“我们需要传统。”。“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与人民和谐共存的具体的多重性基础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预见革命可能走的所有道路。与总是匆匆忙忙的独裁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发现两点之间的直线是最长的。正如兰多尔在1907年,也就是俄罗斯第一次革命尝试两年后,已经能够写作的那样,如果这条道路“可以通过俄罗斯,也可以通过印度”,以及其他任何传统,任何人类文化的历史表现形式。沿着这些思路,柏柏尔诗人哈瓦德反驳了某些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是欧洲独有的,是19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确实认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存在于西方对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诞生的反应之前,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例如,在哈瓦德,在柏柏尔文明,或在中国道教(见这个术语),以及在许多其他人类传统中。

与肤浅的解释可能使我们相信的相反,一个主义并不反对传统,因为传统不仅仅是一个过去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158页。

Gustav Landauer, qtd. in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48-49(转:我自己的修改)。

2000年4月15日,在La Gryffe书店的讨论。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以外在的方式提及。历史，在展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就像构成真实的一切事物一样，在特定时刻继续在构成我们的生命中行动。这些经历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解放和支配性的自由意志主义行动从中选择，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考虑它们(见永恒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Elisée Reclus 观察到“现在的社会包含了所有过去的社会。”就像构成现实的“自然”力量一样，它们只是现实的一个维度，与制度、语言、神话和表象相联系的传统继续在当下发挥作用，这是唯一存在的时间。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在这些基础之上，在这些基础之上，在所有存在的基础之上，自由意志主义行动可以尝试对世界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重组。因此，无政府主义与国际社会不幸的口号完全不同：“不再有传统的枷锁束缚我们”对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自由意志主义计划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现在，在这个现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给予了，在这个现在里面，所有的力量都在无限的可能的安排中参与、限制和部署。

超越(见内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任何超越，反对任何声称是外在于他人或另一种性质的存在或现实。上帝是一种超越性的最充分的表达，在所有存在的事物中，这种超越性证明了统治的合理性。

转换(见行为、直接行动和亲密存在的宣传)。这个概念是由吉尔伯特·西蒙顿提出的，它使人们能够思考一个存在的形成以及行为(见这些术语)通过传播对其不断重组的贡献的方式：“我们通过转导一个操作来理解——物理的、生物的、精神的、社会的——通过这个操作，一个活动逐渐地在—一个领域中传播，这个传播是—建立一个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受到影响的领域的结构上的。”²

变性人(见主体、主观性、孤独和事物中间)。这个概念是吉尔伯特·西蒙顿发明的，它使我们能够思考人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社会和个人之间的错误对立之外形成的。

《人与地》，第6卷，当代历史(续集)(巴黎：图书馆)

Universelle, 1905), 504, qtd. 《无政府主义，地理，现代性：激进的社会思想》

约翰·p·克拉克和卡米尔·马丁(拉纳姆，医学博士：列克星敦出版社，2004)，225。

西蒙顿，个体化心理和集体，24-25。(译者注：也见斯科特，吉尔伯特·西蒙顿的心理和集体化，特别是77-80。)

透明度(见秘密)。

信任(见公共资源)。

U

无意识(见主题)。

联盟(革命)(见直接行动、权力和集体存在)。与亲和团体和个人一样，联盟历史上是自由至上的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因此，应该从工会的解放潜力的角度来理解工会，这种潜力值得称之为“革命性的”，以便将其与其他类型的工会区别开来，这些工会的解放权力相当薄弱，因为它们只关心保护或改善它们所代表的雇员的命运(见代表权)，一般而言，它们置身于现有秩序的网和陷阱之中，不受任何争议。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联盟的“革命性”或“解放性”特征，绝不能在其纲领、领导人的党派承诺中寻找，也不能在使其存在的限制中寻找(见阶级)。它的解放性质完全建立在这种组合模式与其产生的秩序(见起义和直接行动)的断裂之上，同时也建立在以“联合”的名义组成的集体存在的本质之上，建立在解放或肯定的性质之上，建立在其组合模式所产生的力量和反抗的强度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联盟经常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因为马克思主义组织否认由联盟组成的集体存在的内在革命范围(见异化)，而(同时，非常合乎逻辑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革命功用——从外部看，这是它们唯一的理由。这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组织为了利用工会并以阶级斗争的超越性质为名领导工会的同样外在企图的理由，尽管这些企图从解放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可悲的。他说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工团主义(无论它们是源自资本主义还是源自所谓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通常概念的外在和功利性质,支持任何集体在某一时刻都具有的解放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在历史上是工会的表现形式之一。

团结(见一)。

普遍(见政府和特殊)。

普遍因果关系(见塑性力)。一个巴枯宁的概念,在他的词汇中与生命,团结,自然和组成的统一同义。在尼采或德勒兹的词汇中也是物种活动、单一存在和权力意志的同义词。

德勒兹的概念(见塑性力)。

功利主义(见反物种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清算的呈现)。如果功利主义不能作为某些潮流——例如反物种主义——的理论参考,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出现在这个词典中,这些潮流有时声称接近自由至上的运动及其思想。功利主义在其各种形式中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双重性,它将自由主义概括为存在的事物的总体性、它的正当性以及它的社会心理条件。就像一门应用道德的课程(沿着去年小学数学练习的方向),功利主义旨在将我们的生活简化为一种针对我们的行为和感情的市场投资策略,简化为几个简单的原则(快乐、痛苦、兴趣),它意在衡量这些原则,1 其中构成我们的所有东西必须立即不断地转化为一种共同的、可兑换的和普遍的货币:商业法则延伸到存在的所有东西的总体。转化为经济计算,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总是外在的存在和他们的实践。2 与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和分析相反,它从来没有处理不可避免的主观的,单一的,内在的性质和质量的欲望,影响,和原因(见集体理性),产生这样和那样的行为,这样和那样的效果。相反,它规定了对这些行为和影响的评价,而这些行为和影响只是

Jeremy Bentham 采用了七个标准: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接近性,纯度,繁殖力和范围。

作为一个先决条件,道德以判断(动员理由、计算和算术)的形式出现,然后必须“指导实践”(参见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定量的和一般的(因为它是客观的或外部的), 把它们转换成成本和利润, 因此, 正如边沁写道, “唯一共同的衡量事物的本质是金钱。”¹因此, 可以建立一个量化的评估, 就像在政治经济学中一样, 这是一个信贷和借贷、利润和损失的平衡。”²换句话说, “效用原则”延伸到道德生活和行为和质量(特别是在密尔)既不改变其原则的性质, 也不改变其还原论和外在性质(见本术语)。金钱和纯粹经济制裁的“和平正义”只不过被其他人的法庭所取代(可以这么说), 这个法庭是一个要求不同的法官和检察官, 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一个为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影响(男性、白人等等)辩护的问题。然而, 这个道德商业法庭(目前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实践的延伸提供了一个邪恶的视野)永远不会停止回应对经济利益的卑鄙计算。

一个例子(在众多其他可能性中)将足以证明功利主义推理模式的普遍性和外部性, 由此产生的道德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之间的等价性, 以及最后, 这种道德和法律专业知识总是引起的与世界关系的深恶痛绝的性质(见这个术语)(见专家和法律/权利)。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是反物种歧视的首席理论家, 他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一书中写道: “当一个残疾婴儿的死亡将导致另一个有更好前景的幸福婴儿的诞生时, 如果这个残疾婴儿被杀, 幸福的总量将会更大。”。因此, 如果杀死患有血友病的婴儿对其他人没有不利影响, 那么按照总体观点, 杀死他(强调我自己)是正确的。”⁵

杰里米边沁, 边沁的政治思想, 编辑比丘巴雷赫(纽约: 巴恩斯和诺贝尔, 1973), 122。

米歇尔·迈耶, 《盎格鲁-萨克森哲学》(巴黎: PUF, 1994), 93。

“当... 人们无法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任何理由时, 我们可能会拒绝他们按照道德标准生活的要求, 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传统的道德原则[强调我自己的]”(辛格, 《实用伦理学》, 9)。

Singer 从这样一个假设开始: 如果残疾儿童被杀害, 父母可能希望(这里介入概率论)再生一个有很大机会不生病的孩子。

ibid.163.在辛格的辩护中, 让我们强调这个“如果”的重要性(“如果杀死患有恐惧症的婴儿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不利影响”), 这个“如果”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对“有害影响”的功利主义计算(无穷无尽), 但是, 就像辛格的推理与科学的“万物平等”相一致一样, 这个“如果”也开启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次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秩序, 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不会急于以“十诫”、社会习俗或道德原则的名义大声疾呼丑闻。与人们可能相信的情况相反，前一句话的丑闻和耻辱主要不在于其功利主义计算的对象：血友病婴儿的生活质量与其他生命的可能质量相比较，以及决定杀或不杀。它们存在于合法性或专业知识的机构中，而这些机构能够首先假定这种选择。他们居住在这个机器诱导的特定形式的快乐中。它们居住在这种两难困境所提示的计算模式中(你更爱谁，你的父亲还是你的母亲？汰渍还是获得品牌洗涤剂因此，在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计算需要。这种关系相当古老，与伟大的威权宗教的诡辩密切相关。无论是在当地超市还是跨国公司的广告中，还是在任何专家或经理的实践中，无论他或她的应用领域是什么(见本术语)，从禁烟运动到信托或国家的管理，以及退休、安乐死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点，更不用说“道德委员会”的激增了这样，例如，根据其商业和普遍的等效原则，Singer 的声明可以简洁、立即、自然地转换成以下形式(因此也可以转换成许多其他形式，你可以自由地推断出来，不管这是令你沮丧还是令你愤怒[参见这个术语])：“当一家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的清算导致另一家盈利机会更大的公司的诞生时，如果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被清算，利润总额就会更大。第一家公司的清算通过第二家公司获得更大的利润可能性得到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从总体经济角度来看，如果清算陷入困境的公司不会对其他公司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那么它的清算就是合理的。”

因为它肯定了存在、情况和事件的绝对奇异性，以及这些存在、情况和事件同样绝对的权利，去实验和定义他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而不必参考外部权威(甚至不是还原论和数学公式的错误客观产物[见统计])，无政府主义厌恶功利主义和功利主义。

乌托邦(见理想)。

从根本上粉碎了功利主义和它的店主的良好感觉。对于科学的还原性推理的批判，参见米歇尔·塞雷斯，特别是《五种感官：混合体的哲学》。玛格丽特·桑基和彼得·考利(伦敦：布鲁姆斯伯里，2016)。

V

复仇(见怨恨)。被侵略或被控制时对痛苦的延迟反应。无政府主义对于任何复仇的概念,对于任何“分数设定”,对于任何不可避免的追溯性“审判”都是陌生的这是因为,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总是试图立即和直接地根据该情况允许的情况和它阻止的情况采取行动,因为它认为,在这一直接情况下,一切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好是坏(见好/坏)。从习惯道德的角度,以及从它(显而易见的)对立面——武力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总是从零开始——就像著名的 Edith Piaf 歌曲“Non rien de rien, je ne regrette rien!”¹—没有记分,没有账簿,在所有存在的基础上。

暴力(见反抗,矛盾,责任,处死,和类似战争的)。作为约束和支配的外部关系的指示(见这些术语),暴力表现出两个方面。虽然从支配性和限制性方面来说,暴力纯粹是消极的,但当一种力量肯定自己的权利和能力,而其他力量试图将其从属于自己的存在理由时,暴力就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如叛乱和起义(见这些术语)。在与之相对应的行动中,暴力还包含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没有外部限制的基础上的(见这些术语),但它也经常冒着立即转变为统治、转变为外部限制的风险,这是经常可以证明的:当俄罗斯工人,1918年的叛乱分子,转变为一个酷刑者和 Cheka 的代理人;当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工人利用他头上的黑红帽子来转变

译者注:这里的歌词直接翻译为:“不,绝对没有,我没有后悔!”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警察、一个法官和一个施虐者。我们如何区分解放性暴力和压迫性暴力？像斯宾诺莎一样，无政府主义拒绝断然判断暴力行为，遵循十诫(“汝不可杀戮!”)的模式。杀人的方法和拯救生命的方法一样多(好的或坏的，程度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也拒绝根据他们的意图或目标来评判这些行为(见目的/手段，朋友/敌人²)，而是根据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决心、意志的质量以及激发它的欲望来评判它们(见这些术语)。暴力行为是否增加了与之相应的存在的力量，以及伴随着这种力量(它的唯一判断者)的喜悦感？这种快乐的质量是什么？它是积极的和传染性的，如在反抗或起义中，还是被动的(见反应)，如当一个人高兴的悲伤强加给他的敌人？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判断暴力行为的标准，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可以试图恢复战争的意义和价值，庆祝大力神的愤怒和暴力：

“赫拉克勒斯，由于他的许多功绩，已经是一个杰出的年轻人，但是他的教育被极度忽视，从他的父亲接受了进入底比斯学校的命令。但是，Amphytrion的儿子把他所有的意志力和理解力都用在了这些微妙的学习上，却徒劳无功。他的智慧，所有的直觉，都不能成功地掌握任何分析性的东西。语法规则在他的大脑中一闪而过，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一年之后，赫拉克勒斯什么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他的力量是超人的，他的勇气和他在每一个练习中的技巧都和他的力量相当。就像所有的英雄一样，面对敌人，大力神突然灵机一动。他立刻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此刻的智慧超过了最聪明的人。

学年结束时，校长宣布颁奖。当天，全市都去参加颁奖典礼。家长们，孩子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只有赫拉克勒斯没有得到奖品。对于他所有的能力，他所有的免费服务，3 校长甚至没有给他一个荣誉的提名。

切卡河是苏联建立的第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全国劳工同盟，一个大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是 1936-1939 年西班牙内战的主要参与者。

译者注：虽然有四个交叉引用的条目的术语朋友/敌人，这个条目没有出现在 Petit 词汇表。

他在阿卡迪亚(Arcadia)杀死了一头巨大的野猪，用箭射穿了 Stymphalides (一群秃鹫，能够带走一头两岁的小猪或小母牛)，用棍棒击碎了 Nemean 狮子的头部，生吞了一个食人暴君，分裂了 Lerna 的九头蛇

大家都笑了起来。

“愤怒的赫拉克勒斯踢翻了讲台，掀翻了凯旋门，掀翻了长凳、座椅和洒满香水的祭坛，打碎了三脚架，把王冠撒得到处都是，把它们堆成了一堆，然后大叫着开火。然后他抓住校长，把他塞进一条蟒蛇的皮囊里——从蛇嘴里伸出来的那个人的头给他戴上了一个野猪的头，把他吊在分发奖品的那棵白杨树上。女人们惊恐地逃走了；男学生们消失了；人们离开了：没有人敢面对赫拉克勒斯的愤怒。”¹

男子气概(见肯定和集体力量)。男子气概的形象和概念在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话语和想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主要由男性组成，这一事实本身不应导致我们将这一概念仅仅归结为其性或性别的内涵。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男子气概以其话语性和形象化的形式，主要是肯定和力量的同义词，因此也是所有集体无一例外的共同力量。好战的经历，如生活及其各种联系和分离，足以表明，男子气概，在自由意志主义意义上的术语，是无关的性别和性别类别。从力量和意志的角度来看，男人不能凭借任何特定的倾向来统治，无论是解剖学上的还是论述性的。

至关重要(生命力，活力，政治生命力)(见自然，生命，和外部力量)。因为无政府主义经常将自己与“生活”(特别是在巴枯宁)相提并论，而且由于许多原因，它的工人阶级表达方式可以与伯格森和尼采相提并论，乍一看，人们可能会忍不住把它与一种特别明显的政治活力主义形式相比较。然而，无政府主义与活力主义以及人们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毫无关系。它声称要表达的生命绝不能简化为现实的生物学或有机的视角。它主要指的是存在的力量，准确地说，存在的力量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见自然的控制和蒲鲁东思考无机物、生命和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方式)。作为力和力之间差异的同义词，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纳吉斯的生命概念可以与“势能”的概念联系起来

一分为二，一个捕食旅行者的大强盗被剥了头皮，他的头发变成了苍蝇拍，利哈斯半岛众多嫉妒嘲笑他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冲了出来。要了解这种叙述的完整版本，请参阅 Proudhon, *La Guerre et La paix*, 14 et passim, 这是

Proudhon 为大学生免费翻译的一本拉丁语教材。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吉尔伯特·西蒙顿理解。在一个更接近自由意志主义词汇表的用法中，它也可以与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的“能量”(energy)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概念中，生命总是以“活力”(élan)的形式存在，即某种“不可抗拒”(irresistible)、“无政府主义”(anarchy)、“造物主”(demiurgic)、“保护”(prote-an)等等。生命总是超越任何秩序，甚至超越生命的秩序，超越任何有序和稳定的“类型”(types)正如塔德所写：“类型只是刹车，法律只是徒劳地竖立起来的堤坝，用以抵御革命分歧和内乱的泛滥，在这些堤坝中，明天的法律和形式秘密地成形(见亲密关系)，尽管它们背负着枷锁，尽管它们有化学和重要的纪律，尽管它们有理性，尽管它们有天体力学，但终有一天，它们会像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扫除一切障碍，从它们的残骸中建造出更高多样性的工具(强调我自己的)。”²

自愿主义(见意志，自愿主义不应与之混淆)。一种理想主义和(因此)专制主义的压迫性秩序的概念，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应该服从他人(上帝、国家以及他们的众多牧师和仆人)发出的外部指令，根据我们能够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的原则，我们能够履行我们所有的道德义务。相反，继哲学家让·马利居约之后，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一种没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个人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³这个命题看起来只是限制性的，因为每个人特有的权力在可能性上比任何法律、道德原则或规范性规定都要丰富得多，无论是好是坏(见这些术语)。

自愿服役(见外部/内部)。

米莱，加布里埃尔·塔德和历史哲学，180。

Tarde, *Monadology and Sociology* 46-47, 我自己修改的。在这个意义上，令人遗憾的是，Maurizio Lazzarato 在一篇本来非常有趣的文章(*Monadologie et sociallogie*, Gabriel Tarde 的后记)中，将 Tarde 关于力量和能量的概念，与文本本身的论点相反，降低到狭义的活力主义维度(在当前的意义上)，将其文本命名为“Gabriel Tarde: un vitalisme politico”(Gabriel Tarde: a Political Vitalism)，从而将 Tarde 分析的政治和革命含义限制在生物权力问题的框架内——这个框架固然有趣，但与 Tarde 分析的自由意志主义维度相比是有限的和具有欺骗性的。让·马利居约，*道德素描独立于义务或制裁*，格特鲁德·卡普坦译(伦敦：瓦茨，1898)。

W

战争(好战)(见工具/武器、起义、暴力和劳动)。由于无政府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并在 1914-1918 年战争的集体创伤之前积累了大部分经验,因此它与一种英雄主义形式密切相关,其重要性不应被 20 世纪的军事和极权主义恐怖所掩盖。如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主义反应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体和平主义的失常,那么,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某些潮流中往往盛行的某些非暴力版本是否也包含与自由意志主义解放完全不相容的力量和意志,这一点绝不能肯定。反抗、起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骄傲、暴力和与死亡的关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及其计划的中心:1831 年里昂丝绸工人的黑色旗帜("宁愿死在我们的脚下,也不要跪着生活!")马克诺维斯特起义军的骑兵和轻骑兵,或者,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1936 年 7 月 Ascaso 在巴塞罗那的兰布拉斯战役中死亡。从历史上看,无政府主义运动将死亡融入其计划的方式——无论是旗帜的明确象征意义,还是其战斗中常常令人绝望的特征,或者从另一个意义上说,1880-1890 年间的袭击(见无政府主义化学)——都是病态或虚无主义的表现。自由至上的运动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恐怖,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战争令人厌恶的性质

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得较晚,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在一个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这场革命是 19 世纪自由意志主义工人运动最终表现形式的一部分。Tachanki 是装在农民手推车上的机关枪,是 Makhno 部队的战术革新。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它从未停止通过不服从命令和一贯拒绝任何形式的军事化和军事机构来谴责和口头上和行动上打击使这些行动成为可能的军事机构。¹但是，这种抵抗和谴责(个人或集体)不应与拒绝斗争本身混为一谈，即使是在最明确和最残酷的战争层面上:当涉及“拿起武器”、从对手和军事机构手中夺回武器或将工具变成武器的问题时(见工具/武器)，使它们服务于与其主要职能完全不同的目的，将它们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动态之中，一种全新的运动，尽管如此，这种运动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经常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特殊的利己主义和对自我的关心与自我的展开[展开]是绝不相容的，这种展开[展开]经常推动一个人去冒生命危险，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参见这个术语)，因为这种生活恰恰包括去到一个个人能力的极限，发现一个人所包含的外在力量(参见这个术语，也包括超越自我，暗示)，在那里，也许，生与死合并

毫无疑问，巴枯宁最好也是最频繁地表达了这种自由意志主义起义和叛乱的好战和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当他呼吁“人民的行动”、“全体法国人民的大规模起义”、“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起义”、“毁灭战争”、“无情的生死战争”时但我们也在路易斯·米歇尔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她对儿童虐待动物的行为感到厌恶，但她仍然参与了巴黎公社的所有战斗，肩上扛着步枪，4月10日，公社官员向她表示祝贺，因为她“杀害了几名宪兵和警察”正如她在回忆录中解释的那样，“我是野蛮人，我喜欢大炮，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和机关枪子弹的味道。”即使是劳动的激情歌手普劳顿，也不得不赞美战争和战争的美德，因为人们不应该过早地指责他:

“战争，我们向你致敬!正是战争使人们能够表现出威严和勇气

看到美丽的西班牙文本，一天悲伤和阴沉: 由一个“无法控制”从

《铁柱》(伦敦: 凯特·夏普利图书馆, 2003年), 最初于1937年3月发表在《Nosotros》杂志上, 或1918-1921年马克诺维斯特军队的组织和行动方法。

关于“生命是外在的力量”及其与死亡的联系, 参见德勒兹、福柯、94及其情绪。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给法国人的关于当前危机的信》(Letters to a french chman on the Present Crisis), 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 184页。路易斯·米歇尔, 《红色处女: 路易斯·米歇尔回忆录》

伊丽莎白·艾灵顿·甘特(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 1981年), 66页。

当他刚刚从原始的黏液里出来的时候，那黏液就像他的子宫一样服侍着他。当他站在一个被他杀死的敌人的尸体上时，他第一次梦到了荣耀和不朽。我们博爱的灵魂被自由洒落的鲜血和自相残杀的大屠杀吓坏了。我担心这种神经质可能表明我们的美德正在衰退... ..狼和狮子之间的战争不会比绵羊和海狸之间的战争更多。长久以来，这一事实一直被用来讽刺我们人类。为什么人们没有看到，恰恰相反，这是我们伟大的标志；如果想象一下这种不可能的情况，大自然把人类塑造成一个专门勤劳、善于交际的生物，而不是一个好战的生物，那么人类从一开始就会沦落到野兽的地步，而这些野兽的命运仅限于纯粹的集体存在？为什么他们看出来他已经失去了革命的能力以及他自豪的英雄主义，那是他所有能力中最不可思议和最丰富的一种？”¹

人们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当代表达中发现了这种对战争和好战的积极看法：例如，在皮埃尔·克拉斯特对无国籍社会的分析中，特别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当尼采之后，他们把“战士”和“士兵”、“游牧战争机器”(Makhnovshchina 无疑是近代历史上最好的例子之一)和“国家机器”区分开来时⁴事实上，除了印欧传统中的两位伟大神灵——Varuna 和 Mitra (魔术师——国王和祭司——法官，债券和契约，暴君和立法者，国家和统治的创始人夫妇)之外，还有一位像战争一样叛逆的神——因德拉，他是“纯粹和不可估量的多样性、群体、短暂的突破和变形的力量”的神，他是“在背叛契约时解开债券”的神，他是“在背叛契约时解开债券”的神带来了测量的狂热，对重力的敏捷，对公众的秘密，对主权的力量，对机器的反对他是战神，“见证了另一种正义，有时是难以理解的残酷，但在其他时候也是无与伦比的怜悯，”他“见证了，最重要的是，与女人，与动物的其他关系，因为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成为的关系，而不是执行二元分配之间的‘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成为动物

蒲鲁东，p.j. 蒲鲁东著作选，203-4。

皮埃尔·克拉斯特，《反对国家的社会：政治人类学论文集》，罗伯特·赫利译

和亚伯斯坦(纽约：地带图书，1987年)，和考古学的暴力，简宁

Herman (洛杉矶：Semiotext (e)，2010)。

“我看到许多士兵：要是我看到许多战士就好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义者，作为 Fernand Pelloutier 所说的“不断的反叛者”和“自我修养的热情爱好者”，反对“好战分子”，即致力于人道主义事业的服从的士兵(Pelloutier，“给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于1899年12月3日至8日在法国社会党大会上发表[Paris: P.-V. 股票，1900]，vii.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一个战士，一个成长中的女人，它超越了术语的二元性以及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每个方面，战争机器都是另一个物种，另一种性质，而不是国家机器的起源。”¹ 相当合乎逻辑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对工作的批判(见劳动/工作)开始，可以强调“19世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之间的对立”的根本性质，前者的意愿是夺取权力和改造国家机器——“劳动力的观点”——而后者的意愿是摧毁国家资产，即“游牧权力的观点”这种反对意见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提到“起源于东方的游牧主题”的合理性，即无产阶级意图使无产阶级成为“西方世界游牧民族的继承人”

武器(见工具/武器)。

Will (见集体力量和安排)。这是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在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马拉泰斯塔的思想中。与笛卡尔二元论的模式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的意志概念与所谓的选择或决定自由没有任何关系，这种选择或决定自由总是被它所征服的人的压迫性命令所预先假定和要求的，例如，当一个人要求一个孩子展示他或她的“意志力”，使自己屈从于自己愿望之外的要求(履行义务，爱他的小妹妹，尊重性道德)，或者，更多的是以太论，当一个人要求一个公民在投票箱前表达他或她的“意志”，或者当他或她签署一份合同(工作、婚姻、租赁等)时。在自由意志主义这个术语的意义上，集体存在的意志总是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表达这个存在的力量、愿望或力量、奇异的安排以及在特定时刻构成它的力量和情况的质量。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主义关于意志的概念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比所谓的自由意志有更多的共同点。一种“纯粹的”意志，与作为其主体的存在所固有的任何决定相分离，其唯一明显的表现是存在强加于自身的限制，总是表明一种支配关系，即存在服从于自身之外的另一个存在。这是它强加于自身的意志的唯一来源(这次是相当真实的)，它将自身的力量与自身的意志分离开来(见自律)。

权力意志。尼采的概念(见塑性力量、权力和欲望)。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个高原》，352页。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千高原，558n61。

工人(工人主义)(见劳动/工作)。

工人分裂主义(见主人/奴隶)。

世界(多个世界)(见内在平面)。

小调作品

该系列的其他作品:

不稳定的狂想曲- Franco "Bifo" Berardi

Imaginal Machines- stephen Shukaitis

新的联盟, 新的自由空间- Felix Guattari 和 Antonio
Negri

职业食谱

要求不可能的用户指南- 叛乱想象实验室

壮观的资本主义- 理查德·吉尔曼- 奥帕斯基

市场不是资本主义。 Gary Chartier & Charles w. Johnson
revolution in Reverse- David Graeber 加里·查蒂尔和查

尔斯·w·约翰逊反转革命——大卫·格雷伯

解读高校战略乐观交往及其不满。 Benjamin Noys

19 & 20- Colectivo situations 本杰明·诺伊斯 19 &

20- Colectivo situation

El Martillo- Eclectic Electric Collective

占领一切! 反思“为什么它无处不在”—— Alessio Lunghi 和 Seth
Wheeler

Punkademics- Ed. 扎克·弗内斯

[开放]乌托邦- 托马斯·摩尔和斯蒂芬·邓科姆合同与传

染- 安吉拉·米特罗波洛斯蹲在欧洲- 蹲在欧洲的集体

Artpolitik: 分裂时代的社会无政府主义美学- Neala Schleunig

下议院- Fred Moten & Stefano Harney 纳米政治手册-

纳米政治集团

危险的共产主义: 明显的突变, 宣言绕道- 理查德

吉尔曼- 奥帕斯基

FutureChe- John Gruntfest & Richard Gilman-

Opalsky Lives of the Orange Men- Major

Waldemar Fydrich State in Time- 欧文

起义的危机- Mikkel Bolt Rasmussen

从普鲁东到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词典

职业文化- 艾伦·w· 摩尔

起义的危机- Mikkel Bolt Rasmussen Gee Vaucher

我们愤怒的美学- Ed. Mike Dines & Matthew Worley

The Way Out- Kasper Opstrup 迈克· 戴恩斯 & 马修

· 沃利出路- 卡斯帕· 奥普斯特拉普

把我们自己置于错位教育之中。 Marc Herbst et al. 社交

媒体之后的组织- Geert Lovink and Ned Rossiter don't

Network- Marc James Léger

神经资本主义。 技术调解和消失的路线- Giorgio

Griziotti